

出生地

我们来到人间，偶然诞生在一个地方，这无关紧要；久而久之，我们才在心中形成自己真正的出生地，因此，也许要回顾以往，我们才能知道，才能一天比一天更肯定自己诞生于何处。有些人精神上的出生地与护照上写的恰好吻合，能同外界达到如此的和谐一致将会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幸福。

——R.M.里尔克

1923年1月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于1888年10月14日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这么说似乎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丝毫没有文不对题，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展开故事的方式，从而能进一步叙述她的生平、艺术以及生活年代等等。然而这不能表达实际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哈罗德·比切姆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因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过是她19年以后才采用的笔名。我们几乎不能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那天出生的，人们不能回避这么一个事实，即她的故事一开始就很复杂——包括姓名本身的问题。

谈到她的父亲并没有什么困难。哈尔·比切姆是位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有着姜黄色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红胡子，非常引人注目的蓝眼睛，他在一家老字号的进口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惠灵顿码头有事务所和货栈，他18岁就开始为其效劳。尽管当时这块殖民地正因为轮船运输业的发达而日益繁荣昌盛，但公司业务却已处于停滞状态。经过11年的努力，他使公司恢复了活力，由于公司业务大量增加，老板让他成为自己的合伙人。当那大早晨他第三个女儿出世时，他还差一个月就满30岁了。

他那漂亮小巧、褐发褐眼的妻子身体有些病弱，风湿病时而发作。她比丈夫小6岁，对他充满爱情，但是讨厌每个月固定的日子里必须坐在饭桌旁丈夫身边，浏览所有的家务帐目，为每一个便士精打细算。她自己的野心是参加社交生活，尽管这个小城只有3万人口。

比切姆家在靠近港口的近郊桑顿造了一所木房子，同安妮的母亲戴尔太太以及两位姐姐凯蒂和贝尔一起搬进了新居。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女儿，家中尽是女人，该要一个儿子了。男主人目前还不是沃·姆·伯拉廷公司的老板，还没有开始“挣大钱”，但是老伯拉廷在英格兰去世意味着合伙人位置的空缺，再有一人去世，他就大权在握了，到那时他就可以成为首都几家公司的董事、港口董事会成员，锦绣前程将在眼前展开。哈尔·比切姆生于澳大利亚的一个金矿上，其父亲生性喜欢东游西荡，但他绝不愿仿效父亲的榜样。也许惠灵顿上流社会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淘金者出身或比切姆太太出人头地的希望，但是最终他们将会拥有比弟纳柯里大道上那所盒式木屋大得多的住宅，可观的财富，国内的金融权力，爵士封号和贵族纹章，而登峰造极的则是比切姆70多岁时出版的《往事与追忆》，这本书红皮精装，饰有金色盾

R.M.里尔克（1875～1926），著名的德裔奥地利作家。他对20世纪的德语文学有卓越的贡献，代表作有《祈祷书》《马利亚生平》等。——译注

哈尔·比切姆即前文哈罗德·比切姆。——译注

安妮系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母亲，凯蒂和贝尔则是她的姨妈。——译注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近郊桑顿一地名。——译注

形纹章。虽然这一切在当时都尚属难以预测的未来，但至少从哈尔·比切姆的照片中能够看到一些迹象。1888年春天的这个星期日，全家人都焦急地盼望着一个儿子的出世。

一篇名为《生日》的短篇小说，写于21年之后，其中描述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与那天早晨的事实相符。毫无疑问是那所房子，屋后的栅栏紧靠一条布满蕨类植物的边缘，吊桥在几步之外，是男主人去请医生的必经之路。那天他紧张不安，连午饭也没来得及吃，这是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好心的外祖母正准备当接生婆。小说中所有的角色都有德国人的姓名，这不过是一种掩饰，毫无顾忌地叙述事实才是她的目的。男主人来到医生家中：

“啊，比切姆，”医生拍去珠灰色背心上的面包屑，快乐地说道，“儿子和继承人迫不急待地要出世了吗？”

比切姆立刻精神振奋起来。天啊，儿子和继承人！

他很高兴再次和男人打交道，这是个聪明人，每天都碰上这种事。

“但愿如此，大夫，”他笑着回答，拿起帽子，“母亲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催我立刻来请您去。”

“马车很快就回来，同我一起乘车去，好吗？”

故事中是个男孩，但是那天坎普大夫举在手中的婴儿却是个女孩，像父亲一样结实健康，有着母亲一样的褐色头发和双眼，当然不能取男孩子的名字，于是被命名为凯什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是戴尔太太娘家的姓，代表着一种孩子后来感到自己从小就享有的爱。

安妮·比切姆不会照料婴儿，孩子从一开始就由戴尔太太照看，成为奶奶的凯丝。她一周岁时母亲就随哈尔去英格兰公事旅行，这并未怎么影响她。安妮回来后又怀孕了，1890年10月11日给丈夫生了第四个孩子，又不是男孩，这个孩子染上了小儿霍乱，需要戴尔太太全力照看。1891年1月9日孩子死了，而此时凯丝已开始夜间做恶梦。她外表胖乎乎十分可爱，但却渐渐形成一种对外界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哪怕不睡觉时，对夜晚也怀有一种恐惧。

接下来的5年比切姆一家一直住在弟纳柯里2号，房子正对着一座光秃秃的高山，山上过去曾覆盖着一片树林，但现在却拉拉杂杂地长着荆豆，散布着羊群。上世纪90年代的摄影家们曾拍摄过绿树成荫的桑顿全景，远处是码头和轮船，凯瑟琳的出生地隐约可见。事实上这条路顺着土地的一个大裂缝延伸，裂缝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断带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就出生于这个断带上。

桑顿的房屋全是木质结构，坐落于树丛中，彼此隔开一定距离，以免火灾蔓延。比切姆的房子比别家更为简朴，正方形，上下两层，唯一的装饰是门廊四面安装着玻璃。哈尔·比切姆每天从这儿徒步去海关码头的事务所办公，惠灵顿的晨风使他神清气爽。为了谋利，他十分重视对这块殖民地的货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著短篇小说之一。——译注

凯什琳是幼年时的名字，以后改名为凯瑟琳。——译注

凯什琳的爱称。——译注

物供应，诸如：诺贝尔的炸药，享有“时代光明”之称的煤油，德累斯顿的钢琴，埃及香烟等等，总而言之，是所有为开发这片新殖民地，为那些远离中产阶级舒适生活所需的物品。这种生活本身也正在被渗透，这一点他女儿的观察更为细致入微。

近在咫尺的码头和轮船总在召唤人们离去，凯什琳半岁时就已熟悉了那儿的景色和气息。1889年，也许是复活节那天，家人携她渡过库克海峡去皮克顿小城拜访祖父母。祖父亚瑟·比切姆躺在床上，“像一只非常衰老、毫无睡意的鸟。”这个形象后来出现在她的故事《旅行》中。

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长辈。亚瑟·比切姆的某些性格特征丝毫不差地传给了他这位有名的孙女儿，她在自己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还无可奈何地提到这些特征。

亚瑟年轻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流浪汉，到处寻求殖民地所能提供的种种坏运气，写些滑稽可笑的西部打油诗来嘲笑它们，如果对得上号的话，还用些拜伦式的诗句。他从不在于一个地方呆上几个月，总是卷起铺盖搬家，家里人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常常苦笑着说，他养的鸡听见打点行李的声音，也会立刻仰面朝天躺下，乖乖等着主人把自己绑起来带走。如果帮工们此时有些怨言，他总是引用几段《唐璜》中的诗句来回答，毫不在意别人是否感到尴尬。

他是某个约翰·比切姆的儿子。此人儿子多得不可胜数，在伦敦有一家祖传的曾经兴旺发达的银匠作坊，这位祖先写些打油诗，从而赢得了“霍恩赛街诗人”的称号。然而他写诗和做生意的才能都有限，尽管他似乎发明了一种新的仿银器，却并未获得专利；他能滔滔不绝地背诵拜伦诗作（这种天赋也传给了亚瑟），或者骑马纵狗打猎，等到“饥饿的40年代”来临时，已没有什么留给亚瑟和他的兄弟们了。

他们的母亲同艺术关系更为密切。她是画家C.R.莱斯利的嫂嫂，曾给他当过模特儿。后者是约翰·康斯太布尔的朋友和传记作者。

康斯太布尔在一封信中曾写道，有一天，他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去“比切姆先生”的作坊观看那些“锻炉、坩埚、金属、车床、皮带和风箱、煤炭、煤渣、灰尘、脏土、炉渣，以及其他对男孩子胃口的东西。”

银匠的孩子们在学校读书至13岁左右，炉渣和尘土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不管怎样，作坊终于倒闭，哈尔·比切姆后来对这结局极为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那种情形下，我祖父毫不阻止男孩子们自谋生路。”至于“霍恩赛街诗人”，就再也无人提起最先离开的是亨利·哈伦·比切姆，他是后来爱德华时代畅销书作家“伊莉莎白”的父亲（后者以其《伊莉莎白和她的德

德国东南部一城市，是一座有着悠久歌剧传统的音乐城，——译注

连接新西兰南岛与北岛之间的水道。——译注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唐璜》为其代表作之一。——译注
伦敦市区一街道名。——译注

C.R.莱斯利，英国19世纪画家。——译注

约翰·康斯太布尔（1776～1837），英国著名风景画家，提倡并追求尽可能真实地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面貌。——译注

指英王爱德华七世（1841～1910），在位期间（1901～1910），常指20世纪头10年。——译注

国花园》一书闻名于世），他的孙儿是布卢姆斯伯里 成员之一，曾向维吉尼亚·吴尔夫求过婚。亨利 15 岁时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在那儿成家，花费 16 年的时间积累财富，然后携全家回到欧洲，在洛桑住了几年。1889 年的一天，他 22 岁的女儿梅在罗马的美国教堂内演奏风琴，一位鳏居不久的德国伯爵对她一见钟情，他在佛罗伦萨向梅求婚，把她带到了自己的领地。几年以后，梅隐瞒了真实身份，开始发表自己极为受欢迎的作品，她的文笔挥洒自如，有着一一种洋洋自得、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亚瑟是银匠的第六个孩子，姑母们的宠儿，双眼炯炯有神，常常诗兴大发。他在城里给一位吝啬的亲戚当了 7 年学徒，写了一些打油诗，其中总有同样的叠句：“他留住了金钱，我保留了自由。”1848 年，21 岁的亚瑟乘船去悉尼，同他没有诗意的哥哥相处使他重新唱起了那些叠句。他加入了维多利亚淘金者的行列，同样一无所获，接下来的 6 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澳大利亚，当过小店主，探险者，乡村导游，锯木厂老板，百货商和拍卖商，音乐会中的男高音流行歌手以及小地方的政客，不过他至少有一次聪明之举，那就是 1854 年他娶了伊丽莎白·斯坦利为妻，她也像那些家禽一样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丈夫每次宣布搬家时，她总是温顺地点点头，“是的，亚瑟”，然后开始打点行李。“我的确可以说从没见她发过脾气，”他儿子以有些居高临下的笔调写道，“我只能说她是一位人间的圣者。”

在淘金地生的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1858 年，哈尔出生了。他生在矿区，当时父亲似乎做着“百货商”，他是在淘金用的流砂槽内受洗的。两年后，亚瑟的一位有钱的姑母在新西兰给他留下了一块土地（不久就被别人骗走了），于是全家渡过了塔斯曼海。

家里人都称呼亚瑟·比切姆“老爸爸”，这个称呼他孙女儿后来经常用到，有时也用来形容自己，似乎指的是一种无忧无虑、无责任心的人，总是第一个嘲笑自己的不足之处。有次亚瑟在马尔博罗一口气演讲了 10 个小时，直到 5 小时后，他才说：“主席先生，刚才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现在接着讲主要问题”。这确实是“老爸爸作风”。另一“老爸爸作风”的典型例子，是他离开城镇跑去看管丛林，全家人靠吃鱼、羊肉和野鸟度日。哈尔写道：“在那儿，我父亲继续让我们受教育。”后来又搬家、送儿子去当地的学校读书，给教师捎去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先生，今送去我儿子哈罗和亚瑟，请查收。”这也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老爸爸作风”。

17 岁时，哈罗已受过他父亲的方式所能允许的最完全的教育，便决心找条更好的出路，当父亲再次搬家时，他在伯拉廷公司找了个工作，从此开始他事业蒸蒸日上的城市生涯。

他对诗艺也颇有些兴趣，学会了弹钢琴，甚至还曾经希望过在音乐会中演奏短号。他在惠灵顿“结识了许多非常好的年轻人”，加入了划船俱乐部、足球俱乐部以及“行吟诗人小协会”，担任协会演出的伴奏。”我能记得起来的当时演奏过的曲子今天早就过时了，例如《少女的祈祷》《金浪》《快

英国一些作家、艺术家（1907~1930）年间常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地区的贝尔夫妇和维·吴尔夫家聚会、逐渐形成的一个团体。——译注

维多利亚，澳大利亚东南部一州名，首府墨尔本。——译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西南太平洋海域。——译注

新西兰一地名。——译注

乐的农夫》等等。”

在伯拉廷公司还有一位姓戴尔的年轻职员，他漂亮的妹妹当时才 13 岁，他们母亲未嫁时名叫玛格丽特·伊莎贝尔·曼斯菲尔德，她后来对凯·曼斯菲尔德的生活影响至深，也许超过亚瑟·比切姆。

比切姆断然宣称自己的回忆录涉及“良好的门第”，其中谈到戴尔奶奶时只说她是悉尼“漂亮的曼斯菲尔德小姐”，他的女儿们最多也只肯说仅仅知道她是“爱尔兰人”，尽管这在早期的澳大利亚意味着有一位并不令人十分尊敬的祖先。

事实上她父亲是悉尼的一位酒店老板，从英格兰来到澳大利亚——不是作为囚犯，只不过是一般的乘客——而且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爱尔兰血统”。

塞缪尔·华星顿·曼斯菲尔德在 1825 年 22 岁时来到悉尼，5 年后领取执照开了一家名为“霍普”的小酒店，又过了 9 年，娶了新从萨默赛特来的一位女子玛格丽特·查尔斯为妻。她出生于巴思，父亲是海员。成亲的那年，塞缪尔在悉尼开了两家酒店，一家名为“旭日”，另一家专为海员开设，名叫“金锚”，位于码头附近，那儿现在修建了悉尼港大桥，凯瑟琳的外祖母就在那儿长大。玛·伊·曼斯菲尔德 1839 年出生，受洗为英国教徒，她父亲名义上也属于这个教会。她后来改为美以会教徒，与 36 岁的保险公司职员约瑟夫·戴尔结婚，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安妮出生于 1864 年。后来约瑟夫受命前往惠灵顿开办第一家澳大利亚互助协会新西兰分会，1877 年他去世时留下一大笔债务和几个孩子，自己的人寿保险金也无济于事。

从一开始安妮·本耐尔·戴尔小姐就是毫无疑问的人选，黄胡子哈尔显然从未想过要为金钱结婚，安妮 14 岁时他就开始追求她，让她不得安宁，直到她长大成为自己的妻子。那时他 26 岁，可以养活她母亲和另外两个姐妹。

在凯·曼斯菲尔德有关童年的故事里，母亲和祖母总是相反的人物：祖母耐心、机智体贴；母亲与其说是温柔忍耐，不如说是无精打采，得过且过，她关心丈夫的需要，但对孩子疏远冷淡。安妮是一位娇弱的妻子，对丈夫热情体贴，她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拯救他，照料他，使他安静下来，听他说自己的事”。她像《在海湾》中的琳达·本耐尔一样害怕生养孩子：“是的，这是她对生活的真正不满之处”，因为生养孩子，她被拖垮了，失去了勇气，尤其难以忍受的是她不爱自己的孩子。

戴尔太太，也就是本耐尔系列小说中的费尔德太太，是那种谦卑、老练，善于为人处世的妇女，生有 9 个儿女，后来又为安妮照料 5 个孩子。靠仆人和几个未婚女儿的帮助，13 年来她把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每当一个孩子出世，安妮可以碰都不碰一下。女儿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世上，家务安排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说明哈罗·比切姆有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而祖母的功劳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凯·曼斯菲尔德没有经历过本耐尔故事中那种大家庭生活，我们就几乎难以想象她的文学创作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

凯瑟琳 4 岁时，又一个女儿出生了。比切姆决定让孩子们在乡间度过童

英国西南部郡名。——译注

英国西南部城市名。——译注

本耐尔系列小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写，以主人公本耐尔家生活为主要情节，如《在海湾》等。——译注

年，他在卡罗里找到了一所很大的空房子，坐落在离市区 4 英里外的一个高地峡谷旁，由一条弯曲的道路通往城区。他签了 5 年的租约。尽管此房子在 50 年代享有盛名，被称作“切斯尼沃德”，但它既不“荒凉”，也没有一点狄更斯小说味，与桑顿那积木式的房子相比，它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旁边有已生长近 40 年的树木，果园也有同样长的历史，还有温室，平坦的车道，有足够的空间供仆人居住，车道旁还种着一颗高大的独一无二的芦荟。

此住宅建于狄更斯的年代，那时卡罗里山谷遍布密林，后来人们辟出了林间空地，扫清了道路，但是山腰上仍处处可见无用的树干，散布着吃草的羊群，在溪谷中还留有一些土生土长的灌木丛和鸟类，因此夜间人们常能听见猫头鹰的叫声。村庄就在谷底，那是一些稀稀落落的平房，四周围着木栅栏，一个百货商店，一所木结构的教堂，一家铁匠铺，不远处就是那所有着狄更斯小说中住宅同样名称的大房子。《往事与追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小村庄——牛、马、猪和家禽，凯瑟琳在这里度过了决定她性格发展的童年时代，后来她在许多小说中逼真地重现了这些岁月，我常想这 5 年对她意味深远，就像对我和我妻子一样。”

在凯瑟琳眼中，最新奇的人物大概要数帕特里克·西安，他是爱尔兰人，放牛兼做花匠，凯瑟琳早在一篇中学作文《谈谈帕特》中曾描写过他。他的职责包括每天用轻便马车接主人下班回家（这时他戴一顶褐色礼帽），为全家人擦皮鞋，向每一位新来的厨娘求婚，哄孩子们玩耍。擦皮鞋时，他总是把凯瑟琳抱上桌，给她讲“有关爱尔兰公爵的长故事，这些人他都见过，甚至还谈过话”。在厨房喝茶时，他会放些盐在刀子上，用叉子蘸着吃，“优雅地翘着右手小手指，像公爵们一样”，他同“爱尔兰籍”的祖母一起很可能激发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想象力。的确有一件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出现在她的三篇故事中，而数在《序曲》中的描写最为生动有趣。

当他们的表兄弟皮普和拉格在场时，帕特让本耐尔的孩子来观看“爱尔兰国王们是怎样剥去鸭子头的”。石斧落在树桩上，鸭头飞落，鲜血溅在鸭毛和他的手上。

“看哪！”帕特嚷道，他放下无头的鸭子，只见那鸭子开始一摇一摆，一溜长长的鲜血从原来头的位置那儿淌下来，然后又无声地走向通往小河的陡岸，……，这是最精彩的地方。

“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见了吗？”皮普大声喊着，在小姑娘们中间跑着，拉着她们的围兜。

“就像一台小发动机一样，就像一台可笑的小火车发动机一样！”伊莎贝尔尖叫着。

但是凯瑟琳突然冲向帕特，双手抱住他的腿，用头死命撞着他的膝盖：

“把头放回去，把头放回去。”她哭喊着。

因为比切姆一家不愿无别人陪伴独自迁往卡罗里，跟随他们一起去的有安妮的姐夫瓦伦丁·华特斯，他是一位邮局官员，教堂风琴手，两个儿子名叫巴里和爱里克，是皮普和拉格的原型。瓦尔姨父和安格尼斯姨母住在附近

卡罗里，惠灵顿近郊地名。——译注

“切斯尼沃德”，是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所撰《荒凉山庄》中一大宅第的名称。——译注

一所小些的房子内，两家是在 1893 年复活节后的头一个星期搬迁的。

瓦尔姨父当然没有比切姆家的血统，但他也有些“老爸爸”的特征，因而赢得了外甥女终生的爱戴。为了给花园施肥，他常在周末清扫大路上的马粪。对孩子们来说，他具有姨父的一切优点，用玩具枪打他一下，他保准会躺倒在地，呻吟着：“你杀死我了，畜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他忍受着惠灵顿邮局的乏味工作，在音乐中寻找安慰。在城里，他是很受欢迎的歌唱家，总被邀请参加歌剧和清唱剧的演出。凯瑟琳所撰小说《在海湾》中的乔纳森·特罗就是以他为原型，他习惯于以演戏似的滑稽台词同女士说话，例如在花园中的一幕：

“喂，乔纳森，”琳达喊道。乔纳森掸去那顶破巴拿马帽上的灰尘，把它按在胸前，一条腿跪下，吻着琳达的手。

“向您致意，美人，向您致意，天上的仙桃！”他的男低音轻轻发出回声，“其他高贵的女士们在哪儿？”

像故事中的斯坦利一样，比切姆觉得瓦尔的滑稽台词令人发窘，哪怕在卡罗里，他也是城里人打扮，常常平整道路，在路上标些记号。

1894 年 2 月 21 日这一天，全家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的出生，取名为莱斯利·哈伦，第一个名字意味深长，令人想起那位使这个家庭与艺术产生联系的朋友；后一个名字则是为了纪念那位竭尽全力保住家族商业声誉的叔祖。但是莱斯利这个名字很少用到，人们把它束之高阁，像对待精美的瓷器一样。小时候大家叫他“小男孩”，后来叫他“小伙子”，他的姐姐们则常叫他“小鬼”。

比切姆每天进城，早上走着去，4 英里下山路要花去一小时。他喜欢同邻居们比赛，他们通常乘坐 9 便士一趟的公共马车，一路停好几站。晚上帕特去接他，只有下雨天他才肯乘公共马车。

他现在 36 岁，已经成为伯拉廷公司的主要合伙人，他是吉尔肉食品公司董事，新西兰蜡烛公司主席，治安法官，而且即将得到其他几个董事职位。他亲自挑选了另一合伙人加入公司，此人是他的犹太籍朋友，弟纳柯里大道的老邻居，钢铁商华特·纳森。

1895 年初，6 岁的凯什琳上学了，就读于卡罗里公立小学，同去的还有她姐姐维拉和彻迪以及山谷里所有的孩子——农民、卖牛奶的、驾马车的、小店主、洗衣妇和牙医等人的孩子，他们一起接受“免费普及教育”，根据 1877 年《教育法案》规定，殖民地所有的孩子，无论白色还是棕色人种，都必须受教育。她算术很好，拼写却很糟。

殖民地的孩子很少进私立学校，比切姆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当地的小学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当然他们也预见到以后情况将有所改变。在卡罗里还是能见到一些使其他孩子疏远“大房子”的迹象，“大房子”的孩子总穿着浆洗过的围兜，说话腔调特殊。

凯丝现在是家中挂单的人，比维拉和彻迪小得多，又比弟妹们大些。她觉得家里人不怎么宠爱自己，除了奶奶以外。她开始发胖，变得喜怒无常，愤愤不平，有一种使大人感到窘迫的锐利目光，她会用那双敏锐的褐色眼睛凝视着他们，观察着他们，然后再在别人面前把他们毫不留情地评论一番（后来伯特兰·罗素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她母亲不爱她，而更喜欢其他几个

女儿。

凯丝很爱读书，虽然这对视力有害。她总是就着烛光看书，直到奶奶进屋睡觉。钢丝架眼镜框使她显得更加目光锐利，她也曾竭力想引人注目，八九岁时，在学校获得过英语作文比赛奖。卡罗里小学教过凯瑟琳的老师仍记得“一位胖乎乎、冷静沉着的小姑娘，有着明亮机灵的褐色眼睛，总是那么温顺听话”，她写起来似乎受着某种欲望的驱使，“一开始把思想付诸文字，简直就不能停下笔来”，教师必须加以限制，让她把句子写短些，以符合小学生作文的标准。

1898年，切斯尼沃德租期已满，全家人该回城居住了，但是比切姆同妻子先去了英格兰一趟公事旅行，把孩子们留给戴尔太太和贝尔姨母照看，三个大些的女孩子，维拉、彻迪和凯什琳开始就读于位于桑顿的惠灵顿女子高等小学，等待着全家再次搬往桑顿。

新学校有一份自己的杂志，即《高小记者》，凯什琳立刻不失时机地向它投稿。第一学期结束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埃娜·布莱克》的小文章，署名凯什琳·比切姆，9岁，一位六年级同学为她写了绝妙的按语，那是这位以后将对古老世界文学作出贡献的殖民地作家作品获得的第一篇评论：“这篇由一位刚进我们学校的女孩子所写的小故事，显示了今后将会获得巨大成功的潜力。我们将非常乐意接受低年级同学的来稿。”

这篇故事不过同其他孩子讲述的“所度过的最愉快的假日”一样，将背景设置于英格兰中产阶级之中，自信地着意于描写室内室外气氛，这一点后来成为她作品特征之一，倚窗而立的姿态描写在这儿也值得注意。

“噢，母亲，还在下雨，你又不让我出去。”

说话的是一个女孩子，看上去10岁左右，她站在一个陈设讲究的房间内，从一扇大凸形窗向外眺望。

“不，亲爱的埃娜，”母亲说，“你有些感冒，我不想让它加重。”

这时开饭铃响了，她们走进饭厅。吃饭时，女仆拿着信件进来……

1898年11月，全家人在弟纳柯里大道25号团聚，住宅位于高处，俯瞰着港口，是一所漆成白色的长方形大房子，四周是细柱支撑的游廊和阳台，凯·曼斯菲尔德在《日记》中描述了“露台和水泥台阶，维多利亚式的大门，送货大门以及一对巨大的从未使用过的旧铁门。”住宅似乎恰好适合殖民地“福尔赛世家”居住，然而弟纳柯里大道的那一带好坏混杂，最令人尴尬的是比切姆自己的洗衣妇就住在篱笆那边的“茅屋”里，再过去住着一户“有无数孩子的穷人家，这家花园里扔满了空果酱盒，旧平底锅和没有盖子的铁壶。”这不是首都那些门第古老的家庭居住的地方，再说比切姆也不属于那种家庭。

25号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规模以及处于地质断层上居高临下的位置，东面有廊柱的阳台俯视港口，然而在另一个方向，道路下面却可看见人们简陋木屋锈蚀的屋顶，这些木屋位于潮湿的洼地，终年不见阳光。下层人的生活不仅一览无遗，而且日夜都能听到。后来凯·曼斯菲尔德的故事《园会》就是

“福尔赛世家”，英国20世纪初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小说《福尔赛世家》中的家族，是那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译注

以这所房子为背景，故事中社会不同阶层因同情和负疚感而得到沟通。事实上，凯什琳为《高小杂志》写的下一篇故事《幸福的圣诞夜》的主题就是富人对穷人欠下的债务。

真是巧得很，凯什琳发表第一篇作品时，另一“霍恩赛街诗人”的后代也刚刚为世人所知，那就是他父亲的表姐梅·比切姆，如今是冯·阿宁姆伯爵夫人。

《伊莉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也是那年9月发表的，此书以揶揄的笔调描绘了德国的美好生活，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乐趣。哈罗和安妮很可能从伦敦带了一本书回来，显然他们一点也没疑心到作者的真实身份，离开英国回新西兰前还同她的父母亲在肯特呆了一段时间，知道她浪漫的婚姻和她在德国豪华的住宅；此时，那本书已闻名天下。到了1899年5月，麦克米兰公司已宣布此书第22次再版。

目前凯什琳还只是个不引人注目的孩子，照片上是一个严肃的小胖子，同两位姐姐穿着一模一样，而两位姐姐看上去要自在得多。她不大说话，总爱生气，而且还爱撒些小谎。她很少向大人诉说心事，被人问及将来时，她总是回答：“我要当作家，”而人们总是大笑。在学校她只有一个知心朋友。

这位知心朋友是玛丽安·罗迪克，加拿大人，是独生女，她与凯什琳的父母亲一起渡过太平洋，因此遇见凯什琳时还没有别的朋友。罗迪克小姐写下了她们短暂会面的情形，她记得哈尔·比切姆在檀香山海岸大步走着，头戴礼帽，拿着一把收起的雨伞，他妻子是一位“无精打采”的女人，在惠灵顿码头一见到她第三个女儿时就说：“啊，凯什琳，你还是那么胖。”

1898年底，玛丽安同比切姆一家去库克海峡岛湾别墅，度过一个真正新西兰式的圣诞节：水桶和铲子，晒斑和香橼，牧人馅饼和布丁，装在绿绒布盒内的银质顶针，上面刻着“爱你，玛丽安。”一个很热的日子，R.J.西顿先生像圣诞老人似地出现了，他是新西兰总理，给哈尔带来了一生中最贵重的圣诞礼物：西顿政府最近挽救了濒临破产的新西兰银行，需要一些稳妥的人负责银行事务。《往事与追忆》中谦逊地记载着：“1898年12月，我有幸成为政府部门董事之一。”

这次任命比切姆为银行总裁使他成为除政府外，殖民地金融事务方面最有权势的人物，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仍是“生意人”，惠灵顿俱乐部的绅士们从没有忽略这一点。然而，他现在才刚刚度过40岁生日，便已取得了决定终身的成就。

凯什琳同玛丽安·罗迪克成为“生死之交”，共同分享小学生的秘密，写些诗，在花园里发现了一条遭了魔法的飞龙。然而遥远的神话很快就消失在新西兰童年的现实中，消失在阳光、海洋和丛林里。下一个圣诞节，比切姆家有了自己新的避暑地，为了弥补不得不搬回城里的遗憾，父亲在戴斯港口东面租了一所别墅。

那儿的丛林仍未遭损坏，港口四周尚未修路，所以必须乘船出城，船只静静地驶进戴斯港码头，召唤乘客们，友好的汽笛声穿过空荡荡的山谷，回荡在丛林中。渡船，尤其是丛林，使戴斯港口成为与惠灵顿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英国东南部郡名，濒英吉利海峡，下辖阿什福德、多佛等14个区。——译注

惠灵顿一港口名。——译注

伤感的小故事《幸福的圣诞夜》于 1899 年底刊登在《高小记者》上，此时教师们已准备好了将要在学期结束仪式上颁发的奖品，其中英文、算术和法语三项是给凯丝·比切姆的。她穿过大厅，从尊敬的罗伯特·斯托特手中接过奖品。他是首席法官，前自由党首相，大学评议会成员，当时正提倡“妇女高等教育”，他说这项改革是“比金钱更好的嫁妆”。在座的每个人都很清楚，他其实正在为维多利亚大学网罗学生，这所大学是在他的倡导下刚刚建立起来的，当时还没有校舍，但是最早任教的教授中却有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 R.C. 麦克罗林。

虽然，比切姆的女儿毫无疑问能成为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但在惠灵顿这小地方受高等教育不能和“回老家”相比。在惠灵顿女子中学继续读了一个学期后，维拉、彻迪和凯什琳被送往斯维森小姐私立中学，这是通往伦敦的进身之阶，在那儿对前途将会有所选择。

被称为“斯维森小姐住宅”的大房子背靠宽广的山谷，斯维森小姐聘请亨利·史密斯太太（《水孩子》的作者查尔斯·金斯利的一位表姐）做日校主管，学校的整个气氛让学生感到只有英格兰才是“老家”，而新西兰不过是“放逐地”，所有的孩子离开这所学校都是为了在英格兰或欧洲完成学业。

那儿的两位教师讲述过她们记忆中的凯丝·比切姆。史密斯太太说她长相不好看，“是一个无礼的小姑娘”，“好想象至几乎不真实”；她的作文太长，写得很差，拼写很糟糕，而且“放进了太多的自己”。

埃娃·巴茨小姐是那种爱德华时代所谓“衣着讲究的女人”，她说凯丝“又黑又脏”，写的作文“总是文不对题”，13 岁时，她就问巴茨小姐一些有关“自由恋爱”的看法，那时哪怕对成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过于放肆，令人侧目的话题。她又矮又胖，无吸引人之处，“甚至也不调皮”，“在学校里也没什么雄心大志”。

不管怎样，正是凯什琳·比切姆创办了斯维森学校的第一份杂志，刊登一些故事和笑话。当巴茨小姐组织义演时，发现凯丝具有维妙维肖模仿别人的才能，她会随意模仿几下家庭生活细节来嘲讽父亲的虚荣心，同时也显露出她和母亲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

她因扮演一个角色而赢得一位英国牧师的爱慕。英国国教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也曾经有过一个令她心荡神驰的顿悟时刻，她把这记述在祈祷书的扉页上：

1901 年 11 月 3 日，同 E 和 D. 本达尔以及维拉去圣·马克教堂听弗雷德·本耐特牧师讲道，极为神圣。

他还诵读了《圣经选读》第 2 课《背叛那稣》，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愉快。我准备去做一个毛利人传教士。

她具有反抗精神，有一种危险的才智，很可能陷入宗教狂热，而且她很孤独，玛丽安·罗迪克走后，她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亲密朋友，所以才向巴茨小姐问及“自由恋爱”问题，此时她 13 岁，初次与汤姆·特罗维尔相遇。

查尔斯·金斯利（1819~1875），英国作家，他 1863 年发表的小说《水孩子》，在当时颇受欢迎。——译注

毛利人，新西兰的土著居民，信仰多神，现约有 24 万人。——译注

“凯撒（不知为什么凯什琳这样称呼他）是惠灵顿一位音乐教师的儿子，当时已很会拉大提琴，已经有人赞助一笔钱送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小提琴手加纳特一起去欧洲深造。这两兄弟像凯什琳的父亲一样有着一头的红发，但是并没有他的性格。很快凯丝就相信自己爱上了汤姆，而他却不怎么在意。10多岁孩子的恋情通常很快就会谈忘，但这次的情形后来却被写入一个故事的开头几页，这个人们后来称为《朱丽叶》的有关爱情与死亡的无标题小故事笔调夸张，随便涂写在一本厚厚的黑封面笔记本上，虽然只不过是三流的浪漫虚构小说，但确实表达了当时这两个生活在殖民地的年轻人所感到的希望与恐惧。

在一个她那冷漠的母亲称为“一般的音乐晚会”之后，朱丽叶来看父母亲，发现大厅里只剩下自己一人同那位受到赞助的年轻大提琴手呆在一起，他把她领到一扇敞开的窗前，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

“朱丽叶——你呢？”

“戴维，我是个音乐家，今晚表演过了，也就是拉大提琴。我明年要去欧洲。”

“我也要去，但不是为了音乐，只是去完成学业。”

“你想离开这儿吗！”

“是的——不，我渴望体验新的生活，新的地方——但我会怀念这儿我热爱的一切。”

“你喜欢夜晚吗？朱丽叶！”他的表情变了……

现在她需要一把大提琴，跟凯撒的父亲学习，她自己的父亲很高兴她喜欢音乐，并立刻给她买了一把提琴。不久她的相貌变了，在一张去英格兰的途中全家合拍的照片上，站在仪态威严的父母身旁的是凯什琳，此时已长成秀丽、端庄的少女，脸庞更为优雅，眼神温柔了，不再戴眼镜。总而言之，凯什琳14岁时看上去比她的贝尔姨妈更成熟自信。贝尔姨母那时仍未出嫁，正要陪同外甥女们去伦敦呆三年，说实话，也不可能指望会有安静自信的表情。这次航行十分讲究排场，这是负担一切开支的男主人所熟悉的，他写道：

我妻子，我自己，我们全家4个女孩，一个男孩，以及两位姻亲（贝尔和西德尼·戴尔）占据了弟赛尔航线的涅瓦鲁号客轮的整个客舱，这的确是一次辉煌的航行，先在吉斯博恩和奥克兰停靠，然后经过合恩角和拉斯帕尔马斯，整个航程花了47天，我妻子非常喜欢航海，总是陪我一起旅行，这给大家增添了乐趣。

1903年1月29日，他们从惠灵顿启程，凯什琳给尚未离开新西兰的汤姆·特罗维尔写信，从而开始他们长达6年的通信，至少在她这方面是热情

新西兰东部港市。——译注

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及最大港口。——译注

南美洲最南端合恩岛上陡峭的南角。——译注

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港口。——译注

洋溢的。特罗维尔兄弟 7 个月后启程去德国，得到了 885 英镑赞助。参加这次典型的新西兰式赞助活动的募捐者中有哈罗·比切姆，他的合伙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饲养场主，旅店老板，打字员，码头工人，还有几位“绅士”。从利特尔顿到伦敦的路费是 26 英镑，伯拉廷公司的捐款刚好够这项支出。他们在法兰克福高等音乐学院呆了一年后，又去了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后来阿诺尔德——这是汤姆的艺名——在音乐汇演中取得几项大提琴演奏奖后，不得不按规定离开那儿。几年以后他们两兄弟都到了伦敦，父母亲也来同他们团聚。

伦敦皇家学院

对于凯瑟琳这一代人，颓废派艺术家们是通往充满想象的生活的入口。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

1933 年

皇家学院坐落在哈利大街，是英格兰为妇女高等教育而开设的第一所大学，虽然不久以后就相继设立了其他学院，它在妇女教育史上仍占有一席之地。这儿要谈到的是它在一个女子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女子后来写了名为《家庭女教师》的故事以及一系列有关独自旅行的年轻妇女的小说，因此有必要对历史作一番浏览。

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出生的年轻小姐，既不聪明漂亮，也不富有，没有结婚，面临的选择就只有一种文雅的被奴役方式：成为所谓的“家庭教师”，除此之外无路可走。那时妇女唯一合适的职业就是结婚，然而在英格兰，妇女人数远远超过男人，父母亲只顾自己享乐时，孩子往往无人照看，因而家庭教师是“维多利亚社会的特别牺牲品”：这位小姐几乎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之所以被聘用只是因为“无人要”而已。有人曾经试图拯救她——当然是男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埃琳·凯尔在她写的皇家学院校史中对此有过描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44 年的一个夜晚，以剑桥公爵为首的“贵族和绅士”在伦敦酒家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他们邀请了年轻的名小说家，32 岁的查尔斯·狄更斯作为客人发言以督促他们。正是狄更斯告诉这些人：“知识”在社会上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家庭教师比厨师、管家、侍女、穿号衣的男仆收入还低，现在迫切需要“使全国免受指责”，在座的人是一个家庭教师慈善机构的赞助者，在哈利大街有宽敞的活动场所。4 年以后，作为这个机构计划之一，在那里创立了皇家学院。在这曾经做过许多贫穷家庭女教师之“家”的地方，在那些外观相同，雅致漂亮的房子里，气氛仍十分活跃。学院创立于 1848 年，正是欧洲大革命的年代，也就是在这一年，亚瑟·比切姆离开了霍恩赛街前往殖民地。

因此，从多层意义上讲，皇家学院从来不是一所专修学校，而是代表一种大改革，意味着年轻妇女可以接受大学教育，如果不是在名义上，至少在实际上应该如此，而这种权力过去一直是她们不能企及的。当最初两个学生在会客室相遇时，她们甚至不知道是否该摘去帽子，然而主管太太——从没人称她“校长”——告诉她们应该这样做。当两位教授开始讲课时，她们很快就被迷住了。这两位教授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F.D.莫里斯 和牧师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水孩子》的作者。莫里斯相当大胆地宣称学院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原则”，而金斯利则立刻开始鼓励她们阅读各种英语文学，包括现代作品。事实上这两人都与当时的宪章运动有关，金斯利不久就迫于政治压力而引退了，但新兴的学院最终可以为之骄傲的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女生，不仅有著名的女子学校校长如巴斯小姐、比克小姐（如一首大男子主义

哈利大街，伦敦市内一街道名，——译注

F.D.莫里斯（1805～1872），英国神学家，社会改革家。——译注

宪章运动：1838～1848 年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起过影响。——译注

歌谣所说，她们“对丘比特之箭无动于衷”），而且有格特鲁德·贝尔，女性中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苏菲·杰西-布莱克，后者曾为妇女进入医学界出力，这4位学生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学院培养出来的最为有名的人物。

出于需要，皇家学院一直聘请男性教授。1903年，教授中几位有趣的人物并不把学生看作未来的小家庭教师，挑选他们也并非出于社会原因。热情洋溢的J.A.克兰姆（他在此任教时同奥特琳·莫瑞尔有过恋情）讲授现代史，他写的《德英两国》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战争；霍尔·格里芬是白朗宁的朋友，讲授英国文学；H.G.威尔斯的年轻朋友“破衣烂衫的”格利高里，未来的天文学家（克利夫顿学院鞋匠的儿子），讲授天文学，人们觉得他说话土腔土调；沃特·李普曼教德语，他风度迷人，作为语言教学的革新者而享有盛名，他同时还把易卜生，奥斯卡·王尔德，保罗·瓦莱里和理查·德梅尔等人的作品介绍给学生们，大概凯瑟琳就是从他那儿知道文学必须具有“形式”的。

哈尔和安妮·比切姆怎么会为女儿们挑选这所学院呢？这很容易解释：安妮的表亲弗兰克·佩恩是一位医生，他父亲约瑟夫·佩恩是英国第一位教育学教授，具有现代意识，他按弗洛贝尔的方式带大自己的两个女儿，后来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又把她们送到皇家学院就读，因此三个来自殖民地的姑娘就可以同表姐妹伊芙琳和西尔维亚·佩恩相聚在这样一所并非随意选择的学校里，再说，她们的前一任校长又是查尔斯·金斯利的一位表姐。

一到学校，她们就去见主管女士卡米拉·克劳戴斯小姐，她是一位漂亮女人，机智幽默，曾在克里米亚同狼打过交道，曾经是F.D.莫里斯的学生和信徒，这意味着她无暇顾及“小聪明”。克劳戴斯小姐像戴尔奶奶一样头戴一顶精致的花边帽子，但伊芙琳·佩恩从不觉得她古板守旧。如果克劳戴斯知道学校里发生一起“热恋”事件，总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一位女该子迷恋上谁就被叫作“D.V.”这个词来源于她自己一位常爱闹些恋爱的侄女名字的首写字母），而且除了私下场合，她也从不冷嘲热讽。她总是邀请学生去她的乡间别墅，那儿客人登记簿上一段热情洋溢的话表明凯什琳至少应邀去过一回。

一般学生通常要学4年综合课程，但年龄较大的“非综合型”女子也可以学习一套选修课程，这使它显得更像大学而不是中学，学生不穿制服，附近有一幢宿舍供家在城外的学生居住，由克拉拉·芬妮达·伍德小姐管理，她是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顶着高高的发髻，头老是摆动，发髻也跟着摇晃，她去歌剧院时总爱穿紫红色或丁香色衣服，写字也爱用紫色墨水。

T.D.劳伦斯（1888~1935）考古学家，作家，曾在中东考古，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译注

奥特琳·莫瑞尔（1873~1938），当时英国下院议员菲利普·莫瑞尔的妻子，是文学艺术家的赞助人。

——译注

白朗宁（1812~1889），英国著名诗人。——译注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社会改良主义者。——译注

克利夫顿学院，牛津大学学院之一。——译注

理查·德梅尔（1863~1920），德国诗人，其作品深受尼采影响。——译注

F.w.A.弗洛贝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其教育方式主旨在于帮助儿童心智的自然发展。——译注

注

走读生——像佩恩姐妹这样的西区富人的孩子——为这个地方定下了格调，每天放学后，“伍迪”就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归她管辖的学生面前，把她们带到隔壁自己那并不起眼的领地。但是她的管辖也不坏，晚上做完功课，她们一边缝纫，一边听她朗读。星期六她们两人一行排成长队走上山岗，而星期天则给家里写信，因此星期天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留下一种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这一天后来一直是她写信的日子。“伍迪”确实了解凯丝·比切姆，1906年她送给凯一本厚厚的黑色笔记本作为离别礼物，这是《日记》的来源之一。如果她看过后来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她的发髻保险会散落开。

凯什琳对皇家学院的反应完全出于个人情感，学校的创立者F.D.莫里斯肯定会为之大吃一惊，他的画像俯视着在学院图书馆用功的凯什琳。历史课使她感到厌烦，虽然克兰姆本人并不如此；至于英语文学，霍尔·格里芬认为她“令人失望”（但是这种感觉是双方面的），她很喜欢德语，也很用功，然而只是出于个人原因，她迷上了，或者不止是迷上了沃特·李普曼，一个很会献殷勤的人。

纯粹出于偶然，她在皇家学院最重要的交往始于1903年4月。刚到学校的那一天，同克劳戴斯小姐谈过话后，需要找个人带比切姆姐妹去伍德小姐那儿看她们将要合住的房间，这个差使落到一位高个、脸色苍白的金发姑娘头上，她来自缅甸，总是乐于做这一类事。埃达·康斯坦斯·贝克生于英国，在印度长大，与学校其他人总有些格格不入。她的性格尚未成形，有待别人来打上烙印。只是因为她母亲刚刚去世，别人不知道该如何安置她，她才恰好住在伍德小姐公寓。她父亲过去是驻印度军队的随军医生，现在附近的维尔贝克大街开业，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不好交际，“过多的咖喱影响了他的消化力”。在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已故上校的女儿》中可以找到他那令人生畏的影子，此故事最初的标题是《非综合型学生》。

埃达在缅甸度过童年，现在维尔贝克大街的房子里仍摆满了东方的雕刻品，然而家中缺少母亲，等待着她的也无非是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如上校的女儿们该扮演的角色，尽管她不会去做家庭教师（已经为她准备了一笔钱）。她一辈子都会是“施者”，当然也会得到别人的报答。贝克上校消极避世，忧郁消沉，最后在罗得西亚自杀。目前，埃达住在伍德小姐公寓里，她把新西兰来的几个姐妹带到她们房间，接着就避而不见了。然而，不久她就迷恋上了维拉。后来维拉回忆说：“我经常发现她躺在我门外的地上，等着问是否能帮我脱衣服。”——在处处使用拉链的今天，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那只不过是帮着解开无数的扣子而已，一件很平常的事。

埃达喜欢喂动物，照看婴儿，她拉小提琴，甚至还在辩论协会演讲，但没人理解她，别的女孩子“为她感到遗憾”，却不知道其实她自信心很强，对这种同情不屑一顾。她很爱吃布丁，身体健壮，然而声音柔美悦耳，令人有些吃惊，同艾米莉·狄更森一样，她眼睛的颜色像“客人离去后，留在杯中的雪利酒”。人们通常认为埃达是一个温顺的小东西，一只擦鞋垫，或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一只快要吊死的小狗”，然而她绝不是这样的人，而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人，具有在某些场合下表现得十分谦卑的才能；但是她穿大尺码的鞋子，凯什琳在她身旁显得又矮又小。

罗得西亚原为英国殖民地，1980年独立，改名为津巴布韦。——译注

艾米莉·狄更森（1830~1886），美国女诗人。——译注

凯什琳似乎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哈利街的生活，没有人为她感到遗憾：无论如何，比切姆一家人从新西兰来此包了整个一艘船；他们住在昂贵的旅馆里，在剧场看戏时拥有最好的座位，而凯什琳如果愿意的话，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她总是一个比切姆，这是不容忘记的事实），她从庞德街的希尔商店新买了一把大提琴，仍在给汤姆·特罗维尔写信。夏天那两兄弟一起去法兰克福，10月份她去过那儿看望他们。据埃达回忆，秋天在摄政公园，凯什琳出乎意外地提议“让我们做朋友吧”，这使她吃了一惊。在埃达看来，比切姆不过是佩恩的新西兰表姐妹，她们到达学校的那天恰好遇上自己。她解释说，人们并不开始友谊，只是自然而然成为朋友。但是凯什琳达到了目的，因为埃达一辈子都需要一种特殊的友谊，能够让她分享别人的雄心和成就，从中得到一些替代的快乐。如果埃达曾经迷上了维拉，那么也很快就轮到妹妹了，然而这次比由狂热引起的恋情更为长久，她的性格也开始形成了。

埃达在晚年写的一本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凯什琳的热爱，用了凯什琳给她取的名字L.M.做笔名，书中描写的有关凯什琳的第一件事是她的头发，在哈利街住的时候，她常几小时地梳理秀发。她们常在凯什琳的房间一谈就是几小时，埃达虽然对使用照相机不大在行，但仍然给凯什琳一张接一张地拍了许多拉大提琴的照片。

这时期，汤姆·特罗维尔的照片一直挂在凯什琳衣柜的上方，默默地俯视着，“这是她的新西兰朋友和伟大的罗曼蒂克偶像，”埃达曾这样描述他（他并非很有男性）。两个女孩都想成为音乐家，或作家，或名人，因此需要职业名字，就像汤姆一样（他的职业名字是阿诺尔德），还有凯什琳那有名的表姐，写了一些关于德国生活的迷人作品的“伊莉莎白”。埃达成为小提琴手后，就想使用母亲的名字凯瑟琳·莫尔，但是凯什琳自己想要“凯瑟琳”，因此为埃达找了另外一个名字。她可以用凯弟弟的名字，叫“莱斯利·莫尔”，所以埃达后来叫L.M.。

同年冬天，在一次诗歌朗诵小组聚会时，凯什琳迷上了自己相当纯洁的表姐西尔维亚·佩恩，这一次也是凯什琳采取主动，而且一直如此。据西尔维亚姐姐说，她“害羞、沉默、谦卑、胆小”，外貌很像戴尔，有着汤姆一样的红头发。

凯什琳的感情得到回报的唯一迹象就是西尔维亚直至去世，一直保存着因她的羞怯而激发的充满火热情感、热情洋溢的信件。凯什琳最初的两封信不过是表姐妹之间的客套问候，然而1903年圣诞前夕从“亲爱的老爸爸”——叔叔亨利·哈伦·比切姆——在肯特的家中写来的信却是突如其来的宣告：

最亲爱的西尔维亚：

今天下午我想给你写信，所以就写了……，我喜欢你胜过在英格兰遇见的任何其他女孩子。最近似乎不大见到你了，我们正站在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口，但却不能越过门槛。我所指的心灵是这样的：我的心灵对所有自己热爱的事物（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敞开大门，那是我珍藏回忆、幸福和欢乐的地方，其中有一处小房间标着“梦幻”，有许多许多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但他们通常只看到我对外开放的房间，他们说虚假、疯狂、多变，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看见我的真实面目，否则我想他们会更加认为我疯狂。

这儿提到了“小房间”，她后来的友谊都具有这种特征，所表达的感情也不过是对埃达感情的重复而已。

那个月的校刊上登载了“凯什琳·M.比切姆”写的一篇儿童故事，赢得了一些称赞，故事的标题为《松树、麻雀、你与我》，来自于她“对外开放的房间”，在一个“秘密房间”里的（记载在笔记本上，从未发表过）则是完全不同、意义更为阴暗的东西；一个故事或幻觉，标题为《他的理想》，死亡愿望的主题第一次出现在她的作品中。标题指的是一个无名的主人公，在童年生病时，曾梦见一个美丽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长大后他很想念她，最后准备淹死自己，因为她再次出现，满足了他的愿望，他的名字就是死亡，那是1903年8月写的，凯什琳只有15岁。

除夕夜，她正在设菲尔德附近的亲戚家度假，写了一首诗给西尔维亚·佩恩，是一首祈祷文，祈求知识和光明。做过午夜礼拜后，她又给汤姆·特罗维尔写了一段祝辞，记在她的笔记本上：“在这新年将到之际，我打算开始写书，那不会是什么富于戏剧性的大作品，只是讲述我所做过的一切……”，这在她离开新西兰的第一年，已能初见端倪：她找到了一位新西兰绝不能给予她的终身朋友，写了一些有关孩子们的故事，而且受到称赞，但是也写了一个幻想作品，其中的主人公盼望死亡；她还写了一些小诗，而且形成了同笔记本聊天的习惯。事实上，自从找到能与音乐和大提琴竞争的方式后，如果哪一天没写些东西她就认为这一天白过了。

在摄政公园，她的提议“让我们成为朋友”使埃达觉得奇怪，肯定也让西尔维亚·佩恩感到吃惊，也许她们觉得这有些“殖民地”味道，其实并不止此，这是核心，是形成她许多作品的一种方式。接二连三的故事似乎都在向读者说“让我们成为朋友”。最亲爱的西尔维亚：

你真好，给我写了封长信，收到它我很高兴……。

谢天谢地我马上又要回学校了，但是西尔维亚，我那么渴望德语课，真有些羞愧。我没有办法，真可怕。上课时，我觉得自己一直想盯着他，我从没有这样喜欢过任何人，我一天比一天喜欢他，但星期四他简直像冰块！……

“他”是李普曼教授，德语班的偶像，事实上也是一位非凡的教师，具有激发年轻人思维的才能，不久就成为凯什琳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李普曼并不总是像冰一样，凯什琳的一位同时代人回忆说他“教女子学校太年轻了些”（1905年他同一位原来的学生结婚），而伊芙琳·佩恩回忆他是“胖乎乎的，头发擦得油亮，说话咬舌音很厉害。”

在凯什琳的眼中，他代表一切时髦、大胆和激动人心的事物。结婚前他常常邀请比较聪明迷人的女学生参加自己在住宅内举行的文学晚会；他与一位记者合用这所住宅，凯的忠诚受到注意，她很快就成为入选的一员，那儿所有的艺术作品使她大开眼界。这所房子有一种“气氛”，几年以后成为小说家的凯回忆道：

沃特打开了门，“哈，你终于来了。”他说，声音表达了热烈的友好态度，“到吸烟室来，右边第二个门。”她掀起沉重的紫色门帘，房内两扇窗前挂着色泽黯淡的黄色窗帘，角落里摆着高高的熟铁烛台……墙上挂着美丽妇人的照片，桌上放着一个身材修美的女孩塑像，优雅的双手抱着一只贝壳；一张长长的矮沙发上套着暗红色的罩子，还有几张同样颜色，式样古雅的矮椅子，房中弥漫着菊花的馨香。

“我相信他曾帮助过许多女孩子发现自身的价值，”埃达这样谈到沃特·李普曼，“在那女人成堆的地方，这些将要步入成人阶段的女孩子能受到一些男性的注意是再好不过的。”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也称赞李普曼激发了凯什琳的想象力。

凯什琳自己在1910年发表的一篇辛辣的小寓言故事中，不无嘲讽地回忆了这一段交往，这篇故事的标题为《一个神话》，其中一位李普曼式的人物将萧伯纳，易卜生，亚瑟·西蒙斯，奥斯卡·王尔德和保罗·瓦莱里等“颓废派”的作品介绍给一位“木刻家的女儿”，她从他那儿知道了“无私意味着缺乏进步”，他必须竭力避免“七个致命的美德”。

人们对凯未受李普曼影响之前读些什么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她们家并非书香门第，这方面她的背景和她后来交往的其他英国作家大不相同。

但是她有一位著名的表姐，阿宁姆伯爵夫人，还有她的有名的作品，如此好学的凯什琳不会仅仅只是对《伊莉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一览而过。

5月7日——我喜爱我的花园，此刻我正坐在黄昏临近时的可爱气氛中，不时受到蚊子的侵扰，又忍不住要欣赏四周那一派新绿，半小时前的一阵冷雨把树叶冲洗得干干净净。两只猫头鹰栖息在附近，正在一唱一和，我真喜欢，就像喜欢听夜莺婉转的歌唱一样。猫头鹰绅士唱低音，而她在近旁的一棵树上应答着，用美妙的歌喉高声接着唱下去，恰好符合一头训练有素的雌猫头鹰的身份。它们起劲地一遍又一遍他说着同一件事，我想一定是什么有关我的坏话，但是我不會让自己被两只猫头鹰的冷嘲热讽吓住的。

这儿有一种晶莹透明（这是一本书的开头一段），当时似乎颇有魅力，如果读者属于相当的阶层，过着有保障的幸福生活。

但是，“伊莉莎白”的文体比较空洞，没有什么衬托，从不涉及内心生活；洋洋洒洒的笔调没有给人留下思索的余地，也没有人们在她表妹最好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的对环境所迫的人物的深切同情。

早在1904年，皇家学院杂志上就刊载了凯什琳的一篇故事，标题来源于伊莉莎白一个月前发表的一本有趣的书《伊莉莎白吕根岛历险记》，而凯的故事一点也不好笑，至少她没有故意逗笑。表妹笔下的“孤独者”是一个渴望浪漫地死去的精神错乱的老处女，她一人住在山顶上，白天在林中散步，晚上则在海边游荡，直到有一天，一位站在由月光形成的美妙的白色小船中的人向她招手，她的嘴唇微笑着，“带上我”，她喊着，但是一个巨浪打来，

亚瑟·西蒙斯（1865～1945），英国诗人与批评家，著有《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译注
吕根岛，德国北部岛屿，位于波罗的海西南海滨，是著名的疗养地。——译注

接着是一片沉寂。

在凯什琳的作品中这是第二次出现死亡愿望这一主题，也许在此阶段只不过是一种文学“影响”，但后来出现的频率之高就令人吃惊了。在另一本书中，“孤独者”讲的是在吕根岛的一个海滨那儿有一片松树林，纯净的海滨空气中含有臭氧，“对任何胸腔有病的人都能产生奇迹”。这儿肺病与死亡愿望的同时出现显然只是一种巧合，但是这当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的肺病的威胁，那时它是主要的致死疾病。

比切姆姐妹在伦敦确实与冯·阿宁姆伯爵夫人有过短暂的会面，但并不尽如人意，伯爵夫人有自己的领地纳森海德习惯了以恩赐的态度告诉来访的邻居们他们可以坐下，她把这习惯也带到了伦敦，使那些到威斯敏斯特广场32号来访的客人感到吃惊。当她那令人尴尬的新西兰商人表亲的女儿试图结识她时，她轻蔑地置之不理，用维拉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殖民地来的小乡下佬而已”。

这时——1904年——伯爵夫人给自己的三个女儿请了一位教师，摩根·福斯特先生，是她侄儿西德尼·沃特罗在剑桥的朋友，他也写了一本书，《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他在纳森海德改小说校样，而女雇主则在度夏别墅内打印自己的剧本《普里西拉公主的两星期》，“她读了我的校样，讨厌这本书，因为其中谈到半生不熟的肉和唾液。”虽然此时凯什琳与这两位作家彼此的世界似乎距离遥远，但他们的结识其实已经为期不远。她以自己漫无目标的方式正在接近某种艺术，在下一个非颓废年代就将以平等的身份结识他们。

那个夏天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所有我喜爱的书”以及一些她不喜欢的书。

7月的一个周末，她一口气读完了托马斯·莫尔写的拜伦传记和安东尼·霍普的《多利对话》，她喜欢罗姆尼的传记，但不喜欢夏洛特·勃朗蒂的《谢利》，爱伦·坡的诗歌标上了喜欢的记号，但没有提到她读过短篇小说；没有见到吉卜林，斯蒂文森，亨利·詹姆斯和H.G.威尔斯的名字。她又写了一些诗歌，大提琴也开始拉伯尔曼的交响变奏曲。

为她练习大提琴伴奏的是新西兰同胞露西·赫里克，埃达的书中提到过

指伊莉莎白写的《伊莉莎白吕根岛历险记》。——译注

摩根·福斯特（1879~1970）英国小说家，著名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译注

西德尼·沃特罗，布卢姆斯伯里成员之一。——译注

托马斯·莫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拜伦的朋友。——译注

安东尼·霍普（1863~1933），英国作家。——译注

罗姆尼（1734~1802），英国肖像画家。——译注

夏洛特·勃朗蒂（1816~1855），英国女作家，《简爱》是其代表作之一。——译注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其作品多怪诞、神秘。——译注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译注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著名的冒险故事及散文作家，《金银岛》《新天方夜谭》为其代表作。

——译注

亨利·詹姆斯（1843~1916），出生于美国，后定居于英国。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代表作有《淑女画像》《波士顿人》等。——译注

伯尔曼（1862~1897），法国作曲家，大提琴交响变奏曲为其主要作品之一。——译注

她；她写道：露西和凯什琳去参加音乐会，“打着松软的黑色领带，头戴宽大的绒帽，摆出一副懒散的走路架势，她们看上去像年轻的波希米亚音乐家”。要施展抱负，究竟是以音乐还是写作为开端，两者之间必须作一选择；谈到拉大提琴，露西说“她的手指太短了”。

而眼下，汤姆从法兰克福寄来了自己的作品，凯什琳应该有所回赠。事实上，1904年维拉和凯什琳·比切姆小姐是以歌曲作者的面目出现在刊物上的，她们写的两首歌曲《夜》和《爱的恳求》由一位柏林音乐出版商发表。也许是奉了新西兰钢琴公司董事长的命令，几个月后在惠灵顿的一次港口董事餐会上曾由别人当着他的面唱过这两首歌，这不过是客厅里唱唱的歌谣，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后期作品中那些热情洋溢的年轻姑娘们唱的相思曲。

刊登在学院杂志上的另两个故事出自她童年的回忆，笔调近似于《序曲》，但是1905年12月接着又发表了她的最后一篇作品，随笔《谈谈帕特》，此随笔就像帕特本人一样，写得生动活泼，可以说是第一篇出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作品。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描写新西兰才是她最拿手的。

1906年，一位新朋友，一个比她大两岁的聪明冷静的年轻女士借给凯什琳一本书，从此改变了所有的一切。沃特·李普曼比较谨慎，没有把《陶连·格雷的画像》介绍给他的学生。但是维尔·巴特里克·贝克——凯什琳称她“咪咪”——偷偷地借给她首次刊载此小说的《利平考特》杂志，凯什琳一开始就读到了此书未经删改的原文。《雷丁监狱叙事诗》在凯什琳心中引起了共鸣，两个女孩子常坐在凉亭里热烈地讨论王尔德、托尔斯泰和梅特林克。

《陶连·格雷的画像》一下子把她卷入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当然现在看来它似乎并不特别出格；其中的警句使她迷惑不解，这也影响到后来她自己写下的一些“读书笔记”。读到“保持本色只是装腔作势，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她完全赞同，再读到“充分表现一个人的本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她也抄了下来。脑袋里装满王尔德和颓废派，她等待着父母从惠灵顿来。现在开始了一个“欧洲”阶段插曲，其中能不时听到普契尼和米尔热，还有天才知道的一些什么人。

特罗维尔兄弟已从法兰克福转入布鲁塞尔音乐学院。1906年复活节期间，贝尔姨妈（她现在既是陪伴又兼做伍德小姐在哈利街的帮手）把外甥女们带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因此凯什琳再次与特罗维尔兄弟会面，还遇见了他们的一位似乎名叫鲁道夫的同学。汤姆正在创作风格大胆的三重奏，像将要成名的天才人物一样，他和加纳特戴着巨大的黑帽子，抽着最长的香烟。那时正当春季，但是他们手中的幸福之杯很快就被粗暴地夺走了，因为哈罗德和安妮·比切姆正好乘船来到，要接他们完成学业的女儿们回去。女孩们回到了伦敦，同父母暂时在曼彻斯特大街昂贵的旅馆里相聚，凯什琳从那儿写信给西尔维亚·佩恩（1906年4月24日），除了报告一些新消息外，并没

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一地区，后常用来指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译注

《陶连·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译注

《雷丁监狱叙事诗》，奥斯卡·王尔德的长诗。——译注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普契尼（1852～1924），著名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

米尔热（1822～1861），法国作家，其小说《波希米亚人生活场景》被普契尼改编为歌剧《艺术家生涯》。

——译注

说什么反抗性的话，目前她还是一个绝对的比切姆。

从上星期五以来，我们就一直和父母亲呆在这儿，过得非常愉快，我从来没有这样笑过，他们俩仍是老样子，我们10月份去新西兰。

离开你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非常不赞成我成为职业提琴手，或把大提琴当作一回正事，所以我希望从事音乐工作是绝对不可能了……同“不可能”较量是毫无用处的，所以将来我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写作上。她说自己很向往那理想的“海边小屋”里的平静安宁的生活，那小屋是父亲为她们在戴斯海湾建造的，然而我们的这个“变色龙”又接着说，现在吸引她的是“模仿”。

我喜欢这种旅馆生活，有一种不必负责任的感觉，这是它的诱人之处，你不愿意试一下各种生活吗？一种生活过于狭隘，但写作可以让你得到满足，一个人可以模仿那么多的人。

回到伍德小姐寄宿公寓后，凯什琳因为同姐姐们争吵，搬出了原来的房间，同另一个新西兰人爱琳·帕丽莎合住。这时从布鲁塞尔传来了鲁道夫自杀的消息，他用手枪自杀，这种情形属于奥斯卡·王尔德的世界，涉及无人敢于提到其名称的那种爱情。凯什琳大为震惊，这种事会导致自杀吗？特罗维尔兄弟此时已离开布鲁塞尔，来到伦敦，在西区举行了那必不可少的音乐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演奏生涯。也许同时出现了过多令人激动不安的事情，爱琳就近观察，感到这种不安也影响到了凯同汤姆那种若有若无的爱情：凯同他会面后，精神极其沮丧地回到伍德小姐公寓，她哭着倒在床上，睡着后也发出抽泣声。她开始去找算命的人，去参加降神会，“想发现将来会怎样”。

看起来这次恋爱只是病状而不是病因，精神上的紧张不安也许主要来源于回“家”，离开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一切诱惑，回到桑顿那难以忍受的平静中去。父母亲谈到惠灵顿，威胁到她的个人世界。凯开始对维尔抱怨父亲，不负责任地谈到要在伦敦租一个寓所，“凑合着度日”。在1906年，对一个体面的年轻女士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维尔的姐姐半开玩笑半当真，建议她们合用一个寓所，凯丝也把此话当了真。

这段插曲写入了凯什琳刚开始的“小说”片断。5月里，在写了那封有关模仿的信后仅三个星期，她打开了一本厚厚的黑色笔记本，开始写现在叫作《朱丽叶》的长篇大论，其中充塞着当时种种事情的记载。故事大意似乎是这样的：

朱丽叶，14岁，遇见了大提琴手戴维·梅因，显然是在惠灵顿，她爱上了他，然后去伦敦呆了三年，在那儿与一个名叫珠儿的女孩子合住一间房子。时间到了，该回到惠灵顿和它“体面的生活”中去，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社会功能，人们用谈论服装来消磨时间。她反抗父亲，决定留下不走，接受了珠儿的建议，在伦敦合住一处寓所，这时也有对戴维的不信任（“想想吧，总是和一个男人呆在一起”，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朱丽叶对珠儿说，“一个女人同一个人呆在一起时不会感到完全地自由自在”），接着就要写到鲁道夫了。

在一个标题为“鲁道夫的胜利”的词藻华丽的章节中，朱丽叶来到她和戴维两人合用的工作室，发现鲁道夫一人呆在那里。他的机会来了，他们闲聊着，他随意在钢琴上弹着《唐·豪塞》，但是不久气氛就变了，接下去是瓦格纳，普契尼，莎士比亚，米尔热以及一些三流的浪漫故事等等的大杂烩。

“放开我”，朱丽叶说，她抬眼看着他，他的表情使她突然停止了挣扎，不出声地望着他，她嘴唇张开着，眼里含着恐惧。

“你这可爱的小家伙”，鲁道夫轻声他说，他的脸靠近她，“你这可爱的小家伙——你现在不能出去了……”她觉得整个房子在摇晃，感到自己要晕倒了，“鲁道夫，鲁道夫。”她说，而鲁道夫的回答是“终于……”。

这件事发生了，又结束了。戴维参加大学生舞会归来，时机恰好地告诉大家，他“疯狂地爱上了珠儿”，而朱丽叶此时也发现自己怀孕了（“恐惧压倒了她，‘噢，这——这不行’，她说，‘绝不行，这太可怕了……’”），但结局显然是她流产了。在戴维和珠儿面前：

她睁开眼睛，看见这两人在她身边，“要我把你们的手握在一起，为你们祝福吗？”她轻轻他说，突然抬起身来，“噢，我想活，”她喊道，但死神的手落在了她唇上。

作者似乎意识到经过这样地渲染渴望死亡的主题（这样奇特地有预见似地渲染），只有讽刺才能使主角退出舞台，最后活下来的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去，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平庸。

尽管《朱丽叶》情节夸张，随意模仿，却显示了作者自己以及她的青春时代，她易受“艺术家”类型的男人诱惑，她与维尔和沃特·李普曼的关系；她下意识地对生孩子和流产所抱的态度。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勃勃雄心，一些迹象表明她将成为父亲一样的强者。许多混杂在一起的细节表明了发生过和将要发生的事件。

伦敦的情景是描写得最好的，但草稿中最完整的人物除了朱丽叶自己外，当然就是她父亲了：“用一块大丝绸手帕包裹着脖子，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像所有那些身体完全健康的人一样，总想象着自己是在同虚弱的体质挣扎”，描写他是“道道地地的庸俗商人”，当他到伦敦一所学院接女儿时，全身散发着“毋庸置疑的商人气息”。

17岁的凯的无情笔锋下这位牺牲者也像《福尔赛世家》中任何一个人物一样，一点也不知道世人对自己的了解，现在正在伦敦参加大英帝国商会第六届会议，恰好被选为30个会议代表之一，在白金汉宫受到爱德华七世召见，他自己的书中也有记述。

夏天似乎在观光和走访亲友中度过了，然而随着乘船回家的日子临近，家中出现了一些争吵。凯什琳说她要呆在伦敦，当然未得到允许，但是她知道该怎么办，她告诉爱琳·帕丽莎：“我要让自己变得非常令人讨厌，这样

《唐·豪塞》，瓦格纳1845年创作的歌剧。——译注

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戏剧家，主要著作有《艺术与革命》《歌剧与戏剧》等。
——译注

他们就不得不让我离开。”

贝尔姨妈留了下来，此时她已同一个富有的股东结了婚，这位股东拥有两处产业。凯什琳也许能够开始写作小说，向自己证明自己是位作家，但绝不能让父母知道，她只能在海上航行时继续写下去。

他们 10 月启程，几天前她才度过 18 岁生日。这次他们只好同其他人一起乘一条船。

回到惠灵顿

这儿描述的情形是一种喜剧和悲剧奇特的混合，那些受到悲伤情绪感染的读者不用别人解释也知道喜剧只是表面的，而悲剧才是实质。

——爱德蒙·高斯 《父与子》前言
1907年9月

对于凯什琳，旅途中吸引她注意力的是一位英俊的英国板球队队员，他去游览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船上人戏称他“阿多尼斯”，因为他美貌非凡。到达热带地区时，他同她调情，她在日记本上有所记载：

因此，我暗自发笑，坐下来分析这新的影响，这种复杂的感情。不管我走到哪，不久就会碰上类似的情形。一个音乐家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性的全音阶，R是我新的体验对象。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正躺在椅子上，他走过去，我看着他节奏完美的步伐，绝对的自信，身体的健美，心中感到一阵激动，这是青春和造物给人的永久的渴望。当我同他在一起时，一种异常的渴望抓住了我，我想让他狠狠地伤害我，我想让他健壮的双手紧紧地勒住我……

板球队员们竖了一个球网练球，她看着阿多尼斯美妙地投球。同一天夜晚，他俩并肩坐在热带的热浪中，用法国人的那种危险的语言交谈（他在巴黎呆过8年），阿多尼斯“特别易于激动，有时甚至有些狂暴。女人越有感情越好，他告诉她。凯感到他的衣袖擦着自己裸露的胳膊。“我想激怒他，在他心底唤起奇特的感情，他见过那么多世面，这真是一种征服。”

这一切都完全正常健康，特别是有关双手勒住的部分。笔记中接着谈到凯什琳的父母亲，他们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她父亲的外貌使她厌恶透顶，他的双手覆盖着长长的沙色汗毛，是绝对残酷的手，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感抓住了我。他说她要回到英格兰去是“该死的念头”，她说“看，他绝不会让我在黑暗的角落里同别人鬼混。”但是不仅仅是同别人，凯什琳身上有种东西既能吸引女人也能吸引男人，她父母亲也意识到这一点。母亲总在观察着她，“时刻疑神疑鬼，盛气凌人”，至于她父亲，“我不能独自呆着，或杂在女人中间，哪怕只是半秒钟——他在那儿眼神可怕，企图假装满不在乎，毛茸茸的双手扯着自己长长垂下的红灰色胡子，呸！”

这是凯什琳对父母亲不够恭维的评论。虽然在以后她的各种笔记本中还能找到滔滔不绝的自我表白，但她再也没有如此贬低过自己的父亲，她感到这次旅途十分可恶，行动受到限制，航行回家离开了另一个她叫作“家”的地方，那是她现在精神上的老家。

经过开普敦和澳大利亚港口，就是寒冷的塔斯曼海，哪怕在12月也很寒冷。最后再光顾一次行李房，那些西区买的衣服和硕大的爱德华式帽子都捆扎好了，准备运上岸。刮风的海峡，荒凉的石头山，岛湾的小棚屋，接着进入弯成一个问号式的港口。

爱德蒙·高斯（1849～1928），传记作家、诗人，《父与子》是他的自传。——译注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罗狄忒的情人。——译注

1906年12月6日的《晚邮报》说，大约9点钟，柯林斯克号气派十足地驶进了海湾，灿烂的阳光给这次来自遥远北方的航行增色生辉；另一版面上，哈罗德·比切姆受到采访，就“帝国和殖民事务”侃侃而谈，他很有自信，为什么不呢？他刚同国王会过面。

但是三个小姑娘的情绪如何呢？她们现在何以消遣？她们会不会也像父亲17岁时那样，“遇见许多很好的年轻人”，给父亲带来女婿，让他们同莱斯利一起加入公司业务呢？

殖民—爱德华时期的惠灵顿今天几乎全都无迹可寻，因为那时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年轻的亨利·詹姆斯也许会同情我们回到殖民地的居民：街上每刮起一阵风，都会卷起大团大团的灰尘和谷壳。伦敦——伦敦在哪儿呢？而这个拥有6万人口的兴旺发达的都市却能给她们父母亲提供一切欢乐。在海关码头，每根电线杆都有160个绝缘体，160根铜线为贸易往来嗡嗡作响；在弟纳柯里大道上，正在兴建的房屋等待着“园会”家庭的归来；很快他们就会在总督官邸的来客留言簿上签名，应邀去那儿做客。

莱斯利仍在高中读书，因此家中只有姐妹几个。几星期后，快乐饶舌的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佩恩，描述“住在新西兰究竟是什么滋味”。

这儿绝对没有艺术，自然人也就枯燥乏味。接受我的劝告，亲爱的，千万不要到殖民地来居住，就待在英格兰吧，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那儿啊。如果能回去，我真愿用一切来交换。我简直不能告诉你这儿有多么悲惨，我们根本就没有朋友，过去所认识的女孩子都长大了，结婚了，似乎对我们毫无兴趣，这很让人伤心，对吗？

姑娘们回到新西兰，说话带有特别的“口音”，戴着半遮半掩的面纱。她们举行“小姐茶会”，凯什琳身穿紫红塔夫绸服装唱歌。

当然还有更为盛大的场合，“英国板球队员们全都那样迷人，他们在惠灵顿，这让人多高兴。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描述了为他们举行的一场舞会。但是他们乘船离去了，留下别人不能填补的空白。“我们最近参加了两个欢快的舞会，”另一封信中说，“只是我真希望那些男人是英国人，殖民地的人太不同了。”而这时，凯什琳给西尔维亚的信则是这种情绪：

新年来了——我真不敢去想象——这儿简直没法活下去，我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一个朋友都没有，看样子将来也不会有。亲爱的，我谁都不认识，也没谁想要认识我；世上没一件事可做，没一件事值得看，我的心一直飞往牛津广场，威斯敏斯特桥一直萦绕在我心间，我觉得它一定会回来，真难想象人们怎会愿意住在这儿——

此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活中已有了两种毁灭性的冲突力量：对父亲的爱与恨，对祖国的爱与恨，它们将她撕成两半，使她四分五裂，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精神创伤。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都给这个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留下了烙印，从

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即1840~1907年，与爱德华七世在生期间，即1841~1910年，正好接近，故有此说法。——译注

巴特勒 和高斯到《海浪》的作者身上都能看到这些痕迹。在冲突中总有一位潜在的人物，对于巴特勒和高斯，是清教徒的在天之父；对殖民地居民和爱尔兰人，是他们亲爱的祖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只是名义上的英国教徒，至少用不着服从于清教主义，但她确实知道它的后继者热爱财富；她诅咒父亲拼命赚钱的愿望（她并不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父亲一事无成的一种反抗作用）。后来她能够充满深情地描写他和自己的祖国，但目前她在这两者身上都只能看见糟糕透顶的地方。

文化土壤开始在新西兰形成之前，具有文学创作素质的人显然觉得日子不太好过。这个国家小，创建晚，土地贫瘠，远离欧洲，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这些都是积极因素，有利于新的尝试；但在艺术上却是希望的敌人。用庞德的话来说，“创新”的作家需要传统使自己同过去和将来紧密结合，而移民则斩断了这一宝贵的联系。那些 1840 年左右离开英格兰的人或者像亚瑟·比切姆那样乐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误以为自己能够在新土地上生根。这片土地在基督诞生时尚无人类，连哺乳动物也没有。他们把钢琴从船上搬下来，在摆满了象征老家温馨回忆的木房子中给钢琴重新调音，但古老的曲调再也不会依旧如初了。柯勒律治在《桌边闲谈》中说，并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同一的“语言、宗教、法律、政府和血统使人们成为同一国家的人”。1920 年，凯瑟琳身为双重流放者，在法国读到这句话时，在页边上写着：“但是我脚下的土地使我成为这个国家的人”，因为那时她已知道需要创造新的神话。只有经过几代重新在一个地方造就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使他们与那地方产生有机的联系，柯勒律治提到的那些事情的一致才能有所帮助。当人们在夏天迎来圣诞节，却在秋天庆祝复活节时，宗教的传统颠倒了，人的精神必须重新开始。

1907 年的惠灵顿并不像凯瑟琳所描写的那样生活平淡，有很多剧团和音乐家来访，甚至多少也能听到一些瓦格纳的音乐。凯瑟琳在家中也遇见一些心情激动的客人，因为父母亲请他们未访，这些事情并非无意义，但他们来了，又走了，看见轮船离去令人更觉悲哀。1907 年出版了一种生气活泼的月刊，叫作《三合一》，完全致力于艺术，凯瑟琳曾为其撰写了一篇颓废派式的散文，题为《玫瑰之死》。

但是所有这些外来的世界主义都在殖民地的阳光下枯萎了，无论如何，这不属于父亲希望她进入的那种“体面的生活”，她诅咒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她可以去听在总督官邸举行的有关“女孩的职责”的讲座，但不能去那所新建立的简陋的大学，这所学校位于俯瞰市区的山腰上。

这三姐妹在圣诞节前三星期回到新西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最小的一位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无暇看望亲爱的戴尔奶奶。奶奶现在已上了年纪，同另一个女儿住在桑顿，她曾提到此事，但没有表示不满。除夕，她突然去世。凯瑟琳给西尔维亚写信说：“我祖母新年夜去世了，我也在死亡的气氛中生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亲人的死亡，我吓坏了，过去死亡从没有这样令人憎恶。”

巴特勒（1835～1902），英国小说家。——译注

《海浪》，英国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小说。——译注

庞德（1885～1972），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译注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派诗人，文学评论家。——译注

她的情绪肯定被注意到了，不久几位亲戚就邀请维拉和彻迪去他们的牧场小住，彻迪从那儿写信给西尔维亚，“真希望亲爱的凯丝也在，遗憾的是她未被邀请，我总是不愿撇下她而独自去什么地方。”

在凯的笔记本中可以读到四段阴郁的模仿爱伦·坡的诗句，还有一个“坡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移动的暗红色窗帘、血滴等等，她还开始掺入“单调、可怕的雨滴”，“狭窄、潮湿、肮脏的房子”等等，甚至在岛湾的灿烂阳光下，海的蓝色也是罗塞蒂的蓝色，绿色则是威廉·莫里斯的绿色。在这些描写中见不到一丝风趣幽默，而另一方面却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等新西兰得到进一步的文化熏陶，将产生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她自然之美的艺术家，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却是真实的。”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比切姆太太举行了一次园会，这次园会后来出现在她女儿最有名的一篇作品里。其中写到草地上支起了帐篷，预订的鲜花和奶油点心还未送来，请的乐队马上就要到了，有消息传来，说住在道路下那排破烂茅屋里的一个年轻车夫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从园会这儿能听到寡妇和5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在痛苦地哭泣。劳拉是与众不同的，更为敏感的家庭成员，要求取消园会，当然人们说服她放弃了这种过分的同情。寡妇只得忍受乐队的声音。但是客人走后，母亲出了一个好主意，必须迁就一下女儿，用开园会剩下的东西来安慰遭受不幸的家庭。就这样，劳拉身穿镶满花边的长袍，头戴一顶硕大的帽子，提着一篮子三明治和奶油泡夫去了那儿，进去后看见死者静静地躺着，这时窘迫和同情，爱与俯就的感觉把她压倒了，对着死者，她脱口而出：“请原谅我的帽子。”回到自己家中，只有弟弟了解她的心情。

凯什琳的姐姐维拉后来回忆说，的确有过故事中描写的那样一个园会，那样一次事故，她还说：“是我把东西拿到那儿去的！”她说，“头戴那时人们常戴的那种硕大无朋的帽子”，她感到非常荒唐，进小屋门时还得把帽子歪一歪。时间已过去60年了，她说话腔调中还带有一些不高兴。她和凯什琳从来就合不来。

在弟纳柯里大道75号举办的那次园会可能是在1907年初，只有那时的女孩子们才戴这种帽子，天气也不会陡变，而比切姆一家4月就搬出了这所住宅，也许是2月或3月举办的告别园会，也就是凯什琳经历了第一次亲人死亡后不久。其实也许园会那天凯什琳远不如劳拉那样富有同情心。那时她一心孤芳自赏，很令人讨厌，所以她后来写的一些最有名的故事似乎也是对年轻时代过失的一种赎罪方式。

显然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友谊，这种自寻自找的孤独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补救的方法是同女孩的两次恋爱，这是她第一次体验此类事情，是阅读奥斯卡·王尔德作品的直接结果。

回家不久后，她又遇见了玛塔，一位在斯维森私立学校的老同学，是毛利人，玛塔后来去了巴黎，同她在伦敦还见过面。两人之间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凯的日记中有所记载，玛塔的日记中也能找到一些片断。

这次同性恋发生在4月，可能同另一次交叉在一起，——也就是同埃迪·本达尔的恋爱。埃迪·本达尔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性格简单温柔，一

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兼诗人，热心于组织文艺团体。——译注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译注

点也没有凯什琳的自命不凡。她刚从悉尼的一个艺术学校回来，凯什琳认为她的画正好适合自己的儿童诗，提议她们合出一本书，因此她们常在星期六下午会面，凯丝大谈“凯撒”，或者谈自己可恶的家庭，埃迪则尽力起到“好影响”。

这种友谊也发展成为热烈的恋情，凯什琳父母亲再次感到了在船上时的恐惧，但是他们同时还要为其他的事情分心。4月中旬，一份叫作《自由撰稿人》的周报在当地新闻的头条刊登了这个消息。

W.M.伯拉廷公司前进商行经理哈罗德·比切姆先生当选为新西兰银行董事会总裁……他是商人的典范，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头脑灵活，总是知道把握时机，处理事务……

因此比切姆是这个发展中的殖民地上商业世界的权威人物，他事先肯定知道选举将要到来，所以计划好了搬往更好的住处。新房子这次是在好地段，附近没有破烂房屋，却有槌球场和一个大花园，像邻近所有的房子一样，它是木头造的，前面看上去像石头结构，有着富丽堂皇的柱式门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信件和日记中提到它时总说“47号”。

搬迁完毕，比切姆太太立即邀请人们来参加“乔迁晚会”，也没有忘记让《自由撰稿人》派一位记者来。记者的专栏文章中不失时机地报道说，秋色中可爱的菊花盛开，还有一盆盆的棕榈，比切姆太太身穿黑府绸镶象牙色花边的长袍，头戴十分漂亮的黑色羽毛帽，而凯什琳小姐则穿着一件火红色条纹丝质、本色花边的礼服……

西尔维亚·佩恩从彻迪那儿知道了这一切，“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舞厅，当然也用来演奏音乐，音响效果好极了，凯丝今晚大提琴拉得那么好，我真希望你在这儿听亲爱的老朋友演奏，我不愿意感到她在这儿很不高兴，如此年轻就处于这种心境不是很可怕吗？”

凯丝在楼上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现在放置了一些她从巴黎卢浮宫买来的明信片，“凯撒”和大学同学的照片。早饭后她回到那儿，别人已替她铺好了床，她打开一本笔记本，诉说着对自己的痛恨。她给“凯撒”写信，落款“凯西·曼斯菲尔德”，还试着使用不同的名字：“K-凯什琳、凯西、凯丝、K.凯什”，她打定主意要成为另外一个人。

当她再下楼时，又变成了宝贝，亲爱的小宝贝，她有意怠慢父亲邀请前来吃饭的轮船船长和那些从内地来参加宗教会议时住在他们家的人。日记中有一处说到“虽然没有上帝，上帝仍然会一直是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概念，——进化——最后还是上帝，不对吗？”这类话很有趣，但在她的笔下仍看不到一丝幽默。她父亲办公室的秘书经常帮凯什琳打字，说“从没见过她笑过”，她说话声音低沉单调，“缺少起伏和生气”。

6月初，凯什琳去了戴斯海湾，同埃迪一起住在度假小别墅内，这是她们尚在伦敦时，比切姆特地为女儿们建造的，别墅仅包括一个兼做厨房的起居室，一间储藏室，一间盥洗室洗澡兼堆木柴，这儿饮用雨水，使用木柴火炉或汽油炉做饭，一旦刮起飓风，可以听见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6月1日日记中长长的一段描述了凯什琳和埃迪两个姑娘之间刚刚发生的一幕：

“昨晚我在她的怀抱中度过——今晚我恨她——也就是说我疼爱她：我躺在自己床上时总想到她身体的魅力……同她在一起时，我感到的性冲动超过同任何男人在一起。”她现在已放弃了英俊的板球队员——阿多尼斯——

“如果我敢于探索自己内心深处——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现在有了她，倚靠在她身上，握着她的双手，她的脸紧贴着我，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大半个男人。”接着而来的是一场恶梦，用波德莱尔式的惭愧和罪恶的意象来描绘；最后以凯丝躺在埃迪的胸脯上，得到抚慰而结束，“真希望这种黑暗永远延续下去。”在爱的描写中有着一种美感，那时的感情无疑足够真诚，但是显而易见，凯什琳思维中的一部分还能冷眼旁观，觉得这是一种“抄袭”，甚至在恋爱时，似乎她的叙述也只是模仿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埃迪曾经说过，凯丝可以满不在乎地“利用”别人，她知道自己也被利用过，“她是典型的比切姆家的人”。

只不过三星期后，慷慨大方的埃迪就被抛弃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感情脆弱的关系，还是结束为好。”凯什琳在日记本中写道：“而且她也不会让我有什么大成就。”

凯什琳接着问自己，是否其他同龄女孩子也有过同样的欲望（现在她的思绪转向了玛塔，而不是埃迪），她们是否也像她一样感到“这样绝对强烈地放荡，几乎接近肉体的病态？”

我一人呆在这充满滴嗒钟声的房间里，开始强烈地感到我想玛塔——我想占有她——非常想，我知道这很肮脏，但却是真的，多么不同寻常——我有一种赤裸裸的原始感觉——几乎完全被这女孩子迷住了，我还以为这事已过去了——嘿，嗨！！！我的心就像一本俄国小说。

这是凯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她熟悉俄国作家。她在惠灵顿时可以从议会图书馆借书，借过无数艺术家和诗人的传记和许多诗歌，包括白朗宁、叶芝、易卜生、梅特林克等人，以及尼采的《朝霞》，海涅的《思想集》以及劳拉·马尔荷姆的《妇女心理学》，但没有俄国书籍，虽然图书馆有一本R.E.C.朗译的契诃夫的《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这本书凯什琳也许读过，但未借出来，因为她经常使用国会那俱乐部式的阅览室。

有一本书确实影响过她的写作以及她的所作所为，那就是玛丽·贝什科基夫的《日记》，这是一位满怀激情、雄心勃勃的年轻女艺术家，但还来不及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就死于肺病。她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年幼时父母就分居。玛丽·贝什科基夫同母亲在欧洲各个疗养地居住，当时她第一个愿望是成为歌唱家。

18岁时嗓子坏了，她开始爱上了绘画。25岁去世以前，她的一些画赢得了声誉，被视为天才之作，在法国曾经名噪一时。她尽情地诉说自己的内心世界，共写下10本日记，按照母亲的意愿从中挑选编成两册，加以修改，使之更符合读者的理想。《日记》在她死后三年才发表，当时在法国和英国有众多的读者，成为人们狂热崇拜的对象。克莱斯通深受其影响，斯蒂芬·李柯克在他的《马西诺太太回忆录》中曾加以嘲讽。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恶之花》。——译注

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译注

玛丽·贝什科基夫（1860～1884），俄国艺术家。——译注

克莱斯通（1854～1930），英国政治家，1905～1910年任内政大臣。——译注

斯蒂芬·李柯克（1869～1944），加拿大经济学家，幽默作家。——译注

任何人只要把这两位年轻的自我主义者的生活加以比较，就不难断定，凯什琳在这位俄国女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和特征，开始了“使自己等同”她的危险历程，甚至还模仿她的发式。

玛丽的日记大部分是用法语写的，但也有俄语和意大利语，其中虽然有许多白日梦，但也记下了许多真实的梦境，当她写到自己新年之夜“在镜子前焦急不安地等着知道自己的命运”时，我们几乎觉得看见的是凯什琳的脸，而像下面这样一段话，则是两位作家的典型风格：

喧闹的巴黎。这个旅馆像城市那么大，到处都有人走动，谈笑，抽烟，观看，让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希望生活节奏快些，更快些，更快些……我的确很害怕这种盼望生活在火热气氛中的欲望是生命短促的先兆。

自我表白的欲望促使凯什琳去尝试写作短篇小说——不是登载在杂志上的那种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情节故事，而是在形式上更带有个人成分的故事。比切姆的秘书在办公室替她打字，显然她觉得这些故事“有点病态”，因为凯在一封信中应允马上会写一些更为令人心情愉快的诗——“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其他东西——青春时代悲剧性的悲观意识——你明白吗——就像出麻疹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当特罗维尔兄弟从布鲁塞尔回来后，在伦敦发生了什么，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爱着阿诺尔德。有一段写给他的信的草稿后来收进了《日记》中，开头是这样的：“星期天。亲爱的，虽然我没有见到你，但知道我是你的一——我的每一思绪，每一情感都属于你……对于我，你是男子汉，情人，艺术家，丈夫，朋友……等等。”

此时阿诺尔德的父母亲仍在惠灵顿，凯同特罗维尔一起演奏室内乐，《日记》中有一则提到他时有意称他“我的父亲”。只要他们在那儿，她尚能忍耐，但是他们9月要离开，到伦敦去为自己的儿子们安一个家。

8月末，在音乐室内练习过三重奏后，凯同特罗维尔先生谈论“婚姻和音乐”以及一位音乐家的妻子该为他做些什么，特罗维尔显然持有疑问。凑巧第二天就收到了埃达的一封信，谈到人们纷纷传说阿诺尔德在布鲁塞尔曾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凯什琳相信了这话，马上认真地动了气，这可以从《日记》中看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埃达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有段时间，《日记》中不再提到阿诺尔德了。凯什琳不久就写了一个故事，表明了他分手。

打印这些故事是促使比切姆让她回伦敦的计划的一部分，但她不知道该把这些故事送往哪里，而他却知道。前一年夏天，英国板球队员们来打球，他曾坐在一位报道比赛的《晚邮报》记者汤姆·米尔斯身边（凯什琳可能也在凉亭上，欣赏“阿多尼斯”投球）。“米尔斯，我有一个女儿，她认为自己能写作。”——米尔斯后来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回忆道，“父亲怎么认为呢？”米尔斯问。“噢，我对故事和读者都一窍不通。”米尔斯能不能读读她的作品，提一些坦率的意见？当然他会的——“只要她不是把一大堆破烂塞给我。”

凯什琳准备好了她称为随笔的短小散文和一些儿童诗，她同米尔斯

在一个茶室见面，他建议她把诗送给《哈泼》杂志（后来遭到杂志拒绝），随笔寄给墨尔本一家新创办的月刊，名叫《地方之友》，用米尔斯的话来说，“是一家接受性爱故事的刊物”。显然这是一次很有讽刺性的谈话。

杂志总编 E.J. 布雷迪很喜欢随笔，立刻接受了其中三篇，但是他怀疑这位希望使用笔名的描写性爱的作者就是他的新西兰籍撰稿人弗兰克·莫顿，也许他想向外发展。当问到她是否就是隐姓埋名的弗兰克·莫顿时，她向他保证自己绝无抄袭之作，她痛恨剽窃别人，至于她本人，则“贫穷，默默无闻，只有 18 岁，对所有像我自己的钱包一样轻巧的东西或原则都有一种强烈的爱好。”可能这些话更加深了布雷迪的怀疑，但他出人意料地寄给她一张支票，给了她二英镑，这是她几年来拿到的最高稿酬。他告诉这位年轻的女士，被误认为是弗兰克·莫顿其实是最好的恭维。他继续同她保持联系，而她当然立刻把这张支票拿去给父亲看，他的反应自然符合一位体面的父亲的作法。

10 月 10 日，他瞒着凯什琳在办公室口授了一封信，写给这位在墨尔本的家伙，说自己的女儿给他看了信，他想谢谢布雷迪给予的“实质性的鼓励”，同时他还想向布雷迪保证，用不着“为接受她所写的东西而迟疑不决，以为那不是她自己独特的东西，”她自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写作，不管好坏，自然完全出于她笔下，至于年龄，她说的“很正确”，她在伦敦的一个学院读过书，但后来离开了学校，回到新西兰。“她一直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哦，对了，最好不要对她说我给你写过信谈论她。”

第二天凯丝又写了一封信，提醒布雷迪她只希望署名“K. 曼斯菲尔德”或“K.M.”，绝对不能用“K.M. 比切姆”这个名字。就这样她开始使用笔名，在 19 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放弃了父亲的姓。

10 月号的《地方之友》上刊载的三篇随笔，用其中一句话来形容，“充满了变态的魅力”。一幅朦胧的夜景描绘凯在窗前沉思，伦敦“伸展在她热切盼望的双手之前”。另一幅以窗台为背景的画面描述了一个白日梦景，其中音乐家先生手提灯盏和小提琴盒，从村里的咖啡馆走出来，“轻轻地吹着布鲁赫的 D 小调协奏曲的开头几节”。第三篇写的是在伦敦女孩子之间的亲昵行为，让我们窥见了作者对名声的强烈渴望，但结尾却表现了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无可奈何，这是她唯一的幽默方式：“我们谈论过名望，曾经多么渴望得到它，而这种努力又多么艰难，我们两人想做什么呢？……今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我经历了磨难，而她呢？毫无疑问在 2 月大拍卖时给自己买了一顶帽子。”这几篇都署名“K. 曼斯菲尔德”，下期刊载的另一篇叫作《在咖啡馆》的故事也这样署名，但这一篇不是以颓废派的情绪描写，而是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胚胎，用的是自嘲的笔调，仅仅几千个字就使意思一目了然。故事中无名的女孩有着一种“既充满渴望又预感到梦幻破灭”的表情，是十足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自己。当她在庞德大街同某音乐家朋友见面，同吃午饭时，他懒洋洋地用雪白的双手梳理着头发，宣称“最广阔丰富的生活只属于艺术家”——这是后来曼斯菲尔德纯粹的信条，但这需要加以嘲讽——接下来开玩笑似地提到一份红葡萄干果冻。他们谈到结婚，他问是否要留着她的紫罗兰，“那是你的，”她深情地回答（这儿感情与嘲讽之间的平

《哈泼》杂志，美国一家文学月刊。——译注

布鲁赫（1838~1920），德国作曲家，以小提琴协奏曲而著名。——译注

衡与《幸福》相似，其中也同样用不合时宜的食物描写来嘲笑爱情）。正在此时，他的同学来约他一起去排练，两人走到寒冷的大街上，她情人的双手插进口袋，她的紫罗兰扔到了人行道上。她仍然在思索着几乎要提出的求婚，仔细看了几分钟后，她把花踢进了阴沟，笑着沿大街走了。《在咖啡馆》以描写阴沟结尾，最后的情感是徒劳的，而讽刺也是无效的，但是作者却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模仿才能，使其延伸至漫画自我，这比她过去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技巧，结局也有一定形式。她的良师益友沃特·李普曼已使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她从悉尼写给维拉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识。她谴责自己的同胞以及“他们的顽固不化”，告诉自己的姐姐（她根本不是可以诉说这些话的人）这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是“一阵先拉菲尔派和超唯美派的疯狂浪潮”，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一些“平衡和协调”。

她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想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坐在街角上，商店里，房间里，在喝茶时讨论线条、形式和气氛”，这三个词：线条、形式和气氛出现在此处用来暗示一种同新型艺术有些联系的新美学的出现，但是这种说法有些过火，不恰当。接着信中又抛出了一连串乱七八糟的必读作家的姓名，这肯定使当时正在悉尼忙着参加各种社交狂欢的维拉迷惑不解。这些作家有：

门德斯、梅瑞狄斯、梅特林克、罗斯金、罗登巴赫，萧伯纳、惠特曼、托尔斯泰、卡彭特、兰姆、赫兹里特、霍桑（11）和勃朗蒂姐妹。新西兰人最好读读所有这些作家，哪怕凯丝自己没有读过他们。

凯什琳成为能发表作品获取稿酬的作家是在她19岁生日前一两个星期，趁此机会彻迪在1907年10月14日给西尔维亚·佩恩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她更多的消息。她先描写了凯丝收到的所有的生日礼物（绿宝石耳环，胸针等等），然后写道：

为了让你更了解凯什琳，我寄给你一份澳大利亚杂志《地方之友》，上面刊载了她许多作品，编辑给她写过几封愉快的回信……太美妙了！我简直难以形容自己感到多么高兴和骄傲……圣诞节后凯什琳又要回到伦敦去，我简直不敢去想。但我知道她必须走，这是唯一适合她的事情，我感到，她去后很快就会使我们大家重新聚会在一起，噢，亲爱的，那会多么令人快乐高

《幸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译注

先拉菲尔派，19世纪中期文学艺术家的团体，强调艺术灵感先于纯粹技巧。唯美派，19世纪后期文学派别，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王尔德为其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门德斯（1841～1909），法国作家。——译注

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译注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译注

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理论家。——译注

罗登巴赫（1855～1898），比利时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集《与世隔绝》等。——译注

惠特曼（1819～1892），美国杰出诗人。——译注

卡彭特（1844～1929），英国诗人，社会改革家。——译注

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作家。——译注

赫兹里特（1778～1830），英国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译注（11）霍桑（1804～1864），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译注

兴啊。

这就是家，这就是彻迪。此时凯什琳刚满 19 岁，在需要陪伴的时代，他们竟同意让她一人去伦敦。一星期后，凯什琳在她自己楼上的房间里，在那本黑封面的笔记本中写道：

该死的家！天哪，他们多么乏味，我从心底里讨厌他们，我绝不会再在这儿呆多久了，谢天谢地。甚至当我独自呆在房间时，他们也在外面大声嚷嚷，谈论着肉铺送来的货和肮脏的床单，我真感到……这种糟透了的生活。

不久哈罗就安排他令人伤脑筋的女儿出去呆几个星期，他让她同一些朋友（他并不真正认识他们）乘大篷车远征新西兰北岛的中部大山地区，穿过所有凹凸不平的山地。远征队中有一人是凯什琳在惠灵顿的朋友米丽·帕克，大概是她钢琴教师的女儿。

不知道比切姆是否读过她那本《认真的重要性》，读到“任何人在乡村都能学好”，也许他不过是希望如果她多看一下他自己从小就熟悉的新西兰，就能够安下心来。但是比切姆的女儿现在完全是城市的产物，她甚至要询问她的旅伴如何削土豆，说话还带着英国皇家学院的腔调。

她同惠灵顿的伙伴一起乘火车到内皮尔去加入其他人的队伍，《日记》中写道：“乘火车旅行对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我探身窗外，风拂面而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埋藏在城市生活重重叠叠伪装下的孩子气的欣喜挣脱了束缚，在我心中荡漾。”任何地方的火车窗口都使凯什琳想要写作。

远征队从内皮尔乘坐一辆大篷车出发，拖着一辆马车运送行李，还有一个大帐篷，5 匹马——它们那么可爱，凯什琳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昨晚它们在帐篷外差点把我的脑袋都啃了下来。”

他们在一个山谷宿营，此处后来成为《店中的女人》的背景（他们在那儿遇见的一个女人是此故事中的原型），凯什琳写信告诉母亲，她十分喜欢所有的人，“他们是道地的殖民地居民”，但是非常和蔼可亲，“对我好极了”。她的伙伴威伯太太对凯的俯就态度并不介意，后来亲切地形容凯什琳是“一个快乐的胖乎乎的女孩子，聪明活泼的好伙伴”。

《日记》中的笔记摘要有些过分夸张，但却生动地描绘了火山爆发毁坏的土地，使人们感到此时凯开始同这个国家产生了某种联系，这对她今后的艺术创作非常重要。

“山上遍布烧焦的木头，看上去极像奇形怪状的野兽：打哈欠的鳄鱼，无头的马，巨大的鹅，看门狗——白天可以一笑置之，晚上却不啻于一场恶梦；这儿那儿一队队瘦骨鳞峋的士兵正在爬上山岗。”

她喜爱当地的灌木，新西兰的南蒲苇也令人耳目一新，“我的脚下铺着一层白色的野花——小树上点缀着鲜红色，一团团小花在风中摇动，活像一群小姐妹正在晾干自己的头发。”她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唠唠叨叨地描述

《认真的重要性》，王尔德的剧作之一。——译注

内皮尔，新西兰北部地名。——译注

《店中的女人》，凯瑟琳所写的一篇故事。——译注

了刚到玛鲁卡区 那天的情景，但在笔记中则概括如下：

星期一 玛鲁卡和牧羊山区——非常陡峭贫瘠，但时时可见河流和椰树以及布满灌木丛的深谷，天气炎热——我们累了，晚上到达帕赫，由伯德利提供住宿，他有 14 个女儿栽种梨树。我们在山顶上宿营，四周都是大山，晚间在灌木丛中散步，走到一条美丽的点缀着雏菊的小溪边，——有蕨类植物，还看见牧羊人的小屋，有气味和声音，看见 12 个毛利人——他们的马在嘶叫——房子里在做饭，毛利式烹调，从那儿发信——会见毛利人。

在乌尔维拉山区，他们停留在毛利人村庄里，据威伯太太回忆说，有些毛利人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问他们是不是马戏团的，回答说是的（可以猜到是谁说的），于是村里其他人也一起来等待表演。后来维吉尼亚·吴尔夫莫名其妙地断言凯瑟琳曾随“马戏团在苏格兰荒野”冒险，也许就是据此猜测的。碰到白人时，凯瑟琳总是不喜欢他们——除非是来访的英国客人，有一些文化修养，说话声音悦耳，“我讨厌透了三流货色，要么就是毛利人，要么就是旅游者，但不要居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实际上，凯瑟琳不知道自己血亲在乌尔维拉山区，是毛利人，名字也叫比切姆——有些人说不定就在那些失望的马戏团观众之中。

离开乌拉维尔山区后，远征队继续前行，顺路在温泉区停留，那儿的“彩虹山”五彩缤纷，恐怖的地狱裂口时而可见。

我们经过一个碧绿的湖泊——四周梨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和蒸气……我们去看泥火山——走上泥泞的绿色台阶，向里窥望，火山盆内凹凸不平，布满了一团团颜色难看的岩浆，就像地球上一块化脓的创口。那下面有个小水潭，覆盖着一层石油，起着黑色的涟漪。开始下雨了，她感到厌恶和恼怒。

在笔记中，凯瑟琳常常拿不定主意应该写“我”还是“她”，在国内旅行时，她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属于这个国家。比切姆的希望落了空，这个国家野性的美并没有使凯瑟琳小姐更喜欢她的白种居民。毛利人反而有让她欣赏、喜欢之处：他们使她想起了欧洲，那儿的人民有自己的根。在白人同胞中，她感觉不到什么能够激励自己的雄心，也没有传统的根基土壤。她后来在一首诗（按华特·惠特曼的方式写成）中抱怨道：一个无自己历史的小岛国有碍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我们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圣诞夜，因为天气太热，大部分人都不在家，”1908 年 1 月 10 日彻迪写给西尔维亚的信中说：“凯瑟琳乘大篷车在边远地区旅行了一个月，刚回到家中，她过得非常快活有趣，晒得很黑，看上去那样健康，4 月时见到她不要感到惊奇，那时她很可能在伦敦。”

“我最后——当然——要结束自己的生命”，2 月日记中的一则这样说；另一则日期不明的日记，似乎是在岛湾别墅时的某个晚上等待幽会时随手涂写的，表面看来有一种不祥的等待宰割的意味，似乎写的是第一次同男人发

玛鲁卡区，新西兰北部山区。——译注

乌尔维拉山区，新西兰北部地名。——译注

生性关系的体验——“我生活中的危机时刻”：

夜晚，我在等待着这平生第一回，这生活中的危机时刻，我等待着。一群羊在月光下经过街道，我听见他们啪啪地挥着皮鞭——后面是黑呼呼，沉重的火车——我觉得它像拖灵柩的火车——我在这献祭似的月光下看上去很可爱，心中没有恐惧——只有感觉。我祈求上帝不要让我等得太久，我的灵魂感到饥渴，就像我的肉体一样，一整天都热切地渴望着他——快来吧——我觉得每一刻都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我会全心全意爱这个人——我根本就不在乎那另一个——终于来了——我上床了。

“我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成就，”《日记》中写道，“我还不如死了更好——真的。”然后又说，“我与众不同，因为我体验过一切能体验的事情。”

什么是“一切”呢？她隐晦地提到王尔德以及他对她的影响：“当然，奥斯卡——陶连·格雷使这次的危机感过去了”；5月，“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糟糕，疯狂恐怕就是这样开始的，”等等。“噢，凯什琳，不要再编织这许多可怕的罗网——你太不聪明——学好吧——为了上帝的缘故——学好吧——勇敢点，多说些真话……”

此时，凯什琳正竭力想抑制自己对玛塔的欲望，她认为这是“肮脏的”。3月4日，在岛湾的别墅里，凯什琳开始给西尔维亚·佩恩写情书（“我必须告诉你，今晚，西尔维亚，我爱你，比我在英格兰时更爱你”），说她不久就将启程去英格兰，“我不能同父亲一起生活，我必须回去，因为我知道自己会成功——这是美妙青春的悲剧性的乐观精神。”甚至报纸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比切姆小姐这个月将前往英格兰，她将在那里学习文但是4月她没有走成，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使父母亲犹豫不决。凯什琳在写给埃达的信中提及此事，说她参加了一个舞会，同“一个水手”坐在一起，有一曲没跳，接着是一次冒险，她后来在一些零散的纸张上描述了这次冒险，这些纸张随便放在房间里，起风了，母亲进来关窗户，拾起散落的纸张，看了再也放不下去。不难想象比切姆太太读了以后心中渐渐增长的恐惧，还有她丈夫回来后感到的恐惧，接着就是一次可怕的盘问。

难道“水手”只是为了埃达而特意捏造出来的吗？那些纸张上描述的是她同一个男人还是同玛塔？使父母焦急不安的是女儿的贞洁还是“堕落”这个丑恶的字眼？难怪凯什琳5月还留在惠灵顿，尽管早已对公众宣布了启程日期。

正在此时，她读了一本伊丽莎白·罗宾斯写的女权主义的书，名为《来发现我》，于是她在笔记本中少有地发了一通感慨，谈到在男人创造的世界中妇女的地位这个问题。

真是一本聪明的了不起的书，它使我产生那样一种力量感，现在我的确隐约意识到妇女将来能做些什么。她们迄今为止从未得到过机会，说什么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和人权解放的国家——一派胡言乱语！我们被自己铸造的奴役锁链牢牢束缚着。是的，现在我知道锁链是自己铸造的，也必须由自己来解除。

奥斯卡·王尔德对她已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她现在正在读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萧伯纳和邓南遮。

我的需要概括起来就是权力、财富和自由。认为爱情是世上唯一的东西是一种枯燥乏味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地灌输给妇女，残酷地束缚着我们，我们必须摆脱这个怪念头——然后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的机会。

然而，目前在她父亲统治的这个新天地里，自由只能来自他的赐予，最后她的确得到了自由，公平地说，这应该归功于他。他不愿解释，凯什琳也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欠了父亲多少情份。童年时他给了她乡间的居所，而一个大家庭提供的益处才使她能继续后来的事业，他让她在伦敦接受教育，是为了迎合她的需要，而不是他自己的需要。如果说他毁了她的“音乐生涯”，至少他也使凯避免了把时光白白浪费在这方面。是他最初帮助她找一个编辑发表那些故事；当作者的身份受到猜疑时，是他首先为其辩护。他在关键时刻让她去边远地区和丛林地带旅行，如果没有这次旅行，她对新西兰的知识就会非常有限。无论如何，其他孩子不能去英格兰上学。

他现在决定——尽管以一种使她非常气愤的方式——让凯什琳回到伦敦，每年给她 100 英镑生活费。他试图安排让她同自己的表亲亨利·比切姆住在一起，后者在伦敦音乐学院教书，凯姐妹们在学院读书时，他曾做过她们的监护人。但是亨利慎重地向他推荐了在帕丁顿的一家专为音乐学生开设的寄宿舍，这宿舍恰好叫作比切姆公寓——真是走到哪儿都躲不开这个姓。

6 月底举行了一连串的告别晚会，在奥罗拉园地，古典文学教授的妻子布朗太太举办了一个“紫罗兰茶会”，据《晨报》报道，“主人尽天才的艺术想象之所能，使紫罗兰无处不在。”茶桌上的灯有紫罗兰色的灯罩，上面挂着尚未当令的紫罗兰结成的花饰，桌上的银碟子内放着裹了糖屑的紫罗兰，还有精巧的紫罗兰三明治招待客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比赛，女孩们用紫罗兰色铅笔写“一首有关紫罗兰的诗”，取胜者是凯什琳·比切姆小姐，她的作品标题为《爱情为什么是盲目的》。第二名是凯什琳从前的教师，总穿紫色花呢衣服的巴茨小姐。接着又举行了最后一次晚会。

7 月 4 日的《晚邮报》女士版上，“普列西拉”写道：“我亲爱的凯丝”（普列西拉的专栏总是这样令人吃惊地开头）“……在各种各样为凯什琳·比切姆小姐举行的告别晚会中——她今天启程去英格兰——最令人愉快的是在奥拉宅第举办的午后茶会。”

奥拉宅第坐落在弟纳柯里大道上，是总理约瑟夫·瓦德爵士的大房子，晚会由瓦德夫人举办。普列西拉说，美丽的会客室气氛欢快明亮，灯光柔和，炉火融融，房中摆满了鲜花和绿叶植物，茶桌陈设诱人，一盏低垂的红罩吊灯照着茶桌。瓦德夫人身着极为醒目的黑丝绸外衣，饰有白色花边的精致衬衣外罩一件背心；主客自己则穿一件“订做的黑色镶布花呢衣服，头戴奇形怪状，大朵紫色菊花镶边的帽子。”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作家，记者。16 岁就出版第一部诗集，小说以《死的胜利》最为著名。——译注

帕丁顿，伦敦一地名。——译注

有段时间算命人很受欢迎，别人送给凯什琳·比切姆小姐一本乱七八糟画着猪的素描汇编做纪念，带来了不少乐趣。所有的画上都有艺术家签名，因此，这本画册具有双倍的价值。画得最好的猪还获了奖。

比切姆给凯什琳的临别赠物也是一只猪，是用来擦笔尖的铜猪，背上还有鬃毛，过去曾摆在比切姆的书桌上，她非常喜欢，直到去世前都保留着，又在遗嘱中把它还给了父亲。

凯什琳乘坐的轮船将于下一个星期一，7月6日从位于南岛的港口利特尔顿启航。她几乎不能独自去那儿，因此星期六晚上哈罗德和安妮带着他们的女儿——拿着那本猪的素描汇编——乘船前往利特尔顿。启航的时间是下午4点30分，那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他们在城里吃过午饭，然后乘火车通过隧道。

同船长 T.S.惠斯顿在他的舱房内会面：“比切姆，让这孩子离开老家，是吗？这次航行船上都是男人，只有两个妇女，我们会照顾她，对吗？再来杯威士忌？喝点茶，比切姆太太？”后来惠斯顿船长不无懊悔地回忆起这位有名的乘客，用的是他一贯简短的说话方式：“不能忍受这个女人。”

雨敲打着救生艇、排风装置和码头的小棚屋；海鸥飞扑着啄食面包屑；两个心情沮丧的人最后渐渐隐入雨中，终于转身离去。

《往事与追忆》记述了这次悲伤的别离：“在新西兰呆了个月后，她央求让她去伦敦，相信自己能够在文学界取得成功。

她已经完成的作品无疑表明她有发展前途，没有什么能妨碍她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1908年7月，她从利特尔顿乘船去了伦敦。”

1908 年，比切姆公寓

旅行者，我觉得你完全有理由感到悲伤，你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去观看其他人的土地，于是看到了太多却一无所获；富了双眼，穷了双手……

别了，旅行家先生，注意不要咬舌，要穿稀奇古怪的服装，放弃祖国所有的好处，不要再爱你的乡亲。要责怪上帝给了你这么一副相貌，否则我就要怀疑你是否真坐过贡多拉。

——在阿登的森林，罗莎琳对贾克斯说

1908 年乘船从利特尔顿经过合恩角去伦敦，整个航程需要 7 星期。帕帕尼号载着 24 个乘客，其中只有两个妇女。船在深冬季节朝南行驶，前面是冰山，三个星期以来，除了合恩角之外，不见一点陆地，然后在蒙得维的亚首次停靠。这时凯一定又写满一本厚厚的黑色笔记本，但没保留下来。

在蒙得维的亚，凯什琳同一位男乘客一起上岸。后来，她告诉伦敦的两位朋友自己有段时间中了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害怕自己怀孕了，两个月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据说，经过赤道有时会导致这种令人尴尬的错误。

同时又传来另一有关怀孕的消息。特罗维尔兄弟现在都在伦敦，当凯的船在格雷夫森德停靠时，她收到埃达的来信，说她的大学同学格雯·罗斯怀了阿诺尔德的孩子。这很不真实，事实上其中有很多道听途说、谬误以及故意布下的迷阵等等。

1908 年 8 月 24 日，忠心耿耿的埃达独自一人等待着凯什琳乘坐的火车驶进站台，她直接带凯去蒙太古公寓，在那儿同贝克上校以及他的女儿们呆了几天，然后搬到比切姆公寓。

比切姆公寓是沃里克产地的一部分，根据沃里克郡的那个家族命名。这座摄政时期的高大房屋孤零零地位于号称“小威尼斯”、却无贡多拉船行驶的大运河岸边。运河的帕丁顿流域岸边曾经有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与对岸的法国梧桐遥遥相对。1908 年，这所房子是由两位职业音乐家安·缪克尔小姐和罗莎贝尔·华森小姐开办的音乐学生寓所。两位小姐通情达理，知道音乐是她们的房客们走向自由的必要途径，因此很少有什么清规戒律。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大门钥匙，也可以晚些用餐，可以在自己的房间练习大提琴或打鼓，甚至吹长号。但是结了婚的人不能住进来，如果结婚了，就必须离开。大部分学生都学习音乐，但也有一两个演员。

凯什琳携带大提琴来到比切姆公寓，住了楼上一个大房间，有一个带弯曲铁栏杆的小阳台，可以俯瞰运河。租金不便宜，连伙食费在一起一周共需 25 先令，这意味着她又被看作殖民地富人家的女儿。

她在楼下的饭厅里遇见另一个新来者玛格丽特·威斯哈特，她在公寓第一次进餐时恰好坐在凯什琳身旁，她也是为了躲避父亲——一位海军少将——而到这里来的，所以两人立刻成了知心朋友。玛格丽特学习小提琴，比凯

贡多拉，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特有的一种小船名称，——译注

阿登的森林，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的场景，罗莎琳和贾克斯均为剧中角色。——译注

乌拉圭首都，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摄政时期（1811～1820），其时威尔士王子代生病的乔治三世摄政。——译注

什琳更为温柔热情，性格更坦率。她没有太大的野心，也许更愿嫁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但是父母亲希望她成天跟随他们去军事港口，做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一种音乐点缀，去马耳他 或任何他们会驻扎的地方。她最近获准留在伦敦，靠衣装费（每年 60 镑，而凯什琳每年有 100 镑津贴），再加上拉提琴赚来的钱凑合度日。事实上，不久她就遇见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钢琴家乔治·伍德豪斯，秘密同他订了婚，一年之内靠了华森小姐和缪克尔小姐的帮助而结婚离开了比切姆公寓，父母亲则同她“断绝来往”。这一切在 1908 年将两个逃亡者维系在一起——凯什琳不久也“秘密订婚了”，虽然不是同汤姆·特罗维尔。

想象中的同汤姆的罗曼史不过是想象而已，两人之间的爱情大部分是出于她自己，而在他心目中，她只是一个朋友——“我非常好的朋友凯什琳 M 比切姆”，这是他为大提琴和钢琴所作的 6 部乐曲的题辞——他同她确实一直通信长达 6 年，但几乎没有碰过她一下；而凯同他非常有责任心的兄弟加纳特在一起，不久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卡尔顿山 52 号，凯丝被当作家庭成员，家中有的是音乐而非金钱，她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暖自在，几年以后试着在一本“长篇小说”中描写过。这部小说几乎没有虚构，不久就被放弃了，但一些片断仍保留了下来。其中谈到一个小孩子，显然是凯丝，下楼去厨房吃晚饭时看见母亲正用叉子在一个苹果馅饼上刻她的名字，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在起居室的钢琴上试弹新写的五重奏，另一个在楼上拉提琴。下面是晚饭后的情景（这儿真名代替了半虚构的名字）：

凯丝跪在饭厅的壁炉旁帮多利烤栗子，身旁放着一袋硬壳栗子，一枚用来挑栗子的发夹，一张旧的《每日镜报》装着烤焦的栗子壳。在玫瑰红色的火光映照下，两个孩子倚在一起，一边笑，一边说着悄悄话，非常专心致志。特罗维尔太太坐在桌旁给汤姆的袜子换一个新袜底，她的裙子撩在膝盖上，穿着拖鞋的脚弯曲着放在椅子下面。她看上去苍白疲倦，不时俯身张嘴让多利扔进一颗“漂亮柔软的栗子”。

制图板竖立靠着饭桌，留有污迹的墨水台旁散放着几张手稿，一些粉红色的吸墨纸。父亲正忙着抄写汤姆最近的成绩……房间里很温暖，四处弥漫着烤栗子的香味。窗帘在闪烁的灯光下看起来更沉重，难看的颜色似乎更深了——似乎渴望一些空间将这四扇窗户连在一起——一片寂静中，时而可听见汤姆的钢琴声，他在忙着些什么——晚饭时突然想起一个主题，因而不肯吃布丁，只拿了一个苹果就跑到起居室去了……

“妈妈，”多利突然说，“加纳特去哪儿了？”“不知道，亲爱的——问凯丝吧。”特罗维尔太太对折起一根线，费力地穿着针。“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他会喜欢这些栗子的。”渴望有个家是显而易见的，凯什琳的来信很快就让人知道（确切地说两个星期内，她狂热地爱上了加纳特，希望同他结婚。这并未伤害汤姆，她对他的感情现在已转变成像一个溺爱的大姐姐一样。

玛格丽特·威斯哈特记得加纳特“高而瘦长，好梦想，有教养，爱小提琴也爱书”。他没有很明显的男性特征，但更像是凯什琳愿意与之结婚的那

种男人（她从未被那种健壮如牛的男性吸引，她很不喜欢身体强壮，“成功的男人”）。

这是未完成的小说中的另一个情节：在楼上的一个卧室里，加纳特和凯什琳正在互相倾诉生活让他们感到多么不快活，当他们谈论着黯淡的前途，她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囚犯”时，甚至他那放在白色床上的小提琴盒也像“一个小棺材”。在接下来的间歇中，她感到谈话陷入了一个不可知的深渊，将他和她隔开——而那些混杂的话语则填补了这个深渊。门大大打开，汤姆走了进来，手里挥着餐巾：

“开饭铃响过三遍了，珍妮来喊过你们，母亲发脾气了，饭都凉了。你们两个家伙在干什么？坦白交待，加纳特，你这只老狐狸。”

“噢，我必须赶快下去。”凯丝说。

“不——不，”汤姆伸出双手拦住她，“等我知道了你们两人在干什么才能走。”

“不要问，汤姆，让我走。加尼，在这种光线中，你的头发看上去都很乱——他们会很生气的。”

“不要着急，亲爱的姐姐。”

“不要犯傻，汤姆，”加纳特笑着说，“我们一直在看对面墙上的树——就这些。”

“什么！”汤姆大笑起来，“凯丝昨天说的那两个人难道只是在黑暗中互相拉着手吗？羞不羞。下楼到大家那儿去吧，小姐。”

“噢，你这宝贝。”她嘲笑着，跑下搂去了。

汤姆走过去，捅了捅加纳特，“幸运的家伙”，他说，一路嚷着跟着他们进了饭厅，“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实际情况是凯什琳乘船到达一个月后——那时加纳特随莫迪·马勒斯剧团巡回演出——就已经在信中称他“丈夫”了，然而信中含有奇怪的害怕的迹象，不知是什么原因。甚至他保留着的第一封信也有这种迹象。住在卡尔顿山的那幢房子里时，她给他留了一张便条让他回家后读：

最亲爱的：

我觉得非给你留一张便条不可——今天命运对我俩都很不好，最亲爱的——昨天见到你以后就一直想你，我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到有这么多话要说，而时间又太短促，你马上要离去。

最亲爱的，我热爱你，觉得现在，直到白头都能这样对你说……我觉得你的吻把我的灵魂都融入你心中去了。

开头的几行恰好说明了《在咖啡馆》中的那位女孩的表情，“既热切地渴望，又预见到幻想的破灭。”这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9月13日，星期天，凯什琳送加纳特去伯明翰，他将在那外省的剧院和剧院寄宿公寓里呆一个冬季，每星期演奏6个晚上，每个星期日都要旅行。他在莫迪·马勒斯“A”团，是140位团员之一，查理·马勒斯和芬妮·莫迪

任主要演员，罗莫阿多·萨皮欧担任指挥。那年的11月，日子并不轻松，他们星期一演出《阿伊达》，星期二《蝴蝶夫人》，星期三《名歌手》，接着就是《科夫和佩克》，日场演出《唐·豪塞》，星期六晚上的盛大演出是《玛里塔娜》，然后再乘火车去别的地方。

凯什琳给加纳特写信滔滔不绝地谈论捉摸不定、转瞬即逝的幸福，这是她后来生活的特征。同他在一起，她感到“安全、舒适和满足”，显然两人都想到了结婚，但是她总是问：“你理解吗？”在伦敦的一个起风的晚上，她谈到“在惠灵顿时那种经常要将我压倒的可怕的痛苦感觉”，接着又说，“就像突然迎面碰上了一个将要吓住我的鬼魂一样。”

信中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考虑过如果结婚，将如何度日的问题。凯什琳写到将来时总要大写头一个字母，他们谈到的家也只是梦中的家。玛格丽特·威斯哈特同凯丝长谈过几次，讨论将怎样过这种一无所有的日子，“家中肯定会因为我们同这种不名一文的音乐家结婚而大为恼火”。她记得凯丝曾经说过如果她只有6便士，也要设法买一束紫罗兰装饰餐桌，而宁愿少买些食物。如果所有的收入都贡献给了艺术，桑顿又远在天边，那时将怎么办呢？“我似乎感到加倍的压力，”给加纳特的一封信中宣称“你完全改变了我，”另一封信又说，“我现在与过去不同了，或者说——有生第一回——我觉得完全属于我自己。”

尽管如此，她还是去萨里同贝尔姨母以及她的股东丈夫度过了一个周末。从那儿她给加纳特写信：“我似乎觉得大自然对我说——既然你同世界和平共处，享受而不是怀疑——既然你在爱——你就能明白。”

但是冲突留下了——或别的什么留下了——一种令人苦恼的无名恐惧。就像小说中凯丝这个人物告诉自己的爱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一种宿命感所控制——你知道——一种大祸将临的感觉，或是这种感觉的影子笼罩在我心头——然而它是那样阴暗可怕……难以形容。”

凯什琳离开惠灵顿时，带了一些自己常穿的贵重时髦的衣服：紫红色的塔夫绸，褐色的真丝，做工考究的黑色花呢衣服，这些服装都慢慢不见了，无疑是进了西区某家体面的小当铺，因为这有违于她真正的野心。她在比切姆公寓的穿着与在桑顿大不一样，她的确“不再爱自己的祖国”，在帕丁顿再也看不到那顶奇形怪状的饰有紫色菊花的帽子，也看不到那件蓝底粉红色花蕾的丝绸衣服，不久前她还穿着去参加过在码头星船俱乐部的小屋中举行的舞会。如果要保留所有这些时髦，住一个昂贵的房间，又要使收支平衡，她该怎么办呢？

每个月她可以去一次坐落在维多利亚女皇街的新英格兰银行拜访一次基先生，拿她那8镑6先令8便士（基是老于世故的人，每次都要对她会意地眨眨眼）。付过食宿费后，每星期还剩下15先令用来买衣服，紫罗兰，阿布拉拉斯（加纳特吸这种烟——他们度蜜月时要吸这种烟），经常去皇家音乐厅，

《阿伊达》，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71年创作的歌剧。——译注

《蝴蝶夫人》，普契尼1904年创作的歌剧。——译注

《名歌手》，瓦格纳创作的歌剧。——译注

《玛里塔娜》，爱尔兰作曲家威廉·文森特（1812~1865）创作的歌剧。——译注

该银行经理。——译注

在庞德街喝午茶，后来埃达利用了这机会，自然由她付帐。但是埃达还不满 21 岁，同父亲住在一起，自己每年只有 12 镑。她给哈罗德·比切姆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说“凯什琳能利用自己朗诵、模仿和音乐的才能。”

那时候，西区的女主人常为自己的客人安排一些收费的娱乐，而比切姆公寓显然是公认的天才人物的代理处。凯什琳·比切姆小姐可以非常有趣地朗诵自己写的一些小诗，还能唱歌（此处她的大提琴不能派用场，也许就像那些不久就卖掉了的衣服一样），这也是这位多变的女孩试一试模仿的机会。她很容易被当作一位客人，而在适当时机应邀唱一首救世军歌曲或唱“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幸的人”等，离开时主人则巧妙地塞给她一个信封。埃达说凯什琳接受了许多这种工作，每次一基尼，因此至少能买得起一件长袍。衣服是阿密·伯奇帮着做的，她住到比切姆公寓来，也是为了逃避父母的专制。她是玛格丽特和凯什琳的好朋友，她们三人常常在凯什琳的房间里呆到很晚，喝着可可，“谈天说地”，凯丝蜷曲着身子躺在炉火前的地毯上，看上去的确像有些毛利人血统。玛格丽特后来谈到这些往事，说着还流了一些眼泪。两个女孩分享着许多秘密，其中之一是一个可爱的瑞士理发师，是凯在离贝克街不远的乔治街发现的，她是一个能为人排忧解难的宝贵朋友。玛格丽特 60 多岁时回忆说，在她后来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再也没有同谁像同凯丝在比切姆公寓那么亲密过。

在玛格丽特看来，埃达是一个非常乏味的人，经常来拜访凯丝，“因为忠心耿耿，所以受到容忍，虽然有时几乎让人感到厌烦之极”。她“异乎寻常地崇拜凯丝”，“发狂地嫉妒她同别的朋友来往”，所以玛格丽特尽量躲着她，看见她来就避开，“但同时我总是不得不经常听到谈论她，多么令人生厌，像梦魇一样”。

埃达在自己写的书中谈到凯什琳想写作，却又被公寓内一些烦人的交往占去了时间和精力。“她在学生中认识了许多人，其中一两个成为她那小房间中的常客，她们来得太勤了，时时盯着她，使她透不过气来，不能工作。”

两个人让她透不过气来，还有一个“梦魇”？也许凯什琳有些口是心非。她确实开始了一次戏剧性的冒险，扮演了某个角色，将她的朋友置于不同的“小房间”，对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着了迷。

她在惠灵顿的笔记中有一些从一个无名戏剧中摘录的片断：“为了对别人隐藏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最后也许会找不到自己。”不能肯定她是否知道自己会招来什么危险，但她总在观察着这种试验。玛格丽特经常看见凯丝在镜前“自言自语”。

所以这时有关她的一切都是对镜制造的故事，包括迅速地换装，改变声音、活动范围和国家，而唯一说实话的地方是面对镜子，轮流表示各个旁观者的意见，达到某种效果，因为只有在这种多重混杂中才能找到真实。

凯什琳急需挣钱，不久就同一种爱德华时代的“新妇女”开始短暂的交往。她往国内的一家报纸寄了一些时事通讯。加纳特在外省的剧院时得知她有天晚上去贝克街采访一个妇女参政权的会议，衣着华贵的女人声嘶力竭地

救世军，同际基督教慈善组织名，它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类似军队。该组织正式创立于 1878 年。该组织不像其他宗教组织那样刻板、严格，其成员男女平等，皆可以歌唱、演奏、鼓掌、作见证、自由祈祷、公开忏悔。该组织已在 80 多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有关机构。——译注

基尼，旧英国金币名。1 基尼等于 21 先令。——译注

争论着，踏着地板，鼓掌叫好，其中一人甚至想说服她加入这项工作。但是凯从来就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觉得自己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整治世界的毛病，也就是说通过写作。

她在皇宫音乐厅感觉更为愉快些，那儿她可以见到大胆的芭蕾舞新秀莫德·阿兰穿着轻飘飘的雪纺衣服，“代表着行将逝去的、色彩缤纷的供人享乐的一切。”当她写信对加纳特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楼上一个房间的女孩子正在练习《巡警合唱》中的击鼓部分，而隔壁一间房子里，有人正开始练习长号音阶。

委内瑞拉钢琴家特丽莎·卡里诺在里希斯坦音乐厅开音乐会，演奏著名的表现“男性力量”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一个星期六下午，凯什琳带着加纳特的妹妹去听音乐会，那天晚上她写给加纳特的信中谈到卡里诺、埃达，以及读了家信后感到的沮丧（“过去生活的阴影笼罩着我……残酷地伤害了我。”）。她们去后台看望卡里诺（凯什琳肯定曾在惠灵顿见过她），卡里诺吻了她的手，“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常常见到你。记住我是你的朋友，希望你在我演奏《魔王》基本上是为了你。”这并不完全是一时的感情冲动，那个星期天凯应邀去她的寓所。

星期三是她的生日，她后来给加纳特写了一封很特别的信（1908年12月13日），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虽然我见不到你，却知道我是属于你的：

我的一切思绪，一切情感都属于你——今早醒来，我一直梦见你——而白天，我生活表面平静如常，心却同你在一起激动地跳跃着，同你一起，我体验了所有可能体验的情感——爱你。

这些话听上去有些熟悉，开始几乎是逐字重复1907年8月11日在惠灵顿写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似乎她在对镜朗诵脑子里早就记着的东西。那封信是写给加纳特的兄弟汤姆的，不知他是否读到过此信。

生日那天，凯什琳收到加纳特寄来的一只戒指，她戴着它，去卡尔顿山给他母亲、汤姆和小多利看，然后在维多利亚车站乘坐4点30分的火车去看望贝尔姨母。她早上念叨着加纳特的名字醒来，亲吻了“我们的戒指”，跳下床，听见花匠就在下面掘土，马上就把这些全部描述给她的未婚夫听，但又问道：“加纳特，摆在我们两人面前的是什么呢？噢，我们将去寻找世界的灵魂。”

那时凯什琳的新西兰朋友罗斯·赫里克仍然在伦敦，有一天，出乎意料地她发现自己成为别人倾诉烦恼的知心朋友。凯知道罗斯认识一位妇科医生，告诉她在蒙得维的亚的插曲，解释说她已停经一次，请求罗斯介绍认识这位医生。难怪她同贝尔姨母呆在一起时在《日记》中写道：“感到恐惧，却不知什么原因……心情糟透了，真害怕，不知该怎么办。”另一则日记是在回伦敦的途中坐在公共汽车中写的：“我不知自己是否还能再高兴起来——这是个问题……我似乎觉得脑袋僵住了，整个灵魂都因可怕的痛苦而麻木了。”

无法证实究竟是什么使她产生这些念头，但害怕怀孕肯定能解释一二。

如果在蒙得维的亚真的受孕的话，她是否仍能继续扮演所有那些角色——同时与加纳特结婚呢？

但是，第二天晚上她就高兴地启程去巴黎参加婚礼。特拉法节这天（10月11日）威斯哈特的一位海军朋友将要在英国使馆教堂结婚，凯丝使玛格丽特的父亲着了迷，他邀请她作为自己的客人参加婚礼——结果她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记下了许多旅途情景。其中有一大段是写给加纳特的，谈到自己在火车中睡了一小会儿，梦见他们一起出国。她没有提到这次婚礼，但告诉他有关凡尔赛、卢森堡和圣母院的一切。不久她就回到比切姆公寓，又见到他的家人，此后写的一则日记似乎表明已排除了恐惧的一个原：“10月29日——去彻丽·波德太太那儿，终于放心了。”

只有两封给加纳特的信保留至今，用铅笔涂写的只是一张道晚安的便条；11月8日在德文港某人家中写了最后一封信，讲到前一天阿斯奎斯太太给海军的一艘新战舰下水剪彩，凯情不自禁地描绘了一番这个非常动人的场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后来写作的一个特点：

噢，加纳特，我们为什么那样喜欢强烈的情感？我想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生活，狂热地确信我们本身的存在。

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平庸——我喜欢时时抓牢生活——因此我强调所谓的小事，因此所有的一切事实上都是富有意义的……

最后一页写道：“昨晚我梦见昨晚我俩一起听柴科夫斯基音乐会——正好演奏一段提琴曲，乐曲速度惊人——我惊恐地看见一大群翅膀大大张开的黑色鸟儿尖叫着从乐队上面飞过……”不管10月29日排除了什么恐惧，其他阴暗的因素依然存在，这种恐惧和对“真实”的热爱有些联系。我们必须再来看看凯什琳在比切姆公寓写的东西，这些作品和她的行为一样值得重视，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生活与创作是一致的。

首先是她的惠特曼阶段，她创作力旺盛，因为另一个热情洋溢的人玛格丽特经常让凯即兴给她写些惠特曼式的诗，其中一篇作品在韵律上混杂了惠特曼和斯温伯恩，是一首有关秋天的帕丁顿的诗，标题为《十月》，写于1908年10月22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维拉。她的《诗集》中收入了这一篇。

不久前还那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伦敦如今在诗中却是死亡与荒凉的象征，但总不是因为读了惠特曼吧？惠特曼热爱城市，认为城市充满活力，引人入胜，积极向上，而凯的诗却有所不同，“街道的话语”失去了它的魅力，然而韵律却既不是她的，也不是他的，令人奇怪的是，居然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而不是任何别的作家用斯温伯恩的腔调说话。

这同时，她在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故事的构思、王尔德式的格言（“绝不要重新点燃熄灭的香烟或旧日的恋情”）以及故事角色的姓名，那是坐在公共汽车上时从店铺招牌上看来的。玛格丽特说，“她写了一大段故事，我猜后来大部分都被她扔掉了，她总是把这些故事大声念给我听，让我提意

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政治家，1908～1916年任首相。——译注

“惠特曼阶段”及下面所讲的“惠特曼式”，似是讲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特有的口语式的诗歌创作风格。——译注

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译注

见。”

这些故事不厌其烦地大谈邪恶的细节——“崇拜邪恶”，那时是这么说的。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受人引诱的女裁缝，她住在贫民区的简陋住宅内，因患肺病而奄奄待毙，窗外有一摊水果车上翻倒下来的烂香蕉。“这使我很恶心，”玛格丽特回忆道，“但她坚持要保留着，一边高兴地格格笑着。”

玛格丽特也许还看过一篇名为《奥琪的教育》的故事，大概也是那时在伦敦发表的（见于1月份出版的惠灵顿《晚邮报》，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凯本人寄去发表的，更有可能是他们从伦敦“窃取”的）。这是凯什琳自我实现的幻想，她自己以奥琪的面目出现，十分自信，光彩照人，衣着漂亮，嗓音甜美，风度潇洒迷人，还有一位举止傲慢的崇拜者——她曾经在地中海目送他扬帆远去。听说她去了伦敦，他写信要求她这天下午来看自己（“我渴望你，渴望此时此地见到你，你来吗？——马克斯”）她的回电很简短，“我来”。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端详一番后，她决定穿“一件裁剪大胆，缀有淡紫色扣子的紫红棉布服装，戴同色的海狸皮帽，上面插着一根长长的羽毛。”

她4点差1刻乘坐轻便马车到达东广场8号，不假思索地叫马车夫5点半回来接她。接下来的一幕有些像伊莉诺·格林小说中的一个情景，虽然实际上不过是《朱丽叶》中一段的重写，那一段描写了对沃特·李普曼，或者说是“男人”的一次冒险拜访。他领她去吸烟室，掀起沉重的深红色门帘。高大的熟铁烛台立在墙角，还有一张长长的覆盖着暗红色罩子的矮沙发。

他给了她一支香烟，从一只大皮箱内拿出自己画的素描。他们坐下来，谈论着生活意味着什么，不时感到微微的性骚动——接着又回避开了——最后故事结尾处有些令人起疑，有点像早期那篇描写颓废中学生的故事《孤独者》的结尾：

“奥琪，艺术和生活中有许多你梦想不到的高低起伏，如果你能够意识到什么可能会属于你该多好。你正在布满了美丽鲜花的森林边缘玩耍，总有一天，如果你想完成自己的使命，会有人来拉着你的手，将你引向那儿，你就会知道了。”

黑暗的房间里又是一片沉寂……银色的雨点打在窗上。

她突然转身朝他伸出双手——“教我吧，马克斯，”奥琪说。

轻便马车准备离去，读到这里，人们不由地想知道凯什琳的父母亲在自己订的晚报上读到这故事，见到署名K.曼斯菲尔德后会怎样想。一张长长的矮沙发！

接下来写的一篇故事出自这样一位19岁的姑娘笔下的确技巧熟练，不同凡响，故事取名《疲倦的罗莎贝尔》，鲜明的对比令人吃惊。她扔掉了自己本来就无用的面具，一位年轻的天才出现在读者面前。故事也没有用讽刺笔调，开始潦潦几笔就使人感到真实：

罗莎贝尔在牛津广场的一角买了一束紫罗兰，事实上为此她几乎没喝什

伊莉诺·格林（1864~1943），英国女小说家，她写的《三个星期》描写浪漫爱情，曾被视为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先驱。——译注

么茶——只不过在里昂斯咖啡馆吃了一小块烤饼，一只煮鸡蛋和一杯可可，在女帽店劳累了一整天后吃这么一点是不大够的。她跨上大公共汽车，一只手抓住裙子，另一只手抓牢扶手，心想她情愿出卖灵魂来换一顿好饭——塞满青豌豆和栗子的烤鸭，布丁加白兰地沙司——总而言之，能够吃得饱饱的，暖暖和和的。她在一个年龄与自己差不多的女孩子身边坐下，那女孩正在读一本廉价平装本的《安娜·隆巴德》，书页上还有雨点留下的痕迹。罗莎贝尔望着窗外，街上潮湿肮脏，但是投在窗上的灯光却使玻璃闪着银光，珠宝商店这样看上去就像神话中的宫殿。

故事情节简单得很，罗莎贝尔经过令她回想起威尼斯的街道（“甚至连轻便马车也像贡多拉那样上下颠簸”），回到帕丁顿自己那间煤气照明的阴暗房间，她解开鞋带，跪在窗前，开始陷入遐想。梦想着一对富有的年轻人——英俊傲慢的年轻男人和骄傲的小姐——她今天在店里侍候过这两位。这场梦想中对话的描写手法精练，是她这年龄其他的人难以做到的，说话人的手势和动作描写虽然只有潦潦几笔，却出神入化，生动逼真。

这位女店员一直遐想着，直到梦见自己嫁给那位富有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家，房间里生着炉火，四处摆满鲜花，还有一个法国女仆替她系上帽带，等等。罗莎贝尔的实际环境在梦中隐去，因此故事同时在三个时间层次上展开：在店里，在卧室，在想象中婚后的家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还有第四层时间：罗莎贝尔的白日梦突然让人感到与公共汽车上那位女孩子的梦相同，当时那位女孩口中念念有词，正在蘸着口水，翻着书页，读着《安娜·隆巴德》中那些“炽热的、恣情纵欲的夜晚”。

这种笔调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最后一段无可奈何的描写，作者自己出现了，有点笨拙地发了一点议论，谈到那“悲剧式的乐观常常是青春唯一的遗产”。

可以肯定这故事写于1908年。凯什琳早期的作品中都能找到直接来源于实际体验的迹象，不管其中包含了多少幻想。

她怎么处置这些作品呢！伦敦的一家报纸确实刊载了《奥琪》，但这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玛格丽特知道凯曾尝试给惠灵顿的一家报纸撰写“新闻通讯”，但不记得曾有来自伦敦方面的退稿。如此看来，凯什琳在伦敦比在桑顿时还要孤独，她只是一位住在寄宿公寓里写作的女孩，独自挣扎着企图发现一种文体，却不知何处去寻找所有年轻作家都需要的批评指正。

她的困难不仅在于自己是一个消息闭塞的殖民地人，一个消息闭塞的音乐家，还在于她发明的那种文体。她不是天生的小说家，没有什么可以给图书出版商。虽然在爱德华时代伦敦发行的杂志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只有书才算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凯什琳·比切姆绞尽脑汁想要创作的并不是那种戏剧家称作“窗帘”的、杂志上刊载的小说或威尔斯和吉卜林式的小说——她更喜欢窗户本身。编辑们想要情节，还要有幸福的结局，她的目标却在别处——强调所谓的小事情，正如她对加纳特说的那样，“让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当时在英格兰这样一种短篇小说是没有的。也没有凯丝·比切姆能施展一二的天地，就像在都柏林年轻的詹姆斯·乔伊斯无处施展才华一

《安娜·隆巴德》，是1901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黄色畅销书。——原注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为《尤利西斯》。——译注

样。

爱德华时代无论哪一种期刊都是绅士们阅读的杂志——《玉米堆》《黑森林》以及《海滩》等都散发着一股港口和皮椅子的气味，这会使凯什琳立即联想到它们属于父亲在惠灵顿的俱乐部，属于那个有着公认的生活态度、人生观的世界，阿诺尔德·本涅特就可以很好地描述一番这个世界的面目。

1908年四月，本涅特在一份小小的叫作《新时代》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上撰文说，“在任何‘世界强国’中，包括美国在内，英格兰的期刊是最愚蠢幼稚的”。《海滩》和《铁圈球杂志》“毫无希望”，《黑森林》刊登的只是一些“随手捡来的最差劲的小说”，《玉米堆》则代表了“不列颠民族性中最糟糕的东西，像一个从外交部退休的小官员那样四平八稳，空虚乏味。把一期杂志从头看到尾也找不到一丝半点有意思的话。”两年后，在伦敦发行了一份引人注目的“纯文学报纸”，主要刊载文学新作。知道此事后，本涅特宣称“在英格兰这将是一件新奇的事”。

那些体面的周刊《雅典娜神庙》《观察家》《民族》等几乎不值得一试，它们全都属于凯什琳希望逃避的那个世界；而那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还没有创办《英语评论》，直至1908年12月，他才“怀着在英格兰给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以一席之地”的目的创办了这份刊物。

尽管凯什琳以自我为中心，爱说假话，但她那孤独、执著的追求中有着令人鼓舞、使人钦佩的东西。她最需要的是找到并会见自己的同路人。

从冬天的某个时候开始，似乎加纳特的双亲，或至少是他的父亲开始坚决反对儿子同凯什琳的婚姻，这涉及到金钱问题——因为他们家现在生活窘迫。特罗维尔曾经为了儿子的事业放弃了惠灵顿的各种关系，现在希望重新白手起家，因为儿子们并没有什么大出息，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学生。他同他妻子认识比切姆——他们已经欠了他很多人情，再让自己的儿子同凯丝结婚会让人觉得他们希望从他那儿得到更多好处。而且，凯什琳最近变得“成熟”起来，这肯定让人稍有察觉，他们也一定注意到她突然移情于孪生兄弟中的另一位。他们确实接受了她的接济，有一段时间，她正式搬出比切姆公寓，转而付食宿费给特罗维尔太太，既然加纳特不在家，她大概住在他房间里。

冬天像秋天一样地过去了，凯丝和玛格丽特都“秘密地订了婚”，并为此感到幸福。11月，加纳特回家休假一星期后，凯丝才去同他父母亲住在一起，整个11月，凯什琳都在伦敦，但是冬天某个时候，在卡尔顿山发生了一些事情。加纳特同父亲为是否悔约发生了争吵，不管母亲怎么想，父亲绝不会让儿子们自作主张。他有些固执，喜欢最后拿主意。于是突然之间全家人都不再对凯丝表示亲切友好，而她那时显然非常需要这些情感。在她给加纳特的信中，随处可见后来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那种对家的幻想，这种幻想突然之间破灭了，她回到比切姆公寓，住了一个便宜的房间，这大概是在1月。

2月发生了更多变化，凯丝通过玛格丽特的朋友们结识了一位男高音歌手，他长得“白里透红”，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留着小胡髭，头发从中分开，是一个浸礼会牧师的儿子，比她大11岁。他是伦敦某神学院的教师，说是个歌唱家，不如说是演说家更合适些。他住在比切姆公寓附近，对她一

阿诺尔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兼记者。——译注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英国小说家，编辑。他创办的《英语评论》给当时尚未成名的劳伦斯、庞德等人经常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译注

见钟情，据玛格丽特说，“第二天就给她写了长长的一封情书，以后每天书信不断，而她格格笑着，大声把这些念给我和阿密听，一面加上些尖刻的评论，尽管我们抗议说这对他不公平。”

那时玛格丽特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第一个迹象，表明扮演不同角色的这种游戏将把凯什琳引向何处（这也是后来两篇“悔罪”小说的主题故事中都毫不留情地讽刺了一个大声念情书并加以嘲笑的年轻女人）。直到1948年玛格丽特才知道凯什琳在自己家和特罗维尔家中叫作“凯丝”，在埃达面前叫“凯蒂”，而后来所有的朋友则叫她“凯什琳”。玛格丽特说，“我相信不同的名字对她意味着不同的个性，……对于我，她总是亲爱的、诚实无私的人，处处为人着想，而且极有魅力（毫不矫揉造作）。她确实没有一点那些别人一目了然的坏处或更不好的表现。我们从未有过不和睦的时候，直到突然一下！——最后两天她不辞而别，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感到伤心不解。”“突然一下！”指的是凯什琳闪电般地决定嫁给那位写情书的家伙，违心地抛弃所有知道她与加纳特恋情的朋友。那是2月末，她一反常态，变得疏远冷淡，几天之内就从比切姆公寓消失了，留下了一大堆闲话。很久以后，一位女孩对玛格丽特说，有一天9点钟吃早饭时凯什琳出现了，“泰然自若，身穿红白两色条纹新衣，褐色呢裙，宣布说她刚才结婚了。”然后她又离开了，没对那些曾经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们作任何解释。人们议论说她正在写一本书，这样做只是想亲身体验一下。两个星期后，这位女孩在报纸上看见一则结婚启事，凯什琳成为乔治·波登太太。1949年，华森小姐在卡迪夫担任莎士比亚剧团音乐指导，她这样描述了“旅行小姐”的别离：

她还非常年轻，我从别的女孩那儿知道她已订婚了，打算马上结婚，就同她谈了一次，恳求她写信向父母征求意见，获得准许，再作出结婚这项严肃的决定。她答应了，而且似乎很诚恳。几天后，她说去拜访朋友们，接着就传来她已结婚的消息。当人们开始说闲话时，我了解到她对不同的女孩讲了七八个不同的故事。我猜想她那小说家的天赋使她能把自己想象成不同浪漫史中的女主角。不久，她让人来取走自己的东西，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了。我的印象是她不真诚，我甚至不记得她的外貌了。

1909 年，“波登太太”

我说，维，只要半分钟，维，是这样的，你想要自由，这样吧，你知道——如果你想要自由，这不过是我的一个主意。你知道那些俄国学生是怎么做的吗？在俄国，是举行一种形式上的婚姻，仅仅是形式，使女孩子摆脱父母的控制，明白吗？你只需同我结婚，而不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阻隔，一切都照现状。为什么不呢？获得一张结婚证，这不过是我的一个主意，……我希望你没生气。好吧，我走了，要去打曲棍球了，在杰克逊球场，哈里德打得好极了！再见，维，我只是提个建议，不要当真，突然想到的。

——H.G. 威尔斯（特迪向安·维罗尼卡 求婚）

1909 年 3 月 2 日，在埃达·贝克的陪同下，凯什琳去帕丁顿登记处登记结婚。在填写表格时，她将年龄改为 22 岁，称自己为“无业”未婚妇女。甚至连新郎自己也采取了同样随便的态度，简单地称自己为歌唱家。只有一位双方的朋友参加了这一结婚仪式。

埃达说当时凯什琳全身穿着黑色，头戴一顶“可怕的闪闪发亮的黑草帽”，她声称自己之所以戴上它是为了“增添勇气”。他们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同波登先生见面，那是一个肮脏的空房间。一个“大惊小怪的矮个子”走了进来，因为还需要另一位证人，而波登先生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矮个子只好随便请来了一位职员。“就这样我亲爱的朋友结婚了”。

谈到新郎居然会忘了带一位证人来，他后来的妻子说，“这正像乔治的为人”。

新婚夫妇动身去一家旅馆，埃达回自己的家。凯什琳除了自己从新西兰带来的笨重行李外，别的一无所有，埃达只好把自己一套崭新的梳妆盒暂时借给她，那是别人送给埃达的 21 岁生日礼物。在包扎梳妆盒时，埃达往里面塞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权且忍耐”或类似的话。当凯什琳读了便条后，整个情况急转直下，她改变了主意，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波登。第二天埃达才知道凯蒂离开了，去了一处她不让人知道的地方。

不久以后，玛格丽特去乔治街的那家小小的瑞士理发店，打听到 3 月 3 日（即宣布结婚的那天）凯蒂曾哭哭啼啼，失魂落魄地跑来央求收留她。理发师和她的丈夫在楼上有一个空房间，凯什琳把自己锁在里面，“整整哭了一个星期”。一位波登的学生曾来探望她，但她拒绝一同离开，只是不停地：“我不能去，我不能去。”然后她又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地址。

她也没有去找贝尔姨妈，有人替她从比切姆公寓取走了行李，她不能在此继续呆下去。她曾同华森小姐见过面，后者问到波登先生，凯什琳只是说：“不想让他再打扰自己”。后来有个女孩把《晨邮报》上刊载的结婚启事给玛格丽特看（“我想他故意登载启事，以此促使凯什琳拿定主意”），玛格丽特很着急，又完全感到迷惑不解，凯什琳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话。

许多年来在凯瑟琳的生活中，波登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可笑人物，凯的第二任丈夫后来的一些议论也多多少少伤害过他。

1949 年波登先生写道：“我们的交往并不缺乏友谊与高尚之处，如果别

安·维罗尼卡，是威尔斯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晨邮报》，伦敦的一家报纸。——译注

人硬要把我当作一个恶棍，我也不在乎。一切在我们初次相遇时就决定了，而我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竟然想入非非地去缔结婚约。”

他们初次见面是在圣·约翰伍德，当时有名的科普作家卡莱·萨利比家，那是一次晚宴，餐后演奏音乐，波登先生注意到一位“不引人注目，举止有些拘谨的人”坐在钢琴旁的一张矮椅子上。当他介绍自己后，原来的印象改变了，他发现她谈吐十分风趣，于是他们“很快地交谈了几句”。

在另一次音乐晚会上再度相遇时，他惊异地发现她的外貌与前次大不相同，这次她穿着打扮“多多少少有些毛利人风格”，肩上披着一块类似围巾的东西，这使她看上去有些怪异，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装扮，而是使她整个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变换。他觉得她看上去有些像奥斯卡·王尔德。

接着波登先生自己开了一个晚会。在离比切姆公寓不远的圣·玛丽街区，他与一位工程师朋友合住一套工作室，这位朋友是个业余音乐家，特别爱好伊丽莎白时代的爱情歌曲。他们两人有一个仆人，晚会那天，当仆人打开房门，通报“凯什琳·比切姆小姐”时，整个房间立刻一片沉寂。“又是一次变换”，这次头发梳得很高，衣着几乎像个小姑娘，整个举止“王公贵族般的坦率随意”。从那以后，她成了一位常客，让人感到她喜欢“分享我们这些单身汉的生活”。

后来波登先生去医院摘除扁桃腺，凯什琳给他写信，要求等他回家后，坐车去看他。就这样，他们订婚了，在第二天的萨利比家的晚宴上宣布了这消息，并告诉了伦敦音乐学会的亨利·比切姆，他是凯在伦敦的保护人。亨利写信给新西兰，但凯却匆匆行事，干吗要等待同意？再说波登也同情妇女解放运动，他的观点是“婚姻应该进一步解放妇女，而不是约束她们”。无论如何，那时已是1909年了。

他们着手准备结婚，凯要加入寓所内的单身汉生活。她坐下来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的未婚夫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将相逢在“随处可见的路边的篝火旁”，而不是共同踏上幸福的征途（她那时正在阅读乔治·博罗的作品），然而他并未放在心上，以为这不过是她“常用的比喻”而已，她常常提到的吉普赛似的生活似乎只是象征性的。总而言之，一切还保留独身生活的特征。

尽管凯什琳常提到自己的写作，但波登先生对她狂热的野心所知甚少，他几乎总是看见她“心情愉快”，然而有时也会情绪低落，这时她看上去难以接近，而且似乎在演戏，在“享受灵魂的不健康”，他从未见她哭泣过。

接着他们在结婚登记处会面。后来谈到她那一身葬礼式的打扮，波登说：“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事情已过去很久了，但我想如果当时我认为这种打扮很出格的话，肯定会评论一二——也许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我记得当时凯什琳穿的只是一般上街穿的服装，黑颜色，同她很相宜。

仪式结束后，他们没有回原来的寓所，而是直接去了旅馆。他们一起吃饭，像往常那样态度亲切地看了一场电影，接着波登发现一切都不对头了，就像几天前玛格丽特所感到的一样。那时他并不知道梳妆盒内塞的纸条，只知道在旅馆房间内，“她躺在床上像一根木头一样”。他说，“你最好还是去给埃达·贝克打个电话。”她照办了，就这么走了，但没有流泪。凯什琳后来告诉埃达，她不能忍受旅馆内粉红色的绸缎床罩和带有粉红色流苏的灯

圣·约翰伍德，伦敦一地名。——译注

乔治·博罗（1803~1881），英国作家，善于描写流浪生活。——译注

罩。她讨厌粉红色的流苏。

有一些凯什琳自己写的东西保留了下来，似乎能更好地解释她的行为。

凯什琳 1909 年写的一个名叫《一段小插曲》的故事梗概，开头是这样的：

“噢，”她说，孩子气地感情冲动，“我太伤心了。”她觉得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向他倾诉，听取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同情——她感到自己必须再听见他那充满抚爱的奇妙声音。

为了讨好他们，她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接受一切——而且似乎有段时间完全依靠他们，虽然事实上她总是独往独来。

我从巴黎回到这儿。噢，我确实感到自己不如死去，我每晚都哭——他们用各种事情来折磨我——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最后我下定决心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离开他们。

这似乎指的是卡尔顿山的房子和加纳特的父母亲，以及冬天所有的那些麻烦。从“我”至“她”的这种改换人称是凯典型的作法，好像她不能肯定自己究竟是谁。接下去又写到自己不名一文，“没有朋友，没有希望，没有爱情，孑然一人”，然后又含糊不清地写道：“——来同我订婚——是的，就这么办吧。”她曾经以为一旦结了婚就能得到自由：“但是——我被关进了鸟笼。”

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她一生中从没有如此需要爱情，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原始女人，所有的谨慎小心都置于脑后。

“你到哪儿去了？”

“我去散步，吹吹风。”

她看到一瓶桉叶油，枕旁放着那两条手帕，感到非常厌恶。

这些片断多少与她的结婚以及婚前发生的事情有关。看过莫德·阿伦的舞蹈后，她曾经写信告诉过加纳特自己有“一个古怪的野心”，她可以写些东西，可以非常美妙地在灯光暗下来的舞台上朗诵：“研究噪音中声调的效果，绝不依赖手势，虽然手势是另一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她说自己愿意做“这种艺术的莫德·阿伦”。也许遇见乔治·波登时——他教了一辈子发音方法，而且她觉得他的噪音“充满抚爱”——她认为找到了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此时凯什琳还写过一封信给一位不知名的朋友，信封两面都写着：“请以朋友的名誉起誓，当我活着时，绝不读此。K. 曼斯菲尔德。”此信问这位朋友：“你是否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生平——不但读过，而且思索过——能够确切地描述他的颓废堕落吗？他不寻常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在新西兰，王尔德对我影响极大，我也经常屈服于那使他毁灭，使他智力衰竭的同样的疯狂情绪。现在我觉得很悲哀——这些情绪又回来了，有时我会完全忘了它——然后它们又以可怕的力量重新迸发出来，几乎无法阻挡——这是我瞒着世人和你的秘密——只有一个人分享我的秘密，那就是——，因为她也一样遭受同样的恐惧——我们常常谈到它，知道它最终将毁了

我们，使我们疯狂或瘫痪——而没有什么目的——

很奇怪你和我从没有分享这个秘密——我知道你能理解，没人可以帮忙——从我 18 岁时起就一直是这样。这也是鲁道夫死亡的原因。

我今天当着他的面读了此信，我的理智不受道德的约束——我知道这是难以启齿的堕落——以至于只有在枪口下才能意识到尊严。

不管此信是写给谁的，这人知道鲁道夫的自杀和自杀原因，而且会把此信当作一封自杀遗书，虽然实际上这并非遗书，显然只是某个紧张戏剧中的一部分，而结婚则是另一部分，也许那是凯什琳不顾一切的尝试，想证实自己是个正常的女人，男人的女人，因为自从惠灵顿的恋情后，她一直受到羞愧的折磨。离开理发店后，凯什琳“失踪了”，其实她去了利物浦，以加纳特妻子的身份参加了剧团，成为合唱队的一员，有一段时间感到“幸福”。的确，几年以后，凯常常告诉她第二个丈夫一些她同加纳特一路上的有趣故事：怎么在公寓的煤气炉上烧鳟鱼；怎么在合唱队唱歌，还学会了那时候在外省唱歌时合唱队必须做的一些荒唐动作。

莫迪·马勒斯剧团 3 月底到了利物浦，那以前在格拉斯哥。几个月后，《日记》中有一则“星期日早晨”的记载，写给加纳特，谈到痛苦的记忆：

又是一个星期日，这一天会给我们两人带来什么呢？给我的是甜蜜和焦急——利物浦——卡尔顿山——但不是家。又在下雨，这种持续不断的雨，使人产生绵绵思绪，回想往事……

也就是说，婚后大约一星期，凯什琳就去格拉斯哥找加纳特，然后又去了利物浦。加纳特的父母亲也许在报上见到了结婚启事，并寄给他看。如果她没有告诉过他事实真相，当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鳟鱼和合唱曲的诗情画意不能长久，注定会以两人的痛苦告终。

回到伦敦，唯一可呆的地方是贝克医生家。4 月初，凯知道了母亲要来英国看她，因为银行的基先生发电报告诉她母亲凯已结婚，使她大吃一惊。她 18 日乘船从惠灵顿启程，那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五”——这一天的日记充满了受难日的感伤，使人不忍卒读。

凯什琳不久知道自己怀孕了。埃达的一位护士朋友被请来看她皮肤上莫名其妙的风疹块，护士锐利的眼睛立刻看出了问题，这次是真的了。

比切姆太太 7 周之内就将乘船到达，必须找到一所公寓，埃达介绍了在梅达维尔的一处，位于伦敦名声不大好的地段。凯什琳不断写信给加纳特求他与自己联系，渴望得到他的支持，他没有回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她现在是波登太太了。她去药房买了一些安眠药，等待母亲到来时，她还同埃达去西区一家商店买了一顶昂贵的大帽子——是园会上戴的那种——，想取悦母亲，为此花费了 27 先令。帽子是黑色的，看上去同她结婚时戴的那顶廉价的差不多。

凯突然心血来潮，去了一趟布鲁塞尔。路上写的日记谈到这次旅行（坐火车总使她想写些什么）：“车厢坐满了人，但是加尼，我觉得自己正在回

利物浦，英国重要港市。——译注

格拉斯哥，英国北部工业城市。——译注

家。避开英格兰——这是我的愿望，我诅咒英格兰。”她时刻想着加纳特，因为怀着他的孩子。

她一直痛苦地感到“老爸爸”式的游荡不定：“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我不能思索，不能生活。”然后回到安特卫普，在火车上想着“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小儿子朗读，”最后又回到梅达维尔的寓所。

5月27日，比切姆太太的火车驶进挤满亲属的站台——凯什琳站在一边，戴着那顶大黑帽子，几乎没有谁认得出她来。大家围着安妮，拥抱她，接着，母亲好像突然想起来了，转身寻找女儿。她不喜欢那顶帽子。

“呀，孩子，你戴的是什么？看上去像一个老妇人，好像要去参加葬礼。”她拒绝住在梅达维尔，去了他们常住的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私人旅馆——就是在这家旅馆凯什琳曾写到她要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比切姆太太让女儿把帽子送给女仆。

凯什琳曾经告诉过J.M.默里，她母亲有时可以像钢铁一样坚硬冰冷，这次就是如此。比切姆太太两星期后就乘船回家了，虽然这令人难以相信。她并不知道怀孕这回事。她只知道女儿同别的女人的关系，在伦敦时，她见过波登先生（事先约好在新西兰银行见面），同贝克医生谈过一次话。10年后，波登先生在加利福尼亚想再次结婚，曾写信给未来的岳父：

与我结过婚的那位女士虽然出身于正派富有的人家，自己也有些文学声誉，但是性欲不平衡，而且有时不负责任，尽管有时是完全正常的人。她在新西兰的家人知道这点，但伦敦的保护人却不知道。我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直到那时我才了解真情。

这封信接着说波登先生并“没有因为这种怪癖而采取什么措施要求离婚。”

于是决定把凯什琳送往国外，离开埃达。比切姆太太带她去“山上的修道院”，把她留在那里。埃达说她一点也不知道大人们心里想些什么（“我那时不知道‘同性恋朋友’指的是什么”），她和姐姐一起被送往加那利岛度假。那时人们认为航海旅行可以治疗这种病，他们尝试过用同样的方法治疗波德莱尔（他竟然会爱上黑人妇女，还用牙去咬她们的卷发）。

比切姆太太回到新西兰，6月14日到达，她丈夫在港口迎接，后来才知道航行途中一位乘客病倒了，打动了她的心。病人最后死在她怀中，这使比切姆感到沮丧。后来凯什琳根据这次事件写了一篇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陌生人》。

比切姆太太一回到惠灵顿就去找自己的律师，从遗嘱中取消了凯什琳的继承权。她还会听到有关孩子的事，但已经有些丑闻传到了惠灵顿，有人偷偷告诉维拉那体面的加拿大未婚夫，叫他不要娶这样一个女人的妹妹为妻，这使维拉非常尴尬。遗嘱是1903年立下的，比切姆太太的个人财产似乎是每年250镑，主要来源于丈夫的收入，如果她死时，丈夫已去世，那么就平均分给所有年满21岁的孩子。但是1909年8月13日，她取消了凯什琳的财产

安特卫普，比利时港市，世界著名港口之一。——译注

加那利岛，大西洋东北部的群岛。——译注

继承权，早些时候有关戴尔财产的继承权也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凯什琳的名字。

比切姆太太这才放心着手准备维拉的婚姻，婚礼将于9月23日在圣·保罗天主教堂举行，新郎是一位加拿大地质学家，等待着他的是辉煌灿烂的前程。

安妮·比切姆带凯什琳去的那个“修道院”，其实是位于巴伐利亚旅游胜地沃里希奥芬温泉的一家最豪华的旅馆。沃里希奥芬既非富人或浪荡子经常光顾的矿泉区，也不是时髦的风景区，1880年这地区因为塞巴斯蒂安·耐普的水疗法而闻名。耐普是一个天主教神父，提倡一整套的自然疗法，主要包括冷水淋浴，此疗法至今还有许多人推崇。那时沃里希奥芬不过是松树林中的一个小村庄，牛在街上乱逛。整套治疗包括手浴，腿浴，脚浴，涉水，晨露中赤足行走。有利于肠胃的素食等等。水疗名声越来越大，城镇也开始远近闻名。至1909年，这儿已有了赌场，湖畔有网球场，还有国际俱乐部，从为中等家庭提供的公寓至豪华的十字旅馆，各种住所应有尽有，全部有倾斜的巴伐利亚式屋顶，便于抵挡冬天的风雪。耐普1897年去世，但他的书《我的水疗法》和《如此生活》在忠实的崇拜者中很有名，医生每年把他们大批送往那儿。

在德国，旅游者必须在警察局注册。1909年6月4日，比切姆太太和凯什琳住在十字旅馆，凯不再是“无业”未婚女子，因而决定自己事实上应该是位女作家，她注册为“凯什·比切姆-波登，作家，伦敦”。比切姆太太一两天后就回了伦敦，去搭乘10号离开的轮船。处理她犯了过失的女儿并没占用多少时间，除了在海上海度过的14个星期。

有一个事实是所有爱德华时代做母亲的都知道的：对一个患有凯这种令人头疼的病状的女孩，最受推崇的治疗当然是冷水浴和锻炼身体，于是凯就被送去冲淋浴了。

十字旅馆价格昂贵，6月12日，凯搬入维拉公寓，这地方为她以后第一本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提供了背景和书名。它是斯蒂哥劳尔家开设的（他们的姓名也出现在那本书中，拼法稍有出入），她在那儿呆到7月底。

在季节高峰时期，小小的城镇要接待2000疗养者，谁来了都很受欢迎。人们会问及各种各样与疾病无关的事情，例如，费舍尔太太就会仔细打量新来者。这位固执的夫人来自埃格尔，在那儿她拥有一家运输公司。顾客大部分都是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虽然这个阶层包括上自王公贵族，下至来自于新西兰的女孩子，她们的父亲不过是蜡烛公司的厂主而已。

病人如果真想痊愈，就要从一位叫宾彻尔的鞋匠那儿买一双耐普神父设计的拖鞋；以水果、蔬菜和坚果为食物，并同其他人讨论肠胃状况的种种细节。不远处——只需步行几英里——有一个叫施林格尔（德语的意思是狼吞虎咽）的小地方有一家酒店，病人们常溜到那儿去吃东西。

6月的一个早晨，吃饭前凯什琳赤脚走到挂满露水的树林中去散步，赤脚走路也是治疗的一部分，但这次却使她伤风了。在《日记》中写给加纳特的一段谈到此事，也谈到他们的孩子：

巴伐利亚，德国南部地区。——译注

埃格尔，现匈牙利北部城市。——译注

总有一天孩子会问：“妈妈，我是在哪儿出生的？”我回答：“在巴伐利亚，亲爱的。”那时我又会重新感到这种寒冷——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手冷，心冷，灵魂冰冷，亲爱的，我今晚没有那样悲伤……

她回忆起他俩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共度的那些“充满甜蜜与苦恼”的星期天，她还在给加纳特写信（她仍保留着他的戒指），但是与他的关系已难以察觉，也不知道是如何结束的，留下的只有痛苦和羞辱。

夏日的一天，凯什琳想把箱子搬到橱顶上去，箱子太重，她受了伤，不久就流产了。她写了一封使埃达迷惑不解的信，把消息透露给埃达，埃达把信给朋友古德小姐看，她当过护士，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与此同时，她用一种奇怪的德语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这样一段：“我必须竭力忘记……必须努力奋斗使自己能够再次工作。……”德语文体做作，有些错误，不像是摘录别人的话，可能她想用耐普会赞赏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现在的想法：“我必须奋斗，必须忘却，必须竭力自重，我必须成为有用的人，为了能再次相信生活，”等等。

写了这些以后，她仍感到难以独自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她渴望有一个孩子可以照料。她写信给埃达，埃达去找古德小姐商议，后者知道该怎么办。在离威伯克大街不远处的小巷内有一个小店主的儿子名叫查理·华特，他刚患过肋膜炎，需要晒晒太阳，换换空气。那时安排这种事情很容易，埃达说，“我们给他买了一张票，替他系上标签，把他送到她那儿去。”这时候，为了准备他的到来，凯什琳离开了公寓，同一位图书馆长罗莎·尼兹小姐住在一起。图书馆在邮局上面，位于离赌场和花园不远的大街上。他与她同住了几星期，凯让他称自己“萨莉”。

这是她唯一的孩子。将近10年以后，他变成了故事《帕克大妈的一生》中死去的一个小孩，名叫利尼。

几年以后写的一些奇怪的，富于象征性的故事片断似乎是对这个阶段的评论。埃丽娜·本达尔是一位自我放纵、好出风头的歌唱家，有一个名叫彼得的病弱孩子。她把孩子带到德国的一个地方，那儿赌场外盛开着紫罗兰。那年冬天，彼得病了，躺在公寓里，她情不自禁地想唱歌给他听，他用惊恐的眼光恳求她别这样，她知道，但她仍要唱，因为在她胸中有着一双迫不及待的翅膀：

但是她会轻轻地唱，柔柔地唱。彼得听着雪在下，雪从天上飘下，像绿色和白色的玫瑰，除了月亮，没有谁能见到它们。她边唱边站起来，唱着走到窗前，双手抱着窗框，彼得闭上了双眼。他飘向母亲唱歌的胸怀。随着她的呼吸起伏，他了不起的母亲生了翅膀，是的，是的，她能飞翔，同他一起飞出窗外，给他白雪，给他一些玫瑰，他感到雪飘到胸前，爬到颈前，形成一圈小巧的项链。它还在向上爬——但不要盖住我的嘴，母亲，不要盖着我的双眼。

她还在唱着，医生来了，检查了孩子，发现他死了。

这篇故事是1914年写的，隐隐带着一些令人难以觉察的愧意，描写了一

个自私的年轻妇女，孩子只是她的一种满足而已，她需要“歌唱”，这象征性地造成了他的死亡。除了《在德国公寓里》外，这是唯一以沃里希奥芬为背景的作品。

沃里希奥芬也有它自己小范围的文学生活，似乎吸引了某些大陆文学家（甚至连 R.M.里尔克也尝试过水疗，虽然他从没有去过那儿），毫无疑问，尼兹小姐的图书馆是会见他们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游手好闲的穷文人是波兰人，叫弗罗扬·索比尼欧斯基，他在克拉科夫受的教育，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同文学沾点边；写点文学评论，搞点翻译（他后来曾将萧伯纳的大部分戏剧都译成波兰文，还译了很多高尔斯华绥的作品，直到后者讨厌他为止），据默里说，他“很迷人，引人注目，却完全不可信赖”，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歌喉，“可以做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波兰人的原型”。

通过他和他那更令人信赖的朋友耶尔斯基，凯什琳进入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子，他们将创办重要的杂志，发表各自的作品。索比尼欧斯基热爱波兰戏剧家斯坦尼娄·尤斯宾斯基，还想把这种热爱传染给她。他是惠特曼的狂热崇拜者，于是凯这位迷惘的殖民地人终于找到了同伴——在一群移居国外的斯拉夫人中。为了应答凯写的一首献给尤斯宾斯基的诗作，索比尼欧斯基写了一首花哨讨好的诗，把凯什琳捧为“年轻的英国女诗人”，她曾在一首题为《毛利人的奇境》中展示了自己敏感的心灵。她告诉他自己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并谈到自己在毛利土人中的历险。

也许是通过这两位波兰人，凯什琳才知道《青春》这本“为艺术为爱情”的杂志，杂志附有插图，是在慕尼黑出版的，就是此杂志称德国式的“新艺术”为青年学派。是此刊物的插图，而不是其文字，影响了她的写作或她看待自己疗养同伴的方式。1909年秋天的某个时候，玛格丽特收到一封长长的忏悔信，向她表示歉意，告诉她凯丝将要理清“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还谈到自己的健康。在沃里希奥芬写的一段话谈到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要死于心脏病——她在以后的13年中一直这样相信，还谈到她认为自己活不长：“天知道，我看上去足够健康——就像这儿一个维也纳人说的，他们也只知道说这话——但我感觉一点也不好——我的心脏全出了毛病——我因过分用心而受到伤害——或过少用心。”所以她想在此短暂的时间内拥有那么多：“当我独自一人时，好坏灵魂都来碰撞我的手肘，说——以后你会遇上许多这类事情——充分利用短暂的白天吧。”

她在沃里希奥芬一直呆到1909年年底，多少对索比尼欧斯基产生了一些恋情，无疑她喜欢他的声音。埃达回忆说，凯和那个波兰人计划一起去他的祖国，接着也许去俄国。他们将在慕尼黑会面（凯有时确实去那儿），他在那儿将找“两间起居室，他们可以在里面学习、读书和工作”，但凯什琳到达时，看见只有一个房间，“生活的计划也完全不同”，于是她离开了。

事实上不是去慕尼黑，而是在巴黎，凯什琳事先就知道只有一个房间，她没有去。1909年12月12日，星期天，索比到达华沙，渴望见到凯什琳，

克拉科夫，波兰城市。——译注

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大多描写因“被侮辱与损害”而变态的人。——译注

斯坦尼娄·尤斯宾斯基（1869~1907），波兰剧作家，画家。——译注

用德语写信给她，同她约好圣诞节后在巴黎见面。

凯什琳，亲爱的，你今天不和我说话吗？邮递员来过三次了，什么也没给我带来——但我希望晚上会有信，天哪——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你在哪？现在在于什么？我总是看见沃里希奥芬，无论我朝哪儿看，无论我想什么，你马上就会来到我身边……

他谈到惠特曼，谈到那位不称职的惠特曼波兰文译者，说那大晚上他本来要去看望朋友，但是出版商要来，他们将一起商讨将一位波兰诗人的作品译成英语的计划。

星期一她终于来信了，她写道，“我们在巴黎——我去沏茶——我们将抽烟，聊天，读书。”后来他果然同她一起到了巴黎！——当她说爱他时——噢，他简直不知该说什么，但是她知道他的感觉，发生了一个奇迹：“我们成为一体。”在晚会上他同出版商简短地交谈了一下，后者也要去巴黎——他们可能会碰上他。但是晚会没有什么意思，他自己一直非常沉默，以至于有人竟说“我可以肯定索比准备写一出悲剧。”

晚安，凯什琳，晚安，那个梦怎么样？那白色的森林，现在我在你房间看见的森林，告诉我，召唤我去那儿，噢，凯什琳，也许 18 天以后，晚安，吻你的手。你的弗洛扬。

凯什琳曾写信给伦敦一位名叫维拉的朋友，告诉她自己的打算。维拉显然是个女演员或歌唱家，可能在比切姆公寓住过。得知这消息，她“几乎吓坏了”，写了一封长达 9 页的回信，告诫她，恳求她，从这恳求中可以看出当时未婚女性对男人的看法。

维拉刚从戏院回来，读信时感到非常疲倦，所以至 12 月 12 日，也就是弗洛扬信中提到的那个星期日才回信：“孩子，为什么很难把一切都对我解释清楚呢？难道我不能感觉生活，不了解生活吗？你认为我不会理解或同情你吗？亲爱的小妇人，这总会到来的，我已看见它沿着生活的大道来了，用它所有的惊喜和秘密将你带走。”

她将要做到绝对坦率，希望凯什琳不介意。她绝不会非难她的情人，但是当个男人，不管他是哪一国，遇见凯什琳这样一位有着迷人外貌，了不起的头脑，受过感情创伤的女人，又知道她为何心碎的原因，那么，自然他希望占有她。“但是这个女人是个淑女，他不能说‘我要你做我的情妇’，不，他会说，你同我一起去巴黎，迫使你那野蛮的丈夫和你离婚”——否则他将受到朋友的嘲笑。那位波兰人是否也同时向她保证过她将是神圣的？——“就像受到一位兄长的保护那样？”他保证过他们只是假装同居以便获得离婚吗？实际上没有哪个男人能做到这点。女人天生如此，“一旦堕入情网，是不忍拒绝满足爱人的愿望的。”

她这样说，并非认为凯什琳做错了，而是因为将来她会饮下这杯苦酒，而且将来会那样令人绝望，“你将再也不会在乎自己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她要求凯什琳给她一个神圣的诺言：一旦她同波登宣布离婚，而她那位波兰人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同她结婚，“你将用自己认为是最宝贵、最神

圣的东西对我发誓，你会回到我这儿来，我们将一起设法修补你的生活。”但是她必须保守秘密：“如果你的爱人背弃了你，我是你的王牌，但是不要告诉他。”当然，如果凯什琳知道怎么对待他（“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么维拉将会对她万分钦佩，但如果她屈服于自己的爱情，去满足他的欢愉，那也没有什么，她不愿作出是非判断。凯什琳可以信任她，就像信任自己的工作一样（“除了你的工作，我找不出别的来作比喻，我知道它对你至关重要”）。她唯一的要求只是凯的允诺，因为“亲爱的，除非你去找别的女人，而大部分女人总是会透过变型的眼镜来判断别的女人的行为”。

当然，还有另一位可以信赖而不会随意评判的女人，凯去寻求她的支持和金钱资助。圣诞前，埃达写信告知为迎接她所作的安排，电汇了6英镑作路费。凯最好在早晨来，“这是孩子到达的时间”，否则就不能去迎接她了。

1909年的圣诞过后几天，凯什琳来到伦敦，在新开设的海滨宫殿旅馆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她遇见了一位算命先生，一个古怪的人。她曾考虑过同他合伙，但是接着收到另一封信——谨慎地称她为“波登女士”：

最亲爱的凯什琳，我今天下午1时到达，我住在告诉过你的那个地方。我感到非常疲倦，但很高兴终于到了巴黎，如果你已先到就好了——这个星期将漫长无期，但是我会耐心等待——可是总感到焦虑不安。你怎么样？病好了吗？噢，亲爱的，赶快写信给我，写信给我，凯什琳，好让我放心……

弗洛扬找到了一家旅馆，那儿一个较大的房间每月需60~70法郎，不包括伙食，他们可以住在一起。也许他们还可以花同样多的钱在别处租到两个房间，但是她不写信给他吗？收到了他的两封信吗？他都写着寄给旅馆的波登女士——没有留局待领，因为怕她可能生病了。早上他要去会一位朋友，这朋友曾答应过帮助他们寻找一处房子。

她没有去，似乎是算命先生救了她。因为当谈到那位太太的生意计划时，埃达说凯什琳考虑过这个主意，但是后来她突然告诉埃达“部分地是为了自己家庭的缘故”，她准备去同波登先生一起生活，“试试看能不能凑合”。

这确实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当时波登先生正在林肯郡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接二连三收到管家用托盘捧上来的几份电报，是用电话传达的，措辞急切，签名“你妻”，这使他感到大为尴尬。电报催促他马上去伦敦。他带着显而易见的不情愿——因为他猜测到凯什琳是受到亲戚的压力，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判断才这样做的——去了那儿，凯什琳搬进了他当时居住的寓所，这是在1910年1月底或2月初。

她在寓所内住了几个星期，但“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这是波登先生的话。她去过他在庞德大街的工作室，“稍微唱了唱歌”。她与他合作演出了一场音乐会，是在他任教的学院之一举行的，朗诵了自己作品的片段，使听众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段时间内，她曾陷入一种波登先生称为“黑色情绪”的状态中。根据这次体验，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为《寂寞》。她拿给他看，而他觉得调子过于低沉，大胆改了一两个字，把标题换成《孤独》，说这样就使它由阴郁一变而为欢乐。当然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整个基调。他还加上了一个逗号，而她对这逗号的评论近乎愤慨。

虽然波登先生知道凯什琳去过国外，却不知道他们分开后发生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孩子的事，她从不提到沃里希奥芬和那些波兰朋友。那时她整个身心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但是当她把自己写的一些巴伐利亚故事草稿给他看时，他建议她自己送给《新时代》主编 A.R. 奥列加看。2 月的这次会面极为成功，是凯什琳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新时代》杂志

我深知你在“过去”对我充满深情厚意，始终如一，感谢你让我从你那儿学来的一切……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我思索，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致 A.R. 奥列加
1921 年 2 月 9 日

《新时代》每星期四出版，在 1910 年，这是伦敦最有活力的期刊，尽管有着种种缺点。A.R. 奥列加常常喜欢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它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但却受到敌人的喜爱。这么一份肆无忌惮的刊物显然不会令人感到舒服，任何对爱德华时代政治、文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离经叛道的作品，只要写作水平高，都会受到欢迎，所以青年作家认为值得跻身其中，并非为了报酬它给撰稿者的报酬只是名义上的，或干脆没有。杂志每年亏本 1000 镑，奥列加自己从资助者提供的基金中每星期只取出 4 镑作为薪金，而他最有名的一些撰稿人——萧伯纳、威尔斯、本涅特、切斯特顿和贝洛——则自从 1907 年他任总编辑后就没有拿过任何报酬。

在萧伯纳看来，他是“一个名叫奥列加的神秘人物”（这个姓似乎曾经是霍列加），在离剑桥 12 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出生，没有父亲，但非常聪明，靠乡绅的帮助进了师范学院，成为里兹一所小学的教员，再靠自己的本事爬到后来的地位——自己读尼采等人的书，创立了一个叫作里兹艺术俱乐部的团体，还曾邀请萧伯纳去演讲过。他后来改名奥列加，发音和法语中的“风暴”相同。

1910 年奥列加 37 岁，高而瘦削，两眼炯炯有神。他戴一顶软呢帽（那时是反抗的一种表现，在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帽子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标志），他那猫似的脸庞和猫一般的动作使他看上去总像要对什么东西扑上去一样。

许多认识奥列加的人都用“魅力”这个词来形容他，称赞他为人坦率，当然也有些恶作剧（正因为他让他们写些别人不会允许的东西，他们才肯不要稿酬）。

他喜欢格言，欣赏对仗工整的句子：“天才拥抱无限，别人则拒绝它。”关于自己的刊物，他常说（以示区别于《观察家》）它具有表现作用，而不是代表作用。

在他那爱德华式的俏皮话中，有时可以听出一些虚假。尽管他机智聪明，但仍有一些缺陷，这使他对“终极答案”常有一种神秘的渴望，常想放弃一切而去追随某些握有开启宇宙钥匙的预言家或术士。其他时候则是一位了不起的编辑，虽然他的有些才能是自我毁灭性的。

刊物自称为“政治、文学和艺术周报”，由奥列加和霍尔布鲁

克·杰克森 依靠费边社的支持在 1907 年创办，但是 1908 年杰克森离

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译注

贝洛（1870～1953），英国作家。——译注

里兹，英格兰中部城市。——译注

霍尔布鲁克·杰克森（1874～1948），英国作家，编辑，是萧伯纳的第一个英国传记作者。——译注

开后，则更强调文化而不是政治——这里“文化”一词可用来代替所有的“艺术、哲学、经济理论和妇女权力，加上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异端邪说。奥列加尤其为刊物的第一版感到自豪，那是埃里克·吉尔为他设计的。

人们能从《新时代》了解到欧洲戏剧家们正在做些什么，或能遇见某个默默无闻的俄国作家——例如，“安东·契诃夫”他的一些故事曾刊载在杂志上，而艾西利·杜克斯则为读者们介绍过他的剧作。在诗歌方面，《新时代》曾经在1908~1909年间帮助过意象派步入文坛。1909年，在罗杰·弗莱第一次展示后印象派作品前几个月，它曾就其进行过评论，而当展览受到整个伦敦的嘲笑时，《新时代》却敞开了它的胸怀。

第一版“一周要闻”基本上是奥列加写的，备受推崇，但许多读者最爱看的却是阿诺尔德·本涅特以“雅各·汤森”的笔名撰写的“书与人”专栏，这是一种提供信息和观点的随笔，反映出本涅特那爱追根寻底的头脑的绝妙之处，那时成功还没有使他变得庸俗。通过杂志，他成功地促使威廉·海曼在英国出版陀斯妥耶夫斯基；1909年3月，他还以极大的热情评论过契诃夫，但凯什琳不大可能见到这篇文章，因为那时她恰好去了利物浦。那些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的人可能从没有读过这份杂志，维吉尼亚·斯蒂芬小姐可能会把它同后来自己称作“底层”的东西相联系，虽然她一定听说过杂志对后印象派画展的反应。伦纳德·吴尔夫从未为它撰过稿，而李敦·斯特雷奇有次“几乎要寄一篇文章给它，但却因为没有写妥收件人”而作罢。《每日邮报》从没提到过它的名字（奥列加认为有人从中作梗），而《笨拙》上甚至也没有对其开过玩笑，只是把玩笑留给了奥列加：他身着旧衣服，脚上的靴子前面打了补钉，声称杂志“无稿费”。

1930年左右，埃兹拉·庞德宣称他根本不知道谁会去读那种杂志，他当然是言过其辞了。他的朋友T.S.艾略特就确实读过，后来还极力称赞奥列加，但是杂志从来就不受人尊敬，虽然它给权力机构带来了一些恐慌，却并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部分错误在于奥列加对编辑工作恶作剧的理解，他把自己视作一个坚持公开讨论时享有特权的主席，甚至对费边社的观点也不承担责任。如果他不同意一位撰稿人的文章，只是将其刊登出来，然后在下一期上自己撰文批评或请另一位撰稿人这样做，这并不难做到，因为那些无靠山，不满现状的所谓编辑部成员总是准备着提供新的笔名，他们就像木偶剧台上声势浩大的部队一样，浩浩荡荡地前进，当出现隘口时，则跑入幕后再换上另一种制服出

费边社，英国19世纪中期社会改良主义组织，萧伯纳曾为其主要领袖之一。——译注

埃里克·吉尔（1882~1940），英国版画家。——译注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杰出的剧作家，短篇小说家。——译注

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后印象派艺术的积极倡导者。——译注

威廉·海曼（1863~1920），英国出版商，威尔斯，吉卜林等人作品均由其出版。——译注

维吉尼亚·斯蒂芬，维吉尼亚·吴尔夫出嫁前姓斯蒂芬。——译注

伦纳德·吴尔夫（1880~1969），维吉尼亚·吴尔夫的丈夫。——译注

李敦·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布卢姆斯伯里成员之一。——译注

《每日邮报》，伦敦主要报纸之一。——译注

《笨拙》，英国一讽刺性画刊。——译注

T.S.艾略特（1885~1965），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其代表作为《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译注

现在台上。他们的努力的确使读者感到星期四是个快乐的日子，但“演出”总是入不敷出；奥列加后来几乎同每个最好的“演员”都吵过架，最后甚至还失去了费边社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种种不满，才在1913年创办了《新政治家》，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竞争对手。

凯什琳对《新时代》的原则方针毫无兴趣，很可能在波登先生提出其鼓励性的建议前，她根本就没听说过此杂志的名称。但她自己去拜访了奥列加，这是一次私人会晤，双方都感到彼此有些“魅力”。

人们去拜访他时，总是经过一条胡同到印刷厂后门。两段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石阶通往一个小办公室，那儿放着两张办公桌，挂衣架，一套文件架，几堆杂志，还有一张供来访者坐的椅子。奥列加对这次拜访记得很清楚，“我可以肯定K.M.先称自己为女士，”很久以后他写道，“那是在我发表她的文章几天以后，我记得很清楚读这篇文章时她坐在我的办公室，愿意让我在下一期上发表。”但是似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那究竟是篇什么样的故事。

《疲倦的孩子》其实可以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瞌睡虫》的英文改写，事实上当时在英国已经有此文的翻译，讲一位受虐待的女仆闷死了鞋匠的婴儿，以使自己得到一些睡眠，收在R.E.C.朗编选的小说集《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中，1903年出版，但是这个本子很小，不大为人所知，所以《新时代》的读者们没有注意到凯什琳的故事的来源，这些读者包括阿诺尔德·本涅特，因他在1909年曾提到过朗的书。故事中谈到“巴伐利亚婴儿”，因而可能使所有的人都忽视了那一事实。

很久以来评论家们都不加思索地宣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他的早期影响具有很高的象征性价值——而且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影响出现在她离开沃里希奥芬回来后，包围着她的是欺骗和痛苦时，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在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受到一对粗暴夫妇虐待的孩子，被迫终日操劳，还要摇着婴儿使其入睡；夜晚来访的客人又延长了她的劳累，直到她突然觉得孩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闷死了他，自己才安然睡去。其中有很多相同的细节，但是至关重要的是描写方法不同：契诃夫从前一天晚上开始讲故事，再详细叙述瓦卡的生活；凯什琳把故事局限于一天之内，集中于现在，为了加强疲乏不堪的感觉，她还加上了几个孩子，但是同时又使时间范围更为紧缩。《疲倦的孩子》实际上表明了年轻作者独立创作故事的才能。（例如，在她的故事中，结尾时的梦具有象征性意义，契诃夫的瓦卡则没有梦。）

可能凯什琳在沃里希奥芬时读过契诃夫的德文版小说，也许作者的名字对她没什么意义——虽然她加上去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叫安东。有位评论家强调这是一种“无意识记忆”，说有一种想象力丰富的特殊头脑能吸收自己喜欢的东西，与自己的许多思维活动融汇贯通，几乎没有什么被动地欣赏，因此后来记忆中将它作为自己想象力的产物。无论如何，凯什琳如果知道此故事的英文译本，就不大可能把它作为拿给奥列加去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以后接连几期杂志就在本涅特的专栏上面刊载了《就餐的德国人》（讽刺他们的粗野），《男爵》（讽刺他们的势利）以及那篇妙不可言的自我嘲讽小作品《日光浴》，这些都只是随笔，而不是故事，主题是女性面对粗野

《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在英国出版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译注

契诃夫本人也名叫安东。——译注

时过于敏感的退缩，方法是讽刺——但却用欢快的笑调写出来，加上洞察力，当时杂志上的其他文章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她习惯于将《青春》作为起点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青春》的任何一期上都能找到绘画与漫画来说明她早期的作品，她所有的巴伐利亚角色都有了：男爵、现代灵魂、冒险的女士、在窗前梦想或独自在咖啡馆桌前抽烟的年轻女人。人们也可以在它的艺术作品中找到战前欧洲的风尚——热水瓶、自动搭扣、小型柯达照相机等——这些是飘浮在 1910 年平静天空中的时髦的先兆（然而，《新时代》上刊载的一幅漫画则将凯撒的胡髭画成了大炮）。

《新时代》那些无所顾忌的作家开始攻击这位新成员，《疲倦的孩子》一发表，他们就写了《致编辑的信》，如维迪（他很可能是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写道：“据本人愚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姐制造了一种这些人家庭生活的完全错误的印象。”所有这些废话对通信栏目非常有利，当然凯什琳很快就结识了这些天才的作家。

奥列加习惯于星期二下午在 ABC 茶室会见撰稿人，在地下室甚至妇女也可以吸烟。1910 年常来的人中包括肯尼迪——“一位胖乎乎、尖嗓门的男人，同母亲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叫作 A.E. 兰道尔，瘦削，眼睛直愣愣的，看上去像个饿殍鬼，寿命不长了。

只有一位妇女，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她原名叫爱米丽·爱丽斯·海格，共使用过 17 个笔名，曾以“S. 罗伯特·韦斯特”的名字同肯尼迪和兰道尔进行过长期辩论。她出生于南非，同一位拳击手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但现在甩掉了那个拳击手，同奥列加一起住在肯辛顿的一个寓所内，似乎两人都没有离婚。她比凯什琳大 9 岁，同她一样，也可以在紧要关头向父亲伸手要钱。海格先生是伊丽莎白港的一位富商。

海斯汀斯给杂志撰写了大量辱骂性的评论文章，一些结构松散的小说和辞藻华丽的诗歌。有一段时间她是妇女参政的鼓吹者，而后来又以同样的狂热加入了敌对的阵营，她写的有关生养孩子痛苦的作品（“人类生活最丑恶的现实”）是杂志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既然她自己的故事和诗作不能吸引什么评论界的注意，只有奥列加出于责任心评论一二，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疯狂地嫉妒那些使她相形失色的人，尤其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后成了她愤怒的目标。她 1943 年自杀了。

有一次在拜访过“大个子 B”后，凯什琳告诉另一位朋友：“两个女人聚在一起时，那是很可怕的——不知道我们两人谁更令人讨厌。”而“大个子 B”很久以后还断言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从来不知道她的嘲讽性文章的价值，以为自己那些伤感的作品“更为成功”。

同《新时代》发生联系的最初几个星期，凯什琳和她法定的丈夫住在靠近贝克大街的寓所内。埃达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一直撒着弥天大谎，在那儿留言时总是使用莱斯利·莫尔这名字，这是波登先生不知道的。

3 月下旬，埃达收到一封告急信，让她去一个陌生的地址，她在一个“二等住院病房”找到了凯什琳，知道她刚刚因“腹膜炎”动过手术。凯坚持要马上搬出去，说外科医生调戏她。因此埃达喊了一辆马车把凯什琳带到当时她与姐姐合住的寓所里（她父亲去了罗得西亚），古德小姐每天来给伤口换

肯辛顿，伦敦一地名。——译注

即海斯汀斯。——译注

药。不久她在一家果品店上找到了几个房间，后来又在一块遍布雏菊的草地旁找到一所农舍，把凯带到海边去疗养。自从离开岛湾后，凯什琳就没有在海浪中嬉戏过。这次她写了一首悲伤的咏海诗，其中海成了“海之子”，严厉的母亲和新西兰则被理想化了，成了“远方的家”。

春天来了，乡村很美，但是凯什琳动过手术后，身体仍然很虚弱，伤口再次感染使她又病倒了，这时，她相信自己像母亲那样患了“风湿热”，好几年都受着病痛的折磨。其实炎症是淋病，而疼痛是由于这种病未得到及时治疗引起关节炎所致。

不久就该回城了——显然要去归还加纳特的戒指。她不会再去 G·波登那儿，现在她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是她的笔名，她已完全使用这个名字了。

奥列加提议让她使用自己一位画家朋友亨利·毕肖普在切尼街的住宅，他那时已去摩洛哥过冬，她当然接受了。迁居时，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另外三篇“公寓随笔”，这些同过去的几篇风格一致，但增加了一种新的笔调，其中两篇流露出对生养孩子和男性的厌恶，这种笔调很可能来自于同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女性”的交往。

夏天的一个晚上，奥列加和贝阿特丽丝带着凯瑟琳和另一位《新时代》撰稿人爱德蒙·B·道尔林共进晚餐，后者记得她是一位冷静的年轻女子，对爱情抱着讥讽的态度。在他们面前，她像一位被迫扮演喜剧角色的演员——她必须维持自己在故事随笔中创造的形象。但是，毕肖普那舒适的寓所越过梧桐树顶俯瞰着河水，很快就使她摆脱了一切，那儿的一位新朋友也对她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是，有好几个月她从杂志的栏目中销声匿迹。

1910年夏末，威廉·奥顿在汉普斯特的一次网球聚会上遇见凯瑟琳，他是一位与她同龄的中学教师，正循着她已熟悉的道路热切地探索着文学，他已经读过了佩特、易卜生、惠特曼，但厌恶斯温伯恩——这在他的自传性小说《最后的浪漫史》中都提到了，其中也有一个章节谈及他与凯瑟琳在以后的一年中时断时续的交往。

这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恋爱关系，后来的凯瑟琳可能会称其为“孩子的爱情”，很显然，这种关系存在时，他们彼此非常了解，能自由谈论而不伤害某一方。奥顿说他们确实曾经谈到过结婚，但怀疑两人有谁真的希望这样。

奥顿在书中给自己取名“迈克尔”，他那时正同另一位专注于自我的年轻作家埃德娜·尼克森（书中的“莱丝”）陷于一场恋爱纠纷，她一直“弄些颓废式的东西”，而且极其喜欢斯温伯恩，这令人尴尬。这是会面时的情景：

凯特琳——她称自己为凯瑟琳娜（那时她俄国味十足）——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不久就编集成她第一本书；奥列加也接受了迈克尔的一篇小散文，但他们是在汉普斯特朋友那儿打网球时相遇的，他们之间立刻出现了某种默契。一起回家时，在地铁车站的短暂静寂中，凯特琳突然问：

切尼街，伦敦一地名。——译注

即下文中文威廉·奥顿。——译注

汉普斯特，伦敦一地名。——译注

佩特（1839~1894），英国作家，批评家，其代表作为《文艺复兴史研究》。——译注

“你相信潘神吗？”就这样他们离开了嘈杂的人群，夜半时分走到尤斯顿附近的地方。

他不久就去了切尼街：

她把这地方收拾得很美——几支蜡烛插在一个头盖骨中，窗户中间还有一支，地上一盏灯的光线透过黄色的菊花，她自己则坐在屋子中间，身着粉红色图案的和服，外罩一件白花羊毛衫，是房间中光彩夺目的一团……

实际上整个夏季，在夏普布什 都举办着盛大的日本展览会：日式庙宇和村庄，微型花园，魔术师和相扑师，印花棉布和瓷器，茶道和插花。奥顿在切尼街看见的和服并不是展览会给凯瑟琳留下的唯一痕迹。他让她看谷崎润一郎的诗，开始向往那些美丽的日本房子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宁静。“那时俄国味很浓”，也许是，但日本也在向她招手。奥顿说那时她正在大量写作诗歌，但“她所有的作品都很有诗意”，只有当她的生活服从“艺术的无情召唤”时，她才有安全感。

有一件事使他很惊讶。那时候在切尼街和国王大道之间，人们必须穿过一群群的孩子去搭乘公共汽车，凯瑟琳总是带着一种“感觉好笑却又是明显的厌恶神情——那种有教养的人的厌恶——看着他们——这反映了她绝不愿再受感伤情绪困扰的决心。但是在她的态度中还有另一个因素：她常常很孤独、不想屈服于那些使自己一事无成的情感，这种念头在那些年中非常强烈。

凯瑟琳后来在故事《紫罗兰》中用“你相信潘神吗？”这个问题来开玩笑，奥顿说“我认为那时凯并不怎么了解潘，也可以肯定她那时还没有读过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但她后来以此问题来嘲讽客套话则的确意味深长。

他最后见到她是在1912年，那时她已决定以现实态度看待文学生涯，烧毁了许多早期的作品。“和我一样，我知道这完全错了，我认为她也知道，但拒绝承认，就像一次流产。”

埃达也回忆过在切尼街的日子。她常睡在后面的小卧室内，有天晚上她已上床了，凯瑟琳大声在外面嚷道她“想去日本”，但是当埃达说那样自己会非常孤独时，她立刻放弃了这一念头。埃达总是要为她抵挡一两个讨厌的人，沃特·李普曼来过，很殷勤，但是凯瑟琳不愿同他开始那种他似乎想要的关系。

在那些殷勤的来访者中，有一个受到另眼看待的年轻人，名叫弗朗西斯·海曼，相貌漂亮，看上去还像个孩子，凯瑟琳喜欢他，因为他在聊天时喜欢躺在地板上，双脚在空中晃动。他在城内工作，必须出去售货，但是人很有吸引力。他们谈论着去俄国，他还给了她一个漆木的俄国玩具村庄。他们年轻幸福，想要结婚，“很快就成为情侣”。但他家中不赞成他结识这么一位结过婚，却又独居的女人，所以他的拜访也就结束了。

这就是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12月，凯瑟琳生活的大致情况。用维吉尼

潘神，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的畜牧神，也指顺乎自然的精神。——译注

尤斯顿，伦敦一地名。——译注

夏普布什，伦敦一地名。——译注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诗人。——译注

亚·吴尔夫的一句名言来形容，那时“人性都改变了”。在一份富有吸引力的叫做《敞开的窗户》的杂志上，她写了一篇古怪的名为《神话故事》的寓言，这是一个王尔德式的幻想作品，嘲讽她曾从沃特·李普曼那儿吸取来的一些说教。她确实希望有所改变，也许是为了摆脱自己为了取悦于奥列加和贝阿特丽丝而装扮的形象。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间《新时代》上没有刊载过她的作品。

人们通常认为当维吉尼亚·吴尔夫首次提出“人性”这个现在已被重复得老掉了牙的说法时，是指某次特定的事情，也就是罗杰·弗莱的首次后印象派作品展览。展览于1910年11月8日开幕，直至12月初才结束。这次事件意义重大，对那时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来说，走出伦敦11月的灰暗进入辉煌灿烂的展览会就像是一种突然的解放，摆脱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观念，进入了全新的视野。

除了马奈的作品（展览会的名称是“马奈和后印象派”），还有21幅塞尚 22幅凡高，36幅高更的油画和素描，以及毕加索、马蒂斯、德兰和其他人的少量作品。这是伦敦第一次真正体验“现代艺术”，整个展览马上就被指责为“堕落”、疯子的作品、对智慧的侮辱等等。但这不是《新时代》的看法，汉特利·卡特竭力不持偏见，乔治·考尔德伦以逗笑的口吻描写了受挫的福尔赛们（“他们就像听见音乐的狗一样，只知狂吠，却不逃开”），而阿诺尔德·本涅特则写了下面这段话：

如果有年轻的作家出现，用语言创作出这些年轻人用油彩创作出的东西，可以想象我几乎会对整个现代小说感到厌恶，我也许要从头开始。这种尴尬的情形也许不会出现在我身上，但可能会出现在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身上。无论如何，这种想法不错。

凯瑟琳看了展览，11年以后还写信给她的画家朋友多萝茜·布雷特谈到凡高的《向日葵》给她的印象：“那幅画似乎揭示了我在未见画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后来一直伴随着我，现在仍然如此。这幅画以及另一幅画着戴扁平帽子的航海船长的作品教给了我一些与写作有关的东西，很奇怪，有些近似自由——或者说是一种摆脱一切的自由感。”

亨利·毕肖普1911年初从摩洛哥回来，凯必须另找住处。在一幢叫作克洛夫利大楼的红砖建筑的顶层有一套三间的公寓，可以租下。从厨房窗户看出去可见一个木材厂，还有许多烟囱，伦敦城区重叠浮现；夕阳投在布卢姆斯伯里上；街道下面传来车辆的嘈杂声和有轨电车的铃铛声。

凯没有家具，自然就照日本人的方式布置室内。他们买了一些便宜的竹

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译注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译注

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译注

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译注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译注

德兰（1880～1954），法国画家。——译注

卡特、考尔德伦，均为英国作家，批评家。——译注

席铺地，上面扔了一些坐垫；在起居室内放了一张书桌，一张椅子，还有贝克太太的一张藤条椅。在另一间前室内也铺了一些竹席，放了一尊从缅甸带回来的菩萨像。凯瑟琳在像前放了一碗水，盛着青铜色的蜥蜴。壁炉上有一个水烟筒，几个像颅骨似的巫婆头像。房内还放着一把吉他，有一架大钢琴，是在切尼街时买下的，为此欠了一大笔钱。这就是克洛夫利大楼 69 号，后来还印了一些附有此地址的纸张。有一位女工——贝特太太，每天来打扫住所，后来她成为帕克大妈的原型。

奥顿认为搬到这个住所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象征着凯瑟琳已决心正式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但这样做“太快了些”，她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持续不安的生活中取得精神上的安宁。

埃达说，在搬来后不久，凯瑟琳有理由相信自己又怀孕了，她多次给弗朗西斯·海曼写信，求他来看看她，但没有回音。埃达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但他却从未来过——“所以他从不知道孩子的事情”。过了 6 年以后，他们才偶然相遇，那是在一家餐馆，后来凯瑟琳把这写进了一个故事。

4 月，埃达收到来信，催促她立即去罗得西亚会见父亲和兄弟，她不放下心来留下凯一人，她“正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并为此感到幸福，”埃达写道：“而且她现在更有能力处理事情。”但她没有钱，埃达因此以凯瑟琳的名字立了一个银行户头，存了 60 英镑，以备急需，然后启程去罗得西亚。

1953 年，米德尔顿·默里举了一些不容置疑的医学理由来证明事实上经过 1910 年的那次手术，凯瑟琳几乎不可能再次怀孕。他说偶然在凯瑟琳的一本笔记本的封皮里发现了一张秘密的医疗报告，是 1921 年 A·波查格医生写的，其中提到的事实肯定是凯瑟琳自己对医生说的。默里没有透露医学上的细节，因为其中涉及个人隐私。

还有另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那就是她同《新时代》的 J.M.肯尼迪的恋爱关系。埃达曾不怀好意地描述当他在克洛夫利大楼告诉凯瑟琳说他可能会因为爱她而拿枪自杀时，沉重的身躯几乎把那把她母亲的藤椅坐坏；而凯瑟琳的回答是“噢，还是先吃一块西瓜吧。”

《新时代》撰稿人爱德蒙·B·道尔林是肯尼迪的朋友，他说自己 1910 年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相识时，常常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见到她，“当时那儿是时髦的会面地方”，他们彼此不大感兴趣，但肯尼迪却喜欢上了凯瑟琳。几个月后，肯尼迪带着一种相当欢快的神态告诉道尔林，恐怕他使“一位女孩子怀孕了”。不久以后他又伤心地来了，“告诉我凯·曼抛弃了他，……也许他就是凯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

道尔林写道：“很多年以后，我遇见一位叫诺曼的人，是当时有名的和平主义者。他告诉我，有一天肯尼迪对他大发脾气，用手枪威胁他，因为肯尼迪断定他抢走了凯瑟琳，诺曼当然说自己当时表现得很冷静，告诉肯尼迪他这辈子从未见过凯·曼，这也许是真的。”

埃达 4 月动身去罗得西亚，这时凯瑟琳的母亲已再次启程来英格兰，带着彻迪、杰妮和现在已不再上学的弟弟，来参加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埃达说那个孩子没有出生。当她秋天回来时，“没有孩子，也没有了银行存款。”凯瑟琳再也没有提过此事。

1911 年 5 月，她母亲刚刚抵达伦敦（父亲因银行事务滞留在惠灵顿），

凯瑟琳回到《新时代》，在5月那一期发表了一篇有关孩子出生的故事。两天以后，她同贝阿特丽丝去了海边。

这篇故事代表了凯瑟琳的一个新起点，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次讲的是她自己的故事，这篇故事就是《生日》，第一篇描写自己家庭的像样一点的成熟作品，但她给了书中的父母亲一个儿子，而不是那个极其令人失望的女儿。

《生日》赢得了一些称赞，或至少可说是奉承。莱斯利·比切姆给罗得西亚的埃达写信说，“她想象力丰富，她的作品正在征服伦敦。编辑说，那篇巴伐利亚随笔使《新时代》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刊物。”

小弟现在已17岁了，他热爱自己的姐姐。她带他去见奥列加，而他刚离开高中就发现她成了伦敦的“名人”，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他见过埃达，受到欢迎，现在同她保持通信，告诉她有关凯和他自己的消息。他原来一直在为进商界学习速记，准备加入家乡的事务所，但是现在却想当一名外科医生：“你不觉得同做生意相比，外科医学更有利可图吗？……当然，我要进牛津或剑桥，加入我一直非常向往的大学体育生活。”

凯蒂给了他一把前门钥匙，她真是太好了。但她经常不在家，6月份她“每晚都去音乐会或戏院，因为此时她担任了《新时代》的戏剧评论工作。你没有看到成功就在眼前吗！”

接着发生的事情不是莱斯利料想的那种“成功”，但却导致凯瑟琳写作生涯的一次关键性转变。6月22日，乔治五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10年前他当公爵时曾在惠灵顿同哈罗德·比切姆握过手，比切姆到底还是错过了向往参加的盛大典礼，但是他的女儿凯什琳却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以古代人物为角色的讽刺性作品，嘲笑这一盛会，这篇作品后来影响了她的整个发展过程。

奥列加给了她一本狄欧克里特，建议她写一篇引人发笑的《田园第十五首》的仿作，以迎合这次加冕礼，结果就是她快速写出的一篇讽刺短文，这使她最终放弃契诃夫，开始学习狄欧克里特，把后者的写作方法变为己有。

《阿多尼斯节日》是一出绝妙的笑剧，仅用150行诗句就将读者带入公元前250年两位去参加阿多尼斯节的唠叨妇人的有趣的相伴之中，凯瑟琳的滑稽模仿开始是这样的：

加冕庆典

（向狄欧克里特致歉）

格温妮：喂，老姐姐。

蒂莉：我以为你不来了。到厨房来喝杯茶，恐怕再也喝不到茶了。

格：连小店都关门了。

蒂：见鬼！

格：天哪，这么多人！我连一辆公共汽车，甚至出租汽车都找不到。街上尽是破报纸和走散的警察。真奇怪，有点像星期天，只是教堂的钟没敲。

蒂：我知道。连邮递员好像都来得不是时候，今天我起床时觉得四周有种“早圣餐”的味道。如果不是这么吵闹的话，我就不能住在伦敦了。格：收拾好东西，我们走吧。我看了《每日邮报》说是游行会

狄欧克里特，公元前3世纪希腊诗人加里马赫创作的“田园”诗，这是根据神话题材的日常生活描写，是城市下层居民生活琐事的滑稽剧。——译注

很了不起。

蒂：《每日邮报》说什么都是了不起。你以为我不怕挤坏这顶最好的帽子吗？

格：可能，我穿着旧衣服出来的，昨天晚上睡觉前才收拾好这顶帽子，红丝绒原来是一个沙发垫子上的，向日葵是好多年前花了二又四分之三英镑买来的。

蒂：你是那种从不需穿好衣服的人，噢，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帽子太可爱了，小巧玲珑，正好合适。……我的钥匙在哪儿？这把钥匙我找来找去反而弄丢了。

格：蒂莉，这条裙子你穿太合适了。告诉我，你费了多少布料做这条裙子？

这其实是将《田园第十五首》的前 40 几行变换置入“现代郊区”场景。T.O. 贝齐克洛夫 听说有这么一篇东西，感到又惊又喜，因为在他 1968 年发表的英国短篇小说评论《朴实的艺术》中曾提到《田园第十五首》的方式没有受到现代作家重视，他说：“短篇小说来自于口头寓言和人们自身的叙述，经过了漫长的 9 个世纪。然而奇怪的是，如果它是直接发源于狄欧克里特，就不需经历这么长一段路程了。”当时他还不知道，1911 年凯瑟琳就正好走了这一捷径。后来不久她又回到摹拟剧的形式，已经意识到这种形式给她提供的可能性。

1911 年的夏天经受了长久热浪的袭击，每个像凯瑟琳一样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人都尽量呆在户外。但 7 月份她病了，这是她第一次严重的肺病发作，父母亲希望她去南方的阳光地带，而她却去了布鲁格。

据说那次得的是“胸膜炎”，人们提到这个病总是用这个名称，但现在应该称其为肺结核。那时人们已很清楚胸膜炎是肺结核的先兆，但是凯瑟琳直到 1917 年末才知道自己患了肺结核，而当时她接触的唯一病人是 A.E. 兰道尔；但是曾去过沃里希奥芬的小查理·华特肯定也是肺结核患者，而且同她很接近。

随着结核菌侵入她的肺部，凯瑟琳开始用一种微妙的不同眼光看待事物。去比利时的疗养旅行产生了两篇小小的游记，作品虽然微不足道，却流露出一一种新的迹象，力求细致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凯瑟琳后来掌握了这种技法，就像印象派画家懂得如何捕捉光线一样。

离开布鲁格后，她去日内瓦住在沃里希奥芬时认识的朋友耶尔斯基家，埃达刚从罗得西亚回来，从莱斯利那儿听说了她患病的信息后，直追到日内瓦。

回到伦敦后，凯瑟琳又去见了奥顿（《最后的浪漫史》说：“她稍稍一触就使世界立刻恢复了原状”）；但接着她就在他俩共有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篇令人惊骇的性描述，似乎指的是沃特·李普曼的一次来访，她在别的地方称其为“那个人”：

贝齐克洛夫，英国文学批评家。——译注

布鲁格，比利时西北部古城。——译注

钟敲 5 下时，那个人来看我。他把我搂在怀中，抱到黑色的床上去。他黝黑健壮……天色暗下来了，我蜷缩在他怀里，像一只野猫一样。我心不在焉地欣赏着用穗状带子束在膝盖下的银色丝袜，黄色的小羊皮鞋子镶着白色毛边，我看上去多么堕落啊。我们像两个野兽似地互相抚爱着。

接下去又是一段话，宣称，“迈克尔（奥顿）和我自己都很真实……我想开始另一种生活，目前这种生活已磨损得差不多不久以后，她又写了一个标题为《午夜》的片断，有部分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我几乎是过一天算一天，除了我的工作外，我为我的工作选择最不费力的目标。是否其他艺术家也像我一样感到迫切的需要，急切的需要——那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欲望，那使我不得安宁的欲望？……

那么，凯瑟琳，什么是你的最大愿望？你究竟热切渴望什么？写书，写故事，写随笔和诗歌。

同奥顿的友谊以一种微妙的戏剧性告别结束，《日记》（10 月 29 日）中宣称：“我又成为一个小孩子”；而在《最后的浪漫史》中，奥顿简短地说：“就这样他们各走各的路。”

那年秋天，斯蒂芬·斯威夫特出版社预告将要出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名为《在德国公寓里》的“6 先令一本的小说”。斯蒂芬·斯威夫特敢于冒险，能够识别有前途的作家，他写的《新书预告》给他赢得了声誉，足以使他的作家们吸引评论家的注意，不管作品本身如何。他是奥列加的朋友，偶尔也替《新时代》撰稿，他写诗歌，也能写些拿得出手的书评，他出版的许多书都曾先在《新时代》上发表过。凯瑟琳将自己的公寓随笔收集成书，稍加编辑，再加上几篇未发表过的、也许是奥列加退回的粗糙的故事，交给斯蒂芬，她收到预付的 15 英镑，书恰好在圣诞节时出版，她父母亲和仰慕她的弟弟当然都能读到——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她把故事中提到“凯什琳”的地方都去掉，代之以“她”或“那位英国女人”。

《每日电讯》的文学评论员说这些故事因“那奇特的，精灵似的笔触——没有其他更好的字来形容了——而与众不同，这种笔调自从斯特恩以后就不大为英国文学界所知，虽然在少许现代俄国和法国作家中能找到一些迹象。”《早邮报》说曼斯菲尔德小姐对德国人描写得太好了，但她“有些过分强调了那无容置疑的平庸或粗俗”。另一位出版商的广告引用了《泰晤士报》（“这些随笔观察敏锐”），《铁圈球杂志》（“细致入微的描写”）等的评语。《新时代》评论员（很可能是现在有理由嫉妒的海斯汀斯）不怀好意地指出：“如果曼斯菲尔德能丢掉那些常常与嘲讽才能并存的感伤情绪，她将成为非常有趣、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家。”

这是一次小小的成功，虽然几乎不能同伊莉莎白表姐先写的此书的姐妹篇《伊莉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相提并论，但毕竟在比切姆的家族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60 年前，霍恩赛街诗人的 5 个儿子乘船去南半球，最年长的成为悉尼富

《每日电讯》，伦敦一主要报纸。——译注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译注

有的商人，有一个会写书的女儿，她回到欧洲，嫁了个伯爵，因一本有关德国生活的书而出名，以后一直以此有利可图的手段为生涯，孀居后仍能维持生活排场。诗人年轻一点的儿子比父亲有过之而不及，但他自己的大儿子却也成为新西兰富有的商人，也有一个会写书的女儿，她回到欧洲，写了一本有关德国生活的书而开始成名——那本书她后来称为“谎言”，“幼稚透顶”，“并非出于本意”。

1912 年，《韵律》杂志

年代有些混淆不清；她姐姐至少有一次告诉他，说某个冬天她自己也不知道谁是南茜的丈夫。她大致喜爱编辑这工作——尊重记者这职业，他们一定都是可怕的流氓，因为她自己显然和蔼可亲。大家都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我防卫。总而言之，她做过一些事情，这是主要的，她非常漂亮，脾气好，人聪明，因而是最好的伴。她是真正的遥远西部的产物——太平洋海岸的花朵；无知，胆大，未经雕琢，却充满朝气，有着天生的才智和时而迸发出来的鉴赏力。她常说只想要一个机会——显然她现在找到了它。

——亨利·詹姆斯《伦敦的陷落》

小杂志是年轻人随意炫耀才能的场所，为英国文学提供了无数简要的说明。如果没有它们，就很难说乔伊斯、艾略特和庞德怎么能改变事物。但是杂志的影响在哪一方面更大些呢？——在文学上？还是在生活上？火箭，罗马蜡烛，孟加拉火柴，跳娃娃，轮转烟火，火花和爆竹，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在文学界的上空起了些什么作用，但对于那些在后院施放焰火的人的生活又起了什么作用呢？烧焦的手指，失去的职业，破裂的友情，印刷商的帐单和破产——这也许是遭到忽视的领域。

1911 年 12 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因某种理由对《新时代》感到恼火，寄了一篇故事给一家新的杂志。这家名为《韵律》的季刊是文学和艺术的大杂烩，由两个年轻的牛津大学生创办，印刷精美，看上去倒像一回事。负责文学栏目的年轻人对这篇寄来的《店里的女人》一文极为赞赏，在读过《在德国公寓里》这本书后，就准备拜见作者。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就读于布雷斯洛学院，也就是凯瑟琳说的“那个了不起的牛津人”。初见面时，她不可能猜测到他的家庭背景，因为那时人们自然而然认为“牛津生”家境富裕。实际上他出生于伦敦南区一条肮脏的街上，父母处于下中产阶级的最底层，仅比无产阶级高出一点点。他父亲就像果戈里笔下的某个人物一样，当一名埋头苦干的小职员，是那种心地狭隘的公务员，家中的暴君，不顾一切地决心要让儿子爬上去——爬到政府部门的高级阶层。为了量入为出，母亲早年收些房客；而小杰克在两岁半时就被送往寄宿学校——不是去学习阅读，因为父亲早就注意到了这方面；他两岁时就受到鼓励给祖父酒吧里的顾客大声阅读报纸。本身就是优秀人物的、乐善好施的学者们，将默里从这么一种据他自己说是卑贱，甚至肮脏的低下环境中发掘出来。在本世纪的第一个月，他穿上了布鲁柯特学校的黄袜子和深蓝色长袍，不久就知道了什么是父母家中值得羞愧的东西——却又为自己的羞愧感到惭愧。他没有社会地位，终身打上了这一烙印，也打上了阅读过早的烙印。

他对文学产生了感情，像从前的柯勒律治一样，他成为“希腊人”（有资格获得大学奖学金的前 6 名优生称号之一），1908 年他又获得了进入布雷斯洛的奖学金，每年 170 英镑，可能比他父亲的收入还高，但约翰·默里

布雷斯洛学院，牛津大学的学院之一。——译注

果戈里（1809～1852），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小说《死魂灵》《公务员之死》，剧本《钦差大臣》，等。——译注

也像父亲一样总是认为自己很穷。这时他的父母亲的社会地位稍许提高了一些。

默里刚开始就读于牛津大学时，在牛津和剑桥大约有一打左右寄宿学校毕业的男孩。一些年轻人不久就让他明白自己是被称作“无赖”的那种人。虽然如今他在父亲眼中前程远大，但至少还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在1910年12月，当“人性改变”时，他不在牛津，却在巴黎，经常光顾一家欢迎他的咖啡馆聚会，手中拿着书，像一名感觉良好的文学评论家。

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他的方式是独自坐在一间屋子里读柏格森。柏格森当时正在巴黎大学讲座大厅里用自己有关直觉的新哲学吸引满屋子的信徒（T.S.艾略特也在座）；但默里没有去参加，他坐在家读书。离开书本，小心翼翼地来到塔古尔咖啡馆，他遇见了一位个子矮小，名叫玛格丽特的直觉哲学的响应者。她有一双褐色的眼睛，帽子上缀着樱桃，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她是一个朴实的乡下姑娘，并不真想当妓女，但是要想知道她怎样爱他、如何使他同自己睡觉的故事却必须读他的自传《处在两个世界间》，他讲述这件事所用的温柔的语调超过他那些刻薄的小说中的任何一处描写。她是大自然的孩子，几乎使他从书本中解脱出来。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深切地怀念她的爱情。

通过她，默里认识了弗朗西斯·卡尔科——另一个使他大开眼界的人。卡尔科对女人持讥讽态度，印制精美的名片上称自己为文学评论报《火焰》的编辑部秘书，他那时还没有因为那些肮脏的小说出名，一眼就看出默里是对自己有用的人。

通过牛津的朋友乔伊斯·卡里，默里还认识了一个自称为乔治·班克斯的苏格兰画家。她是一位个子高大的女人，长着一张王尔德一样胖鼓鼓的脸庞，身着男人服装，却常常哭泣。在她乱糟糟的寓所，他能吃到一餐像样的饭菜。他鼓励了她对一位名叫毕加索的放荡不羁的西班牙年轻画家的热情。有次看见一幅他的《多特·班克斯》，默里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他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文章《帕布罗·毕加索》中，寄给了大胆的《新时代》杂志。

但他在巴黎最重要的发现却是苏格兰画家J.O.弗格森。弗格森总是戴着轻便礼帽，蓝色衬领，淡蓝色领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很健康。他是最早深受后印象派影响的英国画家之一，默里说他画的每一样东西里“都有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当弗格森说：“喂，注意，默里老弟”，默里所有的胆怯都不翼而飞。他是一种依赖和轻度反抗的奇特混合物。

关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两个人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默里似乎记忆力异常糟糕，据他回忆，弗格森提起绘画时，总是用到“韵律”这个词；当默里无意中说到他和迈克尔·萨德勒想在牛津创办一份杂志时，弗格森立即建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直觉哲学的创导者。——译注

弗朗西斯·卡尔科（1886～1958），法国作家，其作品以描写巴黎拉丁区文学艺术家生活见长。——译注

乔伊斯·卡里（1888～1957），英国小说家，作家。——译注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20世纪立体主义艺术派别的先锋，《格尔尼卡》为其主要作品之一。——译注

迈克尔·萨德勒（1888～1957），英国作家，批评家，亦即默里在牛津大学的同学，《韵律》杂志的合

议用“韵律”这个名称；它将成为现代派运动的黄皮书，他自己将负责杂志的艺术栏目。

而据弗格森的回忆，有天他正在洗淋浴，默里把萨德勒带到他的画室，在他擦干净身体时，默里问是否能使用他的画《韵律》作为杂志封面设计，画名用作杂志的名称，他们曾在秋季沙龙看过这幅画，弗格森不同意，说那样一个古怪的名称似乎有些做作，但他们仍然坚持。

无论如何，他使自己得到了“一个真正荒谬的职位”，因某种误会而成为编辑和评论家，而这个误会更多地与画家，而不是作家有关。事实上，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只有绘画才能使文学得到解放。默里回到牛津去读三年级，抛弃了玛格丽特和她朴实的愿望（因为她太像自己的母亲了），靠萨德勒和他父亲资助的 50 英镑，在 1911 年夏天创办了《韵律》杂志。

它的出现并非业余性质，由圣·卡特林印刷所印制，淡灰色封面，封面设计以弗格森的裸体画为基调，杂志大开本具有一种舒适的乔治时代风味，但是封里却是毕加索一幅画的复制品。萨德勒撰写了一篇有关弗格森的美国朋友安妮·埃斯特尔·赖斯的野兽派绘画的文章，默里则写了一篇关于柏格森哲学的非常“有直觉”的随笔，在封底上刊登着“宗旨和愿望”，采用了辛格的一句口号，宣称“艺术只有先具有野性，才能具有人性”。

柏格森对默里的思想影响至深，柏格森的观念在他心智方面像玛格丽特在其他方面一样引起了同样的回响。这个新的哲学公开宣称艺术家的直觉和精神观念具有最佳的形式、语言和意义，直觉是“人格的胜利，理智的顶点而不是它的否定”。他在第一期《韵律》杂志上就这样宣称，在以后的评论家生涯中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那年 12 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一人住在克洛夫利大楼 69 号，她家在伦敦，从法律上说是波登太太。《在德国公寓里》赢得了许多好评，因此她受到 W.L. 乔治的重视，他是一位患有梅毒的英法犹太人，写的有关伦敦一位妓女生活的小说《玫瑰之床》也刚刚出版。他专门收集聪明有为的年轻人，觉得曼斯菲尔德小姐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玩世不恭者，是餐桌上谈话的好手。

而另一方面，在《新时代》的一群人中，最近出现了冷淡的迹象。奥列加和贝阿特丽丝拜访过凯丝的寓所后，开始对她私生活和文学生活的杂乱表示不满。

他们曾谈论过这个问题，凯瑟琳说自己绝对信奉一夫一妻制，但没有哪个男人十全十美，足以与她相配。谈到自己某次恋情时，她曾问贝阿特丽丝：“那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爱他”。

在杂志上也出现了疏远的迹象，刊登了一篇似乎是模仿她的写作方法的故事，写得很巧妙，而她自己的一首象征性散文小诗则登在“致编者的信”

办人。——译注

黄皮书，原意为政府发布的报告书，此处代指现代派运动的代言者。译注

秋季沙龙，巴黎一画展名。——译注

圣·卡特林，伦敦一著名印刷所。——译注

乔治时代，指英王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在位期间（1714～1830），这儿用来指一种典雅、富于装饰性的艺术风格。——译注

野兽派，现代艺术派别之一，强调使用明亮的原色作画，表现扭曲的物体形象。——译注

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译注

一起，前面还有“先生”作抬头，因而看上去有些荒唐（《新时代》无暇顾及法国印象派），而对她书的不怀好意的评论，提到她的“感伤情调”，则是从她的退稿中断章取义，并非基于书本身。

是威利·乔治安排了《韵律》的编辑同曼斯菲尔德小姐见面，她先寄去了一篇“神话故事”，这使他感到困惑，（也可能来自她具有“感伤情调”的那堆稿件），然而当她换上了《店中的女人》，一篇以新西兰偏僻地区为背景的血淋淋的谋杀故事时，他被深深地打动了，甚至连无暇顾及《韵律》的乔伊斯·卡里也承认自己有了一个新发现。默里开始热切地盼望与这令人激动不安的作者会面。

乔治把她描绘为一种有些令人生畏的神秘女人，她聪明异常，很难接近，但可以安排某种会面：他将邀请两人吃饭，他那吸烟斗的妻子为了庆祝她的书出版特地做了德式红莓汤，谈话转向一位名叫阿塞巴谢夫的俄国作家（默里对他的理想有些了解）。30年代默里发表了两种不同的有关那个晚上的回忆，以他那不可靠的记忆力为依据，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据他回忆，那次她“巧妙”地占了W.L.乔治的上风，而且一点也不令人生畏。她身着简朴的鸽灰色晚礼服，只戴着一朵花，一条灰色纱巾，“她下意识地把手握在一起，好像手心里捧着一些什么液体”，当乔治提倡“赤裸裸地描写”时，她却倾向于朴实。

这与以前或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事情都不尽相符，几年以后凯瑟琳才提倡“朴实”。这种说法表明默里的记忆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理想化了。在第二次会面以后，他曾问她是否愿意给《韵律》写些评论威尔斯、本涅特和萧伯纳的文章，“最好是带刺的欣赏”。

2月她从日内瓦写信给他说自己病了，被送出国，但不久她就回来了，同贝阿特丽斯一起呆在苏塞克斯，快速地写了一篇名为《激情的婚姻》的讽刺性故事，刊载在下期《新时代》上，是对资产阶级婚姻的嘲讽，以描写紫色床罩，粉红色灯罩以及客人走后的烦闷为铺垫。可能她父母从没有读过这篇故事，他们1912年3月8日就启程去了新西兰，没有同默里见过面，那时他也只见过她弟弟，而凯瑟琳在此次离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母亲。

《韵律》的第四期，1912年春季刊，登载了凯瑟琳的故事，还有两篇声称是俄文《波里斯·彼得罗斯基》的诗歌翻译。杂志预告说今后将每月出版，每期将刊载一个短篇故事，撰稿人有鲁珀特·布鲁克、W.L.乔治、霍尔布鲁克·杰克森、H.G.威尔斯和阿诺尔德·本涅特。

当然这是对奥列加的一种挑战，他猜测《韵律》既然派头很大，由昂贵的印刷所印制，必然有坚强的金钱资助。奥列加怎么样也猜不到萨德勒教授捐赠的50英镑是它的所有财产，也不知道默里的家境贫寒，只是认为如果他在牛津读书，又曾在巴黎评论过毕加索，肯定很有钱。

因此，3月28日，《新时代》开始大肆攻击“名为韵律的杂志”，整版刊登了由海斯汀斯写的未署名文章，几乎整期杂志都被说成“不是愚蠢疯狂就是庸俗不堪”，劳伦斯·宾扬头脑发热，那个法国撰稿人“心地肮脏”，

苏塞克斯，英国南部地区。——译注

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译注

劳伦斯·宾扬（1869～1943），英国诗人，艺术评论家。——译注

指前文提到的W.L.乔治。——译注

而 K. 曼斯菲尔德的文章则“同样肆意蔑视艺术准则，耕耘着现实主义的沙地，使人不能得到一点智慧或机智的享受”；她的诗作更糟糕：“曼斯菲尔德小姐放弃了她的盐碱洼地，诗的整整两节都疲软无力”。

几乎没有谁能猜到在下期《韵律》杂志上给予那样有力回击的 J.M. 默里年仅 22 岁，似乎奥列加在第二个回合中插了一手，防止再次一败涂地，下面一段话显然是他的风格：

任何人只要选择使生活成为艺术，而非痴人的梦幻，就必须找到坚硬的立足之地……我们建议年轻作家应像重视自己的健康一样重视美德，这是古老的真理，但如今往往被人遗忘。美德这个字眼像属于人的其他东西一样，因女人的误解而变得俗气，但所有寻求感觉的人仍记得其真正含义。讲究美德的年轻艺术家将为艺术而生存，以求跻身于优秀行列；他将履行艺术家的职责，回避使人误入歧途的影响，通过完成大而艰巨的任务来增强自己的能力，通过熟悉大人物的生活和工作来加强自己的信念，以此培养自己的性格而力求保证自己的作品永远健康。

这似乎是一种评论家的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个人味十足，奥列加是在用针对凯瑟琳的口气说话，指责《韵律》属于追求耸人听闻的人，“梦想着杀人的女巫，堕落的孩子……沉溺于浮浅的感觉，直至河流本身流淌着性的狂欢。”这些东西过于女性化，能毁灭人的心智。20 年来，德国人在这些肮脏的水中玩耍，现在则在里面沐浴，而《韵律》的编辑正在“往我们身上泼溅着欧洲大陆的脏水”。

默里和凯瑟琳确实注意到了《新时代》对他们的攻击，但这些纸上谈兵与在克洛夫利大楼发生的事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凯瑟琳蹲在竹席上，用大酒杯盛茶，杰克·默里诉说着自己的困境：牛津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同那些贵族子弟格格不入，在 6 月他甚至连学期作业——他们的期末考试——也不愿意写。他想退学，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韵律》，此杂志肯定能获得成功。凯瑟琳表示赞同。

4 月的第一个星期，福克斯把默里带到斯彭德的办公室，斯彭德答应给他一些工作——大约 5 英镑一星期——只要他继续学业。他立刻去告诉凯瑟琳自己“找到了工作”，4 月 6 日，也就是“复活节前夕”，凯瑟琳在和奥顿共用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的告别辞：

威廉：

亲爱的，夜晚像河水似地流逝了，流逝了，夜黑暗，温暖。

不久前我的生活充满悲哀——骚动而不真实。你知道当我俩试图使自己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对现实的荒谬的不真实感觉，那种压倒我们的恐惧和痛苦……前不久我感到自己又聋又瞎，非常害怕，但现在我非常幸福，这儿我找到了自己的家……我的房间向我倾诉它们的秘密，展示它们黑暗的最深处。我独自在里面徘徊，微笑着，一条丝巾裹着我的身体，脚上穿着拖鞋。我躺在地板上吸烟，一边倾听着……

几天以后，默里和凯瑟琳同默里在牛津的一位朋友、《韵律》杂志的撰稿人弗雷德里克·古德伊尔一起吃饭。弗雷德里克一直很想见到这位了不起的讽刺家，过去两年里，他对她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作品赞叹不已。古德伊尔有着一头卷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也像杰克·默里一样，使牛津的指导教师感到头疼——他坚持什么书都看，就是不看指定该读的书——但人们认为他很有才干。凯瑟琳非常喜欢他。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有的煤炭商人），常用特殊的方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善于模仿，笑起来带着古怪的喉音，他用这些来掩盖自己敏锐的才智，——这在以后的交往中往往显露出来——这些都使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想起霍恩赛街的“老爸爸”。事实上，古德伊尔很羡慕朋友交了好运，遇上了这么一位他自己也会喜欢的了不起的年轻妇女。他有次几乎想写信告诉她自己多么钦佩她的才干，但终因过于羞怯而没这么做。

离别的时候到了。一个温暖的春天的夜晚，在皮卡迪利广场上，默里说他要去找一个每周租金 10 先令的房间，凯瑟琳说她有一个建议：7 先令 6 便士租下她的前厅是否太贵？可怜的古德伊尔！

因此 1912 年复活节后不久，默里成了凯瑟琳的房客。埃达帮着她把钢琴搬走了，窗边的桌上放了一瓶柳絮，下面压着埃达给的 5 英镑。当他来到时，凯瑟琳穿好了衣服正要出门，给了他钥匙，让他自己去写给《威斯敏斯特》的文章——每篇文章的稿费正好偿付每周的租金。

埃达突然之间被排除在凯的生活之外，因为男性的因素占了永久的上风，她伤心地离开了，也许有点后悔那 5 个英镑，但还是私下写了一首诗安慰自己。两个月后，她和朋友古德小姐合开了一家美容店，这是后来两年她的职业。

杰克和凯瑟琳各自过了几个星期，只在工作于完后才见面，半夜时分，他们坐在地板上用酒杯喝茶，认真地聊天，上床睡觉前总握手告别：“晚安，默里”——“晚安，曼斯菲尔德”。迈克尔·萨德勒发现自己是曼斯菲尔德这女人认为应该受到轻视的那种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于是倒向了另一边，J.M. 肯尼迪不再登门。凯瑟琳成为《韵律》的副主编，默里仍从《威斯敏斯特》挣他的每周 5 英镑，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此时圣·卡特林出版社的股东们却告诉他《韵律》杂志负债累累。他轻信地接受了他们关于印刷多少份杂志的建议（每期 3000 份），而统计数字表明只售出不到六分之一。是默里订下的，当然得由他付款，而此时又已向读者宣布杂志将改为月刊。

他们现在又为自尊心所困阻，奥列加出于对肯尼迪的忠诚，要求凯瑟琳作出选择：《韵律》或是《新时代》。她作了选择，萨德勒被撵了出来，不可能从里兹那儿再得到帮助，但是让杂志此时倒闭也是不可想象的。默里每星期能提供 5 英镑，凯瑟琳也能提供 2 英镑。杂志每周亏损 5 英镑，但总能对付下去。

默里有次进述这一切，似乎他和凯瑟琳是两个可怜的身不果腹的林中孩子：他们靠廉价的肉馅饼度日，再加上几便士的面包和土豆，再去约克公爵酒店（1912 年，啤酒一便士一品脱），那儿的老板娘以为他们是倒霉的音乐厅歌手，因而给他们免费提供饮料。默里一辈子都很看重钱财，总以为自己手头拮据，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1912 年，他们每周有 10 英镑，算是相当

此处指奥列加，因其来自里兹地区。——译注

富裕了，而寓所只需一英镑，虽然《韵律》使他们“贫穷”，但也没有必要去酒吧接受施舍。

在他们那握手互道晚安的阶段，默里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告诉凯瑟琳有关玛格丽特的故事，讲了他如何同乔伊斯·卡里一起去牛津外面的一个妓院，结果染上了淋病，他后来认为“堕入情网是一种错误”：当玛格丽特使自己成为他的情妇时，不知怎么就“毁坏了一切”。一天晚上，凯瑟琳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你的情妇？”但此时默里正仰面躺在地板上，摇晃着双腿，说“我觉得那会毁了——一切”。至于他们后来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默里在《处在两个世界间》中作了悲剧性的描述，而凯瑟琳讲给一位熟人听的却是喜剧性的。

默里说，一天晚上在酒吧，他们俩凑巧同时在镜中看见一个名叫丽特的妓女的身影，她正在得意洋洋地打量自己。在此背景下，他说，他们应该结合在一起——永远。那晚上他们“躺在彼此的怀抱中”。凯瑟琳的不是那么浪漫的叙述结尾时说道：“于是我们上了这张床，笑着，笑着，不停地笑着，从那以后就总是睡在一起了。”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件事可能发生在5月间。

在春天那个月的3号，在诺丁汉，弗丽达·威克利太太同她丈夫大的学生D.H.劳伦斯私奔了。6月2日，在布卢姆斯伯里，维吉尼亚·斯蒂芬宣布她同伦纳德·吴尔夫先生订婚。在5月号的《新时代》杂志上，奥列加躲在一篇小说的隐蔽后面，用笔名“R.H.朗格里夫”开始对凯瑟琳进行人身攻击。这篇道德寓言连续刊载了整整6个星期，最后指责她“思想、情趣、判断和智力方面的杂乱”。这个故事其实是分好几年发表的《男人读的故事》连续集中的一篇，奥列加试图借其来说明女人对男人心智的毁灭性影响，表露了他自己最为保守的男性态度，同时却又试图描绘究竟是什么使她的作品与众不同。这也是关于凯瑟琳在《新时代》投稿那一阶段的唯一的全面记述——她的面具，她的诡计，她具有波希米亚风味装饰的寓所，她有关文学的闲聊以及她应付男人的种种小伎俩，这些男人她放在不同的位置。文章中随处都不怀好意地影射到凯瑟琳，同时，它那咬牙切齿的威胁口吻也提醒那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女人什么危险在等待着她们，如果她们竟敢将自己的本性和野心暴露在1912年的男性文学世界的话，将会冒什么样的风险。

故事中有三个角色：康格里夫（奥列加），一位名叫特里梅恩（肯尼迪）的政治科学家，还有一位特里梅恩想要教育的寡妇玛霞·费沙克太太；故事结局是她为了“那个自命不凡的斯托耐尔，那个小剧作家”而抛弃了特里梅恩。

故事开始时特里梅恩告诉康格里夫说玛霞死去的丈夫很野蛮，她现在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并不热衷于谈论此问题，而是非常冷静有理智——再也没有什么性的欲望，她现在一心一意考虑学问。特里梅恩指导她读书，“每天给她写很长的信，她也同样写些长长的回信。”“她的情趣很不稳定，也相当杂乱，例如，她喜欢惠特曼，而同时又热爱密尔顿，她认为斯温伯恩是雪莱以后最伟大的诗人。”

“她的天才很难确定，”特里梅恩说，“那样飘渺，难以捉摸，她具有

诺丁汉，英国东部城市，D.H.劳伦斯的家乡。——译注

密尔顿（1608～1674），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诗人，政论家。——译注

非凡的讽刺才能。她的信中尽是信手拈来的对人和地方的描绘，她似乎可以吸收某种气氛，再用一句话将其重现。”

康格里夫则告诉特里梅恩他在费沙太太那儿见到了“最难以解决的杂乱问题”，她结婚过早本身就是早熟而不是对性生活不感兴趣的标志。她多变，能够很快换上各种保护性面具。在特里梅恩面前，她戴着讽刺的面具——“但我可以猜测在其他的圈子内，她也同样坚决地诅咒讽刺。”

特里梅恩带着康格里夫去见这位女士。她的房间布置奇特，似乎每一不见经传的小诗人的作品都在这儿的装饰中占了一席之地；墙上是法国印象派的糟粕——一些鬼呀，男人女人的身体画得像蔬菜一样……地上铺着竹席，中间有一个靠水泵启动的泥制喷泉，还有一架钢琴；一堆无靠背长沙发。

他们坐在那儿谈论斯温伯恩和惠特曼，特里梅恩想让康格里夫欣赏她的才智：“我总认为玛霞可以写一个剧本，她的对话很快，人物性格描述又一针见血，但她的随笔故事则只是简介性的，在这上面她花费了太少时间来显示自己的才能，她需要更大的画布。”

此时一位年轻人来敲门，在前厅里低声说话，但玛霞回来时脸上带着完全若无其事的表情（装出观音菩萨的态度是她最拿手的），对他只字不提。玛霞巧妙地提到门边的一只包裹，说要去看望一位姐姐，就这样打发走了客人。

然而坐在窗边的康格里夫此时已注意到了“那个自命不凡的斯托耐尔”就在下面的街上。——“那你刚才到底为什么不告诉我？”特里梅恩问，而康格里夫说：“就算没有斯托耐尔，坐了一个下午，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费沙太太不过是个空皮囊，像兔子一样杂乱，像水泡一样不负责任，像猫一样狡猾，你自己去想想吧。”

很久以后奥列加回忆说这个故事影射凯瑟琳的地方确实使她感到受了伤害。但到了1921年，《幸福》刚刚发表，受到狂热的吹捧，她受到感动，给奥列加写信，说道：“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了我思索——谢谢你所给的一切。”

默里显然从一开始遇见凯瑟琳时就把她理想化了，“她一举一动都很朴实可爱。自始至终凯瑟琳在我眼里都是极其优雅的人物，我从没想过要去批评她。”如果这是在经过伦敦那充满痛苦的三年后她所找到的东西，那她确实是很幸运的。同默里在一起，她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她自己”。

这是新的开端，但是如何面对默里的考试，他的父母亲、《韵律》的开支以及克洛夫利大楼体面居民们对他们的侧目而视呢？为了应付他的考试，他们全力以赴，同一位新朋友戈登·坎贝尔在野猪山呆了一星期，结果是勉强拿了个二等。

把G.C.波登太太带回默里家则要困难得多，家中曾经对年轻的杰克寄予太多的希望，如今却是这样。在前厅里似乎有“一层冰幕”，默里唯一的弟弟只有9岁，被这种紧张气氛吓呆了。两星期后，默里的母亲和姨母来到寓所，歇斯底里大发作，只有硬把她们推出房门。“走吧，你们女人，走吧！”默里嚷道。后来他有三年没有见过家里的人，现在他们两人都被逐出家门，两人都有自己非常喜爱的弟弟。

关于《韵律》杂志，凯瑟琳有个绝妙的主意，她去找斯蒂芬·斯威夫特，建议他接收这份刊物，一定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天才，更多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书籍”的作家，他立刻同意了，当然没有立下什么凭证，但他建议他们担任编辑，月薪为10英镑，还给了他们一张支票预付4个月的薪金，他们当然高兴地接受了。

至于两人这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如果不能结婚，至少可以出去度蜜月，在巴黎呆几天，让弗格森给他们祝福，让弗朗西斯·卡尔科认识凯瑟琳，他肯定会注意到凯会抱歉地说：“我不会说法语。”接着，他们可以在乡下找一个村舍住下。

默里在《处在两个世界间》中说如果凯瑟琳是自由的话，他们就会立即结婚，但“凯瑟琳的丈夫拒绝起诉，仅仅开了个头就放弃了”。说“拒绝”并非真话，6年的耽搁其实是凯瑟琳恶作剧地蔑视中产阶级清规戒律的结果。

听说他们同居，波登先生径自来到寓所，问凯瑟琳有什么打算。他后来写道：“对于任何可以使她再次结婚而必要的程序她似乎漠不关心，至少当时是这样。离开时我当着默里的面问她——半开玩笑地——他俩是否想结婚，她好玩似地看看他，大概说了声，“我们想吗？J.M.？”

接着，凯瑟琳想到了美国式的离婚——波登先生可借此去美国。她写信给他谈这事（“我想这对于我俩都是最聪明的方法”），又独自一人去找他，再次显示了“我曾经注意过的外表的变换，表露了我从未见过的性格的另一个方面。”但他们发现此种离婚判决在英国不生效。

在英格兰可以由一方就另一方私通提出起诉，由几人出庭作证，另一方不加辩护。波登先生认为如果要离婚就该由他起诉，他觉得她“并不讨厌同默里一起生活——这意味着乔治·爱略特和乔治·桑式的浪漫文学传统——却惧怕在当时的伦敦这样一种不辩护的起诉中处于被告的耻辱地位。”

然而凯瑟琳想让波登先生去美国的计划却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忙，第二年他真的去了那儿，开始了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太平洋神学院教授“演讲噪音运用”，在那儿这还是一项新课目。但是他一心忙于工作，忘了继续办完离开伦敦前开始的必要程序。曾经讲好她会给他写信，但他从未收到过她的来信，从1912年开始，他对她的生活详情一点都不了解，直到它们尽人皆知。有次他写道：“离开这么远，甚至感觉不到一点恼火。我仍然觉得凯瑟琳对我展示了她那多重性格中迷人的一面。”他后来的妻子有一次说，“我觉得乔治是那群人中唯一的绅士。”

到了1912年，杰克和凯瑟琳成为有名的“二虎”。小说家吉尔伯特·迦南很喜欢《韵律》第一朗上刊载的一幅木刻，画的是一只老虎窥视一只猴子，因而给他们取了这名字，他们自己也用这名字互相称呼。杰克后来叫凯瑟琳“梯格”，最后变成了“韦格”。第一个听见使用这名字的是年轻的爱尔兰律师戈登·坎贝尔，他在威利·乔治家遇见过凯瑟琳。他第三次或第四次来拜访时同她单独呆了一会儿，听见她招呼“老虎，你可以出来了”，从另一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同当时著名批评家J.H.刘易斯同居。——译注

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女作家。——译注

吉尔伯特·迦南（1884～1955），英国作家。——译注

均从“老虎”的英文发音tiger演化而来。——译注

房间出来一位身着海军蓝运动装的瘦个子，他猜测自己可能通过了某种测验，可以正式介绍了。事实上不久他就更多地成为杰克的客人了。

他有次说，曼斯菲尔德总是扮演某种角色，也许她把真正的自我写进书中去了，但是默里像他一样也在探索“文学”，从中产生了一种友谊，而她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他认为她从不能真正爱上一个男人，因为她心里总有那么一部分高出自己之上，观察着发生的一切。

6月，狄亚季洛夫芭蕾舞团来到伦敦，一时间人们纷纷崇尚俄国的东西，布卢姆斯伯里也加入了这二行列，奥特琳·莫瑞尔夫人招待了尼金斯基，也许两个老虎有钱了，可以进美术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终于被译成英语——显然是受了阿诺尔德·本涅特的怂恿，他曾经在《新时代》的专栏中催促过此事，其他的期刊现在也在翻译俄国短篇小说。凯瑟琳巧妙地模仿俄国人的手法写了一篇小说，可能早就寄给《新时代》，但一直按着未发，直到7月4日才刊载出来，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过分的攻击，以后《新时代》再也没有发表过凯瑟琳的作品，直到1915年，她才出其不意地又寄来了一篇讽刺作品。

离开桑顿，离开女子茶会、慈善集市和绿色丝绸已经4年了；离开精巧的紫罗兰色三明治，离开伍德女士和蒙着眼罩的猪，离开在利特尔顿的雨中的分别也有4年了，此时比切姆小姐最需要的是一个家。对于两个“老虎”来说，创办《韵律》的目的之一是能够藉此离开原来的处境，得到承认和生活安宁——不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那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而是一个人应得的。然而这种冒险却奇怪地吸引了两位已有这些东西的朋友以及其他一无所有的人。危险和帮助不依不饶地同时来敲着大门。

1912年春天，在德国度假时，鲁珀特·布鲁克收到了《韵律》总编的一封信，邀请他撰稿，他最近刚写了最有名的一首诗，不久就将成为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成员。8月份从伦敦回来后，他住在爱德华·马什那儿，后者是海军部温斯顿·邱吉尔的私人秘书，因为有些钱，又是诗人和画家的保护人。克洛夫利大楼就在附近，布鲁克来拜访——“我想大概是来探听情况的，”默里说。见到两个“老虎”相处极为融洽，他邀请他们去索荷吃饭，让马什也能同他们会面。一开始他们有些怕他——他来自另一世界——但是他却喜欢上了他俩（布鲁克并未沾什么光），这样，埃迪·马什成为《韵律》最好的朋友和最慷慨的帮助者。

他俩仍然渴望着在乡下的农舍；这时另一个年轻艺术家来看他们，这次来的是亨利·戈蒂叶-布尔沙卡，他送了他们一些自己作的动物画，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久他又来了，带着他的“姐姐”。波克和苏菲是两个危险人物，一个20岁，另一个将近40岁，既不是亲姐弟，也非人们通常说的那种情侣。

戈蒂叶无疑有天才，非常敏感，是个法国人——瘦小狡猾，长着一双豹

狄亚季洛夫（1872～1929），俄国芭蕾舞主持人、艺术批评家。——译注

尼金斯基（1890～1950），俄国芭蕾舞家。——译注

爱德华·马什（1872～1953），英国作家，著有《乔治派诗人》一书。——译注

索荷，伦敦一街区。——译注

亨利·戈蒂叶-布尔沙卡（1891～1915），法国雕塑家。——译注

彼克，即戈蒂叶-布尔沙卡。——译注

眼，据理查德·阿尔丁顿和埃兹拉·庞德说，他身上还有一股臭味。反复无常的苏菲·布尔沙卡出生于克拉科夫，是她使戈蒂叶将两人名字连在一起，使他所有的作品都与她的名字相连。

彼克第一次访问两个“老虎”时，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他亲切地抚摸默里绝妙的脑袋，想要画下它。第二次拜访时，大家互诉衷肠，讲了关于两个“老虎”如何上了床，不停地笑着、笑着的滑稽故事。知道默里两人正在找一所农舍，那太好了，彼克和苏菲可以去度周末。他们在齐彻斯特附近的兰克顿找了一所漂亮的小屋，每年只需40英镑。“这是我们的地方，很可爱，”凯瑟琳说，她站在饭厅里，头放在杰克肩上。他们签了一份三年的租约，也许戈蒂叶们要来会觉得太远了些？他们也许会付不起车钱！天哪，不。“那样更好！”彼克说，苏菲可以来同他们住在一起——这有利于她的健康——他有空就可以来。

“但这是我们的房子，”凯瑟琳发愁地嚷道：“我们结婚的新房。”讨厌的桑顿和它那传统的习俗远在12000英里之外，他们倾诉了更多的秘密，苏菲感到同凯瑟琳在一起可以放心地无所顾忌，毫无保留他讲述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当她“展示灵魂的深处”时，亲切地紧握住凯瑟琳的手，不一会就听见说“老虎宝贝，我们要走了。”苏菲知道了自己不讨人欢喜。

几天以后，杰克写了一封短信问彼克他是否愿意不带苏菲，自己一人来寓所，既然他“仍然爱着米德尔顿·默里”，他来了，但发现凯瑟琳怀疑他是同性恋者。她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有“特别的渴望”（例如抚摸脑袋）。他告诉苏菲自己为默里感到遗憾，他爱得太多，几乎被“挤干了”。总而言之，那是8月，天气炎热，戈蒂叶又“有股臭味”，但一贯审慎的默里从未有一字提到过此事。

1912年9月4日，两个“老虎”搬入了兰克顿别墅。默里每年从《威斯敏斯特》收入250英镑，凯瑟琳从父亲那儿拿到100英镑，编辑《韵律》又从斯蒂芬·斯威夫特那儿每月拿到10英镑，这样算起来他们两人每年就有450英镑——这是那时很大的一笔收入，而房租费只需花去40英镑，他们稳稳进入了职业阶层。在工人阶层，一家人每周只靠25先令度日；女话务员一开始每周只挣11先令。J.B.普里斯特利的父亲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小学校长，每年收入350英镑。在此时的英格兰，奥列加（每年收入208英镑）仅靠出版商微薄的收入就能维持《新时代》的发行。因此，“老虎们”要住在兰克顿从经济上来说并不过分。他们分期购买家具，将大钢琴，他们的书和菩萨像全都搬来；凯瑟琳请了一个老兵做仆人，为“兰克顿别墅”印制了一些信笺，所有这些本身并不过分，但对于《韵律》杂志，对于斯蒂芬·斯威夫特来说，他们生活在梦幻中。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痛苦的事情，至少消除了苏菲造成的威胁。戈蒂叶来看这别墅，因为路费不够，最后还走了好几英里，精疲力尽地来到这儿，不幸又恰好听见凯瑟琳（她正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安装窗帘）告诉杰克为什么她不喜欢苏菲住在那儿，戈蒂叶没让他们看见就躲开了。从此以后，他成为他们最恶毒的敌人。整个事件似乎是一种模式——其中的相似之处令人惊奇

理查德·阿尔丁顿（1892～1962），英国作家。——译注

齐彻斯特，伦敦郊外。——译注

J.B.普里斯特利（1894～1986），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译注

——即不久以后同 D.H. 劳伦斯和他那咄咄逼人的妻子之间的友谊的预演。

埃迪·马什来乡间度过一个周末，弗雷德里克·古德伊尔“吵吵嚷嚷，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同鲁珀特·布鲁克一起在别墅会面，4 个人越过沼泽地带，齐声唱着古德伊尔作的许多歌曲。《英语评论》的人亲自前来表达敬意，因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维奥莱特·亨特就住在附近（两人也婚外同居）。埃达也来了，看见她的观音像放在花园里。《韵律》的销售已经好转，黄金时代！

但是默里说，此时一种奇怪的危险感开始侵入他们可爱的房子，似乎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随时可以拆除的舞台布置。他们渴望有个孩子，但又苦恼地预感到“他不能生育。黄昏将近时分，在窗前，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能看见凯瑟琳双眼泪水盈眶”。

这时过去的一个人物出现了。“凯瑟琳的一位斯拉夫朋友突然来到英格兰，身无分文，来找我们，带着两个装满了书和手稿的黑色大箱子，因为他是位作家。”索比尼欧斯基侵入了他们结婚的新房，成为他们精神上、经济上的负担。他总是向他们“借款”；秋天的夜晚，房子内总是回荡着他凄凉的歌声，他们重又感到那威胁着“所有具有人性和可爱的东西”的压力。

更为突然的是默里被急电召往伦敦，凯瑟琳同他一起去，听说她的出版商“斯蒂芬·斯威夫特”潜逃了，留下侵吞财物、重婚、欺诈等一连串罪行。印刷商也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更改印刷的通知，印刷量实际上已增加了，因为杂志订阅情况已有好转，但是斯威夫特（他的真名原来是哈斯肯）却以默里的名义作了更改，现在同路易斯·哈杰斯一起携款而逃，给默里留下了所有的债务，他欠了圣·卡特林出版社 150 英镑，这次灾难严重地影响了默里以后 6 年的经济自由。

查理·哈斯肯，化名查理·格伦维尔，有些出版社的书目预告称其为“英国的托尔斯泰”。1905 年 11 月，他以“亨利·查洛斯·詹姆斯”的身份同爱米丽·艾莎·帕克订婚，但是在举行婚礼那天，他在她家“喝了一些”，头脑随即一片空白，下午就离开了，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三年以后，他又以“查理·格伦维尔”的身份娶了夏洛林·福赛特。

1912 年，他成为“斯蒂芬·斯威夫特”，有着长长一张新书预告目录，希莱尔·贝洛，麦克斯·皮尔波姆，埃兹拉·庞德和亚瑟·兰森都是他的作者。但是同时扮演詹姆斯和斯威夫特，还加上“托尔斯泰”等角色显然使他感到压力过重。1912 年 9 月 29 日，他去找他的医生，他已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这是医生后来告诉法庭的。医生建议他放弃自己的事务出国去，他当然立刻照办。这次用了戈德温这个名字，“由一位年轻女士陪伴”。他 10 月 28 日在丹吉尔被捕，被指控犯有重婚欺诈罪。

1913 年 7 月 2 日，他以欺诈 2000 英镑被判罪，出庭受审时，有一位证人就是奥列加。奥列加告诉法庭他名声很好，“人们都知道他是英国的托尔斯泰”。他被判监禁 15 个月，释放后，埃兹拉·庞德还给了他一张 5 英镑的钞票。

此时凯瑟琳·曼斯菲尔还不知道自己有病，不能生育。——原注

麦克斯·皮尔波姆（1872 ~ 1956），英国作家，以其讽刺作品闻名。——译注

亚瑟·兰森（1884 ~ 1967），英国作家。——译注

摩洛哥古城，非洲距欧洲最近的港口之一。——译注

1912 年 10 月，“老虎们”回到了兰克顿，发现他们那位老兵仆人用偷来的值钱的东西换酒，喝得酩酊大醉，让他们几乎感到如释重负，又十分好笑。“噢，滚吧，”他们说，“不要再到我们这儿来。”索比尼欧斯基在起居室跳来跳去，“似乎在痛苦地搜寻着解决我们困境的方法”，唱着自己那些悲伤的歌。他们给了他一些钱维持生活，准备离开别墅，房租他们从来没付过。默里告诉印刷商他认为债不是他欠的，他又写信让商店收回家具。印刷商派来了一个戴着礼帽和黄手套的人，他靠着凯瑟琳的大钢琴，带着一脸独一无二、难以描述的熟悉表情。不知怎么回事，观音像倒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切，它并没有留在花园里，而是跟着“老虎们”进了他们下一个居所。

《蓝色评论》

这是一份愚蠢的报纸，但办报的人倒挺不错。

——D.H. 劳伦斯

她能写，这该死的女人。

——鲁珀特·布鲁克

《铁圈球杂志》每期刊载一个菲尔森·扬撰写的栏目，标题为《事关紧要》，此栏目用斜体字印刷，以区别于杂乱的新闻。1912年10月23日，《事关紧要》栏目是一篇小小的神话，开始是这样的：“从前有位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彼此相爱，而且两人都爱诗，因此决定把毕生精力都用于改善和鼓励英国诗歌——特别是像他们一样不知名的年轻作家的诗作……”

故事描述了他们怎样创立一份杂志，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时间，在“永久艺术的崇高理想境界”找到了自己的欢乐。但是此时“他们彩虹般的桥梁（此处指出版商）却在他们脚下坍塌了”。他们欠了印刷商150镑，除了青春这易逝的本钱外不名一文。菲尔森·扬说如果读者订购一年的《韵律》杂志，他们的轻舟就能荡漾起来。

这个对“老虎们”的小小一击受到埃迪·马什的鼓励，他将其寄往兰克顿，并希望他们“不介意”。——一点也不，——“你是个可爱的宝贝”，杰克·默里模仿埃迪的语气写道：“我们觉得他太可爱了。”这可能是《韵律》的资助者们所采取的旨在使小舟荡漾的一系列行动中最无成效的一次。令人惊讶的是，杂志以《韵律》的名字仍然维持了5期，以后又以《蓝色评论》的名字维持了3期。

仅仅依靠“老虎”的自尊并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还有另一位出版商愿意帮忙——因为格伦维尔逃跑时，帐目表明有些小小的收益——年轻人选择《韵律》是因为《英语评论》过于殷实富有，有着哈代，詹姆斯，康拉德和威尔斯等人为其写作，《韵律》的撰稿者们情愿无偿写作，希望将来能受到注意，也就是说“收益”从字面上来讲是虚构的——指的只是他们的作品。

破产以后默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同印刷商们拖延时间。他们断定他肯定有钱，以为只要紧逼不放，就能得到一切。J.A.斯彭德劝他申请宣告破产，因为确实是格伦维尔欠下的债，法庭可以弄清这一点。这个建议很正确，但也许新西兰银行总裁的女儿却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性，结果是安排让她把自己的生活津贴作抵押来偿还欠印刷商的债款。第二个步骤也是她采取的：她去拜访占尔伯特·迦南的出版商萨克，杰克写信来说：“‘老虎’觉得萨克关于《韵律》的作法很可爱，我想他会接手出版的事情，会竭力做好的。”

威利·乔治计划用500英镑作为资金开办一家公司，结果没有成功，到了11月中旬，“老虎们”只好在彻恩斯里路57号（奥列加住在59号）的一个阴暗的寓所内工作和居仕，6位朋友每人凑了10个英镑让他们度过11月。

在这倒霉的时候，凯瑟琳还是写出了一篇新的故事——是为弗兰克·哈

哈代（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译注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原籍波兰。——译注

彻恩斯里路，伦敦地名。——译注

里斯写的，他最近掌管了一家专讲时尚和皇家生活的杂志《温暖的家》。故事名为《房子》，同她后来写的以伦敦为背景的小故事有些相似，但有种奇怪的自传性质，与她希望能有个孩子，而索比尼欧斯基出现在那个时候有关。

故事中疲惫不堪的勤杂女工在一个待售的空房子前廊避雨，她和自己的恋人最近来看过这所房子。在那儿睡着以后，她梦见自己在房子里举行了美妙的婚礼——快乐英俊的丈夫，一个男孩和一个保姆，木柴烧的炉火和烤好的小面包——但是美梦变成了梦魇。她听见楼下一个声音在叫唤，是过去一个情人的声音，“他在那儿干什么？——是的，是他的声音，她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崩溃了——她连嘴唇都发白了……”

她“嘴唇发白”地冲下去阻止他进来，前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了，来倒垃圾的人发现她死在前廊上：“我记得很清楚她的脸，昨天她同一个年轻人一起来看过这个房子……他走了以后，她又回来，笑着说，‘我们的钱还不够装饰房子，我们只是做做梦而已’。”

与此恰恰相反的，是《韵律》上发表的她写的三个新西兰谋杀故事，它们是对新西兰，尤其是边远地区常见的社会隔离状态的剖析，而且故事是作者在完全的文化隔离背景下写的：没有哪个在伦敦读过这些故事的人能知道事实上说的是什么。《店里的女人》是写边远地区的黄发女巫婆，她一天到晚备着一枝装满子弹的枪防范生人，几乎像石头、山峦和灯光一样，成为那地区景色的一部分。奥尔·安德伍德是个眼光凶蛮的殖民地酒吧的流浪汉，完全受制于环境的影响，几乎处于疯狂状态。米莉则是一个没有子女的边远地区女人，深切同情一个精疲力竭的逃犯，当人们开始追捕逃犯时，她的同情变成了嗜血的欲望，这一切也像她那所房子里骇人听闻的事件一样属于这个地方。

《新时代》认为这些故事代表了“大陆”对美的原则的歪曲，与此相反，事实上那时只有一个新西兰人才能写出这种东西。在刊载了《房子》同一期的《温暖的家》中，还有修·金斯米尔和埃尼亚·巴诺德写的有关默里和凯瑟琳的文章，前者把默里描写成一位年轻的实质评论家，叙述了《韵律》的出版商如何逃跑，留下“老虎们”负债累累。这些话出现在格伦维尔被捕后仅仅一个月，对于他忠心耿耿的朋友奥列加和贝阿特丽斯·海斯汀斯来说太过分了。

《新时代》对此的回答是署名“TKL”的一段话：

你们成为一窝蟋蟀，蜂拥在《温暖的家》上的一群蟋蟀，或者是耗子。船长已下船了，船呢？——瞭望员，船怎样了？的确，船长像那样地弃船而逃真令人讨厌，但是说实话，他真那样坏吗？难道没有一点食物留给小耗子吃吗？那些靠他养活的人怎么办呢？

文章接着问谁被《铁圈球杂志》给蒙骗住了，当然没人不在乎恋爱中的女士——“只有汉诺威广场才会去考虑到法律上的无效——也许这个玩笑不太合适。当然我不该公开提到这件事，但我的确极其讨厌耗子。”同期还刊载

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爱尔兰新闻记者，作家，作品有《王尔德传》等，他主编过不少杂志，最主要的是《星期六评论》。——译注

汉诺威广场，伦敦当时名人们结婚的地方。——原注

了另一有关凯瑟琳的语气更为激烈的署名文章，标题为《善变者》。奥列加也感到这太过分了，几个月以后，他免去了海斯汀斯太太杂志文学评论的职务，自己开辟了一个专栏，“读者和作者”。第二年他们分手了，她去巴黎居住。关于耗子的文章几乎不能伤害到“老虎们”，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慷慨的资助源源而来，他们讨论使《韵律》站稳脚跟——改换名称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据马什说，《韵律》这个字眼对于书摊上的东西来说太过分了）。

马什刚刚成功地发表了《乔治派诗人》的第一卷，销售相当好，当默里需要保证人以便能借贷 100 英镑作为《韵律》的资金时，马什立刻答应了。默里告诉他，“你担保保证我们三年中每月将偿还 3.16 英镑，你知道我们会的。”

当艺术家格温·拉沃拉特告诉鲁珀特·布鲁克她痛恨《韵律》杂志时，他为之辩解道：“当然，它很现代化，完全是由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能干的年轻人办的。”新出名的作家 D.H. 劳伦斯虽然刚同自己教授的妻子私奔到意大利，急需挣钱，也写信来表示同意无偿为《韵律》写一篇故事——虽然杂志有些疯狂，但人却相当好。

默里接着又试图说服修·沃波尔，不久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谈到撰稿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了一些新的宏伟计划。在极其热烈理智的气氛中，约 16 名青年艺术家宣誓忠于杂志，他们将无偿撰稿，默里将支付每月 10 英镑的损失，到年终如果能收益 15~20 英镑时，将按各人工作量分配。近 64 页的杂志一半将刊载诗、短篇小说、评论文章等等，其他篇幅将由吉尔伯特·迦南评论一般书籍，D.H. 劳伦斯评论德语作品，默里评论法语书，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竟然评论“服装”，这肯定是她不在场时，由全体男士决定的。

鲁珀特·布鲁克、沃特·德·拉·马尔、W.H. 戴维斯等每年也会撰稿两三次，所有这些人都对计划很感兴趣，还有两个人有待接近——奥利维·阿宁斯和 M.E. 福斯特，默里请沃波尔去说服福斯特（“他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之一”），就这样，1913 年 5 月《蓝色评论》由马丁·萨克出版社发行，卷首刊载了麦克斯·皮尔波姆的《论怀疑》，还刊登了劳伦斯的《玷污的玫瑰》和凯瑟琳的故事。

吉尔伯特·迦南亲身体验了他们在彻恩斯里路办公兼寓所的阴暗滋味，那儿电灯必须整天开着，凯瑟琳的一只金丝雀也死了，她写的关于特罗维尔的小说也完成不了。吉尔伯特建议他俩在他位于柯尔斯伯里 的磨坊附近找一个别墅，春天他俩果然搬去了，或者说凯瑟琳一人搬去了，带了一些曾经属于埃达母亲的旧家具，默里去那儿度周末。结果是凯瑟琳写的信让我们可以对他们那时的生活略知一二，这些信比默里写的生动有趣得多。

整个《蓝色评论》阶段虽然短暂，收效甚微，但仍然标志着默里夫妇合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这使他们与布鲁姆斯伯里首次相遇；也标志着两人同斯拉夫人那暴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的结束，这种关系属于他们早期的生活。

乔治派诗人，指的是英王乔治五世在位前期（1910~1920）著名的诗人。——译注

修·沃波尔（1884~194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黑暗的森林》等。——译注

沃特·德·拉·马尔（1873~1956），英国诗人。——译注

W.H. 戴维斯（1871~1940），英国威尔士抒情作家。——译注

奥利维·阿宁斯（1873~1961），英国作家。——译注

柯尔斯伯里，伦敦郊外地名。——译注

一大，默里去凯瑟琳的远亲西德尼·沃特罗家，“去见见这些吴尔夫们”。他写信告诉凯瑟琳：“我并不觉得他们怎样，他们属于那种完全无能的剑桥人。”

戈蒂叶和乔治·班克斯来彻恩斯里街拜访，那两人最近合起来发泄对“老虎们”的痛恨，主要是受了苏菲的怂恿。他们出其不意地来访，一进门就暴跳如雷——戈蒂叶要求为《韵律》上刊载的画付稿酬，班克斯则来要回一些凯瑟琳已经带到柯尔斯伯里去了的画。默里挨了几耳光，墙上的画也被撕了下来，两人走时还咬牙切齿地说：“这只是开头。”他们在城里到处扬言说要“砸碎默里的脑袋”，但这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一下：戈蒂叶和他的朋友把米德尔顿·默里那神一样的头颅模型按在墙上，心满意足地扔了一顾砖块将它砸得粉碎。

同一个星期，索比尼欧斯基也来了，他欠了他俩的钱，现在凯瑟琳称他为“相当危险的骗子”。他似乎被摆脱了，至少在接下来的6年中，就这样结束了她生活中这段与波兰人交往的危险经历——人们可以从窥见忤逆的凯瑟琳却往往易于受到异性的欺诈，这也是她小说中许多女人常常遭到的命运。

到了仲夏时分，默里不得不绝望地告诉马什和沃波尔杂志销售低于800镑，每月损失达15镑。“划时代的短篇小说”并未出现，“当代英国艺术天才们送来的破烂玩意”不堪卒读。他自己也迫不急待地要写一篇小说，已经准备了一年了。一位名叫“吴尔夫”的人已经送来了一篇好故事，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除非所有的人都对办杂志非常感兴趣。

在给马什的信中，他说自己拒绝宣布破产，准备同债权人合作，以100英镑作为人身保险，每镑付给他们7先令，这样他就能挣钱养活自己，有时间写小说，马什的担保也不会受到威胁，因为他刚同银行做好安排，偿付债款；他们将放弃彻恩斯里街，去租一个更便宜的地方。信的结尾留了一点余地，马什还可以阻止这种孤注一掷，但马什让这个机会溜走了。

打印好的信件送了出去，通知撰稿人不会再有8月号的杂志刊载他们的作品，“吴尔夫先生”也收到这样一封信，默里在手写的附言中说自己很想登载他的一篇故事，这“无疑是我们收到的来自编外人员的最好作品”（这是默里夫妇和吴尔夫夫妇之间漫长微妙关系中的第一次接触），但他认为英格兰并没有准备好容纳一份“诚实的文学杂志”。他和吴尔夫太太是否愿意来拜访他们远在乡间的住处？“我妻子在沃特罗家没有同你们会面，她很希望见到你们夫妇俩。”但是三年以后他们才正式会面。

那年夏天，D.H.劳伦斯和弗丽达在私奔后又回到英格兰，他们从德国来，劳伦斯刚在那里写完他的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他来办公室拜访，接下来大家都见了面，两对未正式结婚的夫妇立刻互相喜欢上了。默里写道：“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相互沟通了。”而弗丽达在她的书中则称之为“我们唯一融洽欢乐的友谊”，看见他俩在公共汽车顶层互相做鬼脸，吐出舌头来，她立刻喜欢上了他们。

就这样开始了那有名的充满危险的友谊，这种关系影响了，而且有时几乎是控制了默里今后20年，凯瑟琳今后三年的生活；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

指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团体成员们。——译注

指维吉尼亚·吴尔夫。——译注

就是从一开始，漂亮黑发的默里对劳伦斯就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长期禁止出版的《恋爱中的归女》的前言中毫不隐晦地谈到这种吸引力，书中写到当杰若德·克莱奇和茹珀特·伯钦相遇时，他们之间那种“令人颤抖的亲切感”，在金发的杰若德·克莱奇身上有着更多大卫·加纳特的成分，他也是一头金发——而默里绝不会有什么同性恋倾向——他从未忘记过在布鲁柯特中学的一次讨厌的经历。但是从《前言》中确实可以读到茹珀特·伯钦对他黑发朋友的欲望。一开始就因为劳伦斯的嫉妒而存在着危险，就像那位普鲁士军官因为年轻人对他女友的感情，因他为她写的那些诗产生的嫉妒一样，而目前他们的这种友谊还是愉快欢乐的。

劳伦斯同霍伯特·阿斯奎斯一起住在布洛斯泰尔，邀请新朋友去那儿拜访，他们去了。在回家的火车上读了《儿子与情人》开头的几页，小说的深度使默里羡慕劳伦斯的天赋，很久以后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他做了“一个傻瓜，一个嫉妒的傻瓜”。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划时代的小说家。

8月，劳伦斯和弗丽达回到巴伐利亚，到了10月，他们住在意大利，生活很愉快，开销也不大。劳伦斯写过信给默里和凯瑟琳，催他们去，但是默里却因他的债务和伦敦记者工作所困，而且他也觉得自己不能靠凯瑟琳的钱生活。劳伦斯蔑视这种想法，结果以他战前的那种欢快笔调长篇大论写了一封信，告诉默里拒绝使用凯瑟琳的钱只意味着他不信任她的爱情。“你说她需要一些小小的享受，你不忍心剥夺它们，这意味着你对她和你自己都不够尊敬。”

此时，劳伦斯显然已将凯瑟琳视为默里的妻子，想帮助他们两人，虽然他也许不大理解比切姆家人的脾气。他说，“你侮辱了她，一个不满足的女人必须要一些享受，而爱一个男人的女人可以睡在地板上。”他们应该来意大利，每月花费7镑10便士就能够活得很好，出门时还被尊称为先生——对凯瑟琳这种享受绰绰有余了。

至于写作，默里可以“专写评论”，像华特·佩特或此类人一样写些随笔；他必须请求《威斯敏斯特》让他每周从国外写两篇专栏文章。他应该花光凯瑟琳的最后一分钱，让她自己干家务活（但是弗丽达倒雇了一个佣人，每月一英镑），他不能犯傻，懒惰；他必须振作起来“我认为牛津害了你。”

问题在于，如果杰克足够勇敢，靠凯瑟琳的钱生活，而不是拿它去偿还圣·卡特林出版社的债款，破产法庭的官员们就会接踵而至，哪怕他们逃到国外。在那种情况下，新西兰银行的总裁还会付钱吗？

所以默里夫妇没有去意大利，但的确一直打算去国外过圣诞节。默里迫不及待地要写那篇小说，想在25岁生日前完成一件作品，他终于决定去巴黎。如果他不能在意大利赚到钱，也许可以在巴黎？如果《威斯敏斯特》不能帮助他，也许别的杂志也可以——例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恋爱中的归女》，D.H.劳伦斯的主要作品之一。——译注

克莱奇和伯钦两人，均为《恋爱中的归女》里的角色。——译注

大卫·加纳特（1892~1981），英国小说家，是劳伦斯的朋友，其父小说家爱德华·加纳特曾帮助指点过D.H.劳伦斯和F.M.福特等作家。——译注

普鲁士军官，D.H.劳伦斯小说《普鲁士军官》中的人物。——译注

《儿子与情人》，劳伦斯的一部重要小说。——译注

一次轻率的旅行

说实话，我的朋友，换个地方并不是办法，巴黎确实是时尚的权威，但权威们并不能创造！……可以给英国年轻作家的最好建议就是避开巴黎，不再读法语。写出英文杰作的最好准备方式就是住在英格兰，用英语读写，而且最主要的是用英语谈话。

——A.R. 奥列加

默里在 1913 年 10 月的日记中写道：“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说不清楚的孩子似的信念，认为一旦渡过英吉利海峡，灵感就会源源不断，思想会成熟深奥，语言也会流畅起来。”凯瑟琳仍在寻找新的起点，也准备离开伦敦，因此 12 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去了巴黎。默里对可能靠给伦敦寄回稿件赚钱度日这种前景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他匆忙地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编辑交谈过一次，后者说他会尽力帮忙。

埃达说这次搬家是逃跑，他们把她母亲的家具带到了海峡对岸，因而她对此记得很清楚。默里告诉马什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不堪忍受债主们骚扰自己的生活。他们不肯接受一个牛津出身的人每英镑 7 先令的人身保险金。

但是马什也是债主之一，银行突然要求他承兑保证金，他写信问杰克出了什么事，而收到的回信却极其尴尬含糊，直到第二封信才把事情讲清楚。来巴黎前，默里在银行留了 19 英镑让巴克利支取。也许他杂志的两期款项已经偿付了，但是现在他每周只赚三英镑，又是破产诉讼案的被告，他无力偿还另外两期，马什能帮忙吗？

在伦敦时他靠记者工作每周能赚 12 英镑，但是运家具行李等花了 25 镑。他在巴黎租了一个寓所，开始写那本司汤达式的巨著，他发现自己为《文学副刊》写的文章并未发表，所以他们只好把凯瑟琳的生活费全部自己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破产诉讼一事。

似乎占德伊尔跟着他们去了巴黎，他也在吃力地写一本自传性小说，还给了凯瑟琳一本《牛津英语诗集》。躲避债主这事对他并非秘密。

2 月，J.A. 斯彭德写信让默里担任《威斯敏斯特》的艺术评论，他回伦敦去商谈此事，住在戈登·坎贝尔那儿，坎贝尔的一位律师朋友说如果默里马上去破产法庭，那儿的官员会理解这并非他的过错，会好好待他；如果不去，他们就会下令拘捕他。于是他马上去，果然被看作受害的一方，使他感到破产是绅士会遇上的意外事故。总而言之，进过牛津还是有好处的。没有别的选择，在伦敦，一份工作每周只有几英镑，而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但他们在巴黎订了一年的租房契约，而且提到《泰晤士报》证明身份，这次不能逃避了，需要 30 英镑取消租约，他们必须卖掉所有的东西。默里有次竟然在巴黎的妓院到处乱逛，兜售他们所有珍贵的物品，正好被弗朗西斯·卡尔科撞上了。默里在他写的小说《静物画》中对此事曾有过描述。因此，埃达母亲的雕花橡木书桌、写字台、雕花屏风，还有她的许多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留在了巴黎一些名声不好的地方。

默里从巴黎的唯一收获是知道了伦敦才是他该呆的地方，而凯瑟琳却带

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又译斯丹达尔；其代表作为《红与黑》，此外还有《巴马修道院》等。——译注

回了她的一个较长的故事，故事名字取自柯勒律治的一首诗，讲的是两个羞怯的人如何在火车上相遇，都渴望抚摸亲吻对方，又唯恐“破坏这种情绪”，但又梦想着在乡村的别墅内结婚，最后梦想结束了，埃德娜没有来（她只有17岁）。一封电报使亨利的幻想破灭了。小说既不咄咄逼人，也不尽是伤感情调，而从柯勒律治那儿学来的白日梦想则是至关重要的写作方法。

故事有一种非真实，半明半暗的奇怪感觉，在巴黎和回到伦敦后的头几个星期写的日记中也处处流露着这种感觉，她写道：

今天世界四分五裂了，我在等待杰克和埃达，像母亲过去那样正在缝衣服——用我的心来穿针引线，真可怕。但是有什么比那可以将自己溶入真实的东西更为可怕呢？是否这吓坏了我？

我在等着埃达来，她迟到了很久，一切都悬在空中，没有着落——连鸟和烟囱都是这样，心里暗暗害怕。

那个年代，不仅是凯瑟琳，而是整个欧洲，甚至鸟和烟囱都有充分理由私下感到害怕，人们不由地想在这种奇怪及错位的景象中找到一些对噩运将临的隐约感觉。凯瑟琳的情况更特殊：她病了，自己却不知道；她开始不满意默里，同时感情开始转向埃达，因为埃达将要离去，她被召唤去罗得西亚照顾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日记》中一则流露了这种由即将长期离别引起的感伤情绪，她写道：“我是否毁了她的幸福生活？我该受谴责吗？她把自己给了我，我该让她幸福才对。”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这种不同寻常、充满爱与恨的神秘关系：凯瑟琳抚慰精疲力尽的埃达：“……不是像我通常做的那样，而是稍稍吻一下，只是像人们喜欢给一个疲乏了的孩子的的那种爱的吻。‘噢，’她叹道：‘我梦见过这些’（我一直感到有些恶心）”。“没人知道，或能够知道，埃达是我多大的累赘。……在巴黎我感觉最大的幸福就是摆脱了她。”

凯瑟琳既需要又讨厌的埃达要走了，3月27日是他们离别的日子，这一天也是默里接受破产法庭公开传讯的日子，无怪乎所有一切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凯瑟琳的诗《相逢》也是那一天写的，表达了这么一种观念，即她和埃达的生命已用铁环彼此相联。

从那天开始，默里成为债务未清的破产者，而凯瑟琳则对埃达欠下了情份，她似乎好几个月没有写出什么作品。

她患肺病已有三年，“胸膜炎”似乎又将重新发作，结核杆菌正在侵入肌体，虽然并没注意到这一点。

为节俭起见，他们搬入埃迪克洛夫 两间阴暗的顶层房间，房内有两张桌子，两张椅子，地上铺着竹席，厅堂臭哄哄，厕所也是最普通的，地上摆着一只桶装残羹剩饭，默里几乎立即（虽然想努力使自己成为艺术评论家）就患了腹膜炎，一星期后凯瑟琳的病也发作了。她倒在椅子上，脸色苍白，不能说话，心脏剧烈地跳动。克洛夫特-希尔医生亲切地照料着他们，但却忽视了真正的危险，因为她面色好极了。

埃德娜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亨利是故事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埃迪克洛夫，伦敦一地名。——译注

不久默里必须给埃迪·马什回信：“我害怕收到你的信，不知为什么我不能写信，我没有一分钱，从回来后就不名一文。”他想在博物馆或美术馆找个工作；他从《威斯敏斯特》的收入已减少到每星期4英镑，但是《文学副刊》在8月将接受他的一些稿件，这样，到9月拿到稿酬后他就能支付10英镑，他还令人吃惊地说，凯瑟琳想“上台演戏，但这种该死的职业没有靠山是不行的。”

默里收入减少的真正原因也许是他写的那本小说书又长又罗嗦，而且毫不隐晦。主角是莫里斯·坦普尔——是一位年轻作家，同主编的妻子私奔了，因此断了收入来源，她比他年龄大，自己也有些钱（有些像凯瑟琳），小说的主题是讲乡村的美好生活。

在《静物画》中可以窥见一两眼对爱情抱讥讽态度的弗朗西斯·卡尔科（杜邦）、乔治·班克斯，还有弗里德里克·古德伊尔，后者是书中的丹尼·比切姆，他爱上了安妮，因为莫里斯爱她，后来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去巴黎找他们（丹尼·比切姆也是戈登·坎贝尔）。书中议论很多，基本上是长篇大论，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凯瑟琳的评论是写在日记中简短的一句话：“‘坦普尔先生，恐怕你过于注重心理描写了。’然后我出去买腌肉。”此时她自己仍然什么都没写。

D.H.劳伦斯夫妇6月从意大利回来，可以结婚了，他很快活自信，出版商给他的下一部小说预付了300镑，这两个人很幸福，似乎拥有整个世界。他们来埃迪克洛夫吃饭，凯瑟琳自然对自己和杰克肮脏的生活环境发了一通牢骚，结果两人还吵了一架，后来又再次搬家。他们在切尔森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小房子，签订了契约后才发现四处都爬满了臭虫，只好用煤油和硫磺来对付。1914年7月13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坎辛顿登记处结婚——杰克、凯瑟琳和戈登·坎贝尔出席作证婚人。

默里两人肯定非常羡慕，此时弗丽达心血来潮，突然想到把自己的结婚戒指给了凯瑟琳，凯瑟琳深受感动，她戴上了戒指，后来也一直戴着——“甚至当我们结婚时也不肯换下来，她死后埋葬在枫丹白露时还戴着它”。因此凯瑟琳左手戴着的其实是破裂婚姻的象征。

回到坎贝尔在谢尔伍德的房子，他们4人在后院照了一张结婚纪念照，看上去布尔乔亚味十足。他们一点也没有料到两星期前发生的事情！在萨拉热窝，一位中学生开枪射击，点燃了使全世界陷入战争的导火线，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战争爆发了，8月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默里也一度同修·金斯米尔一起报名参加自行车营队，因为他喜欢骑自行车。第二天克洛夫特-希尔医生替他检查体格，说他工作过度，需要休息，给他开了一张证明，提到他患有腹膜炎，并且“怀疑肺结核”。

在那个生命悠关的夏天，杰克和凯瑟琳像所有的人一样也计划去度假：小说家J.D.贝尔福特替他们在康沃尔找了一所别墅，可以度过9月的一段时间。凯瑟琳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打算明天去康沃尔，……告诉

枫丹白露，巴黎近郊。——译注

即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导致7月23日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译注

康沃尔，英国西南部的一个郡名。——译注

我，是否有上帝？我不信任杰克，今晚我感到自己衰老，噢，我真希望有个爱人来体贴我，爱我，抱住我，安慰我，让我停止思索。”

她心中并没有特别想到谁，但很快就会认识 D.H. 劳伦斯的一位俄国朋友，一位不久就成为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神秘人物——不是爱人，却有些像父亲，又像一个远远的仰慕者，一个有时不赞同她行为的人。凯瑟琳很久都不知道如何拼写他的名字——柯特连斯基，又称柯特。

战争开始了，默里需要母亲似的照顾，而凯瑟琳渴望得到与杰克不同的东西，虽然她并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埃迪·马什收到从康沃尔的圣·梅林寄来的一封信，告诉他杰克因视力不好不能入伍，又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只好决定住在乡下，便宜一点。“竭力写作，希望三年之内和平会到来。”同时，因为他只有 4 英镑，不能寄上曾经答应的那 10 个英镑。马什的答复是他典型的作风，寄上了一张 5 英镑的支票，但此时他们已离开康沃尔，后来才包在一块手帕里转寄至他们手中。他们在莱 呆了一段时间，徒劳地想找一个每周租金 5 先令的村舍。后来默里在切尔西想用那块手帕，支票才掉出来。“我不知你为什么这样做，埃迪，是想火上浇油吗？肯定不是的，但却又让我感到恼火。”此时劳伦斯夫妇已在彻斯汉姆 租了一个村舍，离柯尔斯伯里和迦南的磨坊不远，默里夫妇去那儿度周末，结果也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农舍。

玫瑰别墅坐落在里 ，完全适合他们：房子很小，阴暗潮湿，厕所在外面。但是靠劳伦斯的帮助，房子终于装修一新，不久就成为那些极富思想性辩论的场所，戈登·坎贝尔曾经称之为“绝妙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夜晚，曼斯菲尔德总是精神不佳。”坎贝尔妻子去了爱尔兰，因而他总是下乡来，在这家或那家度周末。三个男人常常把整个周末都花在思辨性讨论上，就是此时凯瑟琳对安妮·埃斯特尔·赖斯说，“默里哪怕煎香肠时也想上帝。”她觉得这些男人太严肃，有天晚上她对贝阿特丽丝·坎贝尔嚷道：“我需要音乐，灯光和人，”而她却在这儿做果酱或用茶中把花园里邻居的鸡鸭赶出去。

他们不久就发现劳伦斯有些变了，他同弗丽达的关系受到恋母情结的困扰，对战争的失望正在渐渐地毁灭他。他看上去病得不轻，新蓄的胡髭更显得脸色发青。他常常同弗丽达大吵大闹，每当她一开始思念自己留在诺丁汉的孩子时，他就大发雷霆，事实上他已患了肺病。

杰克和凯瑟琳现在可以就近观察劳伦斯的婚姻，却为之大惑不解，默里在日记中写道：

我想得越多——凯和坎贝尔也有同感——就越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并不能得到肉体上很大的满足，他们这方面完全不对头，弗丽达说他“像公狗对待母狗”那样占有她。昨晚上他说甚至现在人们也会感到一种双方面的“羞愧”，他常常渴望弗丽达，而她对他却没有一点欲望，他只得承认这一点，并感到无可奈何。说真的，我觉得她一点也不爱他。她不过是爱上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名作家这么一个概念，仅此而已。劳伦斯竟然允许她用那虚

莱，以及彻斯汉姆、柯尔斯伯里、里，均为伦敦附近地名。——译注

莱，以及彻斯汉姆、柯尔斯伯里、里，均为伦敦附近地名。——译注

莱，以及彻斯汉姆、柯尔斯伯里、里，均为伦敦附近地名。——译注

莱，以及彻斯汉姆、柯尔斯伯里、里，均为伦敦附近地名。——译注

假的对自己孩子的“爱”来凌驾于他之上，真让我讨厌。我尽量避免去惹她，她愚蠢至极，固执得让人难以忍受，不明白劳伦斯为什么能忍耐下去。凯瑟琳也相信弗痛恨她，我认为弗对凯瑟琳非常嫉妒。

他们的新朋友柯特来同劳伦斯夫妇共度周末，却发现吃中饭时空气紧张，因为女主人被被她抛弃的孩子感到悲伤。柯特从不知道如何隐瞒真话，他具有一种有用的才能，能使朋友们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感到良心的谴责。他只需站起身来，用自己那坚定的俄国语调发表一些具有道德份量的看法。这次他也不客气地告诉女主人（他过去只见过她一次），既然她离开了自己的孩子同劳伦斯结婚，就没有必要再去为孩子而有什么怨在同已婚朋友的交情中，柯特一辈子都习惯站在夫妇某一方的立场。他是劳伦斯的终身好友，因此也成为弗丽达的敌人，很长一段时期，他似乎也是凯瑟琳的好友，她在困难时的避风港，她唯一能信任的人。默里说，柯特的信念是“凯瑟琳永不会做错事”，其实是默里自己这样认为。默里从未提及终于有一天柯特不再是凯瑟琳的朋友，但至少目前他是的。在渐渐疏远杰克时，她常常倚靠他，但是拒绝了他求爱的表示，那似乎是由他的某种误解造成的。

并不是柯特本人，而是他的默许，使凯瑟琳在玫瑰别墅时开始疏远默里。她渐渐觉得弗朗西斯·卡尔科——她前一个冬天同他在巴黎呆过一段时间，让他给自己授课，因为她“不会说法语”——有她所需要的代替杰克的东西。卡尔科此时一直与默里通信，凯瑟琳读了他的信，喜欢他“温暖的情感生活”，她希望他是自己的朋友。

到了1914年圣诞节，默里和凯瑟琳两人都明白该分手了，因为她破坏了一项不成文的原则，偷看了他的一本红色小笔记本，读到他告诉戈登·坎贝尔的话，说不知道她是否“对于自己仅是一种满足”。因此她在日记中（12月18日）写道：“这使我下了决心，这使我得到自由，我不再继续演这出戏了……”

此时她自己已开始与卡尔科通信，并告诉杰克，但他并不真感兴趣。（默里深知卡尔科为人，确信如果凯瑟琳去找他，总有一天会失望地回来的。）不久以后，凯瑟琳又写道：

一天晚上杰克同戈登在一起，我已上了床，他说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能控制他的女人——是的，这是他真正想要的。他又说我很顺从，是的，我顺从他，现在也一直如此，但我这样做是因为并未感到自己的迫切需要，现在我仍然因为习惯而顺从他，但每次都带着一种反抗，我称之为“告别”顺从，似乎总觉得是最后一次。

到了狂欢的季节，曾经计划举行三次晚会，结果只兑现了两次，在这4栋以艺术为中心的风光里，共有三位小说家，一位短篇小说家在勤奋工作。

默里骑车去位于贝林顿的别墅，听弗丽达说劳伦斯正在写一篇有关三代人婚姻的小说，其中用马洛和菲尔丁的手法描绘了一次真正的英国式婚礼，小说将取名《虹》。劳伦斯不久就会有一间舒适的顶楼工作间，弗丽达

马洛（1564～1593），英国剧作家。——译注

菲尔丁（1707～1754），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译注

正在替他准备，这使默里十分羡慕，他只能在棚子里创作。吉尔伯特·迦南在柯尔斯伯里的磨坊里接待了一位客人，年轻的犹太画家马克·格特勒，后者正忙着催促他写一本题名《门德尔》的小说。在默里的别墅里，凯瑟琳也正在写短篇故事以及沃里希奥芬系列，她不时撕毁自己已写好的作品。

第一次晚会是23日在劳伦斯家，欢快的宴会，房间装饰着常青树枝和槲寄生。柯特用像乌拉尔山吹来的寒风似的嗓音唱了希伯来歌曲，当劳伦斯宣称小说不是“角色的创作”时，几乎发生了“谋杀性的娱乐”（默里的话）。听到劳伦斯说的话，肚里灌满了酒的默里把手一挥，宣布如果劳伦斯创作出了角色，他就“每天几次”脱帽向劳伦斯致敬（这是那晚默里上床前昏头昏脑写下的）。

圣诞节的夜晚，同样一伙人聚集在迦南家，晚会分别在他的长房间和圆房间内举行。他弹着自动钢琴，而默里开始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格特勒之间存在着敌意。大家都喝醉了，没人能切开烤乳猪，但饭后还是演了两出短剧，在第一出戏中，没人为默里想出一个角色，柯特一直催他设计一出“戏中戏”，这样才演了第二出。

默里把概念付诸表演（他和凯瑟琳的实际情况），而“劳伦斯、弗丽达和凯瑟琳都开始怀着好奇心了解到我的真实意图。”

杰克将扮演一个玩世不恭的丈夫，他妻子（由凯瑟琳扮演）有一种出于情感的渴望，想去安慰一个伤感的外国人（柯特），但却受到另一位强壮、狂热情人的诱惑（格特勒），但后来又同丈夫和好了。默里虽然喝得醉醺醺，这最后一点对他却是至关重要的。戏继续演下去，遭到抛弃的柯特躺在地板上死了，自杀了。格特勒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情戏让大家觉得过于真实了些，先是劳伦斯把默里拉到一边，带着极其严肃和关心的口吻告诉他不要再继续这样暴露自己，把他带出房子，走到路上，说，“我们并非不爱你。”

接着弗丽达来干涉了：凯瑟琳开始亲吻格特勒（在戏中），当劳伦斯夫妇说“你不爱他”时，她回答，“不，我爱他，我爱，”而且拒绝表演回到默里身边去的情节。因此弗丽达把格特勒带到外面路上，对他说凯瑟琳是个坏女人，引诱了他，于是格特勒痛哭起来。“我们谈论着这出戏，一起上了床，”默里在日记中写道，“但是气氛太不寻常，非常像一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这也给劳伦斯的小说提供了一个情节，马克·格特勒将这件事讲给卡林顿听，说“柯尔斯伯里所有的作家都想把它写进自己的作品”，但只有劳伦斯一人做到了；吉尔伯特·迦南告诉奥特琳·莫瑞尔夫人这件事，说它“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章节”，将这种情感的尽情发泄同“我们经历的那可怕的几个月”相联系。像大家一样，他认为战争很快就将结束。

默里家的晚会根本就未举行，先是推迟，后来干脆取消了，也许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起了作用。无论如何，此时凯瑟琳一心想的只是那位写信给她，说“噢，夫人，你们生活在阳光下”的法国士兵。

弗朗西斯·卡尔科在格雷军事占领区，担任军队通信员。如果有些殖民地人的胆量，就可以去那儿看他。凯瑟琳称之为“三年田园式的”与杰克的共同生活似乎已经结束，她想过一种“我认为更适合我的生活”，因此她在

乌拉尔山，俄国一山脉，也是欧亚二洲的分界线。——译注

卡林顿，布卢姆斯伯里成员之一。——译注

日记中处处提到这位杰克比她更为了解的法国人，他像她一样，也出生在阳光灿烂的南太平洋地区。

她为他拍了照片，还给他寄去一绺头发。当她和杰克在炉火前做爱时，她“竭力想忘记他，却很难做到”。在杰克的房间里时，她闭上眼睛，贴着他的脸庞，梦想着，结果发现这样非常可怕（“我觉得自己背叛了弗朗西斯，几乎不能入睡”）。凯瑟琳并不是唯一沉溺于幻想的人，劳伦斯的确认真地说过要聚拢一些朋友，乘船离开这个充满战争的肮脏世界，在一个有着“真正像样生活”的小岛上建立一个殖民地。这个灿烂的憧憬称为雷纳宁，得名于柯特的一首感伤的希伯来歌曲。而据柯特说只有凯瑟琳——虽然幻想着遇上好男人，而并不幻想去海岛上过像样的生活——四处搜集了许多有关海岛的详情。从那以后，劳伦斯感到伤心失望，再也不提此事了。

她想要写作的愿望反映了她生活的紧张感，1月12日写完的名为《勇敢的爱》的长篇故事则是后来凯瑟琳再次用到的枯燥程式的原版：一位年轻妇人突然产生了浪漫的激情，爱上了一个比自己丈夫更富有异国情调和想象力的男人，但理智恢复后又回到自己家中。这是“谨慎的妻子”的主题，几乎是她本人生活方式的直接模仿或移植，因其自我流露而值得一读。同米弟尔的悲惨的幽会发生在马赛一个悲惨的地方，这篇故事奇怪地预示即将到来的她自己在法国的幽会。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默里受到了一连串一个比一个厉害的打击，首先劳伦斯夫妇走了，有人答应让他们使用苏塞克斯的一个别墅；他正在惋惜这一损失时，戈登·坎贝尔又无故失约，事后又不作任何解释，突然跑来宣布结束他的友情，发生此事时，凯瑟琳又恰好下决心离开他。这时，凯瑟琳的弟弟正好从新西兰来加入一个英国军团，在伦敦同她会面，给了她去巴黎度一个星期的10英镑，这更使默里的处境一败涂地。

莱斯利写给父母亲的信（2月21日）讲的则是完全另一回事，从信中可以看出凯瑟琳将自己的生活置于不同“部分”的技巧自从1909年以来丝毫没有减退。莱斯利只有21岁，他的信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充满对父母的深情。

他从贝尔姨妈奢侈豪华的家里给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去银行看基先生，离开他办公室时，“想不到竟然撞上正好前来取钱的凯瑟琳。她看上去非常健康，见到我高兴极了，根本没想到我会来”。于是他们一起吃午饭，信里接下来是一大篇谎言：她同J.M.默里比从前更加相爱，这是件大好事。又同一家月刊签订了新的合同，撰稿报道战况，他们有希望得到一小笔收入，虽然这种事极其费神，因为他们习惯随意写作。他们周末去巴黎搜集素材，我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她。

默里2月15日去维多利亚车站送走了凯瑟琳，回来后染上了流感，自己去了格雷汉姆，在那儿病倒了，劳伦斯细心地照料他。毫无疑问劳伦斯无意中抓住了一个替默里按摩的机会，与《埃伦的杖杆》中描写的罗登·里利所做的事情极为相似，而默里像过去一样茫然无知，没有意识到劳伦斯对他的依恋之情。此时凯瑟琳戴着迷人的皮手筒，还有不可缺少的笔记本，将这一充满战争时期讽刺意味的越轨想法付诸实施，后来则将其写进了名为《一次

米弟尔，即该小说中的情人。——译注

《埃伦的杖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译注

轻率的旅行》的故事中。

难道所有这些带笑的声音都是去参加战争的吗？这些黑黝黝的树林中隐现着——桦树和桉树的白色树干，显得异常神秘。这些水汪汪的田地上有大鸟飞过——这些河流呈现绿色和蓝色——难道战斗在这儿进行过吗？——

我们经过多么美丽的墓地啊，它们在阳光下闪耀，似乎布满了矢车菊、罂粟花和雏菊，在这种季节哪儿来这么多花呢？但那根本就不是花，是系在士兵们墓地上的一束束丝带。

4 天以后，她迷住了几个威严的上校，获准进入“军事地带”，她住进了卡尔科下士在格雷的住所，一切都非常神秘，激动人心：“房间，小灯，木头天花板……弗朗西斯几乎没穿衣服，用一把铜火钳拨火……用我的象牙刷子梳头。”“爱的行为本身倒像是偶然性的”，他们谈了那么多。

卡尔科不知道她在日记中写了些什么，1938 年在他的作品《20 年代的山貂》中叙述说“至少我这方面是极其认真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大家都互相认识，如果我的意图并非绝对正确，毫无私心，我根本就不会建议让那年轻的澳大利亚人 来我这儿了。”他白天一直值勤，只有晚上才能舒舒服服地同她闲聊一阵。

在默里的《静物画》中，杜邦这个角色是卡尔科的再现，他告诉莫里斯，爱一个女人绝对不能超过三四天，但是在这三四天之内，他“绝对不能想别的事情，绝对不能离开她一分钟，这样了解她直至内心最深处，然后同她一刀两断，不要同她藕断丝连，让那些你尚未了解的地方把你牵挂着”。这段话在小说的第十页上，很可能是在格雷发生的插曲之前写的，后来加进去不像是默里的作风。

凯瑟琳在格雷呆了 4 天后，默里收到一封电报，说她次日早晨抵达维多利亚车站（2 月 25 日），谨慎的妻子回来了。“她举止奇怪，头发剪短了，防备他人几乎近于好斗，我不敢想象她是回到我身边来。”在玫瑰别墅，两人之间那种疲惫的休战渐渐变成讲和，他们决定去伦敦找房子。

此时，她居然还写出了与《勇敢的爱》截然不同的《小家庭教师》，还有《春天的画》，她“孤独女士”的主题转变成为艺术。不久，在愉快地拜访了劳伦斯夫妇后，她知道自己必须重回巴黎，这次是为了写作。她可以使用卡尔科在鲜花码头 的寓所，他仍然在格雷。

这次她写的信欢快有趣，她现在爱着杰克，想同他分享一切。令人惊讶的是她现在同住在诺汉斯路 13 号的贝阿特丽斯·海斯汀斯好上了，后者离开奥列加后，狂热地爱上了温德姆·刘易斯，后来又同麦克斯·雅科布，莫迪利阿尼，毕加索打得火热。凯给默里写信说，“贝阿特丽斯的寓所真热

卡尔科当时以为凯瑟琳是澳大利亚人。——译注

鲜花码头和诺汉斯路，均为巴黎地名。——译注

鲜花码头和诺汉斯路，均为巴黎地名。——译注

温德姆·刘易斯（1882～1957），英国画家，作家，旋涡画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小说《上帝的獠狮》，画《巴塞罗那的投降》等。——译注

麦克斯·雅科布（1876～1944），法国作家，与超现实主义及立体画派有密切联系。——译注

莫迪利阿尼（1884～1920），意大利著名画家。——译注

闹，忠心耿耿的麦克斯·雅科布替她跑腿买东西……她打发走了达多（莫迪利阿尼），把她圣女般的心肠放在毕加索身上，他就住在附近。虽然她仍然异常美丽，仍有着金色的头发，小脑袋仍十分可爱，但她已经毁了。”

这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我非常讨厌耗子》和《善变者》的作者，凯瑟琳这么快就同她成为朋友，肯定不大知道那回事。她堕落的原因是：“我走到餐柜前，喝着科涅克白兰地，直到醉得不省人事，亲爱的。”凯瑟琳同她一起醉过一回，发誓再也不这样喝酒了。3月21日她俩大吵了一通，彼此永远分手了。（但是1918年她们又不可避免地打了一次交道。）

三天以后，凯瑟琳“扑进我第一本小说张开的怀抱之中”，她已开始写她以卡罗里为背景的故事，取名《芦荟》，后经过修改加工成为《序曲》。

她现在已挣脱了不能写作的魔咒，但是找谁去发表作品呢？

“不，你不会在《新时代》上找到任何我写的东西，我绝不会送给他们一行字。我认为奥列加太卑鄙了。”她终于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却没有地方将其展示出来。

当她不在时，默里高兴地装饰好了几个房间，盼望重新开始。凯瑟琳带着未完成的《芦荟》回来，整个4月份她都住在那儿，但发现自己不能在这两间房子里继续呆下去，于是5月间又回到鲜花码头，回到那些在信中多次描绘过的美妙景致中去了。一天早上她听见看门人对别人说她是“弗朗西斯·卡尔科”的情妇，还听说他马上要回巴黎，于是赶快逃走了，并向杰克保证她现在一点也不把他放在心上。5月19日，她又回到伦敦，故事也写好了。第二年，发生了一场灾难，改变了她整个生活和价值观念，她又重新开始修改小说，但仍然没有达到她期待的效果。只是到了1917年，受到狄欧克里特的影响和另一位作家同行的鼓励才改成《序曲》。

卡尔科回来后，发现客人走时留下了一个漂亮的英国瓷器盆，非常高兴。这时他当了飞行员，没有去土耳其。一年以后，写了小说《纯真》，其中将凯瑟琳描写为“维妮”，一个四处搜寻猎物的剽窃者：还有“贝阿特丽斯”，她最后谋杀了维妮，但是卡尔科只听说过海斯汀斯，所以外貌似乎是以乔治·班克斯为原型。卡尔科自己是米洛，他同一位年轻朋友在圣·米歇尔林荫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同维妮初次会面。

凯瑟琳成为名作家后，卡尔科在《20年代的山貂》中回忆这一段交往，将其描绘成友情，“虽然有些疯狂，但却绝对真诚”，他那时确实以为她是澳大利亚人。

对任何不理解这一友情的人，我都能诚实地宣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我两人对诗的共同爱好。这些诗描写了夜晚、雨，以及存在的荒谬和危险——总而言之，我们共同爱好那悲伤的浪漫情调，其中异国风味掺杂着美感，当然也少不了幽默，一点幻灭。我们俩都出生于遥远的国度，相隔仅咫尺海水和一些岛屿，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些亲和力，这多亏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命运的巧妙安排。

生活忽视了一切，同样也不希望我们的交往能够长久。但是多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我才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书，因为她在某种程度上为我提供了其中的素材。如果人们在《纯真》中维妮身上认出了她的话，我认为她只代表了此角色纯真无瑕的一面。……在米洛的性格中也能找到我自己的影子，但仅限于他同维妮奇特地交换双重个性时。

后来得知默里在《处在两个世界间》中描述了格雷那一小段插曲，卡尔科说，“这很伤脑筋，我并不知道默里了解此事。”

阿卡西亚路和波琳别墅

大部分人都认为等到我训练完后，就不再会有人被送往前线了，就是有的话，也已是夏季，会有更多的野餐，所以不用发愁！

——莱斯利给父母的信

1915年2月1日

对于许多英国家庭来说，1915年这个时候报告死亡的电报来的更为频繁，让人惊恐不安，而老百姓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古怪离奇的事件，有着奇特的讽刺意味。人们仍然好奇地前往车站观看从火车上抬下伤员，前一个秋季，凯瑟琳自己也常常沉溺于其中。

现在，虽然她仍能够随意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但英格兰也已经开始体验到法国和比利时早就尝到了的战火滋味。2月，劳伦斯在格雷汉姆的女仆慌慌张张跑进房间，“噢，太太，我可怜的弟弟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威廉·奥顿侥幸活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但是鲁珀特·布鲁克和亨利·戈蒂叶-布尔沙卡分别在5月和6月死于战斗中。德国人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开始使用毒气，法国人伤亡成千上万，年轻人回家度假几乎不知该如何叙述亲眼所见的一切。

莱斯利·比切姆同其他200名年轻人一起参加一项军官训练课程——“似乎除我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大学运动队成员”——整个3月都住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奢侈讲究的房子里，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这种新生活的荒谬之处。在家时，房子里总是摆着鲜花，而在4月的英格兰，在驻扎地，他诅咒列队行进时的亵渎行为，将樱草花、紫罗兰和雪莲花踩在脚下。6月，他驻扎在阿尔德肖特附近，有一个勤务兵听他使唤（每天早晨给他端来洗脸水，帮他穿制服，伺候他吃早饭），他学习如何使用原始的弹射器投掷一碰即爆炸的手榴弹。

劳伦斯回伦敦去了。通过同伯特兰·罗素短暂的哲学上的交往，他决定在汉普斯特建立他的雷纳宁，他同罗素可以授课，同默里可以合办一份杂志。现在世界已进入成熟时期，那些真正关心的人会订阅报纸，前来听课。为了靠近他，但又不能过分靠近，默里夫妇在圣约翰伍德的阿卡西亚路5号租了一栋房子（连同仆人一起），这之所以行得通，因为凯瑟琳的生活费增加了，而默里已有了固定职业，是《文学副刊》的法语书评论员。戈登·坎贝尔夫妇和特罗维尔家也住在附近。

他们刚刚安定下来，莱斯利·比切姆也来到伦敦参加6天的学习课程（他告诉父母亲“这些炸弹杀伤力惊人，很难操纵，现在我必须教会整个营队的官兵”），因此小弟就有机会来看他的姐姐以及与她同居的那个怪人，他写信回家尽量说了一些默里的好话：

指英法海军于1915年2~8月在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联合发起的登陆战役，先后有两次大的登陆战，但都失败了。——译注

英国客轮名，1915年5月7日在爱尔兰海岸附近被德国潜艇击沉，酿成1100人死亡的大悲剧。——译注

英国地名。——译注

我在凯瑟琳那位于阿卡西亚路可爱的小屋中度过了非常舒适的一个晚上——杰克·默里脾气和善，他和凯丝相处极其融洽——事实上我很高兴见到一切都很顺利——他们每年付房租 52 英镑，房子非常舒适干净——便宜极了，你们说呢？

那是 8 月下旬，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可以发行《信号》了，这份半月刊 6 期共售价 2 先令 6 便士。劳伦斯告诉一位朋友他将撰文“说教”；默里将发表“他们有关个人心灵自由的想法”，而凯瑟琳将写些“小小的讽刺作品”。

这绝对不是他们目前的情景，虽然劳伦斯见到的只是这些。小弟在阿卡西亚路时，同凯瑟琳一起坐在后花园的梨树下，陷入恐惧和思乡的情绪之中，两人一直在玩着“你还记得吗？”的游戏——“你还记得坐在花园里粉红色的凳子上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粉红色的板凳……现在它在哪儿了？你想我们进了天堂还能在那上面坐一坐吗？”

带着这种情绪，她写了一篇《起风了》，这是第一篇以惠灵顿为背景的怀念青春年代的故事，结尾处奇特的时间变换和梦境变换造成了一种神秘感。伯特兰·罗素和李敦·斯特雷奇以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信号》上刊载的这篇故事和《小家庭教师》。莱斯利·比切姆很像他姐姐——在惠灵顿的一次化装舞会上，有人曾错将他当作她——而且显然他有些花花公子气息。1912 年他回到惠灵顿时，穿着鞋罩，拿着手杖，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这在那儿不合适。很久以后有人回忆说（没有丝毫恶意）他像“今天人们称之为娘娘腔的男人”。默里明显地对他只字不提，他父亲在《往事与追忆》中说，“我认为他会愿意选择文学生涯，但是遵从我的意愿，他选择了经商，进了事务所当学徒。”

驻扎在朴恩茅斯时，莱斯利恰好同乔治派诗人爱德华·谢恩克斯合住一间宿舍，后者一直记得他是一个聪明快活的小伙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爱好。他很喜欢莱斯利，莱斯利告诉过他许多惠灵顿家中的事，但从没提到过凯瑟琳，虽然后来曾说过他认识奥列加。战后谢恩克斯惊奇地发现他的朋友竟然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兄弟，因而猜测莱斯利并不想冒昧地同一位相对来说不熟悉的人谈论他姐姐的生活方式。

9 月 22 日早晨 6 时，莱斯利以南兰开夏军队投弹教官的身份兴高采烈地前往法国，身边还带着姐姐给他的一张便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匆忙拥抱你。”有两个星期他不能写信。10 月 4 日——此时“夏日野餐”已稀少了——他请贝尔姨妈寄给他一些战壕皮靴，一些干果和鱈鱼干，那天他还给凯瑟琳写了信。

三天以后，在阿门弟也尔附近的一个地方，他给战士示范如何扔手榴弹，用的那一颗正好出了毛病，在他手中爆炸，同时还炸死了一个中士，死前他一直说着“上帝饶恕我所做的一切吧”，又说“抬起我的头来，凯蒂，我不能呼吸”。10 月 11 日，默里写了这篇日记：

朴恩茅斯，英国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爱德华·谢恩克斯（1892～1953），英国诗人。——译注

南兰开夏，英国西南地区郡名。——译注

阿门弟也尔，法国地名。——译注

三分钟以前梯格接到一封电报说她弟弟死了……我仍不能相信，她也不能。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她没有哭，只是脸色发白，说着：“我不相信，他是不会死的人。”现在她去基那儿打听消息，她想知道7日是哪一天。前一天她还收到他的来信，说他觉得自己像个7岁的孩子——那天她买了他们团队的徽章回来佩戴，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感到前景可怕：她那样看重他，那最后一封信——

似乎那天晚上在阿卡西亚路还有一个晚会，柯特也在场，凯瑟琳穿了他送的那件色彩鲜明的俄国农妇服装。坎贝尔夫妇迟到了，但没人告诉他们什么事情，贝阿特丽丝觉得她异常话多，快乐。但是几天以后，当她问到小弟时，凯瑟琳用“奇特狂野的目光狠狠盯着她”，然后说“炸成碎片了！”他的帽子后来送到她手中。

这件悲伤的事情改变了凯瑟琳的生活，她的痛苦完全改变了她玩世不恭的态度与其他方面的平衡，因而释放了她的创作能量，这个过程是悄悄进行的，日记中有几则写给小弟的是这种语气：“你知道我再也不能成为杰克的爱人了，你得到了我，你在我的心灵和肉体之中。”她谈到要“为我俩做些事”，此时（10月29日），默里知道她再也不能继续住在阿卡西亚路，两星期后，他们前往法国——这就是战争——以便让凯瑟琳能够写作，写新西兰。

在同一个月，劳伦斯恰好也受到了狠狠一击。10月28日，他送了默里夫妇一本他的新小说《虹》，莱斯利去世前两天，他来给他们看罗伯特·林德为《每日新闻》写的带有敌意的评论。默里读评论时，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觉察到了威胁迫近；这确实是他遭受围攻的开始，此书不久就被查禁了，连出版商也受到指控。但是凯瑟琳和默里感到很难安慰他，他们不喜欢《虹》，凯瑟琳简直非常讨厌其中一些章节；她讨厌有关“女人”的章节，认为这应该怪罪于弗丽达。

11月，对《虹》的指控迫使劳伦斯也搬了地方，以寻求解脱，他突然心想去佛罗里达寻找一个雷纳宁，聚集了一些有名无实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新相识（其中包括非利普·黑塞尔丁和一位名叫H.S.苏哈罗迪的印度法学学生），有权势的朋友帮他和弗丽达弄到了护照，但去美国的签证需要有医生证明不能入伍，其实他已开始排队等候检查了，自尊心却开始反抗，他冲了出去，朋友们所花的力气也付之东流。这就是两对夫妇之间忠诚与厌恶参半的感情，此时默里已准备前往法国，丢下劳伦斯一人去哀悼他的《虹》，哀悼《信号》的失败，这份杂志只出了三期。

走之前，他们的新朋友多萝西·布雷特在厄尔斯科特路附近自己的画室

《虹》，亦译《彩虹》，1915年初版于英国，是D.H.劳伦斯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主题是勇敢地探讨了两性关系的现实与意义，此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干涉，曾一度查禁，后随着劳伦斯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地位的确立，此书才重新公开出版。——译注

罗伯特·林德（1879～1949），英国报刊编辑，散文作家。——译注

《每日新闻》，伦敦一报纸。——译注

非利普·黑塞尔丁（1894～1930），又名佩特·沃洛克，英国作曲家，作家。——译注

多萝西·布雷特（1891～？），英国画家，凯瑟琳和劳伦斯的朋友。——译注

内举行了一个热闹的晚会。她其实是埃塞尔子爵的女儿，尊敬的多萝西·布雷特；然而她曾经是斯莱德艺术学校的学生，总是被人称为“布雷特”，她觉得自己的地位适合一位身穿罩衫的斯莱德女学生。她第一次写信给奥特琳夫人时，用的是父亲饰有贵族纹章的信笺，封信时在纹章下画了一幅自己颇不雅观的无下巴的头像。她有些耳聋，总是带着一副助听器，称之为“托比”。

布雷特11月5日的晚会似乎是为劳伦斯夫妇举行的——那时尚在谈论去佛罗里达。碰巧在这欢快的日子，劳伦斯听说自己的书被查禁了。布雷特写的有关劳伦斯的书中对那晚会有一段喜剧性的描述。大家都在那儿，包括马克·格特勒，克莱夫·贝尔以及李敦·斯特雷奇。很可能这是凯瑟琳第一次同布卢姆斯伯里和奥特琳夫人在佳星顿的朋友们会面——无论是谁，只要是《新时代》的读者，就能在那星期的杂志上见到凯瑟琳写的模拟滑稽对白，讽刺市郊妇女对战争的态度（“我爱那些伤员，你不爱吗？噢，我就是爱他们，他们可爱的红蓝两色制服看上去真漂亮，真动人，不是吗？”），笔调辛辣刻薄。她把它寄给自己不久前还认为“过于卑鄙”，不能信任的奥列加，这本身就意味深长，而且这标志着她作品中一种新的主题的出现，这个主题后来变得极其重要，也是1911年接触到狄欧克里特后对其滑稽剧手法的进一步使用。她真正的进步往往始之于微不足道的小事。

虽然劳伦斯过于骄傲，不去寻求军队的拒绝入伍证明，默里却不这样：11月初，他就收到了一张新的健康不良证书。阿卡西亚路5号转让给了柯特的几位朋友，他们也请柯特住了进去。11月19日，默里和凯瑟琳已到了马赛，准备在海边找一个廉价的便于两人写作的住所。凯瑟琳一心想在痛苦中追寻过去，使弟弟能够得到再生；而默里则要写一本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以便还清《蓝色评论》拖欠的旧帐，他可以为《文学副刊》写书评。他现在靠凯瑟琳的津贴度日也不再感到惭愧，现在凯每年已有120镑。然而凯瑟琳的父亲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与她同居的这个男人怎么说也是在逃避自己的职责。

在卡西斯，南部海岸北风凛冽，他们躲在旅馆房间里浑身颤抖，不知道自己干吗要来。一天，他们散步绕过海角，坐在石头上，凯瑟琳忍不住痛哭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歇，默里发现自己“现在尝到了嫉妒的滋味”，对她大发了一通脾气，事后又觉得非常惭愧。后来讲到这件事时，他责备自己不该嫉妒一位死去的弟弟。但是，纯粹因家庭成员的死亡而产生的悲痛并不会使丈夫感到嫉妒或愤慨。

毫无疑问凯瑟琳爱小弟，在他俩之间有很强的吸引力，他最后的话也是对她说的，但是他们成年后的交往并不多。显然关于前一年春天在“巴黎度过一星期”的目的，她欺骗了他，而且她对他死亡的反应（她几星期以后的冷嘲笔调奇怪地混杂于其中）也使人觉得那天在卡西斯坐在石头上痛哭除了感到悲伤外，也许还感到愧疚：实际上是对从1908年以来自己家庭，对特罗维尔家的愧疚。在卡西斯淌的眼泪既是为小弟之死也是为自己过去的反叛，正是因为这一点，默里才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

他开始安排返回伦敦，计划重新发行《信号》，找一个印刷商帮助劳伦

克莱夫·贝尔（1881～1964），英国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姐姐瓦妮莎的丈夫，布卢姆斯伯里成员之一。——译注

卡西斯，法国南部沿海城市。——译注

斯。离开之前，他们在海岸边上找到了一个村庄班达尔，把凯瑟琳舒适地安顿在旅馆里。默里虽然这时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还是回了伦敦。

两人商量好一旦她能重新开始写作，她就回来。她从班达尔，从温暖的南方写来的第一封信，几乎过分洋溢着济慈式的欢乐情绪。而默里则在汉普斯特租了一个每周9先令的房间，独自安顿下来，有时劳伦斯夫妇和坎贝尔夫妇会来一起吃饭。

但是此时凯瑟琳生病了，开始是“马赛热”，过去他俩在那儿时都得过这病，后来又是她所谓的“风湿病”。躺在陌生旅馆的床上，她渴望他的来信，整整两天没收到他的信，她的反应（在这样一个陷于战争中的国度里）有些异乎寻常——她写道：“不要让我这样呆着，没有音讯，这太残酷了——太残酷了。”而默里在自己那间孤独的小屋中写的信则流露出他几乎近于可怜地依赖于她的爱情，居然低声下气他说自己配不上她，自己“只不过是人物”，但是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后来的情况证实这次不同寻常的情感爆发部分起因于她第三次疾病发作，而仍然没人怀疑到她患的是肺结核。

在这种困境中，她给劳伦斯写了“一封有些撒野的信”，她后来对默里承认“那时我们不公平，你明白吗？”信送到拜伦别墅时，恰好默里也在场，劳伦斯没有把信给他看，但读了信之后，他去找默里：都是默里的过错，他是胆小鬼，他从没给过凯瑟琳新的生活，她生病是悲哀所致，这都是因为默里总是畏首畏尾，从不做出决定，等等。

这场吵闹使默里做出了决定。此时有人把康沃尔的一所别墅给了劳伦斯，他圣诞节后将去那儿，默里可以回到班达尔去，因此他建议凯瑟琳去找一所别墅。同时，在劳伦斯的怂恿下，奥特琳·莫瑞尔邀请他同李敦·斯特雷奇以及克莱夫·贝尔一起去佳星顿庄园度圣诞节。默里告诉凯瑟琳说他的新朋友是些“体面人”，但又说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像林中野孩子一样。当他回到自己睡觉的顶屋时，可以想象着同凯瑟琳拥抱着一起入睡，“小鸟用树叶遮盖我们”。

节礼日 凯瑟琳收到他从佳星顿发来的电报说他马上回来。第二天早晨，她去了邮局，小小地庆祝一番，“给所有糟透了的锈钢笔换上了新笔尖”。她情绪很好，找到了波琳别墅，见到了和善的男女主人，订了酒和木柴，30日她在花市兴高采烈地抢购了“整整三打玫瑰和6束紫罗兰”。

那年的12月，凯瑟琳从班达尔写给默里的信——接连三个星期至少每天一封——都流露出“兴高采烈”的情绪，甚至她前一个春天从巴黎写回来的信也没有这样生动，回想起来，在这些信以及在《日记》中都能见到明显的肺结核迹象。

12月27日：“我知道自己不能入睡，心中充满了欢乐，噢，杰克，我几乎不敢呼吸。”三天以后：“我仍然这样害怕，连呼吸都感到心疼。”“甚至连我的心都不再跳动了，只有血管里血的流动声才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

一年将尽之际，她写道：“我全心全意地爱过你三年，但是似乎从来没

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一种地方性热病，以地中海沿岸的马赛最为典型，故名。——译注

劳伦斯当时的住处。——译注

12月26日，按英国俗例，人们于这天向邮递员赠送“节礼”，故名。——译注

是凯瑟琳此后居住过一段时候的一幢小房子。——译注

有像我现在这样全身心地爱你……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过去我似乎只是在爱情的边缘玩耍，只是体验着一种镜中反映出的生活，那并不真属于我……”

默里在《处在两个世界间》中写道：“我从没见过凯瑟琳这样。”他没有把此情形同她的病相联系。在兰克顿，他们仍注定要互相伤害，而波林别墅则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但是离此不远的地方是凡尔登，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整个时期，人们不仅看到了凯瑟琳同默里，同劳伦斯，以及同朋友们的私人生活，而且还看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力丰富的作家们摸索前进中希望与嘲讽混杂的悲惨道路，而嘲讽本身就能显示其非真实性。

1916年1月21日默里给奥特琳夫人写信说“我们7点起床，9点半睡觉”。他和凯瑟琳像大多数晚上一样面对面坐在饭桌旁，她在写一封信准备寄往佳星顿，自从默里告诉她“在英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以后，凯就一直想送些什么给她，比如说送给她“这个月夜，缀满花朵的杏树在我们雪白的游廊上投下垂着长长丝绦的一条蓝色影子”。有时两人都坐在桌旁写诗诉说自己的幸福。

默里写道：“我们付22.5法郎租金，剩下的75法郎生活。我们尝到了难以置信的甜蜜，一位西班牙女孩早上来帮我们干活，其他时间我们四处乱逛。”

有时他们坐下来工作，默里阅读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关的书籍，而凯瑟琳此时正酝酿写一些自己过去从未写过的东西，她的愿望从没有如此强烈：“我选择的写作方式也将完全不同。”

她此时想写的是“回忆我自己的国家”——以偿还欠下的“神圣的情分”，“爱的情分”。她想要“让我们不为人知的国家跃入旧世界的视野，必须有神秘感，似乎在浮动，在呼吸。必须让它带着神秘的感觉，耀眼灿烂，留下余辉。”

她重新读了自己的卡罗里故事《芦荟》，觉得“很好”，然后着手准备重新开始，心里萌发了前一个春天尚未有的新主意：故事将以莱斯利的出生结束（事实上没有），那时尚未想到用《序曲》这个名字。

《芦荟》比《序曲》长三分之一，既没有活力，也没有留下余辉：首先还要剔除许多糟粕，无疑凯瑟琳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因为它代表着自己与过去常用的写作方式和题材的分道扬镳——一开始就是一种游移不定的散漫形式。

它只是一幅移动的画面，展示一个新西兰家庭从城里的一幅房子中搬出来，又安定在乡村的另一所房子中，这些都是通过角色的眼睛而非叙述者的眼睛见到的，事实上，“叙述者”几乎令人难以觉察，仅仅是轮流停留在所有的角色身上，也没有什么情节，至少没有那种事先安排好的为引出结局而铺垫的原因效果等等。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感受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作品只是一步步向读者展示所有的家庭成员想些什么，有什么感觉，举止如何，如何适应新的家——确切点说是他们整个殖民地的生活——因此有两种：能辨认的和不能辨认的，表明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意识到新的环境将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凡尔登，法国东北部要塞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的法德凡尔登战役即在此爆发，时当1916年2月。——译注

《序曲》最后成型时，其魅力部分来自中心移动产生的效果，叙述从一位主角的内心活动转为另一位的内心活动，似乎叙述者无所不在，同时又根本不存在，这样也不会造成混乱，这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自己的写作方式。

似乎对于凯瑟琳来说，学习写作也是学习做人，这又是一个有关个人生活和创作之间紧密联系的例子。

凯瑟琳在班达尔时，安妮写信告诉一位朋友，“你会很高兴亲爱的莱斯利终于使可怜的凯丝浪子回头，她给我们大家写了非常可爱的信，她爱莱斯利。”“12月，凯瑟琳也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希望拥抱父亲；两个月后他又给她增加了生活费用，惠灵顿的特恩布尔图书馆藏有一些凯瑟琳写给父亲的信的打印件，是凯瑟琳的父亲死以前捐赠的（他1959年去世），其中一封是她1916年3月6日写的：

最亲爱的父亲：

今早我收到您的来信，获悉您已告诉银行经理每月付给我13英镑，而不是过去的10英镑，我几乎不知该如何感谢您对我的无与伦比的慷慨，亲爱的，我恰好手头拮据，而您使我的经济状况稳定宽裕，使我感到生活有了保障，更为舒适。一千次地谢您，亲爱的父亲，我感恩不尽。

我们亲爱的孩子 在这儿时似乎使我非常接近您，每次同他谈论您，我都意识到我多么爱您，崇拜您，您对我多么重要。仁慈的亲爱的父亲，饶恕我孩子气的过错，记着我。

最亲爱最好的父亲，我的信就此打住，再次从心底里谢谢您。我每天都想念您，盼望着同您相见的时刻快些到来，上帝保佑您，亲爱的。

永远是您的孩子
凯丝

劳伦斯夫妇几乎一到康沃尔就决定在那儿定居，而且劳伦斯还开始催促默里到他们那儿去，他说，他们可以一起找到“一个人们可以感到幸福的好地方”，平静地生活，“与世无争，无牵无挂”。但是他想要一种不是基于目的而是基于个人的关系（总而言之是同默里）。他给凯瑟琳写信说，“我已厌倦了这种对个人因素的执著、个人真理、个人现实……我不需要同他的纯粹个人的关系，他是个男人，所以我们的关系应该以目的为基础，不是基于我们本人，而是基于我们希望实现的东西。”他们不应该总是去触动自己的灵魂，或他们熟人的灵魂，而应该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共同享有”的新生活。

凯瑟琳不愿去，她很喜欢劳伦斯，但害怕他混乱的思维，也害怕弗丽达，认为她是一切的起因；甚至更害怕劳伦斯新的信徒菲利普·黑塞尔丁和亚美尼亚作家迪克兰·柯尤迪安（即后来有名的作曲家佩特·瓦洛克和小说家迈克尔·阿伦）。他们此时都参与了计划，虽然两人不久就同劳伦斯闹翻了，或者是他先翻脸。暂时还没有印度法学学生苏哈罗迪的消息。

指凯瑟琳的弟弟莱斯利。——译注

迪克兰·柯尤迪安（1895～1956），又名迈克尔·阿伦，长期居住英国的亚美尼亚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到2月末——凯瑟琳刚开始写作《芦荟》——默里夫妇妥协了，虽然不是因为劳伦斯的原因。军队已经开始征募未婚男子，默里算未婚，眼睛近视，可以参加非战斗性服务，仪为此原因，他就必须回到英格兰去。26日，凯瑟琳给奥特琳夫人写信，“谢天谢地亚美尼亚人走了，但愿他把黑塞尔丁也带走……真遗憾劳伦斯竟然会在这么多枯燥的人周围看见彩虹，在这么多心地狭隘的人身上看见成堆闪光的金子。”默里在附言中写道：“也许你已经知道我们将同劳伦斯夫妇一直住在一起，我敢说将会延续整个夏天。”不久黑塞尔丁也离开了。

劳伦斯找到了名叫特雷格森的石砌农舍村庄，在康沃尔的北海岸，他们自己租了一幢面对大海的小农舍，每年5英镑，还有一幢长方形农舍在与其成直角的方向，默里夫妇可以花16英镑租下，房屋一端有一尖塔，当时还有一城堡式的塔顶。劳伦斯迫不及待地写信说：“我称之为凯瑟琳的房子，凯瑟琳的尖塔。”

两幢房子相隔只有12步左右——他们可以站在各自的窗前聊天，可以有一个女仆，以后也许黑塞尔丁也可以在默里他们房子里有一个房间。羊羔四处跳跃，像一朵朵的烟云，海鸥与渡鸭争食，有时也会出现一只狐狸，海面上有船只。劳伦斯3月11日写道：“我们相信你俩是经过考验的唯一朋友，真实永久的朋友，真正的血亲，我知道这个夏天我们会很幸福。”弗丽达告诉凯瑟琳她现在一心想的只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就像田里的百合花一样。”

到了3月底，默里告诉奥特琳夫人他们希望不久就能见面，波琳别墅的小铁门终于最后一次关上了，他们很快就回到英格兰。默里有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已完成，《序曲》尚未修改完毕。

凯瑟琳在班达尔时，偶尔同弗雷德里克·古德伊尔上士互写一些玩笑式的信，他现在在英军总司令部气象处工作，感到无比厌倦，也像其他许多士兵一样，渴望同女人交谈（事实上他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可能爱上过凯瑟琳）。2月14日古德伊尔写给她的一封信说道：“你为《信号》写了一些好东西，我想奥特琳夫人对此深有感触，所以才请你进她的卧室。”——这封信是他坐在酒馆写的，当时肚里灌了一些香槟和黑啤酒。她说的话是真的吗？劳伦斯是否真给了她一张优等证书！她是否真的完美无缺呢？或只是杰克一人如此？他现在学会嘲讽了——她能听他继续谆谆教诲吗？“你文笔生动，是否拯救过一个灵魂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又何必写作！那么就先拯救我的吧。”

其实他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她从没有被带上床过，他想象不出有比“在床上讨论艺术和生活以及我们的身体”更大的快乐了，“愿你的乳房像鲜花盛开”。不说了！他还不至于那样小气，但是他非常思念她两面演戏的才能，这使得同她的谈话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安慰，尽管她弄虚作假，她还是一个真正的亲爱的宝贝，希望她给他写信，而不是他刚刚收到的一张连地址都写错了的明信片。

同一个月晚些时候，他的确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他2月28日回了信，“我们精神上的同情几乎近于完美”，他这样写道（但是似乎并不恰当）：“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都一直同默里紧紧连在一起，我是没有什么指望的，虽然这使我俩之间的关系很尴尬。”现在在军队中，他堕落了，失去了一切事物的鉴赏力，“我非常怀疑是否还有什么值得拥有的东西能够保存下去”。他总是感到惊奇自己居然还能活着，“我的性生活经历包括同5个妓女有过

交往，一次订婚，几次漫长伤感的友谊。我像刺猬一样，从来没有鸡奸过。”事实上，他一直对生活愤愤不平，“说实话，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凯瑟琳写给古德伊尔的未寄出的信经过删改收入了《日记》中，他收到的回信可能是草稿，“是的，你脾气不好，多疑，易怒。”她写道（1916年3月4日）：“如果你认为我在引诱你，那你就错了，所以不要再提你那什么5个妓女、一个刺猬的故事了，不要再给我开列你那大理石殿堂的清单了，虽然过去在那殿堂里漫步不失为一种快乐。”接着她写了一段逗人发笑的话，说她多么厌恶法国家具——那么不舒适，只有床才是唯一的去处：“我十分理解所谓法国人的道德败坏。你简直是被迫上床的——不管同谁。”

这封信没有寄出，但是4月9日——此时默里夫妇已到了康沃尔劳伦斯夫妇那儿——古德伊尔冷静严肃地给凯瑟琳写了一封信，批评她的性格和态度，比4年前奥列加的批评更使凯瑟琳深受感触。他希望她能变好，因为他喜欢她。在一段玩笑式的开场白之后，他写道：“我接下去要教训你一番”。

过去你对生活要求很高，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认为抢劫和掠夺就是好生活，你一心一意地以自己成功的撒谎和欺骗为荣，毫不留情地公开鄙视社会团体中的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公平交易。现在你却说人性总而言之是令人厌恶的，这是你过去一贯的态度，不过那时你更默默无闻。你仍然使自己与世隔绝，然而承认（我认为是通过经验教训）有一种过去你未意识到的力量。因此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再次讲和或回到过去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

第一条路采取的是一种准基督徒的宗教姿态；第二条则更有哲理性和自我克制精神。如果她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也可以是正确的，只需把自己封闭起来即可。

但是你渴望并深切地感觉到与外界的交往，你似乎是足够幸福和平等地生活于一个由声音、气味、绿草、露水、咖啡馆的镜子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物和现象构成的国度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予人交往，他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除非你像包法利夫人一样，一直对日落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怀有艺术家的伤感”。

是否人们那种野蛮竞争的 w.L. 乔治式的态度迫使她如此呢？每一叶小草，每一颗可爱的花蕾都是一样的，事实上看起来越可爱，就越能打动她的心。“我觉得人和事物的文学意义过于单薄，不值得去体验，这会使生活削弱为单纯的批评过程。如果放弃批评，就能得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个潜在生长的过程。”他并不认为事物具有引人入胜的文学意义，有助于人们写作，至少不是有意如此。某种积极的生活（她曾经表示过积极生活的愿望）很可能帮助她松弛一下那“过于紧张、失去弹性的文学神经”。

积极的生活并不一定是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具有外在目标的生活，“不仅仅是观看，享受或者厌恶。”

你将要一直努力工作，每天早晨起来都要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总而言之

之，积极的生活颇有益处，当然，必须完全用于你自己的目的——它并不会无缘无故地吸引你。

没有哪一个了解她的人——既不是经常见到她的劳伦斯，也不是奥列加，当然也不是默里——比古德伊尔在这封信中更为尖锐地指出过凯瑟琳对生活、自然和艺术所取态度的不足之处，“你那过于紧张、失去弹性的文学神经”——寥寥几字，就将她概括了。

实际上古德伊尔认识作为作家的凯瑟琳比默里还早，因为奥列加曾将他的一篇文章同她的第一篇来稿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他告诉她“当我第一次在《新时代》上读到《德国公寓》时，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女人还年轻的话，她绝对会有出息。但我肯定她已结了婚，45岁，已至更年期。所以我那时没有写信，也许还是不写的好，因为这不是我的职责。

这以后他们只短短地见过一次面，那时古德伊尔在英国休假。1916年下半年，古德伊尔显然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桩婚事，决定要求上前线，结束这种烦闷的生活，这次轮到他厌世了。

1916 年，康沃尔

你们很幸福，我非常高兴。只有这样才能幸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亲密相爱，不管世上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傻瓜才会去为世人担忧。一个人应该恋爱，感到幸福——这就够了。除非还有一些能使自己更幸福的朋友，那就更好，让我们一起幸福吧。

——D.H. 劳伦斯

1916 年 1 月 17 日

应劳伦斯的盛情邀请，1916 年 4 月初默里夫妇去了泽勒，接下来的一年凯瑟琳没有写什么自己认为值得保留的东西，没有哪篇故事是在康沃尔度过的那 5 个月中写的，也没有记日记，以后在伦敦的 7 个月也几乎搁笔，是否古德伊尔说的真心话使凯瑟琳在这整个阶段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失去了信心呢！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凯尔特康沃尔“布满了巨大的石头”，劳伦斯夫妇表现出来的疏远和烦恼，再加上不停地搬家，虽然每次搬家都有很好的理由。

“凯瑟琳看上去像个移民”，这是弗丽达在她写的书《不是我，而是风》中说的话……她讲述了默里夫妇到达时的情景：

“他们高高地坐在堆满家具什物的马车上，沿着大路向特雷格森驶来”——这使人们想起了另一位移民亚瑟·比切姆，他的鸡听见打点行李的声音时，就会乖乖地伸出脚来让主人捆绑。

自从 1912 年默里和凯瑟琳同居以来，他们少说也搬过 16 次家，而凯瑟琳本人自从 1908 年来到伦敦，则换过 29 次通信地址（还不包括她去比利时的旅游或同加纳特·特罗维尔的小住），自从遇见劳伦斯后，受他影响就搬过 6 回，第 7 次也近在眼前。也许就默里夫妇和劳伦斯夫妇这么 4 个时代的产物而言，遗传因素并不重要，但是那些祖先的母鸡确实一直在挠着他们的背脊。

乱七八糟的什物是从呵卡西亚路拿来的，他们在泽勒阶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永远不会喜欢这个地方”，凯瑟琳说），买了一些廉价的旧家具，告诉邮递员把他们的邮件送到劳伦斯那儿，然后开始用涂料和油漆装饰另一所农舍，劳伦斯也热情地做帮手。

上特雷格森由两幢瓦片铺顶的建筑构成，曾经包括 5 个小小的工人住所。“农舍”在沿海朝东的长房子里，三个住所全部打通，这也就是默里夫妇一年花 16 英镑租下的。另一建筑里的两所农舍面对大海，一幢空着，劳伦斯夫妇住了另一幢——一间楼上，一间楼下，还有一个长长的贮藏室——一年 5 英镑。他们共用一个户外厕所，去山上取泉水，上特雷格森的农舍与农庄不同，特雷格森本身离海更近。

在切斯汉，当弗丽达说到劳伦斯像“公狗对待母狗那样占有她”时，当然只是泛泛而谈，但根据《恋爱中的妇女》中“远足”一章来看，也许有所指。不管什么地方不对，默里相信错处全在弗丽达（凯瑟琳有次给杰克写信说“她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胖家伙，劳伦斯真是糊涂了”）。

康沃尔郡的一个地名，劳伦斯当时住在那里。——译注

这是弗丽达写的一本有关她自己与劳伦斯结识以来共同生活的回忆录，成书于 1934 年，知识出版社（沪）据格兰达出版公司 1983 年本译出，于 1991 年出版。——译注

当时，弗丽达正对奥特琳夫人心怀怨恨，默里夫妇到达的那个星期，弗丽达还写了一封信给她，狂怒地发泄一通，指责她“傲慢无礼”，想同劳伦斯建立“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几天以后，邮递员像往常一样，给了劳伦斯夫妇一些默里夫妇的邮件，有一封信来自佳星顿，显然弗丽达偷偷拆开了信封，或仅仅凭直觉知道其中附寄了她的那封发泄怒火的信，因为过了一小时左右，劳伦斯就直截了当地对默里说，“奥把弗丽达的信寄给了你们”。

在这件事中，劳伦斯完全站在弗丽达一边，费了很长的时间企图说服默里和凯瑟琳，说他们继续做奥特琳的朋友是对他的背叛，所以应该同她“大闹一场”，虽然仅仅为了劳伦斯夫妇的原因，还是最好不要这样，等等。

于是默里试着对奥特琳分析他们的情况，他说劳伦斯现在在许多方面似乎比过去更为年轻，更为幸福，但他为这种幸福付出了代价，而且肯定失去了什么：“我觉得他将来不会再创作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此时劳伦斯已开始重写《恋爱中的妇女》，象征性地描述两对确实与他们4人有些相像的情侣。）

至于弗丽达，“我们真的很怕她”，总有一天她会对默里夫妇翻脸。因为她觉得他们威胁到她现在对劳伦斯所占的上风。三年以来他们一直尝试去喜欢她，但她“绝顶庸俗”，使他们望而却步；也许同样的原因使她把矛头对准奥特琳：不再是有钱雇三个仆人的男人的妻子，她觉得自己降低了身份，因而鄙视自己。默里他们一搬进自己的农舍就要开始写作，而目前住在旅馆里，“悬在半空中”。

正在此时邮递员送来了古德伊尔对凯瑟琳的“精神分析”，接下来就是她写作生涯中最长一段时间的辍笔（或自我抑制）。

尽管有弗丽达的愤怒，最初在这小“团体”中还有着愉快的时刻，一月份劳伦斯还称默里是“仅有的几个我信赖的人之一”，现在两人将背着旅行袋高兴地登上去圣·埃维斯山的路程。劳伦斯像一位友好的园丁，让默里觉得他身上有些东西值得发掘，但劳伦斯真正想从杰克那儿得到的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而一旦他有所发觉，就会马上退缩。此时劳伦斯开始谈到兄弟情谊，暗示说他们之间需要一种牢不可破的神圣兄弟关系，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默里马上退缩了，但是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拒绝对劳伦斯意味着什么——虽然《普鲁士军官》可能会使他明白——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说《恋爱中的妇女》里的茹珀特·怕钦就是劳伦斯，或杰若德·克莱奇是默里当然不对，但事实上劳伦斯正坐在农舍里写一本小说，其中有一个男人，像他一样渴望能爱一个女人，却不能够（因为同女人在一起，他觉得或者有过多的姐妹般的爱或只有一种“残暴原始的欲望”），同样是这个人觉得自己受两种男人的吸引——一种肤色白皙，四肢灵活，双眼透出晶莹的蓝色，另一种有着“人们似乎能够投身于其中的漆黑的双眼”，“黑色肌肤，柔软，发出夜的芬芳的男人”，用“笼罩一切的沉重漆黑的双眼”凝视着，这些话出自1968年才第一次发表的《序言》。

后来在小说中，当茹珀特渴望“进一步交往”时，杰若德在那笼罩一切的沉重漆黑的凝视下退缩了，事实上在上特雷格森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形。

与此同时，凯瑟琳感到沮丧，因为“一切似乎都是大石头堆成的”，觉得她波琳别墅的杰克被别人从身边拖走了，而且正被引入歧途，学会了以她

觉得非常荒唐的方式看待生活。她给贝阿特丽丝·坎贝尔写信说，“我绝不会在树上，在流动的小溪中，在石头上看到性，在一切事物中看到性”，但在她的信中没有一丝一毫暗示同性恋，她像默里一样根本就没往这上面想，而且她认为弗丽达该为所有这些“象征”负责。

凯瑟琳觉得他被劳伦斯所吸引，开始感到自己陷入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的情绪之中，而一旦凯瑟琳感到悲伤，默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立刻重新回到她的身边，这对劳伦斯是灾难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常常大发脾气——这与他的疾病有关——而现在就更是频频发作了。

最糟糕的一次——默里对其令人厌恶的细节缄口不言——发生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凯瑟琳告诉柯特她目前同弗丽达已不说话，与劳伦斯也极为疏远，完全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他俩之间的情景，她不知道哪种情形更使她恶心——他们相爱，互相嬉戏，还是他们高声叫嚷，劳伦斯扯着弗丽达的头发，说“我要割断你的喉咙，你这婊子。”他的身体再也健康不起来了，任何一件事，如果有人意见与他不同，他就暴跳如雷，直至精疲力尽，站立不稳，非得躺到床上去不可。只要有争议，他就说因为你性生活不对，精神卑劣。凯瑟琳说“目前他真有些偏执狂”，因为弗丽达让他够受的。

5月5日是星期五，凯瑟琳去他们那儿喝茶，非常不巧，提到了雪莱，弗丽达说“我认为他的《云雀》是一派胡言”，劳伦斯说道，“你这样说不过是想炫耀一下，雪莱的诗你只知道这首。”于是弗丽达说“我真受够了，滚出去，你这万能的上帝，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你到底闭不闭嘴！”劳伦斯说，“我要给你一巴掌让你住嘴，你这臭女人”等等。凯瑟琳逃了，一口气跑回家。

那天晚上劳伦斯来同凯瑟琳和默里一起吃饭，但是弗丽达不肯过来。劳伦斯说，“如果她敢靠近这张桌子，我要割断她的喉咙”。晚饭后弗丽达来了，在屋外的夜色中来回走着。劳伦斯突然猛地朝她奔过去，他们开始尖叫撕打，他打她的头，脸，胸脯，扯她的头发，而她大声向杰克求救，“保护我，救救我！”然后他们冲进默里的厨房，绕着桌子跑着——劳伦斯气得脸色发青，退后一步，挥手上前，“给了这个肥胖女人一掌”（凯瑟琳告诉奥特琳），“然我为劳伦斯感至非常遗憾，却一点也不同情弗丽达，后来默里告诉我他也有同感——他根本不觉得是一个女人在挨打。”

然后劳伦斯倒在一张椅子上，弗丽达倒在另一张上，没有人说一句话，“除了弗丽达的抽泣声和吸鼻子声外，屋内一片沉寂”。劳伦斯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坐在那儿盯着地板，咬着指甲，很久以后才抬起头来，问了默里一个有关法国文学的问题，默里回答了，三个人渐渐地坐到桌子边上来，弗丽达给自己倒了一些咖啡，半小时以后他们几乎和好了，开始“同时记起他们曾经吃过的一种非常好吃味浓的，但价格昂贵的通心粉奶酪”。

第二天弗丽达躺在床上，劳伦斯把饭给她端上楼去，并且开始为她的帽子缝花边，到了下午，她唱了起来（“故意地”），劳伦斯也加入齐唱，挨了一顿打后，她似乎精神好起来，好像对此感到津津有味，因为她开始为自己做衣服，在头发上插花，用小女孩的嗲声嗲气同劳伦斯说话，“这使默里和我目瞪口呆，十分厌恶——尤其是感到厌恶！”

戈登·坎贝尔的妻子，坎贝尔本人1915~1918年任英国军需部助理审计官，他与劳伦斯、凯瑟琳等人都
有较密切的来往。——译注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他身上那个两人都曾经爱过的“亲爱的人”隐藏起来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就像一只小小的金戒指埋藏在弗丽达这个庞大的德国圣诞布丁中，食欲最旺盛的人也不能吃尽弗丽达找到他，只好一旁等待着有人拿刀来把她切成碎片，那时他才能重见天日，重新闪光。但是他自己并不想发生这种事。”

在默里和凯瑟琳所有的信件中，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劳伦斯不好，只有对他的同情和遗憾。默里夫妇开始另找住处，这两对夫妇各自躲进自己的小屋，各自庆幸自己的爱情与另一对不同，各自都使用了“厌恶”这个词，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种狭隘火热的亲昵令人厌恶，这些结了婚的人，关上房门，把自己囚闭于这种不与外界交往的结合之中，虽然是爱情，也使他感到厌恶”。

就这样戈珍和杰若德被描写为走向毁灭，而至于他们的原型，事实要简单得多，也更近人情。杰克和凯瑟琳那时只是彼此相爱，就像人们有时做的一样，不想让人打扰，但是那时恰好在写《恋爱中的妇女》的人却觉得厌恶，恶心。

虽然人们一般认为戈珍和杰若德是凯瑟琳和默里的写照，他们自己在此书发表时，却不这样认为。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故事情节（戈珍离开杰若德去找莱尔柯）出自柯尔斯伯里那场戏（凯瑟琳为了格特勒离开默里），而非出自他们的真实生活，只有开始的几段话劳伦斯写时似乎心里想到了凯瑟琳：“戈珍是一位雕塑家，爱好小事情，喜欢带着不动声色的好奇心观察人们，表现他们的真实面目，使他们固定不变，直至把他们完成，加封，盖章，然后对她来说就算完了。”

她那“绷得过紧失去了弹性的文学神经”已在这种积极的生活中找到安宁，松弛下来了。

有一封给贝阿特丽丝·坎贝尔的信是她心情不好时写的，当时屋顶漏雨，地板上散放着水罐接雨水，她说自己刚刚重读了一遍《芦荟》，“现在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默里夫妇以居处潮湿为借口，开始在温暖树多的南海岸寻找房屋，在离此30英里的梅勒，名叫卡里罗兹的港湾边上，他们找到了一所年租金18英镑的迷人的小屋。他们6月中旬搬走了，留下劳伦斯和弗丽达去看海鸥同渡鸦争斗。同劳伦斯分手时，默里觉得自己已对他说过永别了。然而三星期后，他们出乎意料地又见面了。

向阳小屋坐落于一潮水河旁的树林中，是默里夫妇所知的最美的住宅。有一个菜园缓缓伸向水边，河对岸是安静的田地，可以弄一条船划划，默里很想这样做，但他唯一的收入来自于为《文学副刊》写评论，因此只好租了一条小艇，他从费尔默斯回来，装了一船旧法语书，不停地读着，而凯瑟琳发现他对她疏远了，她自己没有不停地写作。他俩之间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她又想逃避；10天以后，她写了一封措辞隐秘的信，告诉柯特她将要去伦敦，等见面时再告诉他自己的打算。

这时古德伊尔从法国回家休假，来此小住。他获准休假，因为接受了一项可以上前线去的任务，表面上他是来看默里和凯瑟琳两人的，实际上更可

《恋爱中的妇女》中的女主人公之一。——译注

英国一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西南角。——译注

能是再一次纵容自己对凯瑟琳隐藏的（或没有隐藏的）爱，发现她不快乐。似乎他使她产生了去丹麦的念头，他很熟悉这个国家。

他表示想去见劳伦斯，因此默里不得不带他去泽勒住一个晚上（睡在凯瑟琳搭的地板上），于是劳伦斯听说了目前的情况，告诉柯特说默里夫妇俩“有约在先，两人都是自由的”。凯瑟琳写信给柯特说自己准备进城，同坎贝尔夫妇住在一起，想找几间房，还打算9月去丹麦，她写道，“现在我感到生活美好，不同往常，因为我又自由了。”

劳伦斯7月10日对柯特解释说，凯瑟琳想逃避自己，但“也逃避默里，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也许在丹麦的小憩可以有些益处，这以后我但愿她能安下心来——独自一人。”劳伦斯很容易做到这点：他正在写字。

古德伊尔大约是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去的他们那儿。1916年7月1日，英国军队对松姆河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最猛烈的战争行动，古德伊尔最迫切的念头就是赶快赶到那儿。拜访泽勒时，他轻松的虚无主义态度使劳伦斯大为震惊，古德伊尔对自己在皇家气象处的工作厌烦透顶，一心想去前线，对劳伦斯的怀疑他只是一笑置之。唯一的办法是请求执行任务；他回不来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告诉凯瑟琳的“丈夫”，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事情。

默里非常喜欢古德伊尔，也像别人一样对他的将来寄予很大的希望，松姆河的大屠杀刚刚开始，又听见他以这种口气说话，默里当然感到心情沮丧。凯瑟琳几星期以后写的信回忆起这次拜访，仍流露着悲伤，显然小屋中三人都感到了这些笼罩着他们的极度不安的情绪。

同时，作为逃避计划的一部分，凯瑟琳也安排好了去访问奥特琳·莫瑞尔夫人的佳星顿，那是战时艺术和安宁的避风港。她7月8日去伦敦，柯特在帕丁顿迎接她，在圣·约翰伍德坎贝尔夫妇那儿住了几天后，她去了佳星顿。默里收到了她写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露自己离开他时心情多么不愉快。她秘密的朋友柯特明白她正在“离开”默里，并同格特勒谈到这件事，后者却预料她不久就会回去。

莫瑞尔夫妇，也就是奥特琳夫人和她的丈夫，自由党下议员菲利普·莫瑞尔，以前住在贝福特街，那一地段属于布卢姆斯伯里——但他们从不是一——也不想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一部分，两人虽然同他们有些个人之间的友谊，但也像凯瑟琳和默里一样，只是布卢姆斯伯里现象的旁观者。

佳星顿那所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宅第连同1500公顷土地，是通往牛津大学的自行车行驶场地，不仅学生们使用，奥特琳夫人自己也使用。莫瑞尔夫妇在战前就买下了它，但直到1915年才获得所有权，这样做是为了使其成为艺术家以及和平主义者，包括奥特琳夫人以前的情人伯特兰·罗素躲避战争的地方。

到了1916年，这儿各种各样的小屋中已安置了许多拒服兵役者，名义上说是农场工人，其中有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姐夫克莱夫·贝尔，他是道地的布卢姆斯伯里，像李敦·斯特雷奇一样，是这儿的常客；而多萝西·布雷特，绝对的布卢姆斯伯里圈外人士，也经常来此——实际上几乎等于住在此地；马克·格特勒和卡林顿，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也常来常往。劳伦斯惧怕弗丽

即松姆河战役。1916年7~11月，英法联军在法国北部的松姆河对德军发动西线进攻，旨在减轻凡尔登地区德军对法军的压力。英军在这次战役中首次使用了坦克。——译注

达，曾经谢绝过住进一幢小屋，因为她痛恨奥特琳夫人；年轻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因为视力不好，免于服役，不久也将住进来；伯特兰·罗素是常客；而其他人则成群地来此度周末——7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加入了此行列，她同那位瘦削的米德尔顿·默里的关系，人们只有通过巧妙的询问才能略知一二。

那个周末的客人包括李敦·斯特雷奇和卡林顿，大卫·加纳特、弗里德贡·肖夫、C.F.肖特和J.T.谢泼德（他后来是剑桥皇家学院的院长，目前在作战部的一个部门工作）。这些是在登记簿上签名的，但是斯特雷奇写信告诉维吉尼亚·吴尔夫，他记不清来了多少人，当时正在迷迷糊糊打瞌睡，10多人的脚步声和自动钢琴演奏的狂热的拉格泰姆乐曲声把他吵醒了：

这些乱哄哄的人群中有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如果这是她的真实姓名的话——这点我从不能肯定，你听说过她吗？读过介绍她的文章吗？在一份你也许见过的可怜的小刊物《信号》上她以玛梯尔德·贝林的名字写过一些相当——或非常——了不起的小故事。她确实是个有趣的人物，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足够神秘。

他说过一些称赞《远航》的话，想会见作者，因此斯特雷奇说他认为可以安排，他真的认为维吉尼亚·吴尔夫会觉得她很有趣：“我还要说明她有一张丑陋而无表情的面具似的脸庞——木头雕刻的，褐色头发，分得很开的褐色眼睛，藏在后面的是有些庸俗幻想的敏锐才智。”吴尔夫的回答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三年来一直追随着我的踪迹”，但她从没见过凯，也没读过她的故事。

奥特琳在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这些周末，“他们常常在星期五或星期六蜂拥而至，有的骑摩托，有的乘坐火车来”。她的记述表明她典型的宽宏大量，这一点远远超过有些客人留下的回忆——而且也更多地提到她忠实的家庭成员所起的作用（而她的客人们写到的那些拜访时，似乎仆人根本就不存在）。

农场提供大量的食物，但甚至连大房子也没有足够的房间来容纳所有的客人，也没有现代化的管道设备。佳星顿只有一个浴室和一个盥洗室，都在楼上，一个园丁每天抽水上去，为此他每天需花一个多小时来对付一个设在外墙边上的半旋转水泵。

仆人们每天早晨还得清除所有那些“泛滥的约旦河”。

在夏天的周末，客人们挤在桌旁吃过饭后，吵吵嚷嚷地拿了游泳衣（由奥特琳提供），就在用作游泳池的观赏池里扑腾开来——水有些脏，但总比水沟好，然后他们就坐下来，或四处躺着，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

多亏凯瑟琳，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闲聊能够领略一二。一篇刊载在《新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是《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

——译注

拉格泰姆，一种起源于美国黑人音乐的早期爵士乐。——译注

《远航》，维吉尼亚·吴尔夫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译注

这是一句俏皮话。约旦河为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内陆河，河水流入死海，该河水流量变化极大。在56～1700秒立方米之间。在这里主要是说大房子排水管道不畅，易造成积水现象。——译注

时代》上的文章是她 10 个月以后写的，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当时那种闲聊最刻薄的描述：

5 个年轻人：聪明的克莱夫、大卫和奥尔德斯们在一个阴暗的大起居室内没完没了地争论，两人抱膝坐在地板上，一个蜷在沙发上，用黑色裁纸刀裁开一本法语书，每个人都极其悠闲自在，他们头顶光圈的女主人（奥特琳头发上搽过发乳）不时轻声说：“太对了”或“你真的这样认为吗？”他们正在谈论法国，虽然几乎不涉及在松姆河发生的事情：第四位绅士：但是请注意，我想说的只是在我看来法国人的肆无忌惮似乎证明他们的确相信人是真正有理性的动物。你们不反对，是吗？我的意思是——嗯——去他的！他们的文学以此为基础，对吗？

第二位绅士：依你说，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现实主义中寻求灵感，是吗？

第四位：（居高临下地）当然，绝对如此，你还能怎么解释呢？

第一位：如此说来，“谨慎”的民族，例如美国人就相信人不是有理性的动物吗？

第五位：（非常尖酸地）英国人说有些事是不能谈论的，肃静，关上门。

第三位：（相当兴奋地）但是听我说——只半分钟——不要扯得太远了，这很有趣，现在我们真的有点眉目了，如果你们说的有道理，那么谨慎就是迈向真正艺术的第一步——对吗？我们说的谨慎又指的是什么呢？谨慎是虚假的害羞，真正害羞的反面，而后者又是崇敬的反面，崇敬是优点，是伟大艺术必须具有的东西。对吗？

凯瑟琳避而远之了。她 7 月 13 日，星期四到达，显然打算多呆几天，但周末以前她就写信给劳伦斯和贝阿特丽丝·坎贝尔，明确告诉他们自己星期一将回家去。无论这种突然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她确实成为自己一些故事中描写过的谨慎的妻子；格特勒告诉柯特，他自己到达佳星顿时，她已离开了，说早就预料到了。柯特回答说：“你关于夫妇的格言又一次被证实了。”他们可能同时都想起了卡尔科插曲。

在松姆河的进攻——90 英里的喧嚣——已进入第三个星期，此时凯瑟琳离开了佳星顿的草地池塘，回到默里身边。7 月 1 日，在一天一夜之间就有两万英国士兵死于战场；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40 万士兵死于机关枪或炮火之下或死于脓肿溃烂，死于那个夏天伤员们居住的闷热的铁皮小屋中；紧接着又传来了默里年少时两位好友死亡的消息。如果事实真相能够在报纸上刊载出来，正在英格兰享受 8 月份美好时光的人们可能几乎不会相信。古德伊尔仍在受训，在他的文稿中有一段题为《气象员的自白》的诗歌，是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写的，下面是那首诗的结尾几行：

但是没有时间悲哀，明天我就要化作尘埃。

悄然甜蜜地解体，慢慢轻柔地归入虚空世界。

我感到你悄悄地来临，那减弱的微光似在迎接你的到来。

我看到我的小诗，渐渐不如以往那样“帅”。

直到有一天失去了敏感，告诉我该说的已说而不必再等待。

让我在黄土中掩埋，等待着安息和蛀虫的作怪。

古德伊尔以埃塞克斯 军团一位军官的身份在 1917 年 3 月去了法国。5 月 17 日，他从阿腊斯 附近的一个加拿大伤员治疗站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几天前一颗炸弹将他埋在战壕里，炸碎了他的左腿，脚被锯掉了；他收到了他所要的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他“今天早上感觉好些了”。但另一只脚不久也被锯掉了，他死于 5 月 23 日，似乎还未来得及阅读乔伊斯那篇有关爱过并死去了的人们的故事，及其结尾处那美丽的句子。

战争也向默里和凯瑟琳迫近，在康沃尔时，就有新的征兵信送到默里手中。在梅勒，默里去过征募中心，再次体检，被归入 B·2 类。虽然他眼睛近视，不能参加战斗，但可以去劳动营，也许将被送往亚丁 建造防浪堤。一位好心的上校说这对于一位牛津大学生太过分，他应该做翻译或诸如此类的事，他没有朋友能够帮忙吗？因此默里只好求助于老交情，给埃迪·马什写信。

他说自己不是胆小鬼，但不想被雇去在西姆拉清扫总督的花园；

到 10 月 1 日他必须找到一项为国效劳的工作，埃迪是否能帮忙介绍一下？

8 月，按照马什的安排，默里去伦敦看能否在内政部找到一个工作（没有获得），凯瑟琳留在梅勒，不知前景如何。他还去了佳星顿，J.M.凯因斯和 J.T.谢泼德都在。克莱夫写信给妻子瓦妮莎说，凯因斯没有尽力帮忙，他本来可以在高级官员面前通融一二，“多帮帮”某些朋友，例如“默里将被发配去亚丁的劳动营，我们都很喜欢默里，问过梅纳德是否能帮忙，他拒绝了。谢泼德上周末来此，立刻替他在作战部找到了一个好工作，每周 5 英镑。”

默里的小说《静物画》在经过许多次退稿后，终于由康斯特布尔 出版，但得到的反应极其冷淡，在所有佳星顿的通信中无一字提及，凯瑟琳的信中也没说什么，只有劳伦斯对柯特说那“只是堆砌辞藻而已，又是那种莫名其妙，变态的自我扭曲。”

劳伦斯和弗丽达确实在夏日的某一天到梅勒回访过，虽然有些不大情愿。当他们乘坐小艇沿河而上野餐时，一阵狂风几乎使他们掉入河中淹死，但问题不仅在此，显然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不对头。

默里告诉奥特琳，“他回家后给我写了一封恐吓信，这是我从他那儿收到的语气最为激烈的信，说我有同威廉·罗伯森爵士一样的灵魂，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更聪明，或更不喜欢他。”罗伯森将军是帝国总参谋长，劳伦斯是针对默里愿意为作战部效劳而言的。

埃塞克斯：英国东南部郡名。——译注

阿腊斯，法国北部城市。——译注

指乔伊斯的名篇《死者》。——译注

亚丁，也门首都。当时也门为英国殖民地。——译注

J.M.凯因斯（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书被认为可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相媲美。他的不少经济思想对英美等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影响。——译注

伦敦一出版社名，以创办人康斯特布尔（1774～1827）命名，曾一度独资经营《不列颠百科全书》。——译注

默里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也在 8 月出版，他仍寄了一本去泽勒，换了任何别人，得到那样的对待会立刻终止他们的友谊。劳伦斯不过“随手翻翻”，含沙射影他说默里像讨厌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企图发现真理，还令人厌恶地扭动着屁股。陀斯妥耶夫斯基也可以同样地把头夹在两脚之间，在空中扭动着屁股。

他说，“你想独自一人，我也想这样，不想被任何人，不想被世界打扰，那一切我都觉得卑鄙下贱，散发着臭气。”至于她，“我不知道凯瑟琳将要做什么，”两天以后，他对柯特说，“我也不关心，我厌烦他们，真的。”

凯瑟琳跟着默里去了伦敦，他在作战部做翻译，9 月初就要开始工作，因为没有地方可住，他们只有暂时分开，凯瑟琳睡在布雷特在沃尔斯柯特附近的工作室，那儿只有一张床；默里去了贝福特一家廉价的旅馆，他们的家具都暂时放在梅勒的小屋里。

均为伦敦地名。——译注

均为伦敦地名。——译注

高尔街和佳星顿

我把珍贵的书寄回佳星顿，花了我不少时间读它，像往常一样，我认为信件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文学形式，它们能如此令人惊异地叙述事实，对吗？读到最后我觉得自己似乎在那些人中生活了多年，但是谢天谢地我不在其中。

——斯特雷奇致奥特琳·莫瑞尔夫人
1916年10月31日

无论在康沃尔曾发生过什么事，都不能使凯瑟琳改变对自己相信的那个劳伦斯的忠诚——她回伦敦几天后就证实了这一点。

一天晚上，她同柯特和格特勒一起去皮卡迪利广场的皇家咖啡馆——劳伦斯轻蔑地称为“外界”的地方，当时那儿是波希米亚人和作家常常光顾的场所，威廉·奥彭的一幅画曾传达过其中喧闹花哨的气氛：

狭长的大理石桌子，绿松石柱，乔治·莫尔，奥古塔斯·约翰和妮娜·汉姆尼特的脸庞出现在顾客中。同凯瑟琳他们坐在同一张桌旁的几个人拿着一本劳伦斯的新书《阿摩斯》，正在讥笑其中的诗歌，凯瑟琳按捺不住，彬彬有礼地要了这本书，站起身，拿着书走出了咖啡馆，柯特和格特勒跟随其后。

这事柯特讲给了劳伦斯听，就成为《恋爱中的妇女》里“戈珍在庞巴杜咖啡馆”这一情节。人们一直以为那晚上讥笑的人是菲利普·黑塞尔丁和迈克尔·阿伦——他们被认为是小说中角色的原型，但事实上当时两人都不在场。

第二天，格特勒和当时不在场的奥尔德斯·赫胥黎都写信告诉了奥特琳实际上的情景，两人的叙述都暴露出自由英格兰的种族主义态度。格特勒说他和柯特以及凯瑟琳（一个波兰犹太人，一个乌克兰犹太人以及一个殖民地人）发现咖啡馆已经客满，只好坐到一张已由一个黑人占住的桌子旁去，“也许是印度人——但属于瘦弱型”，他们几乎没注意他。过了一会，“一个白鲱鱼一样瘦长的女人，火红色的头发高高盘在头发上”来同他坐在一起，接着又来了一个黑人。

我们立刻开始讨厌这三个人，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居然谈起“学问”来——他们是黑人大学生——用的是字斟句酌的“标准”英语，他们谈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新时代》，现代派味十足，这已让我们足够恼火，但是想象一下这时我们的惊骇和痛恨吧！那个头顶干牛粪的红头发拿出一本劳伦斯的诗集，开始同另一人谈起劳伦斯来，用的是那种仔细挑选的长字眼。我们一直对他们耿耿于怀，现在知道该采取果断措施了。

我们坐在那儿想着，突然凯瑟琳朝他们甜蜜地一笑：

威廉·奥彭（1878～1931），英国画家，尤以肖像画著称。——译注

乔治·莫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批评家。——译注

奥古塔斯·约翰（1878～1961），英国油画家、壁画家、版画家。他的肖像画以有力地深刻表现当代政界及艺术界杰出人物的性格见长。——译注

妮娜·汉姆尼特，生平不详，英国画家。——译注

“让我看看那本书好吗？”“当然可以”，他们全都笑咪咪地说——笑得比她还更甜。想想他们的惊骇和不知所措吧：凯瑟琳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拿着书，我们泰然自若地跟着她——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咖啡馆！！

凯瑟琳从没有喜欢过妓女，或那些她认为像妓女一样的人。

奥特琳可能同时收到赫胥黎的来信。赫胥黎当时 21 岁，即将加入佳星顿“体力劳动者”的行列。凑巧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他遇见了“黑人大学生”中的一位，听了他的叙述，知道奥特琳夫人认识他——他就是那位印度法学生 H.S. 苏哈罗迪——立刻把消息告诉她。

赫胥黎写道，“伦敦到处都是这些牛津的印度人，这些长着鬼脸的怪孩子无处不在，迈着大脚板到处跑，在公共汽车上，地铁车站，公共厕所和餐馆里随便亲昵地拉扯别人的袖子，你躲都躲不开他们。……”赫胥黎接着说苏哈罗迪认出了格特勒（曾在佳星顿见过），但说不出“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名字。苏哈罗迪说，书一到她手中，那三个人就一阵风似地走了，乘出租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奥特琳夫人当然非常感兴趣，告诉了赫胥黎她从格特勒那儿听说的事情，赫胥黎又写了一封信探听更多的消息；这封信送到了凯瑟琳那儿，她并没有觉得好笑，回答说：“我对苏哈罗迪不大了解，他是不是去年冬天在劳伦斯那儿的一个印度学生？无论如何，赫胥黎的那封拖拖拉拉的信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告诉他不可……。”

同时，柯特则去上特雷格森讲述了一番；劳伦斯写道，“你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夜让我的心都抽紧了，我吓坏了，当我想到伦敦，皇家咖啡馆——你确实在那儿，还有凯瑟琳，恐惧压倒了我……真让人害怕。”没有一字对“戈珍在庞巴杜咖啡馆”表示感激——也没有写信给她，然而写书时却照搬了上去。

皇家咖啡馆插曲过后不久，弗丽达来伦敦住了几天，她不想见凯瑟琳，但是见了柯特和格特勒，告诉他们有关默里夫妇的事情（包括默里的“欺骗”，“吝啬”，还说到凯瑟琳把他扔在梅勒，去对柯特倾诉衷肠）。第二天弗丽达从汉姆斯特写信给柯特，“我知道她什么都不会承认，但他们具有那么多优点，我们有必要帮助他们克服不诚实的缺点。”不管说了些什么，不管是否真实，这件事使柯特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同默里夫妇断绝了一切关系。

默里夫妇显然也知道弗丽达说了些什么，但保持沉默，不再写信解释。劳伦斯告诉柯特（11 月 7 日）“我同默里夫妇一刀两断了——谢天谢地。”弗丽达则说“事实上我们的关系算完了，但是如果此时她来，我还是会好好待她，她天生具有套近乎的才能，很会亲热人，但长此以往总没有好处。”这次过了两年以后他们才相见。

凯瑟琳又去佳星顿呆了一个星期，同卡林顿合住一间房，后者兴奋地写信告诉格特勒，“现在我有那本讲粉红色头发的妓女的书了，凯瑟琳把它给了我！道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题材”。同一封信还告知她和默里夫妇计划同布雷特一起合租下高尔街 J.M. 凯因斯的房子，这样他们就全部搬进了布卢姆斯伯里，在接下来的 9 个月里，布雷特成为凯因斯的二房东，其他人则是房客，租金每季度 27 镑 10 先令，4 人分担。默里夫妇住在一楼，靠近前门和电话，布雷特住隔壁，卡林顿住在顶楼，凯因斯的管家查普曼小姐留了下来，住在地下室。

在高尔街的房子腾出来以前，默里夫妇住在布雷特的工作室里，默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使自己适应有规律的生活，适应他在军事情报部的工作。谢泼德担保说他精通德语，这意味着他必须把每一分钟空余时间都花在死记硬背这门语言上，才能对负责的上校隐瞒自己此方面的不足，结果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了，我不顾一切地拚命工作，心智处于僵化状态，生活，或者说我认为的那种生活已经停止了。”

实际上当他写下这些话时，忘了自己在莫瑞尔夫人那儿找到的安慰：

我有时会奇怪地怀疑自己爱上了你，我不知道，很难表达我的感觉，我对人们的感情一般很少超过觉得有趣或害怕，但是当我想形容自己对你的感情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爱上了你。

就这样，出生于贫民区的杰克·默里开始了一种感情的自我怀疑，其中掺杂着曾经身为无产阶级一员的缺乏自信，同他和莫瑞尔夫人对战争和艺术的态度纠缠在一起。像她一样，他现在认为战争是将人类变为机器过程的一部分——他很快就忘记了老百姓们，包括自己以抄写为生的父亲在内一直是如何生活的——这两人现在开始一来一去地写信讨论“另一种生活”摈弃艺术，“仅仅是巨大的机器而已”。另一方面，奥特琳得知伯蒂·罗素去了高尔街，很得人欢心；默里11月2日写信说，“我们非常喜欢他，同他谈话是我们这阴沉可怕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如果默里爱上了奥特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不再把凯瑟琳放在心上。

到了12月，这种无伤大雅的小小“恋情”已成为布卢姆斯伯里的闲谈话题。克莱夫从佳星顿写信告诉他妻子“奥特琳试图同默里恋爱，她给他写信，他把她的信随手乱放。”布卢姆斯伯里好打听闲事的风气是它忽视道德的一个方面。

高尔街3号开始被称为“方舟”，凯因斯和谢泼德一搬出去，其他的“动物”就成双成对地搬了进来；布雷特把她戴着助听器所能听到的一切都报告给莫瑞尔夫人。10月2日，她从“方舟”给奥特琳写信说，凯瑟琳住得非常舒服，卡林顿也一样，但是现在卡林顿不喜欢凯瑟琳了，怀疑她两面三刀；而且她在“方舟”的窝做得太快，太舒适了。布雷特想津津有味地观看发生的一切。

此时，布雷特每天都给奥特琳写信，也许可以说爱上了她，奥本人则为布雷特感到遗憾——她作为侯爵的女儿从小受的教养太糟了。的确，布雷特受到朋友的信赖，奥不久就把默里写的一封信寄给她，其中讲到他在“方舟”感到不幸福，由此“更确信自己爱上了你”。

布雷特回信说这使她非常感兴趣，也明白了自己有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是“看在老天的份上，同默里打交道要注意些！！一定要当心，默里会向你求爱，我不完全相信他们俩……”。布雷特说她能够隐约见到目前默里生活一片黑暗，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人们背离自己的生活，去过别人的生活，尤其是像默里这样一种孤僻、好做梦的人的生活呢？

布雷特又说卡林顿“对凯瑟琳改变了看法”，她本人并不认为凯是虚伪的人：

我可以肯定她不会两面三刀，只不过喜欢说刻薄话而已——为什么不呢！哪怕是对自己过去的朋友。你圣诞节后必须到伦敦来往一段时间，凯瑟琳和我都非常希望你来同我们一起过过这种简单的日子，放下你公爵夫人的架子——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做——噢，有这么多话要说。

如果奥特琳真的去了伦敦，就一定会试图同伯蒂·罗素会面。他去找过凯瑟琳，但她不在家。到了10月末，布雷特告诉奥特琳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她不愿意写信提及，但是又不能对奥隐瞒。“李敦老家伙去拜访了‘方舟’，很遗憾，没有谁比凯瑟琳走得更远！！伯蒂、李敦等人都像魔术一样消失了——我的小小助听器连地板上的开裂声都听得见。”

正在这时，奥特琳收到凯瑟琳写来的一封措辞尴尬的信，这是她几个星期来所写的第一封，说到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久杳无音讯，只因为自己一直心情不好，心神恍惚，糟糕的是她不能鼓起勇气来解释，多么令人难解呀。

奥特琳夫人感到非常迷惑，一定想到这也许与默里的来信有关。因此这封信也寄回了“方舟”，布雷特的来信说：“非常有趣，我想我能替你解答。”可怜的凯瑟琳确实处在地狱中。

我想她爱上谁了，有人似黎明出现在她的地平线上，就像她一生中常常发生的那样——野性的呼唤总在她身上，像任何其他野性动物一样，这种呼唤来到时，她不能抵抗。我相信可怜的凯瑟琳被撕成了两半——为那个同她一起生活的羞怯、温柔、依恋她的男人，以及为自己对自由狂热向往的遗憾——新生活，新面孔，一会儿在此，一会儿在彼，了不起的大千世界——如果她离去了，就等于在默里心中插下一把尖刀，失去宝贵的朋友——我相信这就是她的一个地狱——我告诉过你我很想对她说我理解她，但现在还不能，也许永远不能。

显然，布雷特还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否则她就不大会写信给奥特琳这样说了，因为这人就是伯特兰·罗素。奥特琳也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她过去的情人。她知道罗素在感情上已渐渐对她疏远，但却不知道转向谁，直到几个月后他自己作了解释。事实上，他最近结识了康斯坦斯·梅尔森夫人——女演员柯尔特·奥尼尔，嫁给了迈尔斯·梅尔森——两人已经深深地陷入狂热的激情之中，凯瑟琳当然不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真实对伯特兰·罗素，对布卢姆斯伯里，对那些在佳星顿安享生活的人都极其重要，也包括凯瑟琳本人，她身为作家的一个目的就是探求真实。

10天以后，罗素同默里夫妇一起吃饭，告诉奥特琳说他“现在非常喜欢”凯瑟琳，默里似乎不高兴，因为他“为战争工作”，而罗素试图让他改变一下。接着，罗素请了凯瑟琳一起吃饭。在罗素的文件中留有一封她的信，接受他23日吃饭的邀请，这是他保留下来的她接连写的12封信中的第一封——所有的信都没有抬头、称呼，大部分都没注明日期，语气也越来越亲密，虽然他俩并未真正亲密过。罗素1949年又加上了一段话，声明并没有“恋情”，也不想有。那次共同进餐后，她写道：

是的，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整夜我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激动，甚至入睡后我还梦见同你坐在一张桌旁，谈话，吸烟，咖啡馆所有的镜子都是窗户，从中可以看见长长的碧波在无声地闪烁荡漾，好像我们远在海上。

这时，罗素正好告诉奥特琳自己渐渐开始非常想她：不是激情，因为战争已将其消耗殆尽，而是渴望有人相伴。他曾经处于战争的“绝对深渊”。他一直在同凯瑟琳见面，也喜欢她——她谈到自己死去的弟弟。他接着用一种欢快的孩子般的口气说自己同康斯坦斯·梅尔森很亲密，但她不适合严肃的心情，使他永远永远靠近奥特琳的是宗教信仰——其他任何人都让他伤心，因为缺少尊重。

三个女人和一场战争，宗教和一个情妇，还有尊重（“尊重”是佳星顿用的字眼）通通写在一段话里。一两天以后罗素告诉奥特琳他想真正了解凯瑟琳，因为她从心智上让他感兴趣。她头脑很不简单，但他认为她没有什么感情。

用同样的话对康斯坦斯·梅尔森描述了一番以后，他写信给凯瑟琳，而她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旁人偷听，回信说：

我刚刚重读了你的信，现在脑袋因一种甜蜜的激动而微微作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知道我们还有最好的事可做，我们将成为共事的同志，是多么无比的欢乐……

在这小小一段时间里，你已给了我这么多——超过了我所给予你的，不过，我对此仍感到不满足。但目前我的工作来源于这么一个事实，即你确实代表生活。

星期四再见，我不再读你的信了，太让我激动不安了，但是谢谢你——因此谢谢你。

她第二封信结尾时说：“啊，我们并不是无缘无故相识的，我们将做一番事业——一番事业。”此时，布雷特告诉奥特琳“伯蒂真该死，他今早匆匆跑来看凯瑟琳，想都没想到来看一下我——你可以告诉他我准备教训他一下！！”

凯瑟琳信任罗素，对他吐露自己的心思，讲到自己创作的构思，以及希望写出什么作品；谈到她常有的失望情绪，似乎万念俱灰；但是生活可以重新美好起来，她可以走进鲜花，绿叶，鲜果和青草中——“让自己在这些东西中得到清新的感觉，寻求它们，探索它们，然后离开它们——等骚动平息后再来把它们写下来。”

也许这种关系比1916年那个闹哄哄的秋天发生的任何事情对她都更为重要。

“方舟”住人后不久，埃达·贝克乘坐部队运输船回到英格兰，带着自己孤独的父亲。她发现凯瑟琳同自己的新朋友多萝西·布雷特和“一个名叫卡林顿的妇女”一起住在高尔街，房子里气氛不大对头，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也搬进去，因此把父亲安置在旅馆后，就去同一位在缅甸认识的老朋友住在一起，后者住在齐斯维克。就这样圣诞节前她加入了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

英国妇女行列，用双手操作机器，身穿工作服，头上戴着棉布帽子。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她开始在普特尼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做机械师，凯瑟琳替她在汉姆斯特找了一个住所，是一个上了前线的人空出来的。

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李敦·斯特雷奇带凯瑟琳去霍加斯宅第会见《远航》的作者，他告诉奥特琳“我对住在里齐蒙德的维吉尼亚抱着乐观态度，希望这个星期他们俩能聚在一起——虽然天知道会怎样。”

现在问题是邀请谁来佳星顿过圣诞节？罗素和斯特雷奇会去，还有默里夫妇和布雷特，奥尔德斯·赫胥黎已在那儿住着，还有克莱夫·贝尔。但是奥特琳夫人却为她的比利时避难者，赫胥黎爱上了的玛丽亚·尼斯感到为难，另一个是卡林顿，她近来因为马克·格特勒——或李敦·斯特雷奇而有些行为古怪。

玛丽亚只有18岁，过去有段时间奥特琳一直像母亲一样关怀她，自从逃离父母亲后，她一直像小鸟似的自在快活。她开始住在纽恩汉，但自己从那儿搬了出来，不久就加入了“方舟”的人群中。布雷特10月18日告诉奥特琳“玛丽亚今天第一次开始工作，她同一位俄国将军关系比较好，我让她住在‘方舟’，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她晚上做些什么，是否经常出去。”菲利普·莫瑞尔不想让她回来过圣诞节，因为她向他调情。但布雷特说这太过分了，必须要他让步，“否则就意味着有两个人在伦敦过一个枯燥乏味的圣诞节——或者奥尔德斯把这儿搅成一团糟，而玛丽亚独自一人在伦敦把眼睛哭肿——告诉他不要因为一个傻姑娘犯傻而做得太过分。”

奥特琳也不打算请卡林顿，她近来开始跟卡林顿过不去，断定她骗人，因为她不肯同格特勒睡觉，甚至连菲利普同她绕着池塘散步，对她说教了一顿后，她也不肯。然而圣诞节前一星期，布雷特达到了目的。

请不要认为我不喜欢菲利普，我很喜欢他，虽然我有时觉得他弄得你很为难，但你总能占上风，最后才让菲利普做出好的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全由菲利普一人做主的话，他会让我们大家都去给猪梳毛，算牛奶帐单，最后去坐在蛋上孵小鸡，我们的生活会成为真正的地狱！！！卡林顿已收到你的邀请，我希望她能来。就这样布雷特帮助挑选人参加这次战争中期的圣诞节聚会——处于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紧张气氛中的聚会，混杂着爱情的狂热和战争的绝望，那其实在好几处与正在兴起的文学有关。她无意中还帮助聚集了另一次戏中戏的参加演出者。那年的圣诞节是星期一，布雷特心情激动，前一个星期三就带着礼物来了，正好帮忙用花环和灯笼装饰房子，但是默里夫妇什么时候来得由默里在办公室那压倒一切的工作来决定。他星期六来的，没带任何礼物；“捣蛋鬼”（布雷特和奥特琳对卡林顿的称呼）也是这时到的，可以度过整个星期天，同“李敦爷爷”散步，谈论田地和壕沟，去村里的教堂做晚祷，因为牛津大主教要讲道，还要来吃饭。因此卡林顿就能在节礼日给在法国的哥哥写信，一一列举聚会的人：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玛丽亚·尼斯，一位名声不怎么样，无足可取的比利时女孩；高尔街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她忧郁的丈夫；李敦；布雷特；

伦敦近郊。——译注

伦敦近郊有名的风景区。——译注

伦敦地名。——译注

贝利尔学院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同玛丽亚·尼斯相恋），一位瘦长独眼的年轻人，会写诗，精通贝利尔学院的男孩都知道的一切文学作品；你也许还记得的那位小姐；小姑娘朱莉安，她的父母亲（我们的男女主人），就是这些人。

“小姐”就是朱莉安·莫瑞尔的瑞士家庭教师，朱丽特·贝洛特——朱利安·赫胥黎的未婚妻，正如玛丽亚·尼斯是奥尔德斯的未婚妻。

戈尔主教是奥特琳夫人的好朋友，星期天晚上罗素、斯特雷奇和克莱夫·贝尔都在座，桌上的谈话转向威尔逊总统前一个星期答应为和平谈判居中调解，主教因为希望胜利而受到拒服兵役者的攻击。“捣蛋鬼”私下笑着说主教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妥协，表现得聪明理智，毫不傲慢自大。

后来主教走了。在起居室里，克莱夫·贝尔说同英国人相比，德国民族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易接受外界事物，对艺术的欣赏占了主导地位。这使贝尔受到所有人的攻击，除了斯特雷奇之外，而房间里那位写过一本关于德国人的书的妇女保持相当的沉默。有关德国人的争论变得热烈起来，“捣蛋鬼”说默里“一有机会就为民主争论一番，不管是否与此话题有关。”

同时，凯瑟琳开始设想一场戏让大家表演。默里拿了一些庄园的信笺，写了两封信代替他没有带来的礼物。

第一封信给奥特琳：“明天我将是婚礼上唯一没穿礼服的人：深深仰慕、真心热爱你的人竟然没有礼物给你……”他曾想撒谎说订购了一本书，但尚未拿到，但是不，他不想玩弄这种小小的欺骗。他认为他们的友谊——“我们的爱情——我不会用另一个字眼来称呼它”——绝不会消亡，一年来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没有什么礼物能为他表达这些，语言当然也不能表达——但这是他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了。

另一封信是给布雷特的：“这是我的圣诞礼物——只有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没有别的了。只是想说你是个宝贝，我希望能够永远和你在一所房子里共度圣诞节——如果你吻我，或者让我吻你的话。”

凯瑟琳当然从未见过默里的这些信，但她完全了解写信的原因，称之为他“虚假的性格”，她在他的一篇散文中看到了这一点，就此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觉得你将要暴露你自己，将要颤抖……那是什么呢？是希望折磨自己，或可怜自己，或是什么更为微妙的东西？我只知道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你自我毁灭的方式。”

圣诞节这一天，其他人在庄园内聊天，散步，以便增加食欲，她写着那场戏。后来“李敦爷爷”给大家念了一篇自己写的关于阿诺德博士的文章，这是后来使他一举成名的书中 的一个章节，满是对在座的人开的玩笑，读到一段字句抑扬顿挫的话，结尾是这样的：“尊敬的柏德勒先生说‘公学是罪恶的中心和温床’”，起居室内一片吃吃暗笑声。

牛津大学学院之一。——译注

朱利安·赫胥黎（1887~1975），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哥哥。——译注

即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曾写过名为《在德国公寓里》的短篇小说集，于1911年出版。——译注

阿诺德（1795~1842），英国教育家。曾任拉格比公学校长，对英国的公学教育有极大的影响。——译注

即斯特雷奇191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人物》一书。——译注

最后，到了节礼日的夜晚，凯瑟琳写的戏上演了，卡林顿告诉她哥哥说那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俄国戏，了不起的机智，很好。”而奥尔德斯·赫胥黎则说“我们表演了一出凯瑟琳创作的戏，即席表演，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默里扮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角色，李敦则扮一个极其邪恶的老祖父。”

第二天，大部分客人都乘火车消失在伦敦的浓雾中，但与此同时，邮局给奥特琳送来了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包裹，给奥特琳夫人带来了惊恐；如果早到几天的话，那个圣诞节就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劳伦斯（根据她的要求——她已听到了一些传闻）把自己在康沃尔写的小说的手稿寄给她，当她读了以后，感到自己的脸都吓白了。

她读到自己被安上了各种各样的名称，从性欲狂的“老巫婆”直到衣着邋遢的“堕落的同性恋者”；在一个情景中甚至描写她向“庄重的弗丽达”求爱。房子、花园以及住在里面的人都描写得细致入微，整个小说写出来似乎就是为了侮辱她，而她从惊恐中唯一能够找到的安慰是“所有最糟糕的部分都是弗丽达的笔迹”。

显然，她认为实际上是弗丽达写了那些部分，也许是这样的（在那小屋里弗丽达闲着没有事干）；或者此手稿只是她帮着整理的多余的一份，她有时也帮着抄写一些。

奥特琳马上就写信给罗素和凯瑟琳告知此事，凯瑟琳说她希望能够说服劳伦斯不要发表此书，又说“我认为离群索居使他心中产生一种疯狂”。后来，当她从布雷特那儿了解了更多情况，但自己仍未读过此书时，说道：

毫无疑问，离开大家，劳伦斯发疯了，同大家在一起时，他能感染大家的热情和智慧，他是亲爱的宝贝，常常很了不起，但离开大家，他就变得冷漠，阴郁，孤独，当然弗丽达是起因。他已经选择了弗丽达，同真正的人在一起时，他知道这是一种致命的选择，但是同她独处时，他那该死的固执却竭力企图证实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不惜用最卑鄙的手段。

她劝奥特琳嘲笑劳伦斯，而不让他知道自己多么伤心。奥的丈夫和克莱夫·贝尔都给了她同样的劝告，但没起作用。贝尔告诉他妻子，“奥特琳退还了劳伦斯的手稿，还回了一封极其愚蠢的信。尽管我给了她一些很好的建议，菲利普也曾竭力阻止她不要犯傻。我听到她读的每一行都暴露出一个伤口，劳伦斯真要得意了。”

菲利普·莫瑞尔曾冒着断送自己政治生涯的危险在下议院询问过有关查禁《虹》的问题；奥特琳曾尽力筹款帮助劳伦斯同弗丽达团聚，而上述的事件则发生在仅一年之后。莫瑞尔立刻写信给劳伦斯的代理人 J.B. 平克，警告说如果此书照原样发表，将会被指控为诽谤。据奥特琳回忆，书没有照原样发表，“最糟的部分”作了修改。但可以证实这一点的稿件却没有保留下来。

还没有人意识到杰若德和戈珍是指默里和凯瑟琳，而那个“有学问的 50 岁的干瘦勋爵”取名乔舒亚·梅尔森，则表明劳伦斯听说了罗素同康斯坦斯·梅尔森的恋情，再根据此事作了窜改（1917 年或稍后）。

即劳伦斯于 1920 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据专家们考证，小说中的“布雷多利府邸”便是以莫瑞尔的家为原型描绘的，女主人公之一赫米恩·罗迪斯也有奥特琳的影子。奥特琳为此而与劳伦斯断绝往来达 10 年之久。——译注

从佳星顿回城后，默里和凯瑟琳准备离开“方舟”，没有出现过争吵。但是凯瑟琳自从离开法国后，除了圣诞节那个模拟喜剧外，没创作过新作品，现在感到急需找个能写作的处所，而凯因斯的房子则不是这样的地方。

年初她去找过房地产商，没有什么结果，只发现战争开始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租金增加了；寓所更难找，房地产商要求签订三年的租约，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经受那种折磨，“那些我们租下来又退回的所有房子，所有寓所，所有的房间”。因此，她从年初就开始寻找一间工作室，默里也要找几间房，以便写作。人们谣传曼斯菲尔德和默里分手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然而，她此时仍在进行同罗素的心智和感情上的小小冒险。

她给罗素的信与她任何别的信大不相同，它们像漂浮过月亮的云彩——存在着，但不能触及，也不能同其他物质相比，不能否认其中有着热情，有尊敬，也有魅力。布雷特的“野性的呼唤”似乎不是合适的词，为了找出更恰当的词，只有当他俩在餐桌旁谈话时去坐在他们身边——也许彼此有些误会对方的意图。罗素是否知道凯瑟琳手上的戒指是弗丽达婚姻破裂的象征呢？他们谈了很多“真实”。

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凯瑟琳告诉罗素他的信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感到我俩将坦诚相见，彼此没有保留——这将是一种很大的冒险，心情难以平静。”几天以后她告诉他自己在一部电影“身着散步服装的外景”中表演；后来在一间空旷的大摄影棚里，她必须身着制片人称作“奇异的晚礼服”行走，她遇上了这么多荒唐事。她刚刚被一个狡诈的波兰人骗去了一所公寓，“整个事件就像一部道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

在这期间，有天晚上她和默里去霍加斯宅第同吴尔夫夫妇共进晚餐，由她的亲戚西德尼·沃特罗作陪。她可能过多地谈到电影或那个狡诈的波兰人。一个月以后，吴尔夫告诉她姐姐：“我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她似乎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然而难对付、肆无忌惮的家伙。”吴尔夫大概听到了布卢姆斯伯里的闲谈，由凯因斯和克莱夫·贝尔津津乐道的关于凯瑟琳和罗素的传闻。奥特琳也意识到罗素的感情被吸引开了，但她并不知道转向谁那儿，凯瑟琳也不知道。

一月底，凯瑟琳写了这封信给罗素：

你给我写了如此可爱的信，我亲爱的朋友，好，让我们星期五晚上一起吃饭，如果你来接我，我将一切准备就绪，然后我们将谈话，我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我将在那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很久没见面了——虽然没有见到你，我的“友情”却继续增加，变得越来越深了。

让我们愉快地度过星期五晚上，握你的双手。

罗素把这封信给了康斯坦斯·梅尔森，信的措辞使她确信凯瑟琳同他有恋情。1949年罗素清理文稿时，在凯瑟琳的那些信件旁附了一张便条

读到下面这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信时，我吃了一惊，它们给人的感觉是我们有着恋情，或将要有。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退缩了，也许是因为柯尔特，虽然我从不知道原因。我对她的感情是矛盾的，我深深仰慕她，但她

那黑暗的仇恨又阻止了我。

罗素的自传说在 1916 年秋天，他“感到自己正同柯尔特有些小小的恋情”——而她收到的他写的充满激情的信却完全推翻了这种说法——关于凯瑟琳他则说：

……正是在此时我才开始了解她。不知道我对她的印象是否正确……但是当她谈到别人时，她羡慕、阴郁，有着令人不安的洞察力，能发现人们最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天性中最坏的东西。她恨奥特琳，因为默里不恨她。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必须克服对奥特琳的感情，因为她不再肯给以足够的回报来让我感到幸福，我听着凯瑟琳所说的于她不利的話，最后却很少去相信它。……

很难知道该相信谁。凯瑟琳唯一称作狡诈的人是那个骗了她一套公寓的波兰人。布雷特说“罗素是个混蛋”，这话的确不错。

2 月，凯瑟琳离开了“方舟”，搬入乔奇街 1419 号的一个工作室，其中有着最大的窗户——我的“上帝俯视我的窗口”——默里在相距半英里的雷德克里夫街 47 号租了几个房间（J.A. 弗格森在那条街上也有一个工作室）。凯瑟琳从她的“修道院”给奥特琳写了一封信，透露出曾经有过一些尴尬，她有些害怕遇见她，但宽恕了一切。她写给罗素的最后一封信是 2 月 24 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学识方面的困难而受到阻碍。他曾寄给她一份自己写的文章，评论“战后世界”，文章结尾说如果不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小学生了解战争的真相，文明人就会在地球上消失。“这是否令人遗憾，我就不想下结论了。”凯瑟琳感到吃惊，读这篇文章，她同他一起攀登到高处，却发现这个过程有些嘲讽意味，“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5 个月后，罗素坚持说，作为一张反征兵传单的作者，他应该受监禁，而不是散发传单的人，因此他被传出庭，受到罚款。

在此之前几天凯瑟琳写信给奥特琳，“我为罗素感到非常遗憾，我见过他一回；他对我的工作非常关心，我很高兴同他谈话，他情绪很好。我们没有谈论现在的人和事，而谈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例如奉承和称赞，以及人们写作时实际上要表达什么意思，等等。

罗素写信告诉梅尔森夫人凯瑟琳又见过他，谈论她的作品，似乎急于做他的朋友。但是她接着可能听说了柯尔特（即梅尔森夫人）。

在切尔西的工作室

目前我暂时隐居，只是写了读，读了写——不见任何人，不去任何地方。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给伯特兰·罗素

1917年2月24日

1917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也改变了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生活。虽然，这种比较的尺度过于悬殊，但两者都包含有毁灭和再生的多重矛盾，却是相似的。

A.J.P. 泰勒从男性的观点出发，在他写的大战史中生动地说明了1917年欧洲变化的实质。泰勒说，“如果拿破仑在1月能复活，他就会发现‘欧洲历史’依然存在：沙皇、国王、皇帝以及自由党政客，强国依然进行着他熟知的同样战争，所有这些拿破仑都能辨认和理解，但在接下来的12月，他就会感到困惑了：那时在欧洲的一端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全新的思想和政府制度；在另一端则是美国，介入的规模将使所有的强国黯然失色。仅在一年之内就产生了现代政治世界。”

然而还发生了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妇女有关的社会变化。对于英格兰的青年男女，战争带来了相反的影响。在战场，机关枪杀害了欧洲年轻人的一半，然而在国内的妇女面前——因为有了机器，而不是鼓吹参政的妇女——却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其中就有埃达·贝克小姐，“上校的女儿”，头戴棉布帽在普特尼的飞机制造厂操作车床。

她写道：“我非常喜爱这儿的工作，奎尼先生对我们极其友好，我在那儿遇见了斯苔拉·德鲁蒙特（即后来的尤丝苔丝·帕西夫人），同她成为好朋友；还有玛丽·汉密尔顿夫人。”如果车床对这两位并不意味着自由，至少对埃达如此，她在汉姆斯特有一位房东，好心的巴特伍什老太太，她每天早晨5点半为埃达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当我回来时，在我能休息和阅读的起居室内有温暖的炉火和晚餐”。这无意中描绘了一幅新权力的画面，过去曾经是男人的特权，现在成千上万的英国妇女在战争中期第一次尝到了滋味。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找到了新的事情做——大声吆喝她所有的乘客；“女商人”吃完午饭后当众点起一支香烟；叫作拉格泰姆的美国舞蹈完全改变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女人该如何摆动四肢的概念；短裙、短发和胸罩——所有这一切都使妇女和青年走向20世纪60年代。

对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17年也是带来创作力增加和不幸消息的一年。在1月，她是拉格泰姆似的知识妇女，充沛的活力吸引了伯特兰·罗素，使维吉尼亚·吴尔夫感到不安。在春天和夏季，她则像显微镜下的生物，从古典的种籽，即那将会产生最好作品的摹拟天赋中发芽生长，而到了秋天，经过丰硕成果时期，她开始发寒热；然后终于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她整个生活都改变了，作品的性质也改变了，不再谈什么古德伊尔所说的“咖啡馆镜子，露珠和青草以及表面现象”，而转向内心的探求。

从此，艺术成为消耗她生命的炽烈燃烧的火焰。

她创作力的复活可能起始于在佳星顿所写的轻松的圣诞短剧；在春天，

指美国正式参战及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译注

英国历史学家，生平不详。——译注

似乎奥列加又帮了一次忙。

《新时代》又遇上了艰难时期——比以往经历过的更为困难。他的得力助手在前线参战，贝阿特丽斯·海斯汀斯不再在他身边；奥列加只好单枪匹马办杂志，自己写大部分文章，再求老朋友帮忙。他似乎从萧伯纳那儿得到经济资助（他还重新撰稿），又出现了一些新人：T.E.休姆从前线送回稿件，埃兹拉·庞德创作力旺盛，写个不停，奥列加一定也向凯瑟琳求救，她发了仁慈之心，4月她提供了一些“片断”，接着又撰写了8篇对话形式的稿件，奥列加自己非常欣赏。她还开始写剧本，奥特琳邀请她去佳星顿过复活节。她却回信说不敢中断手头的工作：“我有个剧本写了一半，还有天知道多少短篇小说以及图画说明和梗概要写。”

1917年6月，在伦敦出现了一本题名为《普鲁弗洛克及其它》的小册子，立刻传到了佳星顿，克莱夫·贝尔从城里带了几本回来分给大家。他说，“就像复活节的面包一样，普鲁弗洛克本身引起了骚动和许多谈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大声读了诗歌。

那时她很欣赏此诗，它的抑扬顿挫一直在她心里回荡，她后来对维吉尼亚·吴尔夫说了一句有趣的话，说她并不认为艾略特是诗人，因为“总而言之普鲁弗洛克是一个短篇小说。”除了写作以外，凯瑟琳平静地度过了春季和夏季，她正在努力工作，有了新的发现。古德伊尔死了，如果确实是他直截了当的批评使她在过去的12个月中辍笔的话，那么，这个阶段也已过去了。

她并不完全是独自住在“修道院”，埃达常来拜访，虽然她必须走很长一段路：早上5点起床去普特尼工作，然后去切尔西，最后才回到汉姆斯特的家睡觉。下面也是给《新时代》的片断之

另一个夜晚埃达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了一些牡蛎。噢，我说，这气味让我回想起马赛的一家小咖啡馆，我多么清楚地记得一个夜晚。这时我抬起头来，看见埃达的面色变了——变得奇怪地茫然无表情，然后严肃起来，有些沮丧。“等一下，亲爱的，”她说，“我要离开一会儿，去看一下。”她走了，然后又喜笑颜开地回来了。“是的，亲爱的，在小咖啡馆的一个夜晚，”她说，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是她走了以后，我才想起无论何时我对她讲到什么事，她总会有这些举止情形。“你能等一下吗？亲爱的，我去拿块手帕”，或者“我能不能先去厨房把茶壶放上去？……”，“至于那个小咖啡馆，亲爱的，接下去说吧！”“不，我忘了。”非常苦恼地：“噢，你没有，真的没有。”“是的，的确。你最近洗了头发吗？颜色真漂亮，像啤酒一样。”“不，我很久没洗过了，该洗了，都结团了。”根据女人说话的规律，哪种才是正确的回答？

人们会注意到女人之间的友谊（中间花很多时间梳理头发）总是处于争吵的边缘。不久，因为每天长时间往返，埃达吃不消，凯瑟琳又需要她的帮助，所以决定她最好还是搬来住。

T.E.休姆（1883~1917），英国诗人、美学家、文学评论家。与庞德等人极力鼓吹意象派运动，是这一派别的主要创始人。他的主要作品有《思索》《语言与文体笔记》等。——译注

此书作者为 T.S.艾略特。——译注

然而工作室里没有卧室，只有在当作阳台的地方下面有一个帘子隔开的空间，后面是一个浴室。在走廊另一端是厨房，埃达放弃了汉姆斯特的住处，睡到这儿来，用另一块帘子隔开。默里的日记对这种三合一的工作室内的生活稍有描述：

埃达在凯的浴室洗澡，凯瑟琳背对着门，突然她听见门开了，知道埃达光着身子站在那儿，知道她希望凯转身看她，说“你长的真不错”。但是凯不肯转身，她感到了埃达的羞愧和极端失望——她当然很高兴。

如果埃达在床上时有客来访，她就得一直躺着不动，以便不使他们感到尴尬。到凯瑟琳这古怪的小窝来访的客人之一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告诉哥哥朱利安说有次星期天晚上的谈话突然中断，凯瑟琳突然喊了一声，“躺在一张帘子后面什么人的迷迷糊糊的声音”回答了一下，“我一直不知道居然还有别也许在星期天这是不能避免的，但她们安排好周日埃达9点钟以后才来。她在自己写的书中声称凯瑟琳和默里此时已“分开”，但根据默里的日记看则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无论如何，总有个什么完全不同，压倒一切的理由使默里和凯瑟琳分居两处。1918年8月，凯瑟琳终于同波登先生离了婚。照当时的法律，开始诉讼后，如果皇家讼监能证实她与默里同居，一切就全毁了。埃达谈到“分居”时也很神秘，宣称事实如此，但被问到原因时却又含糊其辞。

不管怎样，可以说当时默里和凯瑟琳两人的创作力都胜过以往任何时候，两人都急于成名，至于凯瑟琳，此时她的确需要首先“做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人”：

夜晚，将晚餐收拾后，吹去你正在读的书上的面包渣，点上灯，蜷缩在炉火旁——这是倾听雨声的时候，你感到一阵突然的静寂，于是睁大双眼，那是什么？喂，在下雨，开始有些不情愿，然后越下越急，敲打着窗子，敲打着门，雨下来了。空气似乎改变了；你感觉到黑暗中流淌的水，甚至连手和脸都变凉了，你开始来回走着，雨的声音多大啊。你在镜中看见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丑。你对在不平的镜面中那丑陋的家伙说：“我28岁，我已经选择，而且绝对是有意地选择永远独自生活下去。”镜中的家伙短促地笑了一声说：“那是说着玩的”，但是你严肃地回答，“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就不要说法语。这是很坏的习惯。”现在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上花园的台阶，停在门口，有人来了，但是没敲门。又是脚步声，又是停顿，似乎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潮湿的门把手。你可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你记起来厨房门还大开着，跑上去把门关好。雨打进来了吗？没有，其实并没有，你探头出去一会儿，看见两个小小的檐槽飞到花园里去了，黑暗中，听上去就像有女人在外面潮湿的花园里哭泣，大笑，谈话，埋怨，大笑。一个人说，“生活不快乐，凯瑟琳，生活不快乐。”但是现在雨已停了，外面的灯柱在灯光中呈现黄色，一根闪亮的树枝掠过灯柱，看上去像狄更斯小说中糟透了的一幅画。是的，雨快要停了，你添好火，蹲下来，把手张开，似乎刚被从沉船上救出来，能安全地活下去就是够快乐了。

凯瑟琳对维吉尼亚·吴尔夫的第一印象渐渐消除，两人的友谊在工作室内展开。旧日的索比尼欧斯基又来了，在他的竭力要求下，凯瑟琳开始同他合译某波兰作家的一部戏剧。经赫胥黎和斯特雷奇的介绍，她还同年轻诗人T.S.艾略特见过一两次面。事实上，在佳星顿读过“普鲁弗洛克”几天之后，她就在一次晚宴上同艾略特会过面。她写信给奥特琳描述过在圣·约翰·哈金森家的一个夜晚，客人中有艾略特，罗伯特·格雷夫斯和罗杰·弗莱。这次“玛丽”是女主人，“杰克”是男主人。写到结尾处时，她说：

噢，天哪，这些晚会！回想起来都非常好，但参加时却觉得极端枯燥乏味。玛丽自然竭力称赞罗杰·弗莱和罗比·罗斯，眼睛盯着格雷夫斯，对艾略特则时而瞥一眼，从玛丽坐着的桌子那一头则不时飘过来乔治·莫尔和麦克斯·皮尔波姆以及柯森爵士谈话的声音。杰克系着一条白围裙切烤肉，看上去英国味道十足，可怜的艾略特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沉默寡言。中间坐着格雷夫斯，不停地谈着自己对中士说了些什么，士兵们对自己怎么说的，自己怎样用手枪逼着把他们带了回来等等。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年轻人，事实上我想顶撞他，对他说一个人只有在有话可说时才说话；我还觉得他对战争的态度愚不可及，麻木不仁，谈到在啤酒里如何掺水时又那样乏味，……我同艾略特一起离开，走过一排排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私人栅栏后的房子，许多发情的猫从路中间窜过，天空高悬着残月。我非常喜欢他，不觉得他是自己的敌人。

在另一封信中，她用自己快速照相机闪电般的速度捕捉到了艾略特的神态：“我想同你谈谈萨松……我想让你嘲笑我同雷斯普丁、奥尔德斯和他穿卡其布衣服的兄弟，以及法国优雅诗人艾略特度过的时光……我想问一下我是否能在下个周末去佳星顿？”《雷斯普丁可能是指索比尼欧斯基）。

凯瑟琳去世几年后，奥特琳写道，常常听凯瑟琳坚持说艺术家与众不同，因而感到自己低一等，回想起来，她记得凯瑟琳时刻都没忘记自己作家的职责，“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不会忘记自己是女王一样”，但是因为缺乏洞察力，她没有同情心，瞧不起人，人们的真诚让她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对待”。有一次她告诉奥特琳，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在表演，什么时候是在生活，又说“我是否还有真正的自我？”然而在所有这些的背后，在她那魔幻般的新西兰童年里，似乎有着一个神秘的避难所，那儿有她“真正的自我”，曾经有过一个纯真的孩子。

4月的一天，在霍加斯宅第，维吉尼亚·吴尔夫在饭厅里打开一包印刷

圣·约翰·哈金森（1879～1971），英国记者，报纸《每日电讯》的编辑。——译注

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军官。主要作品有《向一切告别》《论英国诗歌》《金羊毛》等。——译注

罗比·罗斯（1869～1918），英国作家，艺术鉴赏家，著名作家王尔德的好友。——译注

乔治·莫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柯森爵士（1859～192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译注

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以反战诗歌及小说体自传而闻名于世。他的代表作品有《通向和平之路》（诗）、《乔治·舍斯顿回忆录》（自传）等。——译注

品后，告诉她姐姐说自己要去看望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许从她那儿弄一个短篇小说来”。唯一适用的稿件当然就是《芦荟》了，现在第一次被当作独立的短篇小说，而且采纳默里的建议，取了一个新名字《序曲》。

整个作品经过精简浓缩，删除了拖沓散漫的部分和对话。下面是《芦荟》中描写当女孩子们一起住在伯奇小姐公寓时，南妮如何常常替贝丽尔梳理头发的情景，这是对凯瑟琳和埃达在伍德小姐公寓的回忆：

但是，几乎每次这样梳理头发总是不欢而散，南妮做了什么蠢事：她会突然抓起贝丽尔的头发，把脸埋藏在里面，亲吻着、或者双手搂住贝丽尔的头，按在自己坚实的胸前，啜泣着：“你这么美，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美——多美！”

这种时候贝丽尔感到非常惊恐，情不自禁地对南·弗莱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极端厌恶：“够了，够了，谢谢，你把它梳得很美，晚安，南！”她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轻蔑和厌恶，……奇怪的是南·弗莱似乎理解这些，甚至期待着这个回答，但她从不分辩，只是尴尬地走出小房间，也许在门口轻声说着“原谅我”。

更令人惊奇的是贝丽尔下次又让她梳理头发，又让这种事情发生，……两人之间发生这种蠢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收场，而白天两人则无一字提及。

经过考虑，这一段被删除了，因为有不同的事实，而这种事实不适用于《序曲》。《序曲》中贝丽尔在镜前欣赏自己的头发，凯西亚抱着她那只非常肮脏的花猫——凯西亚是卡罗里的真正的凯丝，奥特琳相信曾有过的那个纯真的孩子——冲进房间来告诉贝丽尔姨母说父亲回来了，午饭已准备好了，“讨厌”，贝丽尔跑出了房间。凯西亚打开一瓶面霜，把花猫抱到镜前，把盖子粘在猫耳朵上，“现在，看看你自己”，猫吃惊地滚了下来，面霜瓶盖飞了出去，像一个硬币那样在油毡布上转了个圈，——却没有破碎，“然后她踮着脚一溜烟地跑了……”

这儿有三个自我：纯真、经验和假经验。就这样《序曲》结束了，仅让我们瞥见了一眼华兹华斯 也许会称之为满怀激情缅怀的静谧与安宁。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诗歌是满怀激情缅怀的静谧与安宁”一语是他的名言。——译注

凯瑟琳和维吉尼亚，
1917～1923 年

两人相见时都“心不在焉”，但都准备携手并进，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创作出一些不朽的作品。显然是年长的一位受困于竞争情结，虽然她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仍害怕年轻的一位会超过她。

维吉尼亚·吴尔夫第一次会见凯瑟琳时已有 34 岁，那时她发表的作品只有《远航》，一篇传统体裁的小说，她花了 7 年时间，经受过两次精神崩溃才完成这部作品。她自己视之为“冗长乏味”，却又害怕真会受到摒弃，她现在正在写作冗长的《夜与昼》，但还没有写出短篇小说《邱园》——那是她第一次背离传统的叙述方法——然而此时凯瑟琳却只有 28 岁，健康自信，很久以前就说过自己的一本书“幼稚糟糕”，最近又开始找到了新的，被李敦称为“绝妙杰出”的小说写作形式。

两个女人都经历过早年的创伤，两人都被迫生活在某种面具后面，有着那么多两人都不敢承认的东西。维吉尼亚受到随着创作力迸发而迫近的精神错乱的威胁，发表了《远航》后，紧跟着就是精神崩溃的折磨，这些凯瑟琳都一无所知——阵发的尖叫狂暴，4 个护士日夜守候，她忠实的丈夫几个星期也见不着她。所有这些吴尔夫都对外界隐瞒着。

凯瑟琳去霍加斯宅第见到的是一位安享夫妇生活，能在自己房间写作的女人，有着较好的艺术背景，用不着因为具有创作才能而与家庭隔绝。来自桑顿的比切姆小姐同莱斯利·斯蒂芬爵士的女儿在竞赛开始时不可能平起平坐，如果这是一场竞赛的话。

未来难以预料，凯瑟琳未活到维吉尼亚此时的年龄就去世了，只多留下了两本书。维吉尼亚并不知道这些，当然不能从中得到安慰；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活 18 年，取得自己期待的成就和名声。

社会地位的障碍是不能逾越的。维吉尼亚的家系中包括萨克雷 约翰·艾丁顿·西蒙兹，甚至还有拉尔夫·沃汉·威廉斯；她还是女孩子时就认识亨利·詹姆斯，她和姐姐从小就熟知哥哥三一学院的朋友们剑桥式的谈话——两人的丈夫都是这些朋友圈子中人。

1913 年，当靠领取奖学金读书的牛津学生米德尔顿·默里告诉哈尔·比切姆的女儿说这些吴尔夫成员属于“完全无能的剑桥团体”时，无疑他先输入了成见——正如两年后斯特雷奇告诉维吉尼亚——“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如果这是她的真实姓名的话——这点我从不能肯定——确实是个有趣的家伙……”

想同你结识——丑陋而无表情面具似的脸庞——藏在后面的是有些庸俗幻想的敏锐才智。”

维吉尼亚回答说“三年来，她一直追随着我的踪迹”；现在两人的步伐

维吉尼亚·吴尔夫曾写过一篇文章《一间自己的房间》，谈到女人要写出好作品，首先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译注

萨克雷（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为《名利场》。——译注

约翰·艾丁顿·西蒙兹（1840～1893），英国随笔作家、传记作家及诗人。他的代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全书 7 卷，并不是有系统的历史专著，而是若干随笔文章的组合，以文笔优美流畅见长。——译注

吻合了。实际上曾经追求过维吉尼亚的西德尼·沃特罗是凯瑟琳的远房表亲，也是另一位居间介绍人，但是他曾告诉过维吉尼亚他的澳大利亚祖母是一个密探的女儿（“他对此非常遗憾，我也有同感”），维吉尼亚从此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几年以后对他更为轻蔑，因为凯瑟琳不在时，他同默里合住一所房屋，维吉尼亚称之为“猪窝”，挤满了“猪，狗，耗子”之类。

吴尔夫也从没喜欢过默里，他高尚无私地忍受着妻子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而对默里“伪君子似的虚荣”却感到“气愤和厌恶”。他确实喜欢凯瑟琳——“我想那时没有谁能像她那样使我笑个不停”——他认为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作家”，而默里却使得她有些变态、受到损害。

到了仲夏时节，两人已经彼此非常了解，维吉尼亚告诉她姐姐说凯瑟琳似乎“从17岁开始就有过各种各样的体验”，“对于写作比大部分人都有更好的想法”。她还告诉维奥莱特·迪金森说凯瑟琳曾经随流动马戏团在苏格兰的沼泽地带四处游逛，有着各种各样的体验。”听上去这或者是凯对她随意胡诌，或者是她自己没有完全记清凯的话。

7月，凯瑟琳写信给莫瑞尔夫人，猜测到那时维吉尼亚“仍然非常病弱”，很少能离开自己的家和环境。凯上星期同她一起吃饭，觉得她很迷人，“我的确非常喜欢她——当时我第一次感到了她那奇异的、闪烁颤动的心智——几乎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她似乎属于那种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纯真受到损害的女人——我立刻断定自己能完全理解她——不知你是否同意。”

当吴尔夫夫妇搬到苏塞克斯的别墅艾斯汉去住时，他们邀请凯瑟琳去度周末，她将把《序曲》的打印稿带去。但是她和维吉尼亚对此并不十分热切，至少在维吉尼亚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克莱夫·贝尔和梅纳德·凯因斯最近一直在散播布卢姆斯伯里关于凯瑟琳的流言蜚语，无疑将她同伯特兰·罗素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凯瑟琳来拜访前的那个星期三，维吉尼亚在刚刚读了凯瑟琳写的使她为之赞叹的一封信后，给莫瑞尔夫人写道：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描绘了你的花园：玫瑰花叶在阳光中枯萎，池水和人们冗长的谈话在月光下来回飘荡，这激发了她的浪漫情感；我想对于她，在经过演员们，火车时刻表和颜料罐后，这是一种解脱。

下面是同一个星期三凯瑟琳写给莫瑞尔夫人的一封信：

你对花园的描述——所有飘动的碧绿和金黄使我再次诧异谁又要去描写那个花园，那会是多么美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会有人在花园里走动——几对人，他们的谈话，他们的闲逛——他们擦肩而过时彼此投射的目光——在花前的留步，似乎听见花的招呼——光彩令人目眩，香味馥郁，经久不散。花园修整得井井有条，优雅迷人，几乎相当于“心之花朵”，观看的人情不自禁地想俯身触摸来证实一下。那几对人一定各不相同，一定有某种魅力——有些人似乎极端“古怪”，同花朵疏远，但其他人则感到亲切自然。用音乐术语来说，有一种为花朵谱写的谈话，你喜欢这种说法吗？……充满了可能性，我有时间就要尝试一下。

在带着《序曲》的打印稿件度过一个周末，回到伦敦后，凯瑟琳给维吉尼亚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的一句话后来常被引用来证实两人之间的文学联

系：“我们找到了同样的工作，维吉尼亚，我们两人相距甚远却会追求几乎同样的东西，这的确令人惊叹不已。”信中还说到“是的，你的花园很好，有一层静止、颤抖、变换的光笼罩其上，那些融汇于明亮空气中成双结对的人迷住了我”。

这意味着凯瑟琳读过了她的故事《邱园》，故事中有4对神态不一的夫妇漫步在花丛中，恰似在给奥特琳的信中描述的一样。

维吉尼亚在她们会面前已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却没有短篇作品，而会面后不久就写了两篇重要的短篇小说——《邱园》和《墙上的印记》——其中一篇是对后方面的尝试，也是她首次背离传统的观察事物方式。可见凯瑟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维吉尼亚·吴尔夫打破了她一直采用的方式。

扫印《序曲》时，凯瑟琳又对文稿作了一些修改，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日记》中有一则里契诃夫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准许凯瑟琳写些长短不一的作品，那是个硕果累累的秋天，工作室里遍布无花果、槲和各种各样的构想。默里谢绝了去佳星顿作客的邀请，说凯瑟琳隐居起来，以便写些故事，“这些故事将会同她交付给慈悲为怀的霍加斯出版社的那些一样，取得非凡的成功。”

凯瑟琳在霍加斯宅第吃饭，看校对稿的那个星期一，维吉尼亚恰好开始有规律地写日记，因此1917年10月10日的那一则记着“等待凯·曼斯菲尔德来吃饭，我们可以讨论许多微妙的问题”，这些其实同《序曲》并无关系，指的是克莱夫·贝尔传播的闲话以及带来的后果。然后第二天的日记：

昨天的晚餐已结束了，微妙的事情也已讨论过，我们俩都希望人们对凯·曼的第一印象不会觉得她像一只跑到街上的麝香猫一样浑身散发出气味，说实话，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对她的庸俗感到吃惊，脸上的轮廓那么粗硬，但是，当这第一印象消失之后，我觉得她如此聪明，不可思议，值得交朋友。

伦纳德·吴尔夫曾经随心所欲地解释过这段话，他犯了一个维吉尼亚自己不会犯的男性的错误，说维吉尼亚不喜欢凯瑟琳“廉价的香水味和伤感情调”。

凯瑟琳喜欢一种相当昂贵的法国香水“香花”（可能这使她回想起了惠灵顿满山遍野火红的荆豆），不知她去拜访霍加斯宅第是否洒了这种香水，但是任何认识她们三姐妹的人都可以断然否定比切姆家的人，包括堕落的凯瑟琳，会去洒“廉价的香水”。当然，洒了香水再去同伦纳德和维吉尼亚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看校对稿显然是犯了一个大错。

维吉尼亚认为那天晚上凯瑟琳身上有气味是廉价的还是昂贵的呢？维吉尼亚是否根本就不喜欢香水呢？也许问题牵涉到两个女人之间更大的分歧。凯瑟琳有着劳伦斯称之为“好动物”的本性，确实喜欢感官的生活，而维吉尼亚则躲避开，这就是为什么她在这方面有此好奇心的原因。凯瑟琳的确喜欢食物，香味，色彩和音乐（尤其是歌曲），如此强烈的爱好几乎排除了一切好奇心，而维吉尼亚虽然对她这方面非常好奇，但同时又觉得很庸俗；而这种厌恶也是她作品中的缺憾。

吴尔夫太太在日记中几乎很少提到凯瑟琳的外表和衣着（那“轮廓很粗硬”肯定指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到了晚上就渐渐地消失了），而在其他情形下，她对此方面的描写是从不吝惜笔墨的。安妮·埃斯苔尔说凯瑟琳“外

貌秀丽……，女性味十足，非常迷人”，而弗丽达·劳伦斯则说她“举止优雅，打扮得体”，还有许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尽管莫瑞尔夫人曾说过凯瑟琳的衣着“趣味相当平庸”，弗兰克·哈里斯的妻子说她“一点也不漂亮”，身高 5.4 英尺，“胖墩墩的”，而弗朗西斯·卡尔科似乎也知道她有过邋遢的时候。然而，一个女人的衣着给另一个女人留下什么印象是最难确定的。

那次晚餐时，因为维吉尼亚当时正在写一篇有关亨利·詹姆斯的文章，因此有些关于他的谈论，维吉尼亚认为凯瑟琳对此很有见解，但是此时门铃响了，“是一位名叫莱斯利·莫尔的兵工厂工人……一位举止不够得体，当然居于社会底层的女人”来接凯瑟琳回到切尔西去。

凯瑟琳给在苏格兰的布雷特写信，说吴尔夫夫妇对她的《序曲》“用金碗盛了许许多多的称赞话，我不由地感到非常满足”，而这整封信似乎都是这种满足的流露：

我觉得你现在画静物是非常正确的，当你面对着这么美妙的一堆圆鼓鼓的鲜果，就会情不自禁地去聚拢，抚摸它们——而且成为其中之一。每次我经过一个水果摊时，都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凝视着，直至感到我自己也变成了一尸苹果，感到任何时候都能奇迹般地从体内变出一只苹果来，就像魔术师变出鸡蛋那样，……当你画苹果时，你不觉得你的乳房和膝盖也变成了苹果吗？或者你认为这纯属胡说八道？我不这样认为，肯定不。当我描写白色鸭子时，我发誓我自己是一只圆眼睛的白鸭子，浮在一个四周围着黄泥的池塘中，圆圆的眼睛不时瞥一眼另一只仰面在我身下浮游的鸭子。事实上变成鸭子的整个过程（也许劳伦斯会称之为与鸭子或苹果同时达到高潮！）如此令人激动，我几乎不能呼吸，只能一心想着它，虽然这仅是大部分人能达到的境界，但仅仅是序幕，接着是那样一个时刻，你比鸭子，苹果和娜塔莎等实物更胜一筹，因而你重新创造了它们。

布雷特：（关上助听器）“凯瑟琳，我求你不要说了。告诉我们星期天晚上在兄弟会教堂发生的一切吧。”

无疑上述一段话也是那种维吉尼亚颇为欣赏的与凯瑟琳谈话的一个例子。

一个星期六早上，维吉尼亚同姐姐瓦妮莎和邓肯·格兰特坐在工作室里谈论着艺术，瓦妮莎和邓肯将英格兰画家的生活同法国画家相比，说在英国没有人有资格被看作画家，也没有人像凯瑟琳和福斯特一样值得与之共同谈论正经事。此时，福斯特已经发表了除《印度之行》以外的所有小说。

凯瑟琳和维吉尼亚有一段时间未见面，显然是因为克莱夫·贝尔那段插曲。给《序曲》排字花了 5 个多月，恰好在这几个月内，疾病完全改变了凯瑟琳的生活。

到了 1918 年 6 月底，《序曲》将要出版，维吉尼亚在日记中说小说似乎“有些夸夸其谈”，随意掺杂了一些凯瑟琳“廉价的现实”，但也不乏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接着凯瑟琳的新故事《幸福》发表在《英语评论》上，维吉尼亚对其不屑一顾，惊呼道：“她完了。”她总的认为，凯瑟琳的心智是贫

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爱尔兰新闻记者、作家。他的代表作有《我的生活和恋爱》《王尔德传》等。他主编过不少杂志，最主要的是《星期六评论》。一译注

瘠的土壤，整个故事的主题“贫乏，廉价，是她那尽管不完善，然而有趣的心智的反映”。秋天，默里夫妇已在汉姆斯特买了一所房子，维吉尼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登门拜访凯瑟琳，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她。圣诞节过后，她感到迷惑不解，觉得凯瑟琳似乎“抛弃了”她，没有对她送去的圣诞礼物表示感谢，她当然想不到凯遭受了什么痛苦，才导致了这种关系破裂。

从此，凯瑟琳的生活重复着英格兰度夏、地中海度冬的痛苦方式，打断了她的婚姻、友谊以及其他一切。维吉尼亚对这些情况有时只是冷眼旁观。

1919年春夏季，默里被任命为《雅典娜神庙》的主编，此时这两位妇女有过最好的会面，写下了最长的日记。3月22日记载了维吉尼亚对这“不可捉摸”的女人的恼火，但是又有“一种自然有趣的感觉，我想这来自于她对我们宝贵艺术真诚的关心，虽然这种关心的方式与我的不同。”下面是凯瑟琳给莫瑞尔夫人的信：

我确切地了解你对维吉尼亚的看法——一直是美伦美奂的人儿，而最后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只鸟，飞上最高的树端，从那儿继续谈话……她像我想象中的鸟儿那样爱美；她俯瞰着自己描写过的“那个步子高低不平的绿色昆虫”，而她自己却不是她描写的主题——她上下翱翔着，飞跃过地面，优雅地飞着——像鸟儿一样在水中看见自己可爱的身影——但却不是人的形象。

那个夏天她俩可以愉快地共度一小时的时光。维吉尼亚发现自己的确喜欢凯瑟琳，觉得她们已有了一些耐久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前面还有障碍。

秋天，凯瑟琳去了南方，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她在那儿给《雅典娜神庙》写小说评论。默里给她寄去《夜与昼》，维吉尼亚构思这本书，作为“传统体裁方面的练习”（这是她自己的话），也许是在经历过《远航》的恐惧后的一种康复工作。她自己也知道这并非出自她最好的才智，甚至称其为“那没完没了的《夜与昼》”。

凯瑟琳对此一无所知，认为一位严肃的作家最近的一部作品总是比以往向前迈进一步，觉得此小说平淡乏味，但其中也有她痛恨的地方。她害怕评论此书，当时她正处于精神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和其他原因，所以16天内有9封信中都谈到她对评论此书的担忧。她个人的意见是：“这是心灵的谎言，战争从来就不存在：那就是它要传达的意图。……”此书流露出读书人的势利观念，但她又不能说这种话，“我尽力做到态度友好，出于好心而犯了过失”——等等。

无疑评论是认真的，凯瑟琳对此进行过严肃的思考，文章富有洞察力，措辞谨慎，根本谈不上对小说的不公平。不幸的是，文章将小说比作一艘静静地驶入港口的轮船时，无意中使用了一些造成伤痛的词句，起因于轮船属于女性词：“这种奇异之处在于她的冷漠，她宁静完美的气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刚刚完成了一个危险的航程——没有任何伤痕。”

维吉尼亚感到评论含有恶意，吴尔夫也这样认为，他们一直盼望着称赞，对当时凯瑟琳在意大利时的糟糕境况一无所知。

除开势利观念不谈，在这段插曲后隐藏着的是凯瑟琳超离于个人的感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1828年创刊，1921年停刊。——译注

里维埃拉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法国的尼斯、芒通，意大利的圣雷莫等。——译注

觉：她相信（在停战的那个星期她曾就此对维吉尼亚谈过）小说必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很深的理解，她告诉默里说《夜与昼》实际上否定了战争，又接着说：

我不喜欢（但愿此事没有发生）总动员和在比利时的暴行，小说不能把战争排除在外，必须有心情的改变，看见人类“安定下来”，的确有一种恐惧感。我最深切的感受是一切都会改变——作为艺术家，我们如果不这样想，就是一种背叛、我们必须把它考虑在内，找到表达我们新思想，新感觉的新的方式和模式。

后来她写了自己的杰出作品《苍蝇》，几天以后，她又对自己关于战后小说的想法加以展开：

我不能想象经过战争以后人们还能重过以前的生活。好像战争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会对你说我们死而复生，生活怎么会一样呢？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不再宝贵，或“光明和白昼的普通事物”已经消失，它们没有消失，而是强化了，被照亮了。现在我们明白了自身的意义，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悲剧，似乎尽管我们复活了，我们还是面临着死亡，但是经过了生活，这是关键，我们在生活中看见死亡，就像在盛开的花朵中看见死亡一样。我们歌颂花朵的美丽，我们将使这种美永垂不朽，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样感觉的吗？——或者不同——那么是怎样的呢？

但是你当然不会认为我这样说意味着享乐主义，不，我的意思是“广大无垠的沙漠”。然而你我之间的差别是（也许我错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冲出这些沙漠，

它们是我的秘密。我可以描写一个男孩吃草莓，一个女人在微风飘拂的早晨梳理头发，这是我能唯一提及它们的方式。但是它们一定在那儿，别的方式都不行，它们可以出现和隐退，在自己喜欢的最美妙的空气中跳跃，但是我它们厌烦透了，维吉尼亚。

似乎遗憾的是凯瑟琳和维吉尼亚都谈不上冲出她们广大无垠的沙漠。

冬天过去了，两人没有通过信，凯瑟琳回来后，似乎也不急于见面——但这得怪她患了寒热。她现在“有些像只猫，冷漠，镇静，总是独自一人——观察力敏锐”。但接着她们又融洽起来，维吉尼亚发现她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她自己只有对伦纳德·吴尔夫才会用同样脱离现实的方式谈论、不加修饰地写作，像写日记一样。

夏天有了更多的会面，维吉尼亚去默里夫妇在汉姆斯特买下的房屋拜访。看望“像一只受伤的动物”那样在房间内走动的凯瑟琳。最后一次拜访过她以后，维吉尼亚探究自己内心情感的冷漠：她是否像自己应该的那样深有感触呢？凯瑟琳对她们的分手会在意吗？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冷漠，但对“不能再同她谈话”又感到茫然。

《幸福及其它故事》出版，正赶上圣诞节，在《文学副刊》上受到专栏文章的赞扬。维吉尼亚预见到将要到来的称颂，感到有点嫉妒，因此也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为她非常高兴和骄傲。凯瑟琳谦逊他说她受之有愧，在回信结尾时用有点古怪的带有结束一切的口吻写道：“不知你是否明白你来看

望我意味着什么——或我多么想念你。你是我唯一愿意与之谈正事的妇女，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人了，……别了，亲爱的朋友（我能这样称呼你吗？）。”

似乎凯瑟琳听说了什么她不喜欢的話，总而言之，这封信结束了她们的友谊，至少在凯这方面是如此。几个星期之后，维吉尼亚听说她病得很重，很孤独，又给她写过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因此感到伤心，后来告诉布雷特，说有些“丑恶的传闻”，使她确信这是凯瑟琳耍的手腕等等；但她仍很懊悔自己没有再尝试，因为凯瑟琳给了她任何人都不能给的东西。

此时她已完成了《雅各的房间》，这本小说中使用了新的技巧，新的时间感和尝试，这也许得之于她同凯瑟琳的谈话，此书是她将来写作方式的新起点；小说还再三强调人们从来不能真正彼此了解。

凯瑟琳去世时，维吉尼亚在日记中写道，凯瑟琳的作品是“我唯一感到嫉妒的作品”。后来她告诉莫瑞尔夫人，凯瑟琳在世时，她因嫉妒，从不能阅读凯的书。无疑我们必须将此种嫉妒视作她的一种病态，而不能从道德方面去考虑。然而凯瑟琳只是羡慕维吉尼亚所拥有的东西（她的家，以及她在丈夫那儿得到的安全感），但是维吉尼亚却嫉妒凯瑟琳可能会取得的成就，也许这就引起了她或许感到的愧疚。

凯瑟琳去世后第三个星期维吉尼亚写的一则日记，描述了在过去十几天内笼罩在她心上的悲伤情绪，现在她又孤独了，没有对手：鹤立鸡群，然而孑然一人，她当然会继续写作，“但归于空虚”。

1918 年，在班达尔
万能的父亲、至高无上的主，
给了我们，你的孩子心、肺和肝脏；
既然你赐与我美妙的语言才能，
就不要倾听我对肺的抱怨与不满。

——“写于陌生之地的诗”

1918 年 2 月

1917 年夏末，“两老虎”一直憧憬着战争结束后两人可以安静地住在一所可爱的村舍里，成为杰出的作家——终于结婚了（离婚案即将结束），摆脱了过去所有的压力，一心从事文学，那会是没有一切不如意之处的兰克顿小屋，除了维吉尼亚以外，布卢姆斯伯里没有任何人能够跨进门槛一步，不能再把凯瑟琳的名字扯进他们自己的闲话中去嘲笑。他俩将会有一个小儿子——别人可以照料他——他们将阅读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从燃烧的秋叶中冒出缕缕轻烟，他俩将在各自的房间里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默里给他读中学的弟弟（亚瑟，后来叫理查）写信时首次描绘了这么一隅前景。亚瑟此时已在乡村，他根据哥哥的安排在佳星顿工作，便于自己淋巴结核手术后的康复；以后靠杰克的资助，他将在艺术和设计中心学校学习印刷术。1917 年 9 月，默里给他写信谈到战后他们三人将会找到“可爱的旧村舍，6 英尺厚的墙壁，果园，草地，附近还有许多很好的农屋”。他们可以将最好的粮仓改成书店，理查可以照看花园，制作黄油，他们三人（千万别泄密）“将一起成为非常有名的人物！”

这个梦中的农庄后来叫做“苍鹭”，以纪念凯瑟琳的弟弟。默里的描述有些自我嘲讽的意味，是特意迷惑克莱夫·贝尔，然而梦想却是认真的，他们都相信过去的好时光在战后还会回来，目前两人都努力 working。

默里工作过于疲劳，11 月他病倒了，克洛夫-希尔再次警告他说他可能会患肺结核（这种疾病当时在英国每周夺去 1000 人的生命），建议他请病假休息，因此凯瑟琳写信给莫瑞尔夫人询问是否能让她们住到农庄上去，“他的一侧肺有些受感染，但主要的问题是发热，精疲力竭——经过那些可怕的压抑和劳累后的崩溃。”

此时她自己感觉很好，这一年唯一的病痛是那该死的“风湿病”，没有迹象表明她知道自己的肺也受到侵蚀。更为异乎寻常的是仅仅几个星期前她还翻译了阿尔丰斯·都德的故事《塞甘先生的山羊》，发表在《新时代》上。

这是普罗旺斯 的告诫性的故事，意在让小孩重视自己的家。故事是书信体，写给一位 15 世纪的法国诗人，他情愿过贫病交加的生活，而不愿选择安逸舒适。很好，都德说，连塞甘先生的山羊也渴望自由；它挣断绳索，跑上山去，遇见了狼，搏斗了一晚，直至天亮。

“终于等到了”，这可怜的家伙说，它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自己可以死去，它躺倒在地上，身上白色可爱的毛皮血迹斑斑……，狼扑到小羊身上把

法国南方地名。——译注

阿尔丰斯·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以短篇小说及描写法国南方风光的散文故事闻名于世。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最后一课》，并被编入许多国家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译注

法国东南部省名。——译注

它吃掉了。

无论如何，凯瑟琳——她自己不久就将因病前往法国，在这战争期间——发现了这篇普罗旺斯故事，就将其翻译发表，而在塞甘先生的羊身上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是不可能的。翻译并非她的习惯，这是她发表过的唯一作品，显然也属于对命运的奇怪的预测之类。自从青少年时代起，她就一直追寻着这种命运，她知道代价。她在山中的自由就是她的艺术。

默里于 11 月 24 日去了佳星顿，当然住在大宅第内，他们决定再也不分开住，管他皇家讼监会怎么说。默里“白天出去找房子，晚上写作”，这使凯瑟琳很不高兴。

于是她冒着寒冷下乡去度周末，在乘马车去车站的路上，她着凉了，只好回到切尔西卧床休息，不久就病倒了，“胸膜炎”又犯了。一位邻居请来了英格医生（也是新西兰人），他说必须卧床，她告诉了默里，又说“我仍然觉得极度兴奋，实际上我根本就睡不着，心情激动地躺着。”

默里进城来，放弃了在佳星顿度圣诞节。英格医生说凯瑟琳必须避开在英国过冬，他建议去法国南部（这样也能避免危及离婚诉讼案），因此决定让埃达陪同前往，帮助凯瑟琳安顿下来，因为她有医学证书。默里和埃达去弄护照，这个消息被当作笑话告诉了莫瑞尔夫人，然而隐藏在笑话后的是恐惧，因为英格医生不久就说在凯瑟琳的右肺上有一个“斑点”，当务之急是去晒太阳，此时如果她自己重视的话，还是很可能得救的。

这消息也引来了家庭的帮助，凯瑟琳的姐姐彻迪在印度成了寡妇，现在伦敦战争登记部工作，她同贝尔姨母一起乘车来探望，带来了许多当时难以弄到的食物。贝尔姨母（她自己也患过肺结核）想把凯瑟琳带到她乡间的居所去，舒舒服服地——“穿着皮衣服，乘汽车四处兜风”——然而英格医生说不行，她必须安安静静地呆在原地。因此圣诞节没有举行晚会，凯瑟琳告诉默里，贝尔姨母的礼物是“一件巨大的苹果绿色丝绸棉袍……三个怀了孩子的凯瑟琳也能塞进去”，只好拿去调换。

到了元旦，凯瑟琳觉得身体好了一些，能去佳星顿见见默里，在旅行前稍事休息。回到伦敦后，他们得知埃达没有拿到护照，不能陪同出国，也许此时应该放弃整个计划，但他们不顾战争的威胁，还是照原计划行事。星期天下午他俩在默里的住处做爱，星期一（1918 年 1 月 7 日凯瑟琳一人从滑铁卢启程，戴了一双漂亮的新皮手笼。她 4 月份再回来结婚，多么令人快乐！默里必须记住把她的信和电报送给“波登太太”——这是她那可恶的护照上的名字。

到达勒阿弗尔时，天正下着暴风雪，她描写了风雪的美景。她感到胸口炽热，像个“熨斗”。尽管去巴黎的火车没有暖气，雪花从一扇破裂的窗户飘进来，占据她头脑的念头还是描写这一情景。然后她乘车经过枫丹白露去米迪，同车厢两位身着黑色衣服的太太说那是肺病患者送命的地方；然后又从马赛至班达尔的可怕旅行，车上挤满了情绪恶劣的伤兵，几天以后，默里、莫瑞尔夫人和 J.D，弗格森都收到了有关这些士兵的有趣描写。危险或痛苦常常是炽热燃烧的刺激写作的因素。

伦敦火车站名。——译注

法国北部海港城市，位于塞纳河口。——译注

法国地名，在巴黎以南。——译注

当然旅行必须付出代价，抵达班达尔后，凯瑟琳告诉默里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掉进牛奶罐中后再捞出来的苍蝇，仍然湿乎乎，淹得半死，不能开始修饰自己。”

在里维格旅馆住的都是新人，一位陌生的女人一面向她打招呼，一面用一张餐巾纸擦着嘴，没人知道她预订房间的事。旅馆没有暖气，价格比过去更贵，城里面熟悉的店铺也变了，现在没人认识她。海湾内停泊着一艘驱逐舰，两艘潜艇——“到处都是黑人士兵”。香烟也买不到，直到一位潜艇舰长给了她一些自制香烟。棕榈树下有粪便。这是凯瑟琳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后果，虽然这种体验来得太晚了些，英格兰只略知一二而已。

分开4个月后所写的90多封信，占了凯瑟琳写给默里所有信件中的五分之一，其中可以找到她最有勇气的话，最冷酷无情，最绝望的话；有些信洋溢着爱情，不仅是对默里（那位高加索女仆朱丽亚也令人不能忘怀），有些则流露出冰冷的仇恨；匆匆从寒热的一个极端跑向另一个极端。

她对法国的第一个反应——途经巴黎时——是承认自己对它的热爱（“因为我从未感到漠不关心”），然而第三个星期她又在笔记本中写到自己讨厌法国，又开始写一篇故事，进一步抒发这种感觉。她自己感到了与劳伦斯相似的情景，不能控制狂怒的情绪，而且开始怨恨莫瑞尔夫人，虽然她送的一条贵重的披中现在正给她夜间御寒。

她不想让默里为任何坏消息担忧的决定落空了，因为她再没有别人能够倾诉。他开始采取行动尽力帮助。他俩在卡奔塔利有一位交情一般的相识，雷吉娜·乔夫诺，她丈夫是位医生，现在担任市长，默里给她写了封信，她出乎意料之外地去看望凯瑟琳，经过旅途劳顿，1月28日在她那儿呆了一晚。她狂热地爱好济慈，这使她成为一个讨厌的客人。默里还告诉了埃达有关凯瑟琳的状况，她又试了一次，想弄到旅行护照。

乔夫诺太太在那儿时，凯瑟琳写道：“我左边肺部疼个不停，就像一块可怕的烧伤。”但是“不要让莱斯利来”。“我能忍受，如果情况糟糕的话，我会告诉乔夫诺”。第二天她承认“的确，我病得厉害”，她进城去买了一根橡皮头的手杖支撑着走路。

疼痛和焦虑不但没有妨碍工作，还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她开始写一篇作品，但不了了之，“乏味冗长，丢失了”。然而接着，在1月底，刚刚对法国人的性行为发了一通议论，就开始写故事《我不会说法语》。她当时处于一种心情狂热激动的状态中，开始写此故事——这种状态从此标志着她的创作阶段——处于一种人们几乎不会寄希望于自己最大敌人的状态。故事写到一半时，她写信给默里说：“我的工作使我极其激动，夜间我感到自己几乎近于疯狂”。她不知道这是危险的迹象，又说“有一只巨大的黑鸟在我头顶上盘旋，我非常害怕它会降落下来——害怕极了，我不完全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夜间的恐怖和失眠又发作了，这种夜间的恐怖来自很久以前，她唯一的解脱方法是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如果我坐在床上读他，就能转移注意力。”然而，如果没有写作，“战争和焦虑会使我发狂。我在此处夜间感到的恐怖，混杂着成群结队、四处流窜觅食、哭噪着的野狗”。那也许是都德描写的夜间狼的哭噪。

当凯瑟琳经历着这一切时，在伦敦，累得精疲力尽的默里每晚在外吃过饭后，独自回到家，反复读着她的信，斟酌着用恰当的口吻给她写回信。他的责任重大起来（不久就将成为书报总检查官），然而夜晚他自己的野心是成为当时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前一个秋天在佳星顿时，他初次拜读了济慈的书信，这是他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命运似乎将济慈的疾病从他自己的肺部转移到了凯瑟琳的体内，因而使他感受至深。不久以后，他告诉她说觉得自己可以写出“前所未有的爱情诗篇”，然后他又宣称：

不，亲爱的，你我都是英国人，正因为是真正的英国人，才与我们同时代的人隔离，他们信奉异教邪说，只有你和我，还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兰姆，济慈和雪莱遵循……你是英国完美的花朵——莎士比亚梦想过的——我知道我有些异想天开，但这些奇异的想法有时却是真实的。

可怜的默里，这种异想天开选择了讽刺性的词句。事实上，正是“异教邪说”将要改变英国诗歌，两位外来者，艾略特和庞德已经着手准备造反。对于默里来说，共同逃避城市和腐败的生活并非通往成功之路，这时他写的诗虽然源于生活，使用的却是僵死的语言。至少，在他们家是凯瑟琳以一种最非英国化的方式更新英国文学。

接着她得到了令人吃惊的消息：埃达不久就将到来。埃达并未得到默里的鼓励，自己去了护照办理处，当众哭了一场，终于达到了目的，凯瑟琳开始收到一些她写来的歇斯底里的信件，比乔夫诺太太还要糟糕。埃达当真要来了，来以凯蒂对她的需要为生。凯瑟琳有些将埃达比作食人动物的说法：“她有点像个食尸者……只要我需要按摩，她就像个天使，因为这是她的食物，……所以在工作室时我常常感到狂怒，因为她当着我的面把我吃下去，我真的觉得恶心。”

2月10日，凯瑟琳誊写完了《我不会说法语》，将稿件寄给默里：“收下吧，是你的，”她写道，“然而我写时有着多么奇异的感觉——啊，我似乎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了——种权威人士——就像我对你的诗篇的感受一样，但愿收到后喜欢它。”

她告诉他说自己晚上梦见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甚至连标题都有了，那就是《日与月》，第二天她把它写了下来，誊好了，准备着手一些了不起的新作品，只是时刻担心埃达会出现。她跑来干吗？他生病好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能理解。

埃达2月12日到达，带来了一些挤扁了的水果蛋糕，“对我的状况近于歇斯底里”。在接连给默里写的几封信中，提到她时充满了几几乎同寒热差不多的厌恶心情：“她是令人讨厌的歇斯底里的食尸鬼，只有把我吃了才能感到满足。”“可惜你没有看见她拉长着脸孔，说‘我觉得你病得很厉害’，我感到血都冻结了”。“噢，我讨厌透了她这个人，她那老母鸡似的劲头——还有她的‘我们、我们’。”“一天，埃达问道：‘凯蒂宝贝，谁是华兹华斯？我会喜欢他吗？不要皱眉，我爱你，天使，爱你的一切，包括皱起的眉头。我什么时候再替你梳头？’”

然而这是莱斯利最大的胜利，她到达后 7 天，凯瑟琳窥见了都德的狼的血红舌头。

2 月 19 日，今天我很早就醒了，打开百页窗，看见太阳已经升起，我开始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句：“这温柔的云雀厌倦了休息”，然后一头倒在床上，我开始咳起来——吐了一口痰，有点异样的味道——原来是鲜血，就这样我每咳一下都会吐一点血。噢，当然我吓坏了，但只为了两个原因：默里不在时，我不想生病，我指的是“病重”，我首先想到的是默里；第二，我不愿意发现这是真正患了肺结核，也许会大发作——谁知道呢？——我完不成我的作品了，这是至关重要的，就这样死去多么可怕啊——只留下“零星片断”，没有完成真正的东西——埃达去请医生了。

医生勉强也可说是英国人。看过病后，凯瑟琳写信给默里，轻描淡写地谈了此事，“波吉，”她写道，使用这个曾经是小弟的昵称来称呼默里，“这不严重，没有让我卧床不起，绝对可以治好，但我吐了一点血。”事实上她看见鲜血“差一点吓坏了”，她马上就明白了。济慈知道，劳伦斯知道，她自己的贝尔姨母也曾经知道这个。

凯瑟琳称之为“水泡眼”医生的是那种她讨厌在异乡遇见的默默无闻的人物——“疯狂地热衷于花柳病和激情”的“肮脏的婊子”。她“肯定他来此，是因为曾用一个脏钩子杀死过什么可怜的女孩子”。唯一能做的是忍受他的眼神，写信给英格医生，以及为塞甘先生的羊写作。除此之外，她当然还能求助于幽默，写下一些好笑的话，或者她可以继续工作，可以搏斗一晚，直至天明。

写作《我不会说法语》有三个推动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自从这次到达法国后对法国人的莫名其妙的痛恨；另一个是她对战争以及战争给她热爱的一切造成的危害所感到的极度失望（“它时刻在我心上，一切都被它弄糟了”）；然而她承认最有力的推动因素是她对默里的爱情，写作此书时她“以我们的爱情为食粮”，称其为对爱情的颂歌，“你知道这是我目前能做到的最好的。”

这是她第一部不是以自己为叙述主角的短篇小说，写作方式是完全模仿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叙述者。当时凯瑟琳大量阅读狄更斯——“我并非漫不经心地阅读狄更斯”——并非毫无意义。她过去一直采用模拟手法，现在则发现了在整个作品中从头至尾使用模拟的方法。另一更为明显的影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笔调中，在肮脏邋遢的叙述者的自我表白中，都能找到不少《地下室手记》的痕迹。《我不会说法语》是凯瑟琳称为自己“反对腐败堕落的呼喊”的短篇小说，表明自己艺术目标的最具说服力的叙述之一，下面的一段话常被引用：

在写作这场游戏中我有两个“开球”，其一是快乐——真正的快乐——在波琳促使我写作，此种写作我只有处于极乐的平静状态下才能进行，此时某种绝妙可爱的东西似乎在我眼前展开，像一朵从未意识到冰霜寒冷的鲜花——知道周围的一切温暖，柔和，静静以待。我一直竭力想将其表达出来。

另一个“开球”是我旧有的，如果没有体验过爱情，那会是我唯一的：

并非仇恨或毁灭意识（两者都是采取蔑视态度的真正动机），而是一种极端的绝望情绪，感到一切都像杏花和圣诞糖果一样注定要愚蠢任性地走向毁灭。对了，当我掏出一张香烟纸时，正好找到了准确的词来形容它——反对堕落的呼喊——这的确是一矢中的，不是抗议——而是呼喊。当然堕落也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

目前我已处于这第二种状况，全力以赴驶进了深深的海洋……

《我不会说法语》首次问世时由私人出版社印刷的小版本非常珍贵，当时未经删改，尚未磨去锐力，后来则再也没有重印，因而故事的原来形式就鲜为人知了。

故事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卢尔·都克的愤世嫉俗的年轻波斯人，“像一个洒了香水的狐狸似的法国人”，他坐在咖啡馆内沉思，而整个故事则经过他的思绪。

他为两份报纸撰稿，但爱好严肃文学，他还喜欢具有英国风味的东两：身穿英式大衣，寓所内有一张英式书桌；他喜欢那个关于“一个鱼丸”的滑稽歌曲；他对英国年轻作家迪克·哈蒙有一种同性恋似的喜爱，他们曾在巴黎见过面，后者更喜欢他自己的母亲。

在咖啡馆，都克拿起一本记事簿，发现有人在那儿写下了“那句愚蠢的套话‘我不会说法语’”，而正是这句话突然使他回想起关于迪克和那个孤独无援的漂亮英国女孩的悲惨故事，迪克把她带到巴黎后不久就抛弃了她。

迪克称她“老鼠”（无疑是“老虎”的余音），她也没有其他名字。他们请都克在一个“体面”的旅馆预订两个房间，他去车站接他们。老鼠优雅柔弱，身披黑毛镶边的黑色长斗篷，双手藏在小小的皮手笼内——“老鼠第二”。

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说法语”，她在巴黎不认识别人。

他把他们领到房里去，休息了一会儿，老鼠请求“立即送茶来！”他不久就察觉到他们之间一切都不对头；然后迪克跑到另一个房间去“写一封信”：“是给我母亲的”。他再也没有回来；尴尬不安地等了很久以后，老鼠走到对面房间，发现留给她的那封信：

老鼠，我的小老鼠：

这没有用，这不可能，我不能坚持下去，噢，我的确爱你，我的确爱你，老鼠，但是我不能伤害她……

都克（当他坐在咖啡馆回忆这个小小悲剧时，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个男妓）不能安慰老鼠，她避开他温柔的帮助，对他所说的“请把我看作你的朋友”的话感到怀疑，但是接受了明天给他打电话的建议，因为“一切都太困难了”——因为“我不会说法语他就这样离开了，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故事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卡尔科的《纯真》的反驳，默里在前一年7月曾为《文学副刊》评论过那篇作品，她现在告诉他“题材，即‘说法语’，当然是取自于卡尔科，格特勒以及天知道谁，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你当然明白），我并没有故意伤人，的确没有。”

实际上故事原稿是紧接着一段话后开始的。

那段话开头说“但是，天哪，天哪，我多么痛恨法国人，他们总处于发

情期，看看他们怎么跳舞，嗅着一个女人的裙子吧……”

将前半部分寄给默里时，凯瑟琳说自己刚才重读了一遍，想不出她“究竟从何处得来的故事——取自于现实生活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个我讨厌的非洲洗衣妇——但仅仅是讨厌而已——而迪克·哈蒙，当然是，有些是——”。

她在此处中断了，不难看出迪克·哈蒙“有些像默里”，而戴着皮手笼的老鼠则部分是他1912年带到巴黎去的凯瑟琳，是6个星期前离开伦敦滑铁卢车站的凯瑟琳，当然肯定也是他1911年在巴黎抛弃的玛格丽特，借口该责备母亲。而都克则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的尼克·卡罗威 一样，是凯瑟琳以自己的眼光观看自己，这个角色蕴含着对她聪明的自我的自我谴责——对《纯真》中四处剽窃的维尼的自我谴责。

两年以后，当康斯特布尔准备出版包括《我不会说法语》在内的选集时，迈克尔·萨德勒 坚持要删去某些片断，这些片断都与性的滥用有关，其本身目的在于使都克的自我描绘更清晰、邪恶，正是其刻薄的讽刺意味才使故事的意图一览无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凯瑟琳的《荒原》。

1920年，听说康斯特布尔要求某些删改，凯瑟琳说她对迈克尔·萨德勒感到极端愤怒，绝不会同意：“难道要我为了40个英镑摘掉故事的眼睛吗？……轮廓将变得模糊不清，那些清晰的线条不能删掉。……”第二天，她作了让步，认为自己过于任性，然而后来又再次改变想法，后悔不该删去一个字：“我错了——

大错特错。”

经过那次《日与月》的梦境体验后，凯瑟琳又着手某个“了不起的故事”；但这不过是《幸福》。这个故事一直受到称赞，享有盛名，实际上极其冷酷无情，其中的女人是人，男人却不过是些类型，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疏远隔离，伯莎 自己的描写则汲取了痛苦的现实：

……在她心中仍有着那块光明灿烂的地方——那一阵小小的火花出自那个地方，这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她几乎不敢呼吸，唯恐将火焰煽得更旺。然而她深深地、深深地呼吸着。

——但是她的丈夫哈里是一个庸俗的证券商人，而愚蠢的埃迪似乎来自《笨拙》描绘的一场网球聚会。附庸风雅的伦敦客厅式的嘲讽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嘲讽一样聪明肤浅，他自己就是埃迪的原型。

T.S.艾略特在他的《崇拜异神》中虽称赞故事“处理微小素材的完美手法”，也公正地评论其“道德寓意则微乎其微”。

3月悄悄地过去，没有再写什么。现在凯瑟琳一心想的只是回家与默里团聚，摆脱埃达——她威胁说要坐着她的出租车去雷德克利夫街默里的住处帮凯打开行李，尽管有默里在那儿：“旅行后一定得有人好好照看你”。凯瑟琳说，“如果你看见她说这话时眼睛怎样牢牢盯着我，就会明白我为什么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1），美国小说家，其主要作品之一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注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故事讲述者。——译注

负责出版凯瑟琳小说选集的编辑。——译注

《幸福》中的女主角。——译注

恨她。”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居于这次蔑视战争的法国旅行之首的一场灾难。

两位妇女 1918 年 3 月 21 日离开班达尔，打算直接回伦敦，凯瑟琳的护照只适用于巴黎，因此她们去了巴黎——春天的巴黎——就在这一天德国开始使用新的远射程大炮轰炸这个城市，在一片恐慌中，再也不能指望渡过海峡，她们在索朋 附近找了一个旅馆安顿下来。

加农炮每隔 18 分钟就发出一阵可怖的声音——或者一天一次，从没有一定规律。坐在旅馆地下室的煤堆上，“听着该死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说话”，这一切太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情节了。而默里却似乎更欣赏象征性的联想。

他给凯瑟琳写信说，“我处于一种现在常有的心理状态，我在一切事物上都看见了象征……这几个星期难以形容……似乎我的灵魂，以及比我灵魂更为珍贵的东西，一种灵魂相依的美好理想从我这儿被拽了出去，变成了飞絮或亮晶晶的气泡。”埃达一辈子都对她的宝贝所爱的男人的这种专注自我很反感。

两个女人在一个公共食堂每天紧张地工作几小时——这是凯瑟琳战时唯一有记载的工作。她每天都要去邮局拿信，去军事护照处，再去邮局。埃达说她们的钱用完了，凯瑟琳必须去见“某个她情愿付出任何代价而不愿见的人”，带了一些现钱回来。埃达不敢问，但怀疑也许此人是卡尔科（此人更可能是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

可怕的三个星期变成了凯瑟琳称之为“另一个索多姆和哥摩拉”。当一颗炮弹带着震耳欲聋的响声落在附近时，她跑去看：一幢房子的整个屋顶都“似乎被啃去了”，道路上盖满了瓦砾，街两旁的树才长出新绿，已被炸断了许多枝条，但在残枝上还挂着许多碎衣服，破纸片——一件睡衣，一件无袖衬衫，一条领带，都在阳光下零星挂着，然后：

两个工人来清理废墟，在瓦砾下发现了一件女人的丝衬裙，他把它穿上，跳了一两步舞，引起众人的哄笑，这让我充满了恐惧，再也不能忘记他那舞动的双脚，他龇牙裂嘴的笑容，折断的树枝和炸毁的房子。

观察人性的这三个星期本身就是堕落，“这不是巴黎，这是地狱”，凯瑟琳写道，说埃达在那个地方扮演了魔鬼卫士的角色：“在每一家店前停下脚步来，咕哝着说，‘我真想哪一天看见你双手戴满了精巧的戒指’。”

凯瑟琳自己的梦想是一回到伦敦就尽快同默里结婚——不想在每一封电报、文件上被称为“波登太太”，只有这个希望支撑着她，使她能抵挡生命的损害和浪费。然后，他们就要去找一所“苍鹭”，她甚至还抱着这样一种女人的希望：“我想去看看医生，问一下自从那个星期天下午玛莎姨妈就没有来过，是否有什么值得庆贺的理由。当然要等到我问了以后才敢抱有希望。”

但是她并没有怀孕，离开班达尔前就病得很严重，后来又到处漂泊流浪，

巴黎市区名，——译注

索多姆和哥摩拉均为《圣经》中传说的上帝摧毁的罪恶城市。——译注

凯瑟琳对月经周期的委婉称呼。——原注

弄得惊恐憔悴（护照照片上的人像鬼一样）。最后，在 1918 年 4 月 10 日终于同埃达一起逃离了法国，渡过了海峡，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了。

4 年前人们就知道“欧洲的历史”已到了尽头，家庭生活以及其对艺术的帮助也面临威胁，华兹华斯的英格兰，文学家和妻子共有的英格兰，可爱的古老村舍里可以写作，燃烧秋叶的火堆中冒出缕缕轻烟——凯瑟琳和默里的这一切希望也破灭了。

等待“大象”

我隔壁房间那个人也患着同我一样的疾病，夜间醒来我听见他在翻身，然后他咳嗽，我也咳嗽，静了一会儿以后，我咳嗽，他又咳嗽，就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觉得我们两人像黎明未到就互相鸣叫的两只公鸡，在那远远隐僻的农庄上。

——《日记》
1918年6月

渡过海峡后几天之内，凯瑟琳去看了英格医生，知道自己“的确患了肺病”，但她说服英格相信疗养院“不能救我，只会让我死得更快”，因此她准备“在家治疗”，也许就在汉姆斯特。她打算冬季到来前找到一所房子，先同默里住在雷德克利夫街，属福尔汉区，她喜欢那儿，因为那儿没有一点布尔乔亚味，住在那儿的人来去都不戴帽子。当然默里的想法不同，他的房间见不到什么阳光，她又一直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他上班时，她要出去买东西。她一点也不了解现在伦敦排队买东西是什么情景。

4月29日，凯瑟琳终于获准与波登离婚，5月3日，由J.D.弗格森和多萝西·布雷特作证人，凯瑟琳与默里去了结婚登记处，终于正式结为夫妇，凯瑟琳摆脱了那个每次看见就使她深感愧疚的姓氏，马上不无骄傲地写了一封信给维吉尼亚·吴尔夫，落款用了新的姓名缩写K.M.M.然而，她对这种布尔乔亚的快乐又有种矛盾心理，因此当她们会面时，她又对其加以贬低，这也许是一种对抗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那伙人的自我防卫。结婚几天以后她去吴尔夫家吃饭，不久维吉尼亚就写信告诉莫瑞尔夫人说发现凯瑟琳仍一如既往地神秘，迷人，但又觉得结婚像聘请一名打杂女工一样平淡无奇，“她的迷人之处部分来自于她必须发些荒谬的议论。”

事实上她结婚的那一天也是个悲惨的日子：

我们的婚礼，你不能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本来应该充满阳光——虽然生活中有其他不如意事。然而这只不过是梦魇的一部分，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抱在怀里，称我为妻子。事实上，整个过程就像我的一次生日，我必须一直让你记住它……

然而，6年来，默里的情感上一直依附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妇女，而同她结婚时她已病入膏肓，又刚刚得知她患了那种每星期夺去1000个生命的疾病。这一切默里会有什么感觉呢？

在惠灵顿，家人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个关于凯瑟琳和她的杰克即将正式结婚的消息（两人都收到她父母亲表示赞同的信），但基先生发出的电报却告诉他们另一个消息，比切姆太太写信告诉一位家庭的朋友：

冬季凯瑟琳将去法国南部，为了健康的原因她曾经去过那儿。上次她从班达尔写信来说胸膜炎、风湿病已好些了，但不幸的是她回到伦敦后，上星期我们收到一封电报说她病得很重，得了开放性肺结核，需要立即去疗养院

或居家休养，你可以想象我们经受的痛苦和打击，我会同样电告在悉尼短期出差的哈罗德。当然我也拍了电报给他们，让他们有权支付这可怜孩子需要的任何额外费用，我将竭力为她做一切事。自从她到达英格兰后，彻迪就对她非常好，凯丝很喜欢得到这位慷慨慈爱的姐姐的关心。但是似乎能为她做的事不多了，除了尽力使她的余生过得幸福舒适。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下次有船来时我会去看她，知道她会高兴再见到我，因为她终于学会了爱她的父母亲，最近给我们写了亲热可爱的信，写得那样甜蜜优美，可怜的宝贝，她失去了那么多东西，但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幸好她是最后一个送莱斯利去法国的人，她从没忘记这个特权，因为她崇拜自己唯一的弟弟，而他则对她所有的过失都表示同情，甚至在学校时他就常给我们写些措辞巧妙的话，为她请求宽恕。

住在伦敦的默里夫妇几乎不大与人打交道，他们不愿去佳星顿庆祝婚礼，在法国时凯瑟琳对莫瑞尔夫人的感情上就笼罩了一层阴影，因为她知道了某些事情，她后来再也没去过那儿。劳伦斯夫妇现住在德比郡，与他们不通信；埃达回到普特尼去开机床，住在兵工厂工人宿舍，非常自得其乐；柯特同默里夫妇不来往（他对吴尔夫夫妇就凯瑟琳的“灵魂”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布雷特去苏格兰度假；安妮·埃斯苔尔·赖斯同丈夫去康沃尔写生；伯特兰·罗素因煽动罪进了监狱；李敦·斯特雷奇现在同卡林顿同在梯德马什，因为写了《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人物》一书而几乎要被捧上天；5月份此书发表后，受到阿斯奎斯先生的称赞，整个伦敦社交界都想会见这位了不起的作者。

在里奇蒙德，吴尔夫夫妇还没有完全为他们的“第2号出版物”排好字，“我可怜的宝贝《序曲》还在他们的小鸟笼内尖叫，还没有出来”，凯瑟琳写信告诉在苏格兰的布雷特，她希望这本书能带来转机，肯定默里也希望它能获得成功。

此时写的日记中有一些生动短小的作品，是她“真正的自我”掌握笔杆时写的非常好的东西，有对雷德克利大街市民生活的敏锐观察，对弗格森画室的拜访，电影剧本的一个片断；描写在大街上流浪的可怜的饿狗“在干涸的水沟边嗅来嗅去”，这最后一个片断像来自里尔克的书信。然而另一作品也记载了她既嘲讽又伤感的矛盾心理：在记下了一些打杂女工的闲言碎语后，凯瑟琳问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一类东西，“那么诗人呢——还有鲜花和树木？”然后她自己又回答道：“既然我不能拥有别的十全十美的事物，我的确喜欢这一类东西。我感到得心应手，它没有固定的地方，我也没有，而且——而且——噢，我确实感到太好讽刺人了。”也许古德伊尔可以告诉她毛病在哪儿，她需要放弃那种乔治时代的田园牧歌情调，调谐自己对现代生活的看法，在城市街道上找到诗歌，然而受到肺病的威胁，这样做的可能性时有时无。

的确，一切都改变了，凯瑟琳再也不会是晚会的中心，再也不能有越轨行为。一个人确实可以体验各种生活，但是死亡却不同，一个人只有一种死亡。

这时，比切姆太太自己也身患重病，三个月后就去世了。——原注
英国中部郡名。——译注

几乎每到晚上 11 点钟我就希望是早晨 11 点，我来回走着，看着床，看着写字台，看着镜子，被那个日光炽热的女孩子吓住了，一边想着“我的烛光能燃到尽头吗？”然后长久地坐着凝视地毯——一直凝视着直到某个偶然的时机才抬起头来。噢，天哪，这种人会死，而且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念头。

肺结核患者在健康强壮的人中间感到的那种猜疑，现在也折磨着她，最近有一次她正在咳嗽时，看见默里把手帕按在唇上，扭过头去；甚至有一次他还问她现在是否“仍然向往苍鹭”，在她梦寐已久的婚礼后才两个星期，就建议她搬出伦敦去度夏。

他们在汉姆斯特看中了一所房子，一幢灰砖结构的庞然大物，他俩称之为“大象”，8 月就可以搬进去；当他们等待时，他想让她在更合适的环境中得到照料，这意味着他“想摆脱她”。

安妮·埃斯苔尔·赖斯住在洛尔，那儿有一个很好的旅馆，她说那“正好适合于曼斯菲尔德”，现在有钱支付这种费用了，默里当书报总检查官，有 500 多英镑，比切姆又给凯瑟琳增加了津贴，每年 200 英镑，就这样 5 月 17 日安妮·埃斯苔尔·赖斯将她安置在洛尔的海德兰旅馆，有一个讲究的面对大海的漂亮房间。尽管战争期间，仍有充足的食物，以及来自亲切的哈尼太太母亲般的关怀。

经过到达一地后通常有的一阵高兴与热闹，默里得知她又病倒了，每咳一下都疼痛万分，洛尔年轻的爱尔兰医生半夜来看她，不久她呼吸就感觉轻松多了——自然又想到写作，虽然又遇上通常会有的那种不知如何开始的困难，她感到“以自己这种可怕的现代方式，我不能触及自己的心灵”，她似乎看见自己站在一个令人厌恶的电话亭前，不能“接通电话”：

“对不起，没人接电话。”传来轻轻的声音。“你能再拨一次吗？——转换台，让电话铃多响一下，一定有人在。”

“没有人回答。”

那么，房子肯定是空的，——连看门的老傻瓜都不在，四处都黑暗，空旷，悄无人声。

奇怪的是她仿佛一直见到这座空旷的房屋，就像她父亲的仓库。——“我看见吊起装着笨重木材的箱子，涂了沥青的绳子荡下来。”

那一天或第 2 天，受到焦虑的驱使，她终于打破了沉寂，开始写一个新作品，“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一个毁灭性的题材”。

《已婚男人》既不伤感，也不刻薄，具有只能在她晚期最好的作品中才能找到的那种清晰具体，其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者是一位药剂师的儿子，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孩子回想起将死的母亲来到他的床前；回想起一个容颜憔悴的妓女溜进店里来买他父亲有名的春药；还有故事本身描写的充满冰冷仇恨的家庭生活场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的尝试。

三个星期后，默里去了凯瑟琳那儿，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的假日，然后回到雷德克利夫街——凯瑟琳重了 4 磅，多亏了她痛恨的旅馆布丁。此时，吴尔夫夫妇已经开始给《序曲》装上封皮，准备发行，这对于默里夫妇两人

来说都是7月的主要事件，然而，后来另一件在文学界朋友中引起轰动的事却使它相形失色。

在此之前，莫瑞尔夫人希望为齐格弗里德·萨松做点好事（他1917年的反战态度受到钦佩，现在他又回了前线），请默里为他的战争诗歌集写篇评论，以为他会高度赞扬此书。评论发表在7月13日的《民族》报上，表明了他的公正诚实，然而却招徕不幸，这种诚实在他一生中各个时期都让他付出过代价。人们只能对他所写的东西表示称赞，然而不管怎样他该聪明一点，不把它发表出来。

菲利普·莫瑞尔写了一封语气傲慢的抗议信给《民族》，莫瑞尔夫人刚听说萨松头部受了伤，于是写信给默里，戏剧性的声称这篇文章“可能会送他的命”；而默里并不知道萨松受伤一事，回信维护自己评论家的职责（“你似乎忘了在我看来诗歌比众人远为重要”）。莫瑞尔夫人同时还写信给在布里斯顿监狱的伯特兰·罗素，将信纸一张张夹在一本书的未裁开的书页中，以躲避看守的检查。罗素以同样的方式偷偷送出了一封给《民族》的愤怒的抗议信，署名“文学爱好者”，并告诉莫瑞尔夫人他非常欣赏这些诗。凯瑟琳给莫瑞尔夫人写信说“噢——这些误会……我很不想让萨松对默里怀有敌意”。萨松从法国写信回来问莫瑞尔夫人谁写的评论，知道后又写道：“我希望能写些让默里感到高兴的东西”。罗素收到莫瑞尔夫人寄来的一本《序曲》，告诉她说他觉得此书微不足道，毫无价值——真糟糕，会容许出现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却没人将其评论一番；莫瑞尔夫人回答说她的确同意他的看法。默里夫妇取消了7月27日对佳星顿的拜访，吴尔夫夫妇也会去那儿，他俩去了，但完全不准备赞同菲利普的抗议信，因此“除了默里危机外几乎什么也没说”，这使克莱夫·贝尔感到有趣之极（“维吉尼亚似乎毫不妥协地维护评论的公正，而已自己又能取得辉煌的成就”），罗素告诉莫瑞尔夫人说凯瑟琳恨她，因为默里喜欢她，这就意味着凯瑟琳必须讨厌萨松，因为莫瑞尔夫人不讨厌他；因此默里也应该同样讨厌萨松。罗素说默里夫妇这一对同劳伦斯夫妇完全一样，只不过稍为收敛一些，完全应该怪心怀嫉妒的凯瑟琳，当他自己处于那种情绪状况时，她对他很合适，但其实应该躲避防备她。

而布雷特此时则告诉莫瑞尔夫人说她觉得伯特像窗户上一只狂怒的苍蝇，她非常讨厌他的自命不凡和性格上的弱点：“上帝在他心中占了上风——然而他自己的个性却相当愚蠢、格调不高。”

这本名叫《序曲》的蓝封面小书没有得到众人热情称赞，没有同情者准备抬高它的地位，放在书店也没人买，几乎没人发表评论，报刊也几乎未加注意，因为它是非专业性出版社的产物。后来维吉尼亚读了《英语评论》上刊载的《幸福》，将它随手一扔，称其令人讨厌。就这样《序曲》几乎悄然无声地问世，恰好此时凯瑟琳又得知，8月8日在惠灵顿，母亲久病后去世。

“是的，这是巨大的打击”，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布雷特说：

她是最宝贵可爱的人，甚至离这么远还给我写信谈到花园，房子，同父亲在床上的闲谈，以及她多么喜欢“忠心耿耿的黑人女仆不知从哪儿突然端

当时，罗素因积极组织并参加反战运动而被英国政法机构拘押。——译注

伯特是罗素的小名。——译注

来的可口的茶点”——还有信的开头常常写着“亲爱的孩子，今天天气好极了”——她的生活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人都充实完美——而她的欢乐完全来自于极大的勇气——面对一切的勇气。

于是默里夫妇搬进了东希思路的波特兰别墅2号，俯瞰着希思峡谷，开始了“居家治疗”。莫瑞尔夫人从度夏的花园别墅送来她对“大象”的祝福，送给凯瑟琳几盒鲜花，两人开始和好；因为莫瑞尔夫人告诉罗素说，“我的确喜欢她，你知道——虽然有种种不快，她刚刚失去了母亲，感到非常难过。”

埃达很喜欢她受制于机器的这种自由，工厂和宿舍为她做决定，她两样都很喜欢，她交了新朋友，开始同这种有规律的生活“融为一体”，如果离开工厂，就会失去这一切，然而凯瑟琳曾打算当他们搬到汉姆斯特去时，埃达可以跟着去，帮助管理家务，她“每星期需花2英镑”，凯瑟琳“怎么样都”害怕带上她，但是想到一旦搬迁，根本就找不到别人，只有依赖她，帮助在雷德克利夫街收拾行李，知道到了汉姆斯特该怎么办；只有她知道量窗帘的长度，等等，但是又不好意思让她做完了这些以后再同她分手，“如果那样对待她就完了”。因此，凯瑟琳于5月从洛尔写信给默里——莱斯利也写了一封信自荐，但在邮寄时又划掉了。

埃达回忆道，在雷德克利夫街，搬家前有一天晚上凯瑟琳问她是否愿意同他们去汉姆斯特“帮助照看”，结果几乎吵了一架：她一想到必须放弃所有的一切就感到心往下一沉，然而还是同他们去了，她放弃了战时工作，在凯瑟琳的有生之年，除了最后三个月，几乎时刻伴随在她身旁。

“大象”是默里夫妇自己拥有的第一所房子，因为默里还是债务未清的破产者，为房子筹措资金有些困难，理查·默里记得家具来自于旧货店或政府多余物资，其中包括凯瑟琳的“政府办公书桌”，后来漆成鲜黄色，她在汉姆斯特所有的写作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起居室用印花布装饰，窗帘是埃达做的，《韵律》上刊载过的图画原稿挂在墙上，地下室的一个大工作间变成了苍鹭印刷所的印刷间，铅字盘放在后面的温室里，因为不满意霍加斯出版社，默里夫妇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第一个产物就是默里的《诗，1917~1918》，多亏了理查所受的专业训练，此书比《序曲》要正规些；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不会说法语》。

随搬家而来的是另一新的改变，对凯瑟琳的健康至关重要，安妮·埃斯苔尔·赖斯现在替她介绍了维克多·索罗皮尔医生，这是她所有的医生中唯一能与之自由交谈的人，他很快就带来了关键性的变化。凯一直误以为是“风湿症”的疾病在6月使她受了很大痛苦，只有索罗皮尔医生才作出了正确的检查，诊断出她的关节炎与淋病有关，消除了炎症，凯瑟琳在《日记》中和其他的信中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

然而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敞开大门，却很少有朋友光顾，他们搬家后不久，在阿卡西亚路，柯特突然收到了一封简单的电报，“今晚来，凯瑟琳”，住在附近的戈登·坎贝尔夫妇也收到了相同的电报，他们以为她病重，全都去了那儿。凯瑟琳的确露出病态，然而却高兴地欢迎他们，“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想今晚你们能一起来会很好玩。”她表现得好像1916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根本就没提到那次争吵。

凯瑟琳和柯特的关系就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没过几天，劳伦斯和弗丽达也来到汉姆斯特同朋友们相聚。

劳伦斯来“大象”拜访过两三次，虽然他同默里再也不能尽释前嫌（“他俩都过于骄傲，默里过于嫉妒”）但凯自己却重新萌发了旧日的亲切友情，“至少对我来说，他又变得可爱起来，我爱他”，她给布雷特写道，他们迷恋硬壳果，金盏花，森林篝火这一类东西，他那黑暗的自我消失了。“噢，他身上有一种如此可爱的东西：他的渴望，他对生活的热切渴望——这是非常可爱的”。劳伦斯回到德比郡以后甚至还送给她一个盛满莹石的金碗，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正好这时候，凯瑟琳同意让两位肺病专家给她看病，一个是她父亲的亲戚西德尼·比切姆（“伊莉莎白”的兄弟），10月14日她30岁生日那天夜晚正发高烧，他来看她，像是父亲给她的30岁礼物，他说只有疗养院才是她唯一的希望。另一个医生是默里在作战部的同事推荐的，是一个“名人”，他离开时在楼下对默里说了同样的话，或者“在国外呆4年”。凯瑟琳显然考虑过这个建议，因为不久以后维吉尼亚告诉她姐姐，说凯瑟琳“将同默里一起去瑞士，会痊愈的”。但是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放弃了，索罗皮尔医生不同意两位专家的意见，说他们不了解凯瑟琳的工作对她生存的意愿至关重要，在疗养院内她会被禁止工作。

11月11日来到了，上午11时，枪炮轰鸣，宣告和平的到来，街上的人们欣喜若狂，“我想到我的弟弟，想到你们”，11月17日凯瑟琳给莫瑞尔夫人写信说，“我渴望拥抱你们，我将会一直记住你们对这场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的想法与众不同——因为你们对生活有着了不起的感觉”。几天以前，凯瑟琳还告诉维吉尼亚·吴尔夫，她认为大部分人既不追求战争也不追求和平。

不久，莫瑞尔夫人同默里和好了，重新成为朋友。21日，维吉尼亚完成了她的《夜与昼》。从12月7日开始，英国人又可以烘制蛋糕馅饼，在上面浇糖和巧克力，又可以买到战前的面粉了。街灯亮起来了，举国上下洋溢着准备欢度节日的气氛，此情此景之下，占据凯瑟琳心头的却只有“我弟弟坟墓的悲惨景象”。

他们还是在“大象”举行了一个圣诞晚会——柯特，格特勒和坎贝尔夫妇——这一定让他们回想起了柯尔斯伯里，袜子和圣诞树，装饰物，饼干，布丁和酒，他们还玩了字谜。一小袋一小袋糖果系在树上，凯瑟琳把它们剪下来分给大家，似乎这是最后的晚餐，柯特很不高兴；在玩字谜时他只肯扮演死人。事实上，这是凯瑟琳在英国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此时也是她私底下感到非常焦虑的时刻。维吉尼亚·吴尔夫最近习惯每星期都去看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她。1918年的日记中，有一则也许是她俩在波特兰别墅的台阶上告别的描写，是有关冬天垂柳树叶落尽的情景：

门再次打开，她走了，像去了另一个世界，——夜晚，寒冷，无限，神秘的世界。

她又看见了那向下延伸的美丽台阶，风中颤抖的常青藤围绕着阴暗的花园——大路另一边是树叶落尽的垂柳——头上是星光灿烂的辽阔天空——又是沉默，像在提问——但这次她没有犹豫，她走上前，非常温柔亲切——似乎在那无垠的沉寂中搅起涟漪——低声说“真好”，另一位说“晚安，亲爱

的朋友”。长久的亲热拥抱，是的，就是这样——当然这就是两人渴望的。

在维吉尼亚对凯瑟琳的感情中，也许有某种“小小的恋情”，这当然不能同她后来对维多利亚·萨克维尔·威斯特 的激情相比，然而毕竟有些迷恋凯瑟琳不可捉摸的个性以及她所有不寻常的“经历”，如果的确如此，那么1918年秋天维吉尼亚每周来访的这一阶段就是此种情景了。

圣诞节过后，维吉尼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因为凯没有感谢她送去的礼物——到了2月中旬，她怀疑凯瑟琳是否还能算是“我的朋友”，很可能她们不会再相见了，这让维吉尼亚感到“非常痛苦”，她们曾经很亲密，“不够坦率，然而很认真”。维吉尼亚对凯瑟琳既有喜欢也有好奇，现在“她保持沉默，对我没有感谢、询问和要求。”

几天以后凯瑟琳的确邀请维吉尼亚来喝茶，解释说“某种新的治疗使她发热两天，不能同别人会面”。事实上过了一个月这次拜访才付诸实现，维吉尼亚将要告辞时，凯瑟琳一时冲动，简略地谈到他俩分手后发生的事情——“某种阴暗的灾难性的事情，也许同默里有关”。她只稍稍暗示了一下，但说她想忘了这事——“显然这事占据了她的心头”。

维吉尼亚当然不可能知道是什么事。正是在12月底，凯瑟琳从索罗皮尔医生那儿得知在过去的8年内，她所谓“风湿症”的原因是淋病，起于1910年。

她感到悔恨和羞愧，这可以解释维吉尼亚所遇到的突然的沉默。《日记》新年后有一长段空白时间，1918年最后一则也许是对此消息私下的评论——索罗皮尔医生亲切婉转地告诉了她这一消息，后来日记中对此表示了感谢：

12月31日，下午4点15分：

噢，那时她在天花板上走来走去，跑上闪亮的窗玻璃，在灯光中飞翔，穿过一束阳光。

上帝眼看着这只苍蝇掉进一罐牛奶，觉得这样很好，小天使们幸灾乐祸地弹起竖琴，欢呼着“苍蝇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文学协会

我发现我不能点燃蜡烛的一头，同时用另一头来照亮我写书。

——《日记》

1919年1月10日

1919年1月，默里在得知妻子濒临死亡后三个月，被邀请担任周刊《雅典娜神庙》的主编。当时，这周刊的发行销售不景气，慈善家阿诺德·罗恩特里建议让它恢复生气，为战后的新社会服务。默里已年近30岁，这是有利于他自身发展的第一个机会；因为虽然此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诗人，但已承认不是小说家。这工作不容易，他必须同当时最好的作家打交道，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要尽量组成一个团体，赢得他们的信任，凯瑟琳的帮助至关重要，最理想的是她成为波特兰别墅的女主人。如果《雅典娜神庙》放弃它俱乐部坐皮椅的读者，重新开始成为战后科学、艺术、音乐和戏剧刊物，那就需要她助一臂之力。

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刊登她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通常并非严肃刊物的内容，只属于一般杂志），但她可以评论连载的小说，维吉尼亚可以撰稿，福斯特也可以，李敦·斯特雷奇现在赫赫有名，可以吸引读者，虽然前不久默里还撰文说到他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节目主持人派头”，还是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们也许还可以请克莱夫·贝尔加入这个团体——还有伯特兰·罗素，也许甚至还可以邀请劳伦斯来写些适合此文雅刊物的东西。1889年，R.L. 斯蒂文森笔下的一名角色被刊物名称的发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时惊呼道：“天哪，什么样的刊物，这是什么刊物！”1919年，他又可以这样说了。

行政方面的帮手有默里的崇拜者J.W.N. 沙利文，还有当时正在银行勤恳工作的艾略特，默里确实试图请他来担任副主编；或者是聪明年轻的赫胥黎，他当时还没有为《时尚》工作。罗恩特里给了默里800英镑的年薪——比他在作战部的收入多300英镑，留住埃达以及她手下的几个仆人不成问题，这样就可以免去凯瑟琳的操劳。

这个消息在佳星顿和布卢姆斯伯里都受到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换换口味，不必再受制于《新政治家》，此刊物的文学主编是极为专制的杰克·斯凯尔，牵着狗，带着酒壶，居于乔治派文人和庸人之首，斯特雷奇听说了默里的任命后写信给奥特琳，“他得到了《雅典娜神庙》，真令人兴奋，是吗？我的确认为它应该给古老的英国文学一些活力。”维吉尼亚私下希望凯瑟琳不要评论《夜与昼》，而在德比郡不受信任的则是杰克，劳伦斯写信给柯特嘲笑说，“我真高兴让默里当我们大家仁慈的保护者。啦—啦—啦！”

这样两个“老虎”迎来了自从《韵律》杂志和克洛夫利大楼时代以来的第七个英国的春天，此时两人都有些疲惫了，生活因受到结核杆菌的威胁而变得有些悲哀。草坪上的柳树尚未完全转绿，默里的第一期刊物就出版了。第二天在大象出生的第一只小猫就由它得名。（在波特兰别墅不大听人说到“雅迪”，但是后来人们常提起它的弟弟文利。）

1919年凯瑟琳几乎没写什么短篇小说，当威廉·海曼拒绝了她的小说集后，她为《雅典娜神庙》写了一篇非常尖刻的小作品，以后就一直保持沉默

了，甚至她的笔记本也有4个月的空白，她把所有的精力花在期刊上（频繁的来客以及讨论），放在家务上（管理仆人和埃达），但最主要的是持续写了许多极好的评论，以其机智聪明的语言以飨大家。

“默里和我像黑奴一样为《雅典娜神庙》工作”，她写信告诉奥特琳，“我不知道你是否真喜欢它，我感到自己像黑颜色大蛋糕上的粉红色糖霜蝴蝶——毫无价值。”的确，一开始整个刊物，除了署名“K.M.”的文章外，都阴郁乏味，因而吴尔夫太太对奥特琳评论默里说，“至少这是他发泄自己痛苦的渠道”。然而不管怎样，期刊还是取得了成功，最早应邀撰稿的人中就有“心之危机”保罗·瓦莱里。

艾略特决定呆在银行里，默里请了沙利文和赫胥黎担任助手，凯瑟琳从不大高兴聘请赫胥黎，觉得他愚蠢，“头脑糊涂”。

在“大象”举行了一次晚会，聚拢所有可能会撰稿或成为朋友的人——也许是凯瑟琳举办的第一个这类晚会，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吴尔夫夫妇没来，艾略特也没来，因为劳埃德公司让他去外省出差；李敦抱歉不能来，莫瑞尔夫人送了一些牡丹、飞燕草和丁香，自己没有来。但是出席的有斯温纳顿，音乐家E.J.邓特——《蓝色评论》的一位好友；邓特开始讲一个过于冗长的笑话，小猫开始撕扯伯特兰·罗素的裤子，克莱夫得意洋洋，

杰克·哈金森坐在沙发上像一个矮胖子（“但是天哪，从没有掉下来”），罗杰·弗莱翻弄着霍普金斯的诗集，埃达四处“分着糖果，好像她提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骑在马上。”

一星期之前，凯瑟琳还突然咳血，她怎么能挺住，没有病倒简直令人吃惊，这再次说明她具有在特殊情况下依靠精神支撑自己的了不起的才能。

第二天写的一则日记（5月30日）有趣地描述了她如何担任晚会女主人这么一个不习惯的角色，本世纪少有作家能像她那样生动有趣地表达真正的好食物给人带来的精致的享受，令人陶醉的满足。

常常在读完一本现代小说后，会引起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写这本书？并非总能立刻找到回答，的确，没有回答，也许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目前各式各样众多的作家。一位有名的年轻小说家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一半，在他自己一本新书的序言中说，他写此书，因为不能不写，因为“情不自禁”——但只是回答了一半，因为我们在写完书，把它放置一边后，不由地想要了解这种神秘愿望的性质。人们写的书，预告、发表的书，藏在图书馆里、评论、购买、借阅的书，留在旅馆大厅、公共汽车、火车车厢和轮船甲板上的书数目之多令人吃惊，难道能相信每一本书都曾经是某个骄傲作者的宝贝儿子吗？——他获得重生的珍藏的希望吗？

这是她新任《雅典娜神庙》小说评论后写的第一段话——巧妙得体地发表了一个宣言，却未对任何人宣战，这也是她能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使用那必不可少的“我们”，而不是她自己个人的语言，这是一种女性的普遍语言，

斯温纳顿（1884~？），英国出版社编辑。——译注

E.J.邓特（1876~1959），英国著名音乐理论家，曾任剑桥音乐教授。——译注

约翰为《圣经》中的人物，据说他是出身祭司家庭的犹太人先知，耶稣就是受他洗礼后才开始传教活动的。——译注

因为此时这位作者的丈夫正竭力争取新读者，而又不想失去老读者。从此她保留着这种语调，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也用此语调讨论各种问题，包括维吉尼亚·吴尔夫、F.M.福斯特以及 H.德·维尔·斯台普尔（《蓝色环礁湖》的作者，甚至还有一位更浅薄的名叫贺拉斯 W.C.纽特的作家，他的书销量以百万计。

凯瑟琳第一篇文章中先提到多萝西·理查德逊（她不合格，因为“她没有记忆力”），然后再一一谈到当时许多无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她也写到了康拉德、乔治·莫尔、V.萨克维尔·威斯特、格特鲁·斯泰因（“写成散文的黑人音乐，具有它所有能令人发疯的单调”），吉尔伯特·迦南、修·沃波尔、杰克·伦敦和约翰·高尔斯华绥——在她最后一篇文章中，她以敏锐的洞察力讨论过他的《骑虎》。她的评论彬彬有礼，巧妙公正，完全没有文学俗套或评论家的陈词滥调，讨论福斯特的《塞壬的故事》时，她趁此机会弥补了过去说过的一些打趣的话（当时她在《新时代》上撰文评论《霍华德别业》），下面这段话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比较公正：

在他所有的文章中都有有一种重视气氛的非常微妙的感觉，表达细致入微，而他对自己笔下独特人物的欣赏使他流露出一种半奇特、半同情的特别幽默，……但是在《霍华德别业》中，我们却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似乎他并没有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为读者创造那个世界，这的确引起了我们的的好奇心，这位作家怎能满足于不去探求自己可爱的领地呢？

人们在凯瑟琳的评论中不易发现审美能力，T.S.艾略特就说过她没有，或至少是没有纯粹的美感。她避免公开谈论短篇小说形式，她觉得至少大部分小说家都不是严肃作家，事实上，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像是根据某些引人食欲的菜谱掺和调制的，她称之为“消遣小说”的作品也像今日电视上的同类一样，是由卖文为生的人制作的。任何人想知道为什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自己的作品深受欢迎，都可以在《小说和小说家》中找到解释，此书是默里将她的评论文章汇编成集的，展示了 1922 年一片等待甘霖的贫瘠土壤，当然，在那几年中，《园会》并不是沙漠中唯一的花朵。

在波特兰别墅住了一个冬天，就足以使凯瑟琳改变对“居家治疗”的看法，到了 1919 年 6 月，她希望奥特琳能来她“在圣雷莫的小别墅”居住，信件和笔记中都流露出想要挣钱的强烈愿望，显然她发现肺结核是非常要花钱的疾病。

默里每年 800 镑，加上她自己的生活费（300 镑）和写评论所得的 100 英镑使他们摆脱了艰难处境，但是，凯瑟琳同默里在钱财上的关系也像她同自己父亲的关系一样陷入困惑之中，金钱的数额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牵涉到的情感问题。从一开始她俩的关系中就有某种凯瑟琳供养默里的成分在内；从这一点来看他从来就不是“丈夫”，甚至现在两人也自理钱财，

多萝西·理查德逊（1873~1957），英国小说家，常被其他作家视为英国文学的改革者，是首先使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小说家之一，主要作品有《蜂巢》等。——译注

格特鲁·斯泰因（1874~1946），美国作家，评论家，提倡新的文学写作方式，曾长期居住巴黎，其文学沙龙在当时享有盛名。——译注

意大利著名的沿海游览休养胜地，紧邻摩纳哥、法国。——译注

然而她有些痛恨这一点。有一天，她偶然听说默里仍在为作战部工作，每年挣 250 英镑，但却瞒着她，她感到很恼火。

她的确有些矛盾心理，虽然她内心的一半盼望做个老式的妻子，依靠一位坚强的丈夫，而另一半却坚持要求独立，希望得到自己姐姐的同情：“我从姐姐那儿连 5 个便士也拿不到”，她写信告诉奥特琳：“一看见我，我姐姐的钱包就杳无踪迹，她比我富得多，我却甚至还准备为她从都佛路到汉姆斯特付车钱。”

8 月，她父亲从新西兰来，失去了妻子，孑然一身，他带来了最小的女儿珍妮，把她留在英格兰，这是最后一只从老巢飞出的小鸟了。凯瑟琳此时已病得非常厉害，又开始考虑是否要去疗养院治疗。她把父亲看作“一个巨大的帽子的象征，从中我将抽出那张决定我命运的小纸条”，也就是说希望他会为她支付去疗养院的费用。他来喝茶（这是自从 1912 年以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比任何时候都更像爱德华七世。她发现他很可爱——“就像我想象中一样，甚至更生气勃勃，热情洋溢，谈吐生动，幽默风趣”。她希望他同默里能够和睦相处，但是默里那天恰好“又闹情绪”，比切姆大笑时，他把头扭开——“根本就没同他说话，对他不屑一顾”。

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产生那悲剧性状况的原因：凯瑟琳每年 300 镑的生活费直到她去世，再也没有增加过，虽然她的需要大大增加了。没有手伸进那个帽子里去，也没有从中抽出任何能解救她“金钱情结”的方法。而且她从一位亲戚那儿听说连生活费也是勉强给的；他忘了她 10 月的生日；最坏的后果是对她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在某些方面可以见到。

不难知道是什么妨碍了父亲慷慨的赐予，默里这家伙最近当了书报总检查官，现在又弄到了那份叫作《雅典娜神庙》周刊主编的职位，他现在难道不是凯瑟琳的丈夫吗？——不管过去怎样。难道他不能为自己的妻子支付医药费，或者把她送到国外去住一段时间吗？家里人还记得早年不愉快的事情——例如，1914 年，凯瑟琳趁维拉在伦敦之际，从她那儿“借”了一些钱去法国。正如一位家庭成员曾经说过的：“当然，钱可以给凯瑟琳姨妈，但不能给那个小团体。”

此时虽然凯瑟琳的确希望能多得到一些钱，感到自己的姐妹们比她富有的多，很不公平，但她渴望得到的不仅仅是钱，而是父亲的爱，渴望他能对自己犯了过失但仍爱他的、濒临死亡的女儿凯丝表示慈爱，甚至宽恕。不幸得很，似乎是默里在那个致命的下午表现不佳，使比切姆不可能让步。多年以后，比切姆提到默里时还说他是“一个道地的无赖”。

根据索罗皮尔的建议，决定无论如何凯瑟琳必须在里维埃拉度过下一个冬天，埃达要陪同前去。买了三个人的车票，因为杰克也要去帮助她们安顿下来。当埃达忙着收拾行李时，凯瑟琳拿了一张纸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孩子：

我把这封信留在基先生处，以防万一我突然死去，没有机会谈到这些事情。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卖去所有的家具，乘海船出去长期航行。不要呆在伦敦，马上离开，去某个可爱的地方。

当然我所有的钱都是你的，我希望有足够的钱替我下葬，我不要火化，不要墓碑或任何此类东西，如果可能，请尽量挑选一个安静的地方，你知道我多么痛恨吵闹。

信中接着要求把一些个人纪念物送给朋友们，包括劳伦斯——退还他的金碗；然后是一句重要的话，后来得到正式遗嘱的证实：“所有我的手稿都留给你。”信最后说，“就这些，但不要让任何人哀悼我，那没有用，我认为你应该再次结婚生孩子，如果有女孩子，把那个小珍珠戒指给她。”

两天以后他们启程了，顺便去芒通 拜访了一位有钱的亲戚——哈罗德的亲表姐柯妮·比切姆，她 70 岁，同一位 64 岁的富勒顿小姐在伦敦合开一家昂贵的小型疗养所，但是在芒通的鲜花别墅度冬。凯瑟琳把她俩都看作她“天主教的表亲”。

三个人在圣雷莫的旅馆里住了几天，直到那位英国籍的经理，看上去像个囚犯的文思先生前来解释说，为了其他客人以及他们健康的缘故，希望他们离开，他自己有一个小别墅，坐落在距此三里远海岸边的一座小山上，女士们可以往那儿。于是凯瑟琳和埃拉被安置在卡西塔别墅（文思先生给了她们一支手枪），被告知马上就会接通自来水。默里 10 月 2 日启程回伦敦。凯瑟琳收到一张帐单，需支付房间消毒费用。在意大利，肺结核是必须申报的疾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有好多天埃达都必须从泉水那儿提水上楼，她还必须学会使用木炭炉子，她的肌肉协调能力受到损害，两天之内——默里得知——她砸碎了“（1）大水果盆，（2）我们的盘子，（3）一些碟子，都是放在餐具柜上时一次打破的”。又过了两天，她砸碎了凯瑟琳的体温表。没关系——她们花 6 先令在圣雷莫重买了一个，“似乎能起同样的作用，虽然读数没那么清楚”。从卡西塔写的最初的信件，像过去刚到达某地后写的那些一样，语言机智，没有自怜自爱，充满对四周美景的描绘，例如下面这封 10 月 1 日的信：

我租下这个小别墅度冬，也许还要长些，这儿很好，柯特连斯基，你会喜欢的。房子在一个荒山坡上，山上遍布橄榄树、无花果树、高高的野草和黄色的花朵，下面是大海——整个海洋一望无际，整天海浪轰鸣，拍打着石头，屋后是大山。别墅不太大，有一个大游廊，可以在那上面工作，还有一个簇叶丛生的花园，没有讨厌的里维埃拉棕榈（像意大利奸商一样），一切都简朴干净，花园墙壁上爬着许多壁虎；晚上，蝉摇动着它那小小的手鼓。

埃达过去从没有管过家务，也很少下厨，现在突然要用简陋的设备（用沙来擦锅子）来为一位苛求的病人准备一日三餐；一句意大利语也不懂，却要上街买东西；村里人都称她为“那个不点清找头的女人”。有一次她从圣雷莫回来（“一个非常滑稽的小店”），买了 4 盎司每磅 10 先令（相当于现在 10 美元）的黑市咖啡。是的，她说，花这么多钱买来这一小包似乎太少，“但是摸上去觉得沉甸甸的”。她打碎了一个玻璃罐子，“本来就很容易碎”，她不停地说，“让我慢慢来！我慢慢会学会的，凯蒂”，她的宝贝听了火冒三丈。她们开头确实请了一个女仆，但她走了，别人也不肯来，因为凯瑟琳

患的是这种病。

虫子也来侵扰她们，大虫，厉害的小虫，她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对付。一天，埃达抓住了一只，学菩萨的样子，轻轻地把它放到窗外去。乞丐常常登门（门没有锁，锁匠也不会配），因此，凯瑟琳趁埃达不在时，拿着手枪跑到花园里去练习射击。夜间也常常门铃大作。

她的生日来了，又过去了，从彻迪和珍妮所在的纽福里斯（比切姆把她们安顿在一所房子里）寄来了一个“普通的一英镑的小小火柴盒，镶着黄色珐琅，画了一个丑陋的中国人。”从她父亲那儿只来了一封信，但对生日只字未提，“因此我的热情都付之东流。我还以为我对劳工危机的观念值得5个英镑，但是不，玛丽过生日他给了10镑，对我他不是太吝啬了吗？”不久以后写的信就显示她的幽默感不会持续整个冬天了。

别墅景色美妙，是愉快度日的好地方；凯瑟琳在信中描写了花朵、云彩和勾起她思乡情绪的大海，远处白色的虚无飘渺就是她想要在作品中表达的东西。然而冬天的气候，昂贵的物价，狡诈的意大利人，孤独以及除了“信天翁”的叫声外的一片寂静（这只信天翁不再是奥特琳夫人的“罗得西亚大山”，而是凯瑟琳曾经杀死过，现在正在杀她的人）——所有这些加上那个事实，又一次使她陷入忧郁之中（10月19日），“我要把这封信寄出去吗？还是另写一封！——一封欢快一些的？不，你应该明白，在远处慢慢地行驶着一只小船，似乎不可躲避，带来死一般的沉寂，——一个小小的黑色斑点，就像肺上的斑点。”

在伦敦，柯特好心地将她的情形告诉劳伦斯，“但愿虫子把凯咬死”，劳伦斯回答，而且他不是开玩笑。现在默里有理由为刊物的将来担忧了，J·C·斯奎尔辞去了《新政治家》的职务，准备创办《伦敦水星报》；《文学副刊》也在开始努力，这意味着在读者和撰稿者方面强有力的竞争，他不得不再一次加班加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凯瑟琳认真对待了评论维吉尼亚的《夜与昼》的工作。

接着家人又来打扰了，然而气氛之疏远，使人感觉不真实。凯瑟琳的父亲来芒通探望比切姆和富勒顿小姐，全体人员乘“摩托车”蜂拥而至，带她出去兜风，她对默里描述了一番，感到自己被这种奢侈惯坏了：皮衣、软垫、司机和通话器（她父亲通过它同司机用毛利语交谈），回到别墅，“信天翁”还是准备好了午饭，但是把洋葱切得乱七八糟，简直像“工人的一餐饭”，她觉得非常荒唐可笑。比切姆小姐拿起凯瑟琳的《牛津英语诗》，说：“这里面有些非常美的东西，是谁写的？”凯瑟琳装作没听见。

将要离开时，哈尔·比切姆拥抱了他女儿（很高兴见到她丈夫默里不在身边），说：“快好起来，小宝贝，你真像你母亲”。他为她采了一些雏菊，一枝兰花，用草扎在一起，给了她，他甚至还给她留下了5支“三炮台”香烟。

然后比切姆乘船回新西兰，因为害怕孤独，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就同亡妻

英格兰汉普郡的一地名。——译注

彻迪在家的绰号。——原注

见柯勒律治的长诗《古舟子咏》。其中信天翁为船员引路，却被一船员杀死，后成为惩罚的象征。这儿指埃达。——译注

埃达曾在罗得西亚住过。——译注

的密友劳拉·布赖特小姐结婚了，似乎没有给凯瑟琳生日礼物，也没有任何支票帮助支付费用，“我们从父亲那儿再拿不到一分钱，再也拿不到了，亲爱的”。显然说过一些什么话，凯瑟琳很快就觉得再也不能给父亲写信，不久就陷入长时期痛苦的沉默。

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只有 31 岁的人怎样才能接受死亡的迫近呢？任何人在 31 岁时该怎么做？一位具有才能，而且这种才能即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得到充分发挥——的妇女如何对待一切都将不可能这一事实呢？如果年轻时曾经有过希望死亡的浪漫念头，追求过死亡，那又怎么样呢？会不会有愧疚心理和责怪别人的企图呢？

奥特琳收到从汉姆斯特寄来的信，其中将埃达描绘成一个地道的“送葬的人”，凯瑟琳时常感到一阵阵可怕的沮丧，常常哭泣，她说（1919 年 2 月）“如果村里举行花展，奖励最美的尸体，埃达肯定会获奖。这真好，但是我开始觉得每个男人或女人都有自己的谋杀者”。

也许还发生了什么事，使她觉得默里曾经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他写的一首诗显然流露出他的想法。寄自卡西塔的一封信说到，“你觉得我已死了，写信也当我死了。埃达也总在为此准备。”其他的信件详细地记载着她兴奋和绝望交替的情绪变化。10 月底，她对埃达的不满变成了狂怒，她诅咒埃达，当面称她为杀人犯，把东西扔在她身上，两天以后她写信告诉默里时，两人还不说话，埃达只好对面包说话（“让她吃个饱，吃个痛快”），此时两人才和解。然而她成为“缠在我颈上的信天翁”，有一封信甚至对她的相貌诅咒了一番：

天哪，像我这样痛恨别人！今天我又有了这种痛恨的感觉，你不知道什么是仇恨，因为我知道你从没有如此恨过任何人——不像你爱别人那样，而我却感到了。我最大最大的敌人今天又把我惹火了，一股盲目的仇恨力量完全压倒了我……她肥胖的大手，干扁的小乳房，婴儿似的嘴巴，下嘴唇永远是潮湿的，嘴角粘着一两粒面包屑或巧克力残渣——她两眼盯着我——紧盯着——等着我做些什么她可以学样。想想如果你得了肺病，又同这么一个仇敌住在一起，你会有什么感觉？

凯瑟琳说这就是她一辈子都羡慕维吉尼亚的地方：“她同伦纳德在一起”。最坏的是同埃达一起她不能写作，她试过，但没有用。

于是，默里也成为这种肺结核病人怒火的牺牲者。此时他自己处境已十分困难，他劳累过度，又要为刊物的将来担忧。11 月，《乔治派诗人》的第四集出版，所有战前的观念丝毫未改；西特维尔的诗集《轮》也发表了，此时默里不得不表明他自己评论家的立场。

如同上次对待萨松，正直意味着冒险。《乔治派诗人》意义空洞，他一定会伤害自己欠了许多情分的、亲切可爱的埃迪·马什，然而 1919 年 12 月 5 日《雅典娜神庙》上发表的评论两书的文章却达到了他评论家事业的顶峰。他断然宣称除了威尔弗雷德·欧文外（德·拉·马尔、D.H.劳伦斯、W.H.

西特维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译注

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英国诗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的诗歌成就主要在于深刻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怒。——译注

戴维斯也除外），在两部选集中都有一种“显然令人不适”的趣味，《乔治派诗人》是虚假的简朴，《轮》则是“技巧和感情贫乏的奇怪混合”。他问，此时英国诗作是否应该严肃认真。他的文章引起的后果是：乔治派诗集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地位，默里成为“文学新潮流的代言人”——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些令人吃惊，但是当时艾略特尚未出名。埃迪·马什的确感到受了伤害。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默里评论家的才能得到巩固时，凯瑟琳却开始朝他发泄怒火了，其无情程度与劳伦斯不相上下，她忘了他工作过度疲劳，甚至也忘了曾提醒自己不要触动那个伤疤。当他的文章在伦敦发表时，她给他寄去了那些题为《新丈夫》的怀有怨恨的诗作，下面是诗的第一节，似乎指的是自己父亲最近的那次来访，非常不公平地将默里同他相比：

有人来对我说忘了吧，忘了你新婚不久谁是你的男人，竟会让你在遥远的国度病寒交迫？

谁是丈夫——谁是石头竟会让你这孩子一人孤独？

实际上共有三首诗，但这一首最深地刺痛了他。诗是随信寄来的，信中还夹着一张字条，请他保留这几首诗，因为将来她要修改“发表”。这种行为也许同她月经周期荷尔蒙失调有关，可能1918年在洛尔时也是这种情形，那时她做了一些非常相似的事情：她“漫不经心”地寄给他一些必定——的确这肯定是她唯一的意图——会深深地伤害他的东西，她深知这一点。在波琳别墅那些平静美好的日子里写的《序曲》中也有这么一段话，其中琳达·本耐尔很想寄给她丈夫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秘密的思想，她的仇恨，像她其他的思想一样真实，“她希望自己能够把它们裹在小包内，送给斯坦利——尤其是最后一个——她愿意看着他把包拆开”。

默里寄自伦敦的无可奈何、受了委屈的回信充满痛苦，他不会为自己辩护是出了名的，哪怕自己很有道理——这家伙不懂出言伤人——他把这件事弄得一塌糊涂，在他的信中用了那么多的“我”字，凯瑟琳读了以后把它们以及另一些偏重自我的词一一划了线。接着，他不顾别人的电报催促和邀请，动身去她那儿度圣诞节。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她在日记中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认为这次的经历使她的绝望情结消失了，“我是一个死去的女人，我不再在乎”。

她生病时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在高烧发作时，她幻想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她的感情秘密转向柯特。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凯瑟琳几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发疯了，但是真的，发疯了，”而且还极端羡慕维吉尼亚：“在她的作品中总洋溢着自由自在，似乎她心里很平静——头上是自己的屋顶，身边是自己的财产，丈夫总在随叫随到的地方。”

既受欢迎，又不受欢迎的默里还是来了，虽然埃达声称她在默里来访的整个期间都将睡在凯瑟琳房间的沙发上，他们还是和解了，两人决定再也不分离——他们将住在伦敦，默里将去乡村找一所房子，“信天翁”必须离开——永远。1920年1月2日，默里带着一些花园里摘的无花果回伦敦去了。

结果还是只有写作才能拯救她，将她从旧日的悔恨中解脱出来。她一天之内完成了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没有脾气的男人》，将其寄给了默里。别墅下面的大海“怒吼翻滚着”，她不能入睡，“我躺着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温旧日的生活……”

第二天，“信天翁”不再挂在她脖子上了，凯瑟琳给默里写信，完全收回了自己过去对埃达说过的一切，不再认为埃达是自己的谋杀者；仇恨消失了，“就像解除了一个诅咒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积极的东西，“近似于喜欢她”。

梦魇过去了，她想让埃达分享这种宁静，“我想最近这些可怕的日子没有埃达，我就死了”，埃达也知道，她的自尊全都恢复了，她们必须取消在乡间租房的计划，她将去芒通，到张开双臂欢迎她的柯妮·比切姆和富勒顿小姐那去。富勒顿小姐为她在一个昂贵的疗养院赫米塔做了安排，于是在一连串意大利人的罢工事件中，他们离开了，花了很大一笔钱坐出租车越过边界，在最后那几天的一片混乱中，乞丐来讨饭，发现房门开着，偷走了凯瑟琳的大衣；但是关于她自己逃难的情形却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地方”写的——医生、女仆、按摩师以及“身穿白衣服的瑞士护士”。为她预备好了一张大书桌，上面放着刻花墨水瓶，还有一盒香烟。她们去鲜花别墅拜访，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那么，亲爱的凯瑟琳，花园是你的——你必须每天来同我们喝茶，如果你来此工作，看见我们就喊一声，我们会马上避开。”把这些对默里描述了一番以后，她说，“我在此有人作伴，有人照顾，我感到自己真地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头发”。

每星期要花5个基尼，她将写信给基先生要求透支一些，但是，《艺术与文学》的主编弗兰克现在正向她索要短篇小说，已寄给他《没有脾气的男人》；出版商格兰特·理查甚至谈到要出她一本书，她确信自己能挣到所需的额外开支，可以偿还透支的钱，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会使银行帐目保持平衡。

战胜个人

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接受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苦难必须变成爱情。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必须超越那个我失望的个人爱情，达到意义更为广泛的爱情，必须把我给他的情感给予整个人生。

—《日记》

1920年12月19日

如果1918年去班达尔是一个错误，那么去战后的意大利则是另一个错误。凯瑟琳“天主教的表亲”——实际上是非亲非故的富勒顿小姐——使她摆脱了那个处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使她皈依她们的信仰。她们两方面都难以成功，但是她们的关心和支持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开始勇敢地孤军奋战，借助她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发挥自己全新的既是宗教性又是创造性的才能，她的敌人是绝望——默里用到这个阴暗的字眼时她非常痛恨，而她对付绝望的上策是她对外面世界的热爱，以及创作可与之相比的完美艺术品的热情。在芒通度过的这一年内，作为恋爱中的妇女，凯瑟琳尝试写作的东西包含了她个人的命运以及另一更广泛的内容，即超越了个人作为战后艺术家的内容。也许当她独自呆在洛尔的旅馆时，就开始想到自己的死亡，至少是第一次将此想法记述下来。在那儿的一个多星期内，她写作《已婚男人的故事》，同时也感到可以“在狂热的工作中忘却忧郁”。但是，接着在那封给默里、但未寄出的信中，她描绘了独自度过的焦虑不安的夜晚，她长时间地坐着凝视地板，独自想着自己一定会死，正在走向死亡。

那个未完成的故事耗尽了她的精力，使她重新陷入绝望或疯狂状态。她回到伦敦，求助于所谓的居家治疗，《序曲》的出版并未获得预期的称赞，接着《雅典娜神庙》又使她累得筋疲力尽。在别墅经过孤独、高热和怀疑的可怕危机，她才写了《没有脾气的男人》，打破了沉寂，重新获得一些生活信念。然后她通过边境，到达芒通疗养院。

1920年1月27日，她在小小的袖珍日记本上涂写了一则日记，勉强可辨认出来，似乎如下：

1月27日。给我做按摩的那个女人其实并不怎么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很古怪，我喜欢我那空气流通的大房间，但工作太困难了。我内心深处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我仍然思考着我的哲学——即个人的失败。

她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个人被战胜”，还是要去战胜什么？

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同时考虑她的宗教困惑，她的艺术追求，她同默里、劳伦斯、她父亲以及她“天主教表亲”的各种关系。

当她写那些话时，心里肯定想到了劳伦斯，正是他在康沃尔时指责过默里和凯瑟琳对“个人”的依赖——那也是《恋爱中的妇女》的一个主题。她“表亲”劝说她来芒通，意在使她的思想转向她们的教会，她们意识到她的问题与宗教有部分关系，而她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她解决的方法不是顺从，而是创造。

默里是她丈夫，完全能支持她将艺术视作拯救自己的方式的信念，她只能对他一人谈到战争带来的“悲剧性认识”，谈到对“战后小说”的要求，

她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谈到过冲出广阔无垠的大沙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然而默里过分热衷于“绝望”这个词，而她虽然对此深有体会，却不止一次告诉他不能使用这个词，他不能有个人色彩，必须冲出去，有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他谈到“我”或“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但是她觉得对于评论家来说，“我”和“我们”是多余的，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两个词，他应该去写诗或故事。

如果说你的时代，尽管说，但不要说“我为这一代人说话”，因为那样你的呼喊就失去了力量，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正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尽管呼喊，但是不要说“我是旷野中呼喊的声音”。

1月29日，凯瑟琳从默里那儿收到一封“极端自私自利的信”；那天她绝望的海湾又刮起了一阵狂风。实际上很难理解这封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此信引起的对他的攻击在他看来很不公平，然而作为一个恋爱中的妇女，她似乎不应该受到接踵而来的打击。

她原来以为告诉了默里赫米塔疗养院收费昂贵后，他会立即电汇10英镑，但是他没有，事实上他已把所有的钱都寄给她了，已经“掏空了腰包”，要到下次发薪时才有钱。而她并不了解情况，给他送去一封最后通牒，要求他每月为她在疗养院的费用提供10英镑，她在日记本中写道：“晚上，旧日卡西塔的感觉，像发疯一般，似乎听见声音话语，出现幻景。”

恰好此时（1920年2月7日）她收到劳伦斯寄自卡普里的信，恶毒地辱骂她，似乎就此结束了他们曾那样珍视的友情，两件使她恼火的事似乎凑巧同时发生。此时默里给她寄去20英镑，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早些寄去。但是“该死的20英镑”，她怒喊道：“我需要爱与理解”，难道这些也用完了，要到2月1日才有吗？同一页信纸写满了下面的话：

我还想说一件事，今天劳伦斯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诅咒我，侮辱我，说“我诅咒你，你这痼病鬼让我讨厌——意大利人不信任你，做得对”，以及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话。现在我求求你，如果你的确是我的丈夫，不要再在刊物上为他说好话吹捧他，自尊一点。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他对你最终的看法是你是“一个肮脏的爬虫”。那么，自尊一点，请不要饶恕他。

劳伦斯的信还说到“你是一个该死的爬虫——我希望你死”

没有人能解释劳伦斯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挑选这个时候。默里拒绝将他的小说《阿道夫》刊登在《雅典娜神庙》上似乎不足以解释这一切仇恨情绪。显然凯瑟琳因为近来深感痛苦，给劳伦斯写过信，也许是一封表示信任的信，像她1915年从班达尔写给他的一样。但是尽管考虑到他因肺病引起的狂怒，为什么他会用如此狂暴的语言来指责她呢？也许可在《普鲁士军官》《恋爱中的妇女》未发表的前言以及在康沃尔时默里天真地拒绝劳伦斯的亲近等中找到解释。故事里那军官心中什么东西“可怕地崩溃了，他讨厌去触摸通讯兵大腿上的青痕”等等，军官如果没有遇见那女孩子会怎么样？——“你这个该死的爬虫，我巴不得你死”。

第二天富勒顿小姐坐马车来看她，知道她已开始讨厌这个地方：来去端食物托盘的声音，房门的开关声。喝茶时她说：“亲爱的，我们想让你来与我们同住，那儿非常安静，你如果愿意，可以整天一人呆着……你会好起来的”。然后，又笑着说：“上帝把你送到我们身边，但愿上帝让我们治好你的病。”

凯瑟琳把这告诉默里，问道“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显然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想到也许我应该加入天主教会，我必须有个信仰。”

在给默里的信中，暴风雨平息了，他把她的一本故事集卖给了康斯坦布尔出版社，得到了预付的40英镑，替她买了一件大衣补偿丢失的那件；他发誓下次看见劳伦斯一定要揍他一顿。默里的信在凯瑟琳的信中激起了极其原始的女性的共鸣，她回信说，她喜欢自己的男人，有时也不妨做一回手拿大棒的穴居人。因此，经过所有这一切以后，她更爱他了，“爱着你，我不能面对孤寂——沙漠上持续开出鲜花——花朵持续向着阳光”。

凯瑟琳不久就搬进了“鲜花别墅”，享受表亲们的盛情款待以及奢侈的生活，她在那儿一直呆到4月，埃达在附近的另一家疗养院找了个工作（城里住满了英国的疑病患者），通常在晚上来看她。

从鲜花别墅寄来的信没有其他信那么自然，有些做作。显然富勒顿和比切姆小姐的确希望她们的年轻朋友能够痊愈，但也希望她能皈依天主教。在接受她们盛情款待和礼物的同时，她接受了一个虚假的位置，这种不真实性在信中流露出来了。

一天，在阳台上喝完咖啡和甜酒后，她们带她乘车去拉特比附近的山上兜风，晚上埃达收到了一张语气极其不自然的字条，凯瑟琳说下午躺在山上时，她知道有个上帝存在，总有一天她将“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埃达被禁止提到这张字条，甚至不许提到这回事。

两星期后的圣约瑟夫日，富勒顿小姐题赠给凯瑟琳一本皮面精装的《仿效基督》，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页边上的一处批语表明第五章的开头几句话使她退缩了：“生活于一种顺从的状态中，服从尊长，不自作主张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这些话边上凯瑟琳写道：“胡说八道”。默里不久就知道了她对天主教的“个人神性”不感兴趣。

在卡西塔的阳台上有一天她写道：“我不想要一个上帝来称赞或请求，而是要让他分享我的意念。今天下午看着雨后的报春花，我不想要任何人‘手舞足蹈’，我只想感到他们也看到了。”

事实上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此时她写的信中对它缄口不言，因为她感到非常羞愧。凯瑟琳同两位表亲呆在一起时，得知她父亲觉得她其实无权享有他给予的生活费，她该由丈夫养活，哈尔每年为她花一大笔钱实在是非常大的让步。可能她误解了他说过的一些话：他的确作了安排，让默里在她死后不能得到本金，很可能还发了几句议论；但他确实打算继续支付生活费。然而她相信了自己听到的话，感到非常伤心，再也不愿写信给他，沉默持续了近两年。

使她伤心的事接踵而至，她骄傲地寄给他一本刚经苍鹭印刷所和理查·默里的手印刷出来的《我不会说法语》，后来却从一位亲戚那儿得知她父亲说

“我把那玩艺儿扔到壁炉里去了，甚至连聪明都算不上”。她有点不谨慎地把此书给女主人看，结果虽然很可笑，但也差不多同样让她感到沮丧。

年轻的理查·默里是一位艺术家，凯瑟琳呆在国外度假的这段时间内，开始亲切地给他写信。他此时 18 岁，来信的慷慨亲切让他感到高兴，有一次他说，“我觉得她把我视作某种吉祥物，因为我曾患过肺病，又痊愈了”。就这样理查在某些方面代替了她的弟弟莱斯利，获得了过去属于她弟弟的热爱，理查一直记得她的一些好处。

然而，甚至在芒通也能找到一些有眼力的朋友。4 月，出版商格兰特·理查介绍凯瑟琳认识了西德尼和维奥莱特·西弗，这两位有钱人资助和搜罗创造性人才，他们住在罗格布鲁恩（凯瑟琳曾在伦敦同西弗短暂地会过面，还评论过斯梯芬·哈德森的一部小说，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西德尼·西弗）。

《日记》中记载“西弗夫妇来喝茶，柯妮躺在沙发上看书，我觉得我必须独自，独自一人居住，只有艺术家才能上门。”

接下去的一段话听上去更像凡高，而不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每个艺术家都割下自己的耳朵钉在门上，让别人对着它大喊大叫。”

西弗夫妇像柯妮和珍妮一样，喝着甜咖啡酒，享受着奢侈的生活，常常住在伦敦西区 and 里维埃拉；但他们邀请艺术家登门，而不是焚书的人。凯瑟琳在此急需有人帮忙的时刻热切地喜欢上了他们，西弗可以随意发表自己对短篇小说艺术的看法，他的妻子是奥多·利弗森（奥斯卡·王尔德称其为“斯芬克斯”）的一位姐姐，也是一个歌唱家，他们的兴趣范围包括凯瑟琳、温德姆·刘易斯、乔伊斯、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普鲁斯特（西弗翻译了他最后几卷作品），他们似乎没有拜访过布卢姆斯伯里。

不久凯瑟琳回到了伦敦，自从 9 月以来共给默里写了 10 万字的信，其中有些片断比她许多故事更有保留价值，《日记》也有同样的价值。

在汉姆斯特，她又加入了自己的流浪团体。马克·格特勒来喝茶，“凯瑟琳，我听说你也得了这病，你吐血吗？和书上说的一样吗？你认为会痊愈吗？”然后他马上大笑起来。布雷特也来了，她现在常同默里一起打网球，讲一些笑话，说她许多朋友都有“斑点肺”。

凯开着租来的车去城里，去《雅典娜神庙》的办公室，办公室和《民族》都在阿德尔菲街区，共用一个楼梯。在写给维奥莱特·西弗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了一番：

难以想象地杂乱简陋，老梅森汉 像裹在面粉里的猫一样在门口溜边走，……赫胥黎像一支蜡烛似地摇晃着，等着门开了出去。可怜的老傻瓜们西服翻领上别着饰针，汤姆林森 回到弗兰德斯 泥泞的路上去；沙利文和

斯梯芬·哈德森（1841～1922），原名西德尼·西弗，英国小说家。——译注

指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的狮身女怪。据传她常叫过柱行人猜谜，猜不出就将人杀害。后世常用它隐喻谜一样的人。——译注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相继入籍法国、美国，是现代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译注

梅森汉（1860～1924），英国记者，当时文学刊物《民族》的编辑。——译注

汤姆林森（1873～1958），英国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小说《晨光》、游记《伦敦之河》等。——

E.M.福斯特看上去面日不清，似乎吓坏了……

杰克是个搞文学的人，他承认自己现在精力不够，“对别人不怎么看重，除了把他们看作某种象征”，然而在西弗夫妇的怂恿下，默里夫妇还是请了后起之秀来吃饭，带着他们的累赘：

今晚艾略特夫妇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刚走，整个房间还在晃动着，杰克下楼去送他们——艾略特太太的声音——“噢，不要怜悯汤姆，他很快活”……她的确让我讨厌，使我感到担忧……我不敢想象她“看见”了什么——约翰不小心掉下一个汤匙，她叫道：“你今晚太吵了，怎么回事？”她到我卧室来，躺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说“这个房间和我上次来时不一样”，想想看，她以前竟然来过这儿——

而艾略特，俯身朝着她，欣赏她，倾听着，对她钦佩之至——的确很在意她是否喜欢乡村。

我很喜欢艾略特，今晚他谈到你们时，我深深同情他……但是这个茶叶店出来的家伙。

怀有戒心，犹豫不决的维吉尼亚仍对那篇小说评论耿耿于怀，不知道现在凯瑟琳回来了，谁该走第一步，然而她还是从里奇蒙德给凯瑟琳寄了一张友好的明信片，只收到一张“语气僵硬的正式字条”，邀请她去拜访。于是冷淡消失了，两人融洽起来，进行了“两小时无比珍贵的谈话”。

凯瑟琳经过与她流浪团体的这些接触后回到她的黄色书桌旁去思索“自我的发展”，——这个自我没有受到我们寻求后又抛弃的经验的影响，终于从落叶和泥上中冒出芽尖，有一天在地面上昙花一现。“总而言之，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一瞬间——这一瞬间我们直接感到自己真切的自我，却极少个人的情感。”

默里和凯瑟琳商讨过关于发表她的小说后，决定不顾冒犯老订户们，将《雅典娜神庙》中某些篇幅辟为短篇小说栏目；凯瑟琳在6月不太引人注目地发表了她的故事《启示》，使维吉尼亚咬牙切齿。

“上星期我在这儿没时间写一个字”，凯在给维奥莱特·西弗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星期已经排满了要读的稿件；最后定稿的诗歌，散文；要评论的小说；要订的计划；还要写一篇文章谈我们为什么打算发表短篇小说，还要为《民族》撰写一篇出色的评论。”

就这样伦敦的夏天在为刊物操劳中度过，《韵律》的撰稿人托马斯·莫尔特来家中作客，注意到默里太太“每星期二早晨都坐在打字机旁，直到下午工作完成后才肯离开”。她的午餐是生蛋液加酒，有时来访的西尔维亚·林德注意到她倒茶时戒指在手指上滑动。

她客人很少，但“伊莉莎白”现在很钦佩她表妹的评论文章，登门拜访，也许想弥补凯丝·比切姆曾感到的冷待。她刚同伯特兰·罗素可怕的哥哥离婚，受到凯瑟琳不卑不亢的接待，也许对两人都感兴趣的“男人”问题发了

译注

伦敦地名。——译注

托马斯·莫尔特（1885～1974），英国文学艺术批评家，当时是许多文学报刊的撰稿人。——译注

一两句议论。凯瑟琳几个月以后同默里谈到她时，显然记起了这次会面；而且还写下了她唯一有关性关系的明确观点：

你有关伊莉莎白的谈论有趣极了，请原谅我的坦率，她对一位肉体上的爱人毫无用处，也就是说不能上床，只有这点不行，她不能忍受——她会吓坏，她整个生活，她的生命，她的才能以及生命力都在于绝不顺从。我有时想知道顺从是否是最伟大的行为——最了不起的行为，它是最难的，除了这个世界的特权人物外，别人还能做到甚至想到这个吗？你看这极为复杂，它需要真正的谦卑，同时还要绝对相信自己的根本自由，它是忠实的行为，像所有了不起的行为一样，在最后关头是纯粹的冒险。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我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这次两位作家的会面并不真正说明问题，珍贵的友谊还有待发展。

维吉尼亚再次拜访，被邀为《雅典娜神庙》评论《幸福及其他故事》，她不顾自己别的考虑，同意了。8月，她们最后一次分手。这一年在汉姆斯特，默里的专注于自我令旁观者感到吃惊，那天托马斯·莫尔特在他们家，默里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日（8月6日）。凯瑟琳不久就写了一则日记提到她对她的不停咳嗽的反应，“杰克一声不吭，低着头，用手遮住，似乎忍受不了”。好多年以后，理查·默里回忆说，“我哥哥根本就缺少所需的一切，他呆在那，阴沉着脸，只是使她感到更难受，他根本就不能让她高兴起来。”

不幸的是凯瑟琳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前一个冬天在默里和布雷特之间滋生的感情。布雷特现在住在瑟洛路，离“大象”不远，3月份，当凯仍在鲜花别墅时，默里给布雷特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些话：

你知道我爱你，就像我知道你爱我，在我处于紧张焦虑、精神濒于崩溃的时候，你的温柔帮助我度过了难关。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奇怪，然而确实是体会到你的爱，才使我意识到我同凯瑟琳的婚姻非常神圣。我几乎因此濒于崩溃，我可以找到一些借口，但不多。

“这很含糊”，他又接着说，“但是你会明白的”。也许甚至凯瑟琳也能明白，她可能读到过这封包含着简单真理的信，也许没有，但她的确看见了布雷特写给他的信，8月的第三个星期凯瑟琳写下了这些怨恨的话：

布雷特在写给默里的信中有些昏了头，今天早上她写到自己如何想冲到玉米田里去——把我吓坏了。然后他应该狠命打她几巴掌，她威胁说要靠在他身上哭，直到把他衣服全弄湿。可怜的东西！她37岁了，歇斯底里，精神不正常，糟透了的家庭背景——他“唤醒”了她。她整个脸都改变了，嘴张开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在她的微笑中有一种愚蠢讨厌的东西，让我不寒而栗。还有咬过的指甲，肮脏的脖子——牙齿上的污垢！不管他怎么想，事实上是她奉承他，崇拜他，请求这位先知的帮助，而他却告诉她那古老的悲剧。

一个多星期以后她又写道：

8月19日。杰克今天早上无意中说到去年冬天他曾经考虑过同布雷特一

起在瑟洛路租房子。好。他们的关系只是友谊吗？噢，不！他吻了她，拥抱她，他们肯定意识到某种比友情更危险的东西，然后他又考虑要同她合租房子……，不顾及我的情绪——这种自私自利让我吃惊，我不在时必须记住这事。默里对我和别人一视同仁……我必须记住他只是我的一位朋友——再无别的，谁能指望这样的男人！在这样的时候做这种打算，然后在我回来时一见面就说：我必须好好对待布雷特，多么卑鄙讨厌！简直厌恶透顶。

人们只能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都遭受到痛苦，默里 30 年以后写的日记中有一段话还谈到他渴望得到女性的温暖和体贴，“当一个人几年来一直照顾一位生病的妻子，为她担忧时，多么渴望得到它。”

1920 年 9 月，凯瑟琳满怀着恢复健康的希望，由埃达陪伴启程去芒通和伊莎贝拉别墅，行李中带着乔叟、斯宾塞、柯勒律治和契诃夫的作品。《幸福及其他故事》圣诞节将要出版，她同时计划让迈修恩出版某种“日记”，甚至在火车中就开始写些片断。轮船和笔记本，火车和笔记本，这些总在一起出现。

富勒顿小姐的女仆打扫好了房间，预备好了茶点，早上凯瑟琳写了从伊莎贝拉寄出的第一批兴高采烈的信件，信中闪现出芒通所有的魅力：它的色彩、香味、花朵和动物——包括了了不起的玛丽，她的保姆，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一切都令人愉快，充满了美、温暖和明亮。但她刚到那儿就受到讹诈：一个声音来自过去，来自沃里希奥芬，恰似早期那篇叫作《房子》的故事中描述的一样。

弗罗扬·索比尼欧斯基已经结婚了，现在波兰驻伦敦使馆工作，他一定是看到了《幸福》的出版预告，因此出于最体谅别人的动机，来找现在富起来了的默里先生，暗示一包凯瑟琳在沃里希奥芬时写的信也许值 40 英镑（恰好相当于康斯坦布尔预付给她的稿酬）。

“让你这样被人打扰，真是讨厌，糟糕，”她到达三天后就不得不写信给默里说，“弗所指的切尔西阶段让我吃惊，但他的确拥有我同他初相识期间写的一些信，出多少钱我也愿意将其收回。”埃达提供了所需的 40 镑，默里去了一趟律师事务所，信最终回到凯瑟琳手中，被销毁了，这样总算了结了这段往事。她渐渐对因自己疾病引起的冷淡无情感到习以为常，想到布雷特，她可以给默里写信说：“我希望你能好好打网球，一切顺利。”当他忘了她 10 月的生日时，她也非常平静地接受了。10 月 18 日，她给默里写了一封出色的信，这封信可与她的作品媲美。她说她一直在想着沃特·德·拉·马尔——他一直“缠着”她，分享她在“寂静的世界”中的快乐，又接着说：

你知道最近我常常觉得除了这些迹象，这些暗示外，这种寂静还有其他意义，如果一个人顺从的话，难道不可能进入一个完整的世界吗？这个世界近在咫尺，但我感到不敢把自己支付给它，这个等待着，向我招手的神秘事物究竟是什么？

然后是受苦，像我三年来经受的肉体折磨一样，这改变了一切——甚至连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增加了别的东西，什么事情都罩上了一层阴影，抵抗这种苦难对吗？你是否知道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特权——我花了三年才理解——才明白。我们抵抗，我们被吓坏了，小船驶入了黑暗可怕的港湾，

我们只能呼喊奔逃——“把我送上岸”，然而这毫无用处，没人理睬，阴影继续往前驶去。人们应该静静地坐着，睁开双眼。

当凯瑟琳这样直接地因受苦而写作，然而又具有如此客观的勇气时。有力的象征不用找寻，自然而然出现在她面前的纸张上。那个时期她的心智同里尔克的心智的自然贴近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没有哪个同一辈的作家如此靠近他，但是她从不知道他，信中接着说：

我相信最大的失败就是被吓住。完美的爱情能驱走恐惧……回顾我的一生，我犯下的一切过错都在于害怕……因此我就该面对死亡吗？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你知道人们有时不得不去想……不，不是个人的上帝或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更像是灵魂不顾一切的选择。

这种道德力量她必须自己寻找，自己掌握，然而现在她身体力量很弱。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消瘦，而每周固定的评论工作又妨碍她创造性的工作。她知道得很清楚《幸福》不够十分好，也知道应该马上写些好作品。

然后她奇怪的幻觉产生了短篇小说《小姑娘》（在她梦中展现），接着又写了《陌生人》，取材于她父亲 1909 年在新西兰港口与母亲相遇的情景，属于她后期最好的作品。同时她也在竭力回顾自己过去的的生活，“那不是让人高兴、愉快或轻松的”。她写信给默里说，“我想你的罪过只在于无意识，比我的容易得到宽恕……我犯了罪过，然后自我开脱，或将其抛至脑后，借口‘去想这些事情没有益处’或（更经常）‘这都是体验生活’，然而这并不全是生活体验，有浪费，‘也有毁灭’。”

她说：“我写作时稍加修饰”，然而她相信自己避开了敌人——又脱颖而出。她的灵感出自爱情：“我终于意识到生活对我意味着同你的亲密无间”。默里不知道当她这样说话时，是一个危险的迹象，乌云已开始聚集。

一系列有名的短篇小说相继出现，首先是《布瑞尔小姐》，然后是《毒药》《夫人的女仆》，很快又写了《已故上校的女儿》的一半，所有这些都同《幸福》中最好的作品不相上下。她请默里做她的代理人将其发表。然而在此期间，在这个自从 1917 年以来最为多产的阶段中，她的绝望情绪再次以暴风雨般的力量将她压倒——起因似乎是默里允许《行星》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

为《幸福》作宣传需要使用照片，默里天真地给了迈克尔·萨德勒一张 1913 年在工作室拍的照片。他喜欢这照片，那时她看上去很健康，虽然有些阴郁。她看见以后大发雷霆，立刻拍了一封电报命令他把它烧掉，“你明白我多么讨厌它”，接着写的一封信狂怒地说道：她没有那种野兽般的眼睛，卷毛狗一样的长发和乱七八糟的刘海。她说，她不是一头牛，她的生命力很弱，她很瘦，有病，但这是真实的我——他不知道吗？她的怒火持续了几天，甚至还借了一台打字机给他打印了一封“公事”信，取消他为自己的代理人，而默里在伦敦简直彻底垮了。这种事情夫妇们事后往往就忘了，但这是凯瑟琳写下自己最好的两个短篇小说时所处的情景，“我还必须告诉你别的事情”，她写道，那时她仍怒气冲冲，很恼火他在信中没有提到她的《陌生

人》：

我病了快4年了——我变了，变了——不是那个样子了。你对自己的工作（我看不见）花的精力是我的两倍，我不想因为是杰作而受到拒绝，谁会提到那“第

一场雪”？我不会像你一样活那么长，我觉得自己几乎没有时间，我死了以后，亚瑟还可以画100年的广告画。我很孤独，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她发了一通怒火以后的那个星期六，默里去同安妮·埃斯苔尔·赖斯和她丈夫雷蒙德·德雷一起吃饭，感到非常痛苦，同伯娜米·都伯雷太太一起告辞时，他出乎意料地吻了女主人的脸（后来写了一封信解释，但又撕掉了）。星期一仍情绪低落，走到地铁站时，看见一位妓女，就停下来同她说话，他说“不，我没别的意思，只想找个人聊聊”。他请她在梅尔兹吃了一餐饭（她是一个兰开夏郡的姑娘，对他很好）。第二天晚上，他打电话给布雷特，晚上10点钟跑到她家，把她抱在怀里，但又对和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星期三他“几乎恢复了理智”，此时玛丽·哈金森请他下星期一同伊莉莎白·比布斯柯郡主共进晚餐，她父亲是马格特·艾斯奎斯，默里刚刚评论过他写的《回忆录》。同她一起乘车离开时（她现在也邀请他吃饭），他突然吻了她的脸庞。他回到波特兰别墅，“情绪焦虑不安”。

郡主给默里寄来一篇短篇小说供《雅典娜神庙》刊登，他告诉她说故事写得“很聪明”，说修改一下后可能会发表。但是星期一离得太远了，她星期五来他办公室拜访，他为那一吻感到很尴尬，但她很亲切，很讨人喜欢。她离开后，他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吓坏了，唯恐她会误以为那一吻是向她求爱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几乎病态地渴望得到柔情的男人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他已经在伊莉莎白·比布斯柯身上找到了这种柔情（她似乎爱上了他），然而他写信给凯瑟琳倾诉自己的痛苦，更为糟糕的是还把那个聪明的故事寄给她征求意见。不，不，她说——给她5英镑她也不会去读它，她太忙了。相反，她写完了《夫人的女仆》，把它寄给刊物去发表，同时还告诉他“K.M.”从此以后不再写评论文章了。

他倾诉自己的痛苦心境引来了一封电报（12月12日）“不要再用这种虚假沮丧的信来折磨我，像个男人，否则不要给我写信。”第二天，她完成了那个有关爱情和怜悯的杰作——《已故上校的女儿》，似乎她一口气写完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午夜后已精疲力尽，埃达给她端来了茶和鸡蛋三明治。

在这段插曲中两人遭受的痛苦可以追寻到1912年，那一年杰克·默里是一个温柔的年轻人，需要支柱和母亲般的体贴；他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及时为他提供的房间，自从她生病以后，他渐渐地失去了越来越多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当然她也是一样，“我首先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个女人”，她在最近的信中两次告诉他——1911年她就承认过这一事实；自从1907年以来，她就知道自己“有一半是男人”。他现在有的只是剩下的一小半，而且还生病了，离得很远。

至于她自己，已经多少与之妥协——“我想让人们把这看作我的自我表

白，”这是她 1920 年 12 月 19 日写的：“生活是一个谜，这些信带来的可怕的痛苦——知道杰克希望我死——他正在促使我早死——将会渐渐消失。我必须加紧工作，把我的焦虑变成别的东西。悲伤将变成欢乐。”

她写这些时，他正前来芒通度圣诞节；因此这第二次风暴又平息了。埃达同他们在一起，看见他们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星期。杰克的刷子和梳子使两人合用的房间变了样。《日记》中说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着神秘的融洽，整个的感觉是他与我尽管比人们能梦想的还要不同，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到达后的那天，默里写信告诉布雷特无论如何他回去后不能在她的房子里住下，破坏他对她所怀有的好感。他说他没有能力轻易地对待那样一种情夫——情妇关系，也许他该那样做，但不是同她。“似乎我在另一方面太喜欢你，因而不能同你有任何肉体关系”。人们总说他不能正视“女性因素”，也许这话不错——“我们等等看”（这些话使布雷特怀有希望，以为凯瑟琳死后杰克将会娶她）。

凯暂时没再写什么故事，只是平静的生活本身。看见她病得很重，杰克只好决定让《雅典娜神庙》同《民族》合并，有关事务的谈判已经开始；已陆续收到有关《幸福》的评论，大意是说她已“卓有成效”。

此时凯瑟琳写了一封给柯特连斯基的怀旧信，以一种奇特的讨好口吻回忆起他们早年的好时光，然而此时柯特恰好时她深感恼火，因为她不小心弄丢了他一本翻译契诃夫作品的笔记本，于是他似乎又一次退缩进自己顽固的沉默中去了。

还有一封更重要的给奥列加的信——重要性在于它与将要临近的事件有关。显然她知道他会听到对她作品唱的赞歌，听见人们提到契诃夫是她的“老师”；奥列加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只留下很少的个人文件，但这封信也在其中，表明这对他也具有特殊意义：

亲爱的奥列加：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写这封信。

我想告诉你我非常欣赏“旧日”你对我那一如既往的好意，谢谢你让我从你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现在仍然——非常惭愧——学问很低，但是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我思索；你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亲爱的奥列加，我真想告诉你我常常回想起你的谈话，在写作时，常常想起我的老师，这样说是否太过分？那么请原谅我。

但是让我谢谢你，奥列加——感谢你的一切，但愿哪天我能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你……如果我不能将死亡拒之门外，那么你也知道这是我的野心。

敬仰感谢你的 K.M. 只有现在，《幸福》发表以后，她才能真正看到——第一次——自己的作品编集成书后是什么样子，别人又是怎么看待它的然而，书评在劳伦斯那里引起了反感，他写信给玛丽·迦南说（她 2 月去了芒通），“看见她时替我唾她的脸，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撒谎者；至于他，我少说为妙……让这两个人遭瘟吧。”不久又写信给柯特，“我听说《雅典娜神庙》在我们这位爬虫朋友掌管下一年损失 5000 英镑……我听说他现在——或曾经——同凯瑟琳呆在里维埃拉——她正在苟延残喘，还想对别人发号施令……两个爬虫，缠在彼此长长的肚子上。”显然劳伦斯不能忍受他俩相爱。

对于英国小说，1920 年并非值得纪念的日子，威尔斯和本涅特开始失去在人们心中小说家的声望，因为他们不再是时代的喉舌；福斯特、赫胥黎和多萝西·理查德逊只写了一些小作品；《恋爱中的妇女》虽然可以在美国买到，在英国仍未出版；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名字只为少数人所知，而知道乔伊斯的人就更少；凯瑟琳自己一年来都在评论一些不怎么样的书，其中唯一突出的似乎只有高尔斯华绥的《骑虎》；因此《幸福》虽然是世人从未加以重视的短篇小说，却成为一件大事，既是英国文学新的观察方式，也是新的声音。

知道此书并不值得如此称赞的评论家当然是凯瑟琳自己，她知道除了《序曲》《我不会说法语》和《没有脾气的男人》（她自己也很看重《幸福》）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无足轻重，或只是凑数而已，事实上，那只是她多年栽培的树上风吹落地的果实而已，她知道自己必须再写出好作品，或者就只有撒手而去，留下“零星片断”。

她非常清楚该怎样做得更好，因为评论《夜与昼》的经验使她思考过小说和战争。似乎不仅本涅特，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所有老作家都准备重新追寻爱德华时代的生活，连维吉尼亚也不例外。凯瑟琳知道至少自己受到战争和疾病的影响，必须找出“新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新思想，新感觉，对此她已说过很多：

你知道已没有时间去绕弯子说话，他们砍倒了樱桃树，卖掉了果园——这的确是我需要的气氛和感觉。是的，跳舞、黎明以及火车上喊着“跳下去”的英国人——所有这些加上背景……我不明白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怎么能够放弃最近这 10 年，重弹老调：什么爱德华为什么不明白，维不愿意受诱惑或（见本涅特）为什么 12 客一桌的晚餐需要改换等等，如果我不评论小说的话，永远不会去读它们。

然而她信中谈到的原则总是比她的实践更为一目了然，她的工作是间接的，在伊莎贝拉别墅写的 8 篇故事中，有 5 篇（包括《已故上校的女儿》）是“孤独女士”主题的变奏，2 篇描写婚姻生活中的孤独，只剩下《小姑娘》讲的是别的主题。8 篇中有 3 篇以死亡为主要原因，讲到死亡如何影响生活。《已故上校的女儿》当然还谈到许多别的事情，其绝妙的处理时间变换的方式——一种与别的作家无关的技巧，而且在 1920 年没人能与之匹敌——表明时间本身也是一个角色。

在伊莎贝拉故事中有显而易见的逃避自我、战胜个人的意识，甚至在《小姑娘》中，人们也不再认为叙述者是凯瑟琳自己。如果说这些老小姐故事有些单薄乏味，是故事的不足之处的话，那么世上所有老小姐、女仆、年轻家庭女教师的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她们都是爱德华时代的牺牲品，皇家学院曾作过尝试，试图为这些英格兰过剩的妇女做些善事，这是建立皇家学院的目的，比切姆小姐也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她的孤独女士故事记述的历史超过了人们所承认的。

当然，这些故事并未公开针对社会宣称妇女的作用，凯丝·比切姆从来就不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所写的许多孤独女士故事中没有一篇能打动一位爱德华时代的读者，使他“坐下来开一张支票”；这也是维吉尼亚·吴尔夫钦佩她作品的一个原因。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自己的职责纯属创造性工作，

只涉及形象思维，与环境无关。她的作品表达的主要价值是想象本身的价值。“我们是艺术家”，她常常对默里宣称，如果有任何东西是她想加以改进的话，那就是文学形式，这种形式通过她的想象可以获得真实的力量。1908年从那个妇女参政会议上逃跑后，她写信给加纳特·特罗维尔（她认为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房间里开始热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抵触情绪，已经过了10点30分，我跑到街上，空气清新，满天星星，因此决定我不会去做一个参政者——世上有的是笑声，噢，我觉得自己可以用容易得多的方式来补救世界——你说呢？

根据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看来，那“更容易”含着一些讽刺。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把自己绑在艺术的栏杆上时，没有好心的警察前来解救她。事实上，她反复回到她那孤独女士主题，谈论她的女性受害者，通过想象给她们以生命。

难道这仅是她自己的想象，或者是真的这些侍者——尤其是侍者——和旅馆仆人采取了一种无礼、傲慢，又稍带取笑的态度来对待一位独自旅行的女人？或者这只是她自己，可怜的女人的自我感觉？不，她的确不这样认为，因为哪怕当她最高兴，最自由自在时，也会突然感到侍者和仆人的腔调，奇怪的是这相应地损害了她的安全感，她似乎觉得某种对她不利的事情正在计划中，似乎一切人，一切事——是的，甚至连桌椅板凳这些无生命的东西——都“知道内情”——都在等待着那可怖的，不可避免的事落在她头上，这种事一定会发生，而且总是会发生在世上每一个独自旅行的妇女身上。

几分钟后，同一位妇女一人呆在旅馆房间里面对镜子：

她抚摸着手笼，自言自语说“镇静”，但是太晚了，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结结巴巴地说：“我必须，你知道……我必须有爱情，……我不能没有爱情而活着，你知道……不是……”说着说着，她心中的那团冰块融化了，变成了热泪，她感到这些眼泪滚滚流淌过她的身体，是的，她哭成了个泪人；她俯身在亲爱熟悉的手笼上，觉得自己要融化在泪水中了，完了——全完了，什么都完了！一切全完了，失败了。

通过给予她们生命，形象以及痛苦的经验，她的确多多少少为那些在世上独自旅行的人说了话。

她的疾病没有显示出缓和的真正迹象，但是早在11月，当她的心境仍然平时，曾同富勒顿安排好将伊莎贝拉别墅租到1922年，她希望在那儿直住到痊愈，如果《雅典娜神庙》真的停刊，她就会让默里也来，两人可以再次从法国南部给国内撰稿。

圣诞节期间，默里决定加速这项计划的实施。2月，他回到伦敦去清理事务，其间他遇见了维吉尼亚·吴尔夫，他关于凯瑟琳的消息促使她写了那封凯从未回过的信。实际上他这次回来标志着默里夫妇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仅仅因为他是重要的主编，他们才与他一直保持联系。

汉姆斯特的房子此时正租给西德尼·沃特罗居住，在维吉尼亚眼里，那儿已经是她称之为“底层”的一部分，后来则成为“猪圈”。1921年，维吉尼亚的确翻阅过凯瑟琳的作品，但读后感到要去清洗自己的头脑。直到凯瑟琳去世，不再成为威胁，维吉尼亚才真正想到她。

3月，埃达去伦敦清理房子，现在的计划是搬往瑞士，猫也要带去。默里受到沃特·雷利的邀请，将去8年前他极其讨厌的牛津讲学，正在伊莎贝拉别墅忙着准备编写《论文体》。

柯妮表亲和富勒顿小姐得知凯瑟琳在某一封信中说她们没有“教皇派头”，就想把别墅租给别人住，她们用不着担心，她已经开始不满芒通和布切齐医生，已写信给日内瓦的一位老同学打听旅馆问题，她还让布切齐医生给她提供了疾病状况的证明。默里写信给西德尼·沃特罗（他在外交部工作），请他帮助打听瑞士一位斯普林格医生的情况，同一天（1921年3月20日）凯瑟琳告诉埃达她将永远离开芒通。她说默里5月将去英格兰讲学，她“已同他安排好，无论如何不到冬天不要出国”。“仍在寻找住处，犹豫不决时，让他也来瑞士是不可能的，他很不愿意来。”这是她对埃达撒的一个谎，因为当时她很不满默里。正当此时他收到几封信，凯瑟琳恰好读了，虽然并非写给她的，因此告诉埃达：“伊莉莎白·比布斯柯又活过来了，昨天写的一封信央求他抵抗凯瑟琳，‘你迄今为止一直忍耐她，现在又怎能不让步呢？你发誓说世上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我希望他把这种关系继续下去，他愿意这样。她问‘没有你的文学忠告，我怎能生活下去？’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问题，我要写信给这个愚蠢的小家伙。”

亲爱的比布斯柯郡主：

恐怕你得停止写这些情书给我的丈夫，我们俩人
现仍在一起生活，这种事情我们这儿不时兴。

你仍然很年轻，但愿你不会让你丈夫对你解释这
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请不要让我再给你写信，我不喜欢骂别人，也讨厌
教训别人该怎么做人。

你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在伊莎贝拉别墅没有再写什么故事，只有日记片断，一些对杰克关于伊莉莎白·比布斯柯闪烁其辞的猜疑，“几分钟以前，我还认为我可以写一个长篇小说”。3月写的一则日记说，“一个男人忠实自己的妻子，但又会撒谎，但是我不能说什么，我不能写长篇小说，我想我要写些小故事。”

实际上她已写了《毒药》，一篇痛苦的小故事，讲的是神秘的来信如何毁坏了一个婚姻，默里拒绝把它登在《雅典娜神庙》上，认为它“不完全成功”。

她在芒通呆的一年给她留下了很坏的回忆，比布斯柯事件过后，她觉得自己“肮脏”，“讨厌”，或兼而有之——“我想到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虚假的”，她渴望某种纯真的东西，在日记中有一小首散文诗，盼望那覆盖一切的白雪的纯洁：“忘了，忘了吧，抹去了一切，遮盖了一切——白雪说，那是很久以前，再也不能重现，再也不能折磨你，一切都杳无痕迹。”

埃达又去了南方，决定让她在蒙特里斯 附近看看，在默里去牛津讲学时她将回到凯瑟琳身边。1921 年 5 月 4 日，凯瑟琳由埃达陪同，离开芒通，前往蒙特里斯后面波吉的一家旅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地中海。

瑞士游览胜地，位于日内瓦湖东头。——译注

蒙大拿 的小木屋

为什么要写得简单些会如此困难呢？——不仅是简单，还要声音和缓，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渴望能够做到的。不要很优雅的效果——不要华彩乐段，只要简单的真理，就像只有撒谎者才会说的那样说出来。

——《已婚男人的故事》

在芒通——连同它那没有浴室的别墅——住过以后，整洁干净的波赛特旅馆和面对大山的景色使人耳目一新。默里在英格兰收到来信，信中兴奋地描绘了一番瑞士的清新整洁。然而安妮·赖斯却得知那儿所有的居民都面目丑陋——女人臀部肥大，男人头戴紧绷的毡帽，身着太小的格子西服。隔了不久，默里也来了，凯瑟琳同他一起爬上蒙大拿山脉，在那儿她获得了最后一次创作灵感，因此她在瑞士小木屋的作品是她创作生涯的顶峰。同埃达住在波吉时，她同父亲的关系也得到缓和。凯瑟琳离开芒通时仍相信自己那位焚书的父亲不愿意付给她生活费，还不知道比她富裕的姐妹们也得到同样的数额，现在她银行的存款因为《幸福》的出版而有了赢余，她有些害怕父亲知道此事，同时她还等着芒通的布切齐医生送来一张数目可观的帐单；上一年秋天还没有偿还索罗皮尔医生的帐单；她把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日内瓦收费昂贵的、自负的斯普林格医生身上。她以为，父亲如听说了《幸福》给她带来的收入，就会突然终止支付生活费，而只有这笔钱才能使她进行这次寻求健康的旅行。

默里尚在英国时，凯瑟琳打电话给蒙大拿的斯蒂芬尼医生，约好去西尔见他。她租了一辆汽车（“我好多年没做这种事了”），自己开车去——这完全是一种比切姆式的出游，但让她一路饱览了瓦莱地区美丽的罗恩山谷。此时从惠灵顿寄来了一封她害怕去拆开的信件，她把信寄给默里，附了一张字条，说她肯定信的内容是“那个我一直担心的打击，请你拆开，然后打电报告诉我结果好吗？”她请他不要隐去任何内容，“我能忍受从你那儿听到的一切”。

信封内的确装着一张存折复印件，伦敦银行经理基先生认为应该寄给自己的总裁。然而比切姆附上一张便条说这是“误”寄至他处的。

默里把它从伦敦直接寄回凯瑟琳，并且立刻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他说：“你竟会如此担忧他会中断给你生活费，太荒谬了。”他尽可能给她父亲详细地描述了她的情景，解释说她病得太重，不能给他写信，也不想让他担心。他给凯附寄上把她吓坏了的主要内容，说：“你父亲心很好，把它退回，认为寄给他是弄错了——我认为这是绅士的行为——但是阿利克斯·基究竟有什么权力将你私人存折的复印件寄往新西兰？凯瑟琳，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将除生活费以外的其他钱全部存在另一个银行。”她立刻作了安排，默里又写信来说，“真的，凯瑟琳，我觉得你过于担忧了，我完全可以肯定他绝不会去为这么一个原因中止给你生活费。”300英镑一年的收入继续付给4个女儿，无论她们身体好坏，经济状况如何。此后凯瑟琳将她作家的收入存入汉姆斯特的巴克利银行，但是她仍然不能给父亲写信。同时，《已故上校的

瑞士山名。——译注

西尔是一小镇名，属于瑞士西南的瓦莱地区。——译注

女儿》在《伦敦水星报》上发表，备受推崇，把这消息告诉凯瑟琳时，J.C.斯奎尔说：“别忘了把你接下来写的任何东西寄给我们，……但愿你能写一本长篇小说，将你对世界的整个看法全部倾吐出来，目前的小说似乎处于一潭死水之中。”

这似乎引起了她的思索，几天以后（1921年5月23日），她问默里，“难道我不是仅仅生活在浮光掠影之中吗？这种生活有些不对，有些渺小，一个人应该生活得更充实些，有更多的力量去爱，去感受，一个人必须忠实自己的生活态度——在每一特定之处——然而我没有做到。”

一两天之后，她又告诉小说家贝洛·罗恩德斯太太她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极其渴望描写家庭之爱——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之间的爱——母亲对儿子的爱，父亲的感情——温暖，生动亲切——不是“虚构的”——而是“出于自然”。

蒙特里斯开始挤满旅游者，凯瑟琳和埃达沿着罗恩山谷去了安静的小镇西尔，位于瓦莱，四处分布着小型的中世纪堡垒和葡萄园地。她开始去见斯蒂芬尼医生，沿途的景致令她高兴，就像前一年10月曾经使R.M.里尔克感到高兴一样，一切都如此美好，她唯一想在此遇见的人是“战前的劳伦斯”。西尔其实是蒙大拿的一个间歇站，蒙大拿高出西尔3000英尺，她也去了那儿，她不敢去挤满了病人和医生的普拉旅馆，不久就看中了杉木小屋，舒适地坐落在山谷下的鲜花和机树丛中。6月10日默里也来了，他们住进了西尔的一家主要旅馆，决定是否要租下一年的瑞士农舍。

23日他们仍在旅馆时，一个男人也住了进来，他也想在瓦莱找一所房子以便写作——他看上去很有军人风度，谦逊有礼，整整齐齐地穿着背心和鞋罩，但几乎又可以看出是位诗人，此人就是里尔克，他的诗作《都诺挽歌》因战争而搁笔，那个冬天他又将重新加以完成，还有《致俄甫斯的十四行诗》。他有着稀疏的胡髭，同他在一起的是女友贝尔迪恩·克洛索斯卡。他在旅馆隔壁理发店的橱窗内看见一张照片，拍的是附近一座迷人的城堡，准备出租或出售，就这样，里尔克发现了他的米索城堡。此时，默里夫妇正准备乘登山缆车去杉木小屋。

他们安顿了下来，开始进一步结识一位邻居。阳光小屋的主人是罗素伯爵夫人，沿着山腰走半小时的路程就到了，因此伊莉莎白和她的瑞士花园不久就对凯瑟琳欢迎之至，让她使用图书室，给杉木小屋大捧的鲜花和一篮篮的杏子，至于凯瑟琳自己，则需克服某种保留态度（她表姐有些“庸俗的小心眼”），但是伊莉莎白开朗大方的性格还是使她克服了这种情绪，凯瑟琳的最后一次友谊就是这样同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形成的。

木屋的房间很小，深色的家具使它看上去更加阴暗，但是屋内有浴室和热水，这比伊莎贝拉别墅好，冬天还有暖气（里尔克的城堡既没电也没水），凯瑟琳自己住在楼上，有一个阳台俯瞰山谷。她同默里马上开始像“两张时刻表”一样生活，工作一个上午，喝完茶再工作至晚饭——默里为《民族》和《文学副刊》写文章，凯瑟琳则写些东西挣钱来偿付医生的帐单。

没有空余的房间给埃达，她在村里另找了一个小房间，后来又在诊所找了个工作。

凯瑟琳此时的经济救星是克莱蒙·肖特，他经营《行星》报的热情高于

情趣，付给她 6 篇短篇小说的稿酬是每篇 10 基尼，这是她所知的最高报酬，当然她不能拒绝。然而事实上这个合同破坏了她的声誉，这使她回到《幸福》的格调，寻找更多的有关英国夫妇摆弄爱情的聪明的小故事，在《行星》上刊登时还附有可怕的插图。几个月以后，温德姆·刘易斯以厌恶的口气提到凯瑟琳，说她是“那个有名的新西兰杂志故事作家”，毫无疑问在别人心中也留下了坏印象。

其实这些付帐作品的最严厉，最有洞察力的评论者恰恰是凯瑟琳自己。她知道《都佛先生和太太》（她为肖特写的第一篇作品）过于虚构，“并非情不自禁”，“也不是我要寻求的真实”。她声称“一切都应感受深刻”，因而转向另一篇新西兰故事。她在小木屋所有的写作出现了一种来回摇摆的形式，一方面以欧洲为背景，一方面则是以新西兰为背景，更为具体的小故事——在大部分这类故事中，光明灿烂的背景衬托下都有死亡这一沉默的角色。

她决定再为《行星》写两个故事以后，将着手一篇长一点的作品，构思一个以象征方式表达的主要作品，将对祖国、童年回忆以及对死亡临近的感觉全部融为一体，成为令人惊奇的结合，表明对爱这一主题的看法。

《在海湾》是在 7 月底开始写的，于 9 月 10 日完成，其间因写作《旅行》而中断，8 月因高烧发作又中断写作，而这时又继续完成了在洛尔时开始的那个可怕的热病作品，《已婚男人的故事》。

所有这些展示了凯瑟琳 1921 年 8 月创作情况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画面。

5 月或 6 月，马丁·萨克宣布将要在伦敦出版《恋爱中的妇女》，默里收到了一本小說，请他评论，那是 7 月 24 日，凯瑟琳对奥特琳简单地提到此事，表达了自己的宽慰心情：“真的！真的！真的！”现在此书使他们的友谊经受了考验——而且在芒通还不止此。

凯瑟琳已经告诉过默里，在《失足的女孩》中劳伦斯“否定了他的人性”，他的男女主人公“只是四处觅食的野兽”，没有感情，也不大说话——“这就是愚昧无知的学说。”谈到阿尔维娜发现自己有了孩子，“感到腹中一阵震颤”那段描写时，她问“一阵震颤——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它在一个男人身上那样特别令人恼火？因为不能从这一方面把别人的情感传达给我们的想象，这是亵渎艺术。”现在送来《恋爱中的妇女》让杰克评论，可以想象在这将要被大雪封住的村舍沙龙中，凯瑟琳和默里会有怎样的谈论。杰若德和戈珍因为错误的爱情而走向死亡，这在书中显而易见，很难相信默里的断言，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认出自己来，尽管有皇家咖啡馆和兄弟情谊的情景。

默里的评论文章 8 月 13 日发表，他遗憾地回忆起劳伦斯战前的才能，他“使我们激动地盼望天才的出现”，哀伤这些才能全部消蚀在“火热猛烈的激情中”，角色毫无区别，所有的人都用了同样的词来描述，他们所做的只是“不停地翻滚扭动，就像受到诅咒的人，只处于一种狂热的对彼此的性意识中”。

默里写道：“我们维护意识以及文明，文学即是这种文明最优美的花朵，劳伦斯先生两种都反抗……他是现代英国文学的叛逆，也是其中最有趣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对他表示怜悯。”无论如何，这是一篇明智公正的评论，没有人会想到它出自这样一个人之手，劳伦斯曾写信骂他妻子“你是该死的爬

虫——我希望你死。”当时没有哪位评论家能做到如此公正。

与那些迫害劳伦斯，却没有受到他任何伤害的敌人不同，默里曾经与他关系密切，仍然记得他本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由疾病、弗丽达和战争引起的三重怒火，他本来会成为更好的小说家。

他只是略微谈了一下读《远足》这一章时所感到的厌恶，谈到它的“准确完善”主题（“她认为没有什么力量比男性的力量更深刻强大”）：“劳伦斯先生达到的完善只是一种堕落，他的胜利只是一场灾难。”默里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但是缄口不言——只是稍微提到我们的祖先“开始从泥淖中爬起来时”就抛弃了某种“非人的野兽行径”。当然今天这种话听上去有些过于一本正经。默里的确是一本正经，这一点在他编辑凯瑟琳的文稿时也表现出来。

此时凯瑟琳写信给布雷特，说“使劳伦斯成为真正作家的是他的激情……然而我相信劳伦斯把一切都弄错了……我的信念是除了爱情没有什么能拯救世界，然而他那痛苦的、魔鬼般的爱情我认为全错了。”

不久她完成了《在海湾》，此书目的之一是戈珍就“家庭之爱”这个问题给戈珍的创作者的回答，这种爱“温暖，生动，亲密”——不是“做作的”——也不是尴尬不自然的。

9月10日，凯瑟琳连续不断地工作9小时后，终于完成了《在海湾》，她需要一个星期休息才能使自己恢复过来，此时她觉得应该把《在海湾》给自己正在编的短篇小说集作书名，然而一个月以后，她又写了《园会》，并用此作了书名。

写完《园会》后两星期，她又开始计划写下一本书。显然此书将有清醒的构思，不会塞进一些充数的东西，但保留下来的只有两个预订标题的目录和简单的构思。就在这个秋季，在小木屋中，她在笔记中写道：“上帝，让我心明眼亮，让您的光明照亮我心。”

计划好了写新书以后，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父亲，作为妥协行为之一——一同过去和现在妥协——她知道这是绝对必要的，显然这封信打破了自从他们在卡西塔会面以来一直保持的沉默，她不能带着这种沉默进坟墓。

令人痛苦的是，当凯瑟琳写此信时，她心中充满对父亲的深情，她主要关心的是在死前重获一点父爱：但她不得不提及别人告诉她的有关父亲不愿给她生活费的事情。

同样令人痛苦的是，当比切姆10星期后读到这封信时，出于生意人的冷漠刻板，他最为关心的还是金钱问题，至少私下如此。他在信边上写道：“我可以绝对声明有关生活费问题，我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孩子吝啬过，相反，我总把为他们尽力，使他们能够得到舒适、幸福、优越的生活看作是一种快乐和特权。”在这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墨迹中——她多么熟悉他办公室的墨水台——人们可以想到凯丝这么多年来害怕的是什么。

亲爱的父亲：

我必须克服这种害怕给您写信的心情，因为很久未给您写信了，我感到惭愧要向您请求宽恕，但不这样做又怎能接近您呢？每天我都想了又想，不知该怎样解释我的这种沉默。我想告诉您我时常梦见您，有时候夜间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新西兰，有时您对我生气，有时我并没有犯下这种可怕的过失，我们两人之间一切如旧。没有给您写信简直就是一种焦虑，我一心想念您，

然而过去阻挡在我眼前，我曾经允诺不做那件事，然而却做了，它像一堵墙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沉默的原因是：开始几个星期我病了，想等好些再写，然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使我陷入可怕的沮丧心情，我无以自拔。柯妮和珍妮告诉我您觉得您对我非常照顾，她们让我明白每年给我 300 英镑是一种极大的让步，实际上应该由我丈夫来抚养我。我知道您这样做是因为我有病，我以为您并不在意如此照顾我，而一想到您的确在意——这确实是一个打击，我不能忘记这事，我觉得自己不是您的女儿，如果彻迪或珍妮生了肺病，不管有无丈夫，她们肯定都会求助于您。无论一个人有多坏，他总是求助于父亲，难道我放弃了这种权利吗？也许……亲爱的父亲，您没有理由不顾一切继续爱我，我明白，我一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满意，令人失望的孩子。

然而，当一个人受伤时，他总是相信家庭会接待他，珍惜他。

当我们在法国时，我感到很幸福，我总是渴望同您在一起，但是当我知道您吝惜给我的钱时，我真感到那是一种折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等待着，看我自己是否能多挣一些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等得太久，似乎不可能再给您写信，后来我又病得很重，不能给任何人写信。等到过了那个危机，我觉得沉默太久，罪孽深重，不能要求宽恕，就这样一直拖了下去。

但是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必须靠近您，至少应该承认我的过错，我至少应该告诉您，虽然为时已晚，您也许不愿再听，我尽管愚蠢，心怀恐惧，但从未停止过爱您，尊敬您，我这样残酷地惩罚了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父亲，不要抛弃我，亲爱的，如果您不能再爱我，至少相信我爱您。

您忠实的深感悲哀的女儿
凯丝

写了这封信以后三个星期她没有再完成什么作品，只有一些尝试性的故事的开头，这些故事本来也许可以归入她最好的一类。此时凯瑟琳几乎正像一位清教徒那样责备自己（虽然每天都受到死亡的威胁）“懒惰”，“失败了”，“浪费时间”，此时期唯一的一张照片看上去她瘦得可怜。因此默里的话有些道理，她理想过高，其实“应该”多多休息。

然而不幸的是，恰好此时柯特连斯基（默里诅咒他，虽然从未诉诸笔墨）写信告诉凯瑟琳，说过去高尔基的医生，现在是巴黎俄国殖民地的一位成员的马努金医生宣称自己能治好肺结核，他的方法是用 X 光消除淋巴结核。此疗程费用昂贵，似乎毫无道理可言。在柯特的怂恿下，她给马努金写了两封信，却没有任何回音。然后她又开玩笑地写信给布雷特（1921 年 12 月 19 日），“我失望了，我曾经把他认作一个奇迹，人必须盼望奇迹。”圣诞节将近，她亲切地写信给柯特（她也想让他重回身边，她正在收集父亲似的人物），回忆很久以前的一次圣诞晚会，劳伦斯的晚会。

那晚上劳伦斯多么好，噢，人们总是爱劳伦斯，今晚我连弗丽达也爱，她穿着巴伐利亚式的服装，脸庞通红，似乎刚为“孩子”哭过，多么遗憾，一切都将逝去。多么奇怪啊，无论发生什么，总有一些人永远一辈子难以忘怀，例如劳伦斯，而其他人只不过是些影子。

但是劳伦斯自己最近也写信给柯特（似乎柯特从未为此责备过他），“我看到默里和那个总不肯死的凯瑟琳又弄出了一些文学新花样，让他们去。”

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寻求和给予和解的心情，但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盼望奇迹的心情。凯瑟琳等待着《园会和其他故事》出版，这本书是当年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1922 年这一年，《尤利西斯》《荒原》，普鲁斯特的最后一部作品，布莱希特

的第一部剧作以及里尔克的《都诺挽歌》一起问世。

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全书描写 1904 年 6 月 16 日这一天在都柏林发生的事、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令人注目。——译注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他的第一部大获成功的剧作是《斯巴达克斯》后改名《夜半歌声》，1922 年 9 月 29 日首次公演，并获该年度的克莱斯特-普雷斯奖。——译注

寻求奇迹

我几乎肯定我疾病的真正原因根本不在肺部，而是别的什么，如果能找到它，治愈它，其他一切都会好起来。

——《日记》

1922年1月20日

1921年秋天，在西尔附近的山上，在死亡的恐惧中，凯瑟琳竭力想把自己艺术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融汇起来——试图用象征的方法来表达比“自我”更有价值的东西。此时，她也像叶芝一样，意识到个人的一切如果不用冰和盐包装很快就会腐烂。战争过去三年了，T.S.艾略特即将脱颖而出，此时他住在洛桑，从银行获准休假，以求从因婚姻造成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他随身带着那首一直在构思的长诗，希望能使它与过去现在融汇贯通，现在诗歌还只是一大团片断，等待着更好的“工匠”之手来将它在巴黎串起来。詹姆斯·乔伊斯等待着出版他由1904年都柏林一天生活片断构成的《尤利西斯》，而在汉姆林路44号住着被母亲的亲吻惯坏了的，永远也长不大的普鲁斯特，他受着失眠和各种疾病的折磨，正在完成他自己关于现在和过去的伟大作品，在里奇蒙德，霍加斯宅第，11月4日，维吉尼亚·吴尔夫写完了《雅各的房间》的最后一页，这是一本实验性小说，宣称人们彼此不可能了解；劳伦斯在意大利西西里。准备最后一次登上欧洲大陆，也将在那儿去世；W.B.叶芝住在牛津布莱克维尔书店旁边，身心极其健康，他最近的一部诗集包括了一些因其象征性的意象以及和谐一致而极受重视的作品。世界已准备就绪——但也毫无准备——等待《尤利西斯》和《荒原》。

《园会》2月底出版，赢得了许多称赞，也获得了许多钱，正好偿付帐单。凯瑟琳并不真正需要继续使自己经受秋天那种紧张工作，但是她最强烈的愿望是“先取得成功，再做别的，尽快写书，我才能尽快恢复健康，尽快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们签订了一年的小木屋租约，打算在那儿呆一两年，如果按此计划，我们就能读到凯瑟琳最好的书，她第一本有目的写作的书。但是通过她的朋友柯特和奥列加的关系，两个神秘人物此时不自觉地干预了她的命运。柯特告诉了她马努金医生的治疗方法；奥列加——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结果——让默里评论一本私人印刷的书，《宇宙解剖，或自我的构造》，作者“M.B.奥克森”——此人是他的诡辩神学撰稿人，华莱士医生。

默里极其讨厌这本“偶像崇拜的书”，不肯接受，但是凯瑟琳迫不急待地收下了此书，认为它谈到了“意识的神秘扩展”、“现实的进化”等等，她开始同默里通信谈论此书。

1月4日……我一直在读《宇宙解剖》，懂了更多，是的，这样的书的确吸引了我，杰克为什么那样讨厌它？

哪怕能稍为窥见一眼事物之间的联系——追寻这种联系，发现它长久保持真实，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使我开拓了眼界。这只是心理学上更为宏大的一种观点，它有助于我的写作，例如，知道帽子+面包可以意味着金牛星，

物质或随便什么，不，真正吸引我的并非这个，而是对某些原因和效果，反应总是一样这一事实。例如，康斯坦霞 选择月亮和水并非事出偶然。

这里提到的《已故上校的女儿》结尾一段是她唯一的一次承认自己使用了象征，让康斯坦霞对此负责，是她典型的作法。如果此书的确“有助于她的写作”，它主要的影响却不在此。通过与奥列加的通信，此书将她引向枫丹白露。然而此时她仍一心向往另一个奇迹，马努金医生用他无意义的机器施行的昂贵的奇迹创造。

默里说她不顾一切地转向“两个不同的，事实上是相矛盾的概念：一个说，有一种医药技术可以解除她的疾病，使她摆脱限制；另一个则说有一种心理或精神的技术，可以帮助她忽视疾病和限制。”

他自己则一点也不相信马努金，许多医生都告诉过他不愿让凯瑟琳听见的话。在小木屋，她似乎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注意养生法，开始把这看作是得救和恢复理智的象征。默里责备自己，后悔当凯瑟琳受到诱惑，要亲自去见马努金医生时，他没有“坚决反对她去”，没能使她多活一些日子。但他忘了此时凯瑟琳的“妻子”所起的作用，在凯瑟琳和埃达夫妇般的联合面前，默里使用一生的决断力量也不能阻挡她们去巴黎。

对金钱的需要又唱老调。1月19日，凯瑟琳告诉布雷特，她“难以想象地”想见到马努金，她为这一“最后的机会积蓄了100英镑，一旦得知他的确能帮助她，她会想法多弄些钱。恰好此时《随笔》写信来问她是否愿意为它的“带刺的故事”系列提供一些以婚姻为题材的作品；虽然她身体状况很不好，在笔记本中还是无可奈何地写道：“我必须服从”。然后她开始安排去巴黎，对默里说她去看几天病就回来，但是却告诉伊莉莎白她的治疗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

如果所有这些听上去有些任性愚蠢，那么这也是亚瑟·比切姆——安妮·比切姆的特点，在喜欢旅行这方面，凯瑟琳像极了她母亲，订购轮船票对她有一种激素作用。想到可以听见马努金念出那个魔术般的字眼“痊愈”，只要有人来收拾行李，她自己则只需在口袋里放上一本笔记本就可以启程了。

1月11日，她用了四五个小时写了《一盏茶》，第二天白日梦见自己痊愈了，收养了一个名叫安东的俄国孩子。后来她断定自己疾病的真正原因不在肺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星期后，她让埃达离开西尔去订车票。就这样，受埃达的怂恿，凯瑟琳1922年1月30日离开了小木屋。

默里立即得知马努金说“我能保证让你痊愈”，那么为什么不马上开始呢？她开始需要15次治疗（一个疗程），每次300法郎，然后在山上休养一段时间，再治疗10次“以免复发”。第一个疗程112英镑，第二个疗程75英镑，她在银行里有103英镑，而编辑们则拿着支票簿等着她的聪明的故事。

她在笔记本中私下承认她虽然感到马努金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却又隐隐约约地觉得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骗子，“又一次证实了我分裂的个性，一切都不一致，一半嘲笑，一半快乐。”然而那天晚上已做了最后决定，凯瑟琳永远离开了小木屋。

《已故上校的女儿》中的角色之。——译注

伦敦一文学刊物。——译注

默里此时又沉浸在另一本荒谬的小说中，不想转移注意力，然而他意识到凯瑟琳希望他去她那儿，于是写信给她，提议自己也去，却被责备了一通：“这就像父亲告诉我说，如果急需，可以随时间他要 50 英镑，这不是彼此深切了解的人做出的姿态。”收到她信的当晚（1922 年 2 月 9 日）他就离开了西尔，因心情过于紧张不安，竟然给了铁路看守整整一个金路易 而不是一个法郎做小费，随身带去了一封写得十分可怜的信，表白自己的爱情，承认一切的过错。

两天以后，埃达回到蒙大拿看管小木屋，看看是否可能找些房客来补偿租金的损失。

默里到达巴黎打断了《苍蝇》的写作。现在人们公认这是她主要的杰作之一，是对战争意义的象征性的看法，它不是匆匆赶就的，从头至尾花了三个星期才写成，也不是杂志上凑数的作品。它发表在《民族》上，像那篇了不起的小作品《蜜月》一样，那是她在巴黎写的——告别了她那轻松的里维埃拉风格。

此时她的书出版了，受到评论界狂喜的称赞，立即再次印刷。《观察者》的评论注意到了死亡主题，说她的处理“在讽刺中包含着温柔，在悲喜剧中包含着庄严”，这使他想起了哈代；《民族》认为《园会》比《幸福》更快乐，使读者相信“生活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地球上是一件好事”。《文学副刊》仍在鸡蛋里挑出了骨头，但是又说结果意义更为宽广，“你可以说其中包含了怜悯”。

同时，默卫为《民族》写了一篇评论《尤利西斯》的文章，这使其作者立即要求同他会面，因为两人都在巴黎。会面由西德尼·西弗安排在 3 月 29 日，几天以后凯瑟琳写信告诉维奥莱特·西弗：

真遗憾星期三西德尼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乔伊斯相当固执，这以前我还不知道他对《尤利西斯》的看法——不知道它与希腊故事的模式有多么相近，不知道绝对必须彻底了解一个人物才能讨论另外一个。我也读过《奥德赛》，对它多少有些了解，但是默里和乔伊斯说的话却让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几乎目瞪口呆，别人绝对不可能照乔伊斯那样去理解《尤利西斯》。听他谈论书的疑难处简直令人恶心，书中包含着暗语，只能在每段话中找到，等等。《问题和解答》这一部分可以从天文学或地质学的观点来读，或——噢，我不知道。他还告诉我们他最近的崇拜者是邓普西。

维奥莱特把这封信寄给温德姆·刘易斯（实际上并非出于善意，因为她知道他蔑视凯瑟琳），还加了一段话：“昨晚乔告诉我们说默里太太似乎比她丈夫更理解他的书，这话准会让她感到惊奇。”

凯瑟琳信中写到的对《尤利西斯》的评论大都是表示厌恶（像维吉尼亚·吴尔夫一样），只有在给布雷特的信中是一个例外：

金路易，法国旧金币，法王路易十五于 1740 年开始发行，相当于 20 法郎。——译注

希腊荷马史诗之一，讲述英雄奥德赛的业绩。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以此故事为模式，讲述主人公布卢姆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天的生活经历。——译注

乔伊斯指的是他在都柏林读大学时的英文教师。——原注

乔伊斯肯定丝毫也不希望人们因为它的粗俗而读它，虽然我承认自己在其中发现了许多“轻松的笑声”，但这是因为（虽然我不赞成他的做法）我的确认为有时玛丽安·布卢姆和布卢姆描写的无与伦比。玛丽安是十足道地的女性，这不容否认，但人们还必须记住她还是劝涅罗珀，也是夜与昼，她还是这个人满为患的地球的形象，布满种籽，不停地旋转着，旋转着。

到处都可以听见对凯瑟琳写的书的赞扬——这也意味着金钱不再是个问题——可以理解凯瑟琳感觉很好，春天来了，但是她把这归功于马努金医生，他精明地给她安排了增加体重的食谱。她给在小木屋的埃达写信说，“我几乎不咳嗽了，体重增加了8磅，风湿症也没有发作……我的声音恢复了正常，现在不吃药了。”

治疗方案中有“山上疗养”，因此决定他们将回到瓦莱——这次不需要蒙大拿那样的高度，主要她的心脏吃不消，他们去伦多恩。埃达能否下山在安格莱特旅馆找两个房间？当然不会再需要她。

太好了，伊莉莎白得知后说，“但是没有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为你张罗，你能去那儿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经过疗养和最后一个疗程，他们可能会去南方，也许再去班达尔，甚至连默里给伊莉莎白写信时也几乎准备相信了：“我开始感到也许可以开始摆脱恐惧了，在隧道的那一头有一个大的真正的光点，我觉得可以告诉你，但绝不会去告诉别人、提到它都会把我吓坏。”埃达此时已清扫完小木屋，她为凯瑟琳的服务终于成为多余的了，于是开始考虑自己找个职业，也许可以在什么地方同朋友合开一个茶室。

6月4日，默里和凯瑟琳去乘火车——但没有搬运夫，一群群的人自己用车子推行李，“15000个普罗旺斯运动员从车上蜂拥而下，”等等。没有卧铺，只有普通的头等车厢，也没有盥洗设备。默里拿出凯瑟琳的钱，把500法郎的钞票当50法郎送了出去；在洛桑丢失了行李票；在西尔遇上了暴风雨；然后又是埃达订的那两个破旧简陋的房间；接着又发现默里丢失了自己唯一的一支钢笔，还把凯瑟琳的小方钟忘在火车上。对于旅馆，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假设它是R.L.斯蒂文森会呆的地方”。然后他们开始轻松下来，考虑将要做的工作。

埃达：

如果你还没有最后决定如何度假——那么听我说。这没有用，我几乎还是像过去一样病得很厉害，我需要你，如果你能来的话，但必须这样：我们要骗一下杰克。杰克从来不知道我要什么，他尽力帮我，但并不能真正帮忙，结果是我所有的精力——每一分精力——都用在杂务上，不能工作……这完全得靠你。我要起草一封信，找个机会发出去，如果你同意，就写信给我，这样做不算错，这是对的，我早就想这么做。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忠心耿耿的人”提供了需要的信件，得知信“恰好达到了希望的效果”，于是放弃了开茶室的计划，准备回到瑞士。直到1953年，默里读了那封给埃达的信以及其他类似的信件以后，才知道与凯瑟琳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中，

布卢姆的妻子。——译注

奥德赛忠实的妻子。——译注

他受到怎样的欺骗。而她早就认定他“专注于自我”“记忆力不好”，可以随意欺骗他而不受惩罚。

她现在对在伦敦的伊莉莎白承认，狂怒的心情又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回到她身上，又说：“我唯一的麻烦是杰克，他应该同我离婚，娶一位真正快乐年轻的人，生孩子，请我做教母。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妻子，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妻子，而他仍然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这使我感到自己是个骗子。”而默里的难处在于她要求他这样相信。

她还要考虑自己的父亲，他又启程前来英格兰，她在巴黎收到他的来信，得知4个姐妹都从他那儿获得同样的生活费用。她3月18日又给他写了回信：

我亲爱的父亲：

读到您的来信，我几乎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有天知道您怎么还能有心绪写信给您不争气的孩子，想到自己忘恩负义的行为我就感到揪心的难过，不明白我怎么会让自己屈服于恐惧和害怕误解的心情。您对于我们大家一直是——现在也是——慷慨的化身，但是，我这么爱您，深切地感到您的敏感和同情，却怎么会去让您痛苦呢？这真不可思议。有时我真希望自从成年以来能够同您彼此更加亲近，而不是那个许多年前同您一起回到新西兰的心地狭窄的女孩子，但是命运作了别的安排……

上帝保佑您，亲爱的
永远爱您的，感恩不尽的孩子
凯丝

她意识到父亲会有的恐惧心理，告诉他自己“不再是开放性的肺结核，不再会传染”，还说8月要去伦敦见他，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他，过去她总觉得这些书不够好，不值得送给父亲，无疑她准备送他一本美国版的《园会》，其中（虽然有些太迟了）她对《陌生人》作了一些慎重的修改，改掉了惠灵顿和奥克兰等地名，否则他会知道“哈蒙德先生”是谁，注意到故事不仅与在港口的事件有关，而且还涉及他1920年1月5日抵达奥克兰当天缔结的第二次婚姻。

旅馆的玻璃游廊全归她一人享用，她开始写作《鸽巢》，本来是克莱蒙·肖特要求的“系列”之一，必须7月1日交稿。她每天工作到中午，喝过茶再工作到吃晚饭，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但是起床过于费事，要铺床，刷衣服，搬开床垫等等，她累得精疲力尽，打字又使她更吃力，因此《鸽巢》除了在小木屋写的那部分外，其他都没保留下来，在伦多恩这种情景下写的东西可能都撕毁了。

埃达6月24日到达——“我不配有一个这样的妻子”——给布雷特的一封信中说——但是她慎重地保持着距离，在这个简陋的旅馆边远的一侧订了一个房间住下。

于是在她抵达几天以后，默里和凯瑟琳又要面对那个今人为难的信念问题，这是他们最为悲哀的一次分离，也几乎是最后一次分离。显然1月份以来她就一直在和奥列加通信（他在中国），开始把他视作可以帮助她达到目的的朋友。她私下订了一个计划，这显然不能告诉默里，但似乎也没有告诉埃达。默里在评论她的《书信集》时，写道：

一种深深的不安控制了凯瑟琳，她确实发现很难工作下去，心中开始迅速转而向往另一个奇迹——获得精神上的控制力量，使她能忽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根本不能享有同感，在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一种使我们俩都痛苦的局面，因而我们同意暂时分离。

他说自己不可能假装相信“神秘主义”对她有任何帮助，因此只好决定让他留在伦多恩，而凯瑟琳由埃达陪同去西尔：“我们同意现在我俩彼此使对方感到沮丧，应该分开生活，直到任何一方找到一种赖以生存的信念。”

伊莉莎白感到非常失望，察觉到事情不妙，被告知搬迁的原因是凯瑟琳“心脏”不好。

伊莉莎白 6 月 29 日的日记写道：“早饭后到凯瑟琳那儿去道别，走后面那条小路，穿过被雨淋湿的草地，同她谈了很久，回来吃午饭。……早上 5 点 30 分赶上凯瑟琳去车站的马车，坐她的车一起去送她。无聊的一天，像星期日一样，整天都无精打采。”

几天以后，凯瑟琳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些话：“今天星期二，自从离开默里以后，我写了一页纸，其他时间似乎在睡觉，这当然开始让我感到旧日的恐惧，害怕我再也不能写作，我得了瞌睡症了，等等。”

然后布雷特来了，在同一家旅馆度过一个月，这让凯瑟琳感到厌倦，因为她总是为布雷特感到遗憾。埃达回忆（两人彼此嫉妒）说，布雷特使凯瑟琳累坏了，总是坐着聊天，弄到很晚，又戴着助听器。但是她的来访促使凯瑟琳完成了最后一个短篇故事，这是她在巴黎时答应写了送给布雷特作礼物的，当时街对面笼中的金丝雀吸引了她的想象力，写好后成为她为一位孤独女人死去的金丝雀唱的挽歌——极端客观真实，一点也不伤感，以新西兰，而不是巴黎为背景——标志着凯瑟琳创作生涯的结束：从《疲倦的罗莎贝尔》至《金丝雀》，不满 14 年；此时她还写了诗歌《受伤的鸟》，像不久后也住在这个旅馆的里尔克一样，她准备承认自己长了翅膀。

虽然她仍挣扎着打字，但不可能再完成《鸽巢》，交稿的期限已过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此时有点钱会带来些安慰，如果是来自父亲作为一种慈爱的姿态就更好了，如果能及时得到这种帮助，凯瑟琳就不用写所有那些杂志故事而因此多少损害了自己最后阶段的声誉，也不用让她去同克莱蒙·肖特这一类需要系列故事的人打交道。伊莉莎白一定得知了她的需要，于是不久有了下面这样的书信往来：

亲爱的凯瑟琳：

一定要让我借给你 100 英镑，本来我想随信寄去，却又唯恐你会把它寄回。如果你愿意的话，等你的书拿到稿费后，可以再把钱还我。如果你像我一样刚刚完成一部书，拿到稿费，而我暂时缺钱用，我一定会让你帮我一把，男人们做这种事很容易，从来不去多想什么，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像亲兄弟一样吗？

非常爱你

伊莉莎白

1922 年 7 月 30 日

亲爱的伊莉莎白：

我们如果能成为男人，成为亲兄弟，那就太好了，我难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一拿到稿费我就把钱还给你，但那要等到秋末，我能借这么久吗？当然，如果此时父亲打开他的钱包的话——但这更可能是一种幻想而已。

从心底里感谢你，最亲爱的表姐。

凯瑟琳

亲爱的凯瑟琳：

你好，你想象得到这样的事吗？——我这个月请来的厨师，我对他寄予所有的希望，居然没来。我们现在没有厨师，我嘴唇疼得厉害，几乎不想说话。

伊莉莎白

亲爱的伊莉莎白：

再次感谢，

听说你的不幸，真难过……我写的故事一点也不好，真遗憾，但是我渴望新事物，新血液——一切崭新的东西。实际上，你把那 100 英镑借给了一位可怕的不顾一切的家伙。

凯瑟琳

因此援助最终还是来自于一位“兄弟”。

那一个月里尔克也常去贝拉旅馆，这地方有一种旧日欧洲的情调，使他感到愉快。他的出版商同他妻子一起来此听《都诺挽歌》，旅馆里客人很少，里尔克一定常常见到这三个英国女人——穿长袍的人戴着助听器，高个子的大脚女人，还有一个瘦削、将死的女人。里尔克假装痛恨英国人，但肯定还是会点头致意。8月7日，凯瑟琳预感到情况不妙，给杰克“心中的你”

写了一封告别信，让他届时去银行取：

最亲爱的杰克：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好几天了，我的心脏很不正常，这不会没有缘故，因此，我不愿意让你无准备就撒手而去，只想试着把我想到的话写下来。我所有的稿件都留给你随意处置，有时间全部过目一下。亲爱的，销毁那些你不要用的，请销毁所有你不想保留的信件。你知道我喜欢整洁，清理一下，让一切都有条有理，好吗？

书当然是你的，钱当然也全是你的，事实上，亲爱的，我把一切都留给你，给今天早上我还吻过的心中的你。无论如何，我们在一起多么幸福我觉得没有别的爱人比我们在这世上活得更快乐的了，无论如何。

永别了，我珍贵的爱人

我永远永远是你的凯瑟琳

8月14日布雷特收到一封电报，凯瑟琳问是否能住在她那儿，她想见索罗皮尔医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要来，连柯特也不能知道。那天凯瑟琳还起草了一份正式遗嘱，两位旅馆职员作证人，遗嘱同给默里的信口径一致，

把金表和金项链给埃达；西班牙披肩给安妮·埃斯苔尔·赖斯；皮大衣给婆母；珍珠戒指给理查；《莎士比亚》给伊莉莎白；所有的书都留给默里，但请他各送一本给沃特·德·拉·马尔、H.M.汤姆林森、索罗皮尔医生、A.R.奥列加、西德尼和维奥莱特·西弗、J.D.弗格森和D.H.劳伦斯；她的写字台给彻迪；绿宝石给珍妮；铜猪给父亲；《圣经》给维拉；意大利梳妆盒和刻花手杖给柯特连斯基。关于她的作品，遗嘱中说：“所有的手稿、日记、文件、信件都留给约翰·M·默里，但希望他尽量少发表，多销毁，他会明白我希望少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立遗嘱的这一天，恰好劳伦斯来到凯瑟琳的出生地，他从澳大利亚去新墨西哥经过此地。自从在卡普里给凯瑟琳写过那封希望她死的信后，两人就再也没有通过信。但是在惠灵顿他心肠软了，买了一张明信片，写了一个字“忆”，请奥特琳夫人转寄。两人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告别姿态，一位在世界的另一头比另一位要更大方些，但是事实上劳伦斯从未收到他的书，默里挑了一本密尔顿——也许其中的一个标题谈到某个失去的东西——是奥特琳给凯瑟琳的，她很珍惜。但是他把寄书的任务交给埃达，而她根本没寄，因为“找不到劳伦斯的地址”，所以劳伦斯从不知道这回事。

杰克从伦多恩旅馆下来，伊莉莎白也来了，来给他们送行。8月16日他们启程去伦敦，决定凯瑟琳住在布雷特家，杰克在隔壁的波里斯·安里普家住。

去枫丹白露

这都是旧日的回忆了 光彩夺目，美妙遥远的幸福回忆。哦，生活怎能如此可怕，我有时看见一堵巨大的黑石墙，在一个地方发光 也许是死后 微笑 顽强的愿望。

凯瑟琳

1919 年 11 月 7 日

1910 年在莫斯科，一位名叫乔治·伊万诺维奇·格吉夫的高加索希腊人创建了他的人类协调发展学院，做一种改变人性的尝试，在那个阶段这个高级思维的学校与一个芭蕾舞剧团相差无几。战争期间，P.D. 奥斯本斯基，一位研究过数学和神秘学说的记者成为他的追随者和主要信徒。1921 年 学院逃离俄国革命，路经第比利斯、君士坦丁堡和德累斯顿 奥斯本斯基来到伦敦，给一些人讲授格吉夫的学说，这些人包括 A.R. 奥列加、小说家 J.D. 贝福特、精神病医生 J.C. 扬以及各种各样找寻新方法的人；其中还有罗瑟米尔夫人，她在美国读过奥斯本斯基的《第三原则》，对此着了迷。她同其他支持者提供金钱，希望让格吉夫和他的学院搬到英格兰来，但因当时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而受阻。因此最后学院在法国枫丹白露附近安顿下来。

“格吉夫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呢？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常在信里以无比崇敬的口吻谈到他。1915 年奥斯本斯基在圣彼得堡找到他时，发现自己在一家小咖啡馆见到的是一位东方相貌的人，黑色胡髭，锐利的双眼，礼帽，丝绒领黑色大衣，像一个不大会假扮外表的人 模样介于地毯掮客和间谍之间。他俄语讲得很糟，带着浓重的高加索口音，听上去根本不适于表达哲学思想，但他显然对地毯非常在行（他靠卖地毯赚了不少外快，精明地掌握了织补艺术）。奥斯本斯基猜测他的童年是在小亚细亚游牧民族中度过的，处于近似于《圣经》传说般的环境中，周围是神秘的人物，羊群，充满了神话故事传说和古老传统的气氛。

他常常谈到在亚洲一些地方的村居生活，那儿冬天的夜晚整个村落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小房子里，老老少少一起织一张地毯，随着唱歌跳舞的节奏缝织。关于学校他谈得很少，他可能今天说是这样，明天说的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关于他，人们什么都不能肯定”。他提到过西藏领主，阿索斯山，波斯和布哈拉的神秘主义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徒，但都“非常不肯定。”

他的信念之一是：文明在发展人的某些才能的同时，却使另一些才能失去平衡，因此任务在于将其纠正，平衡他称为“中心”的东西 思考和形成的智力中心，感觉、主管喜欢和厌恶的情感中心以及行动和创造的体力中心。中心得到平衡的人是一个四维的人，像耶稣一样，具有超凡的能力。人们可能会说 D.H. 劳伦斯需要将他的中心往某方向平衡一下，而米德尔顿·默

罗瑟米尔（1868～1940），英国报业大王，先后拥有及创办《新闻晚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星期日画刊》等报刊。 译注·362·

位于希腊北部，希腊正教教会所在地，这里共有 20 所隐修院，该地区包括哈尔基季半岛东端的三个海岬。

译注

俄国地名，乌兹别克的首府。 译注

里则要向另一方向平衡一下。

获得和谐发展的方法包括所谓“练习”，无论是在第比利斯、君士坦丁堡或是德累斯顿，格吉夫的学生都必须长久地伸出双臂走路；跳舞时随着乐曲结束立即停下来，并保持原来的姿态；或半夜三更起床拼命工作；喜欢吃糖的学生会让他对甜味吃个够；或烟瘾重的人则被命令不准吸烟，等等。

奥列加一直说弗洛伊德是当代伟大的分析家，再需要的是一位伟大的综合家，似乎此人就是格吉夫，伦敦的团体在沃里克花园 28 号的一个诡辩神学派的教室聚会，那儿离上肯辛顿街不远。格吉夫自己也到了英格兰，却发现不能留下来。凯瑟琳一定是从奥列加那儿直接听说他的（奥列加已经决定加入学院）。

1922 年 8 月 17 日，凯瑟琳到达伦敦，默里只知道凄凄惨惨地跟随其后。她同布雷特住在汉姆斯特，默里暂时住在隔壁。第二天早上她去见索罗皮尔医生，“同他一起巡视了一遍战场”，他认为她看上去好得令人吃惊，说她心脏没有毛病，心脏的状况似乎同左肺的状况有关。总而言之，“我散步，四处动动，锻炼得越多越好”，这是她写信告诉父亲的话，他刚从新西兰来，彻迪和珍妮会来伦敦同他会面，她很快也见到了他。“他可以活好几百岁”，她告诉伊莉莎白，“比过去更红，更胖，至于他的‘幽默故事’，简直不堪设想”。

她告诉西弗夫妇和她的“流浪团体”，她自己将同布雷特一起呆三个月，在一个伦敦放射专家那儿接受马努金式治疗。她充满深情地给奥特琳写信

渴望见她。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放烟雾弹，虽然伊莉莎白和默里都以为她将去巴黎找马努金，但是默里说他很惊讶她能如此迅速地加入奥列加和贝福特也是其中一员的奥斯本斯基团体。

现在她让柯特连斯基成了自己的秘密朋友，不久就告诉他自己安排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那样默里可以分享维安·洛克-艾利斯在苏塞克斯的别墅，可以“在那儿永远永远地住下去”。他的确很快就去了那儿，然后她又请来了奥列加，他 8 月 30 日来到庞德街，《日记》中不久以后就记下了他们的谈话：“我开始告诉他我非常非常不满意那种认为生活必须是比我们能想象的要差一些的观念……”，几乎她认识的每个人在青年时代过去以后“就不再成长”，在假设的成熟之下是“潜在的深深的懊悔”。她知道并不一定非要如此，谁知道呢？“让我们举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为例，自从记事以来，她就过着一种非常典型的虚假生活，然而，在这一生中，也有那转瞬即逝的时刻，她感到别的可能性。”这是她对奥列加说的话，后者是她 1912 年的个人评论家。她又见过他两回；还接受索罗皮尔医生的建议，去赴所有的约会，同父亲和姐妹们一起喝茶；接受韦布斯特医生的光会诊，同爱德华·加纳特共进午餐；请姐妹们来喝茶，“9 月 14 日，同爸爸吃午饭，去见玛丽安·罗迪克，在沃里克花园听课”。

肯尼思·沃克医生生动地描绘过自己去那幢房子拜访的情景：在门厅内，沃克医生先听见一位“有点轻松幽默感”的俄国妇女点他的名字，然后他进入一间同成千上万其他房间相似的教室，一排排矮小不舒服的椅子面对着黑板和讲台，一玻璃瓶水，一个掸帚，一些粉笔，墙上有一小幅画，窗台上一只花瓶内插着贝壳做的樱花。人们三三两两地进来，低声交谈着，大部分是

中年人，年轻人很少。

一个剪短发，戴眼镜，身体结实的男人走到讲台前，坐了下来，看上去像个科学家或律师。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笔记，说道：“好吧”，没作别的介绍就开始讲课了。

沃克医生说那人误解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永久的自我，一位主人“我”控制了思想和行动，但这是一种幻觉，代替单个的“我”的是无数个“我”，其中许多说着互相矛盾的事。然后奥斯本斯基起身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用交叉的线条将其分开，直到它看上去像显微镜下一只苍蝇的眼睛，他在每一小块地方都写上一个“我”，然后说，“这是一幅人的画像”。

有人问一个“我”能持续多久，他说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每一思绪、每一愿望、每一感觉都说“我”，然后再消失在背景里；糟糕的是这些转瞬即逝的“我”并不互相认识。有人问难道没有一个是相关的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关的——“但我们通常不知道它们的联系”。

奥斯本斯基然后详述了格吉夫的方法，一个人可以用此方法检查他的本性，发现自我，最终获得目前得不到的力量，而目前他是一架机器。当“一位外貌非常聪敏的夫人”问到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这样的艺术家是否精神自由时，他回答说：“他们也是机器，无疑是很好的机器，但还是机器……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都是机械的，客观的。”讲课持续了一个小时，使沃克确信奥斯本斯基“很诚实，不会装假”。

星期天听过这样描述她所有的“我”以后，凯瑟琳借口太累，推辞了在牛津广场同奥特琳的会面。但是那天她的确出去了——去剑桥广场西弗夫妇家吃午饭，后来在日记中对此只记了一笔，“同西德尼和维奥莱特共进午餐，讨厌”。

实际上事情经过很可怕：通过通信和交谈，西弗夫妇非常清楚温德姆·刘易斯（他此时正给维奥莱特画像）对他们的年轻朋友只有蔑视，但凯瑟琳却一直很佩服他的画，一直想见他，她肯定是过于轻率地谈起了自己最念念不忘的想法，而他则用某种方式攻击她的轻信，或者如几年以后默里在给维奥莱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有意惹火她，她感到西德尼和你没有袒护她，而你们本该那么做。后来好几天她都气得发抖”（他一定是从布雷特那儿听说的，或自己猜测的，当时他不在伦敦）。凯瑟琳显然给维奥莱特·西弗寄了一封短简谈到这次会面，维奥莱特将信转给刘易斯，结果是这样的：

亲爱的维奥莱特：

收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简。你并没有那种巴黎学院能提供的先知先见的能力，怎么会预见到那位受制于地中海通灵巫师，有名的新西兰杂志故事作家同我的会面会出现这种十分可笑的结局呢？我很高兴不受她的打扰，虽然我希望她不要过于耿耿于怀。我明天下午3点或晚些时候等你来。

温德姆·刘易斯

她肯定也给刘易斯寄去了同样的抗议，他告诉西德尼·西弗说，仔细回想一下这些半喜剧性的经过，他觉得是凯瑟琳自己寻衅吵架，而他“只是过于认真了些”：

对于我来说，她不过是个写了两本短篇小说集的作家，受到广告的吹捧，

被称赞得过了分，而我一直觉得这两本书庸俗、乏味、讨厌，既然世上有这么多风趣、迷人、漂亮的人，原则上，我总是尽量避开那些摆弄我所蔑视之物的作家、画家或诸如此类的家伙。

这次经历标志着凯丝·比切姆与同时代杰出艺术家关系的结束，这是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生活的一个方面，以戈蒂叶-布尔沙卡开始，其中包括劳伦斯，以温德姆·刘易斯告终。

她在伦敦只多呆了两个星期，9月30日写信给父亲解释为什么预支了下个月的生活费。10月2日，由埃达陪同，她最后一次渡过了海峡，在西莱特旅馆订了房间。1918年她们曾在这个旅馆坐着等轰炸结束。到达那儿后，她还没忘记给理查·默里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暂时告别信”。

我希望你一切顺利，我亲爱的长大成人的弟弟，哪怕龙来到你身边，也别忘了，总而言之他们很可能是看守宝藏的最好的龙。

她还要给西弗太太写信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辞而别，写信给刘易斯，“难道见到你竟使她如此不知所措，竟然永远离开这个国家了吗？”

就这样凯瑟琳告别了伦敦和她的流浪团体，让别人以为她是回到马努金那儿去继续治疗，实际上她还有别的目的。在《新时代》办事处，奥列加将去格吉夫那儿的消息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忠心耿耿的爱丽丝·马克斯觉得这似乎是世界的末日，他所能对她作出的解释只是“我去寻找上帝”。他的最后一期刊物是9月28日出版的，10月14日他到达巴黎，那天恰好是凯瑟琳34岁生日。

从西莱特旅馆寄出的两三封信还有着凯瑟琳通常的机智快活，但是10月14日以后一切都变了。那天她意识到这是她最后一个生日，但仍然竭力否认这个事实。她写了一则很长的日记，从日记本上撕下来，打算将其寄给默里：她将放弃自从1908年以来一直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她解释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自从来到巴黎后，她的病情没有好转，她不能行走，只能挪动，已成为一个“完全病入膏肓的人”。写作能使她平静下来（谢天谢地还能写作！），但她同样“非常害怕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我是否相信医药呢？不，绝不，只相信科学？不，绝不，我认为一个人不是牛，却认为可以像牛那样治好病，这种想法真幼稚可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和我有同感的人，我听说了格吉夫，他不但与我有同感，似乎还知道得更多，为什么还要犹豫呢？……冒险，不怕冒险！不再去管别人的意见，别人的看法，为你做世上最艰难的事，为自己行动，面对真实。

我认为健康的意义在于有能力过一种丰富成熟，朝气蓬勃的生活，密切接触我热爱的事物。世界以及世上的一切，海洋，太阳，我们所说的世上的一切。我要进入这个世界，成为它的一部分，在其中生活，向它学习，丢弃所有表面和后天获得的东西，成为一个自觉的，直接的人。

于是我开始工作，我如此盼望生活，用双手、感情和头脑生活。我想要一个花园，一所小房子，草、动物、书、画和音乐。从这一切之中，为了表

达这一切，我想要写作（虽然可以写马车夫，这也没关系）。

但是温暖、热切、活的生活——扎根于生活——去学，去渴望知道，去感受、思想、行动，这是我想要的，缺一不可。这是我必须尝试的。她写了这些，想“冒险把它寄给杰克”，他必须明白她多么爱他。

这听上去过于紧张认真，但我已经过了一番挣扎，不再是那样的了。我感到幸福——内心深处，希望你也幸福。

星期一我要去枫丹白露，星期二晚上或星期三早上回来，一切都好。

参加了格吉夫团体的伦敦人扬医生今天来看我，告诉我那儿的生活情形，听上去好极了，很简单，正是人们需要的。

最终她还是没“冒险将它寄给杰克”，她把它留在文件中，让他自己以后去发现。这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她的写作改变了调子，她写道：

的确，契诃夫没有做到，但是契诃夫死了。让我们诚实无欺，从契诃夫大的信件中我们对他的了解多少？仅止于此吗？当然不，难道你会认为他度过盼望的一生而对此一字不提吗？那么读他最后的书信吧，他放弃了希望，如果那些书信除去感伤情绪，就太糟糕了。契诃夫不存在了，疾病吞没了他。

她自己以后写的信也可用同样的话来形容，机智、欢快消失了。

10月16日，凯瑟琳去了枫丹白露，表面上是去过一个晚上，其实却打算留下来。

在艾汶的巴西斯修道院是一所旧的修道院，位于枫丹白露森林边上被人遗忘的美丽猎园中，德雷福斯——辩护律师的妻子将其赠送给格吉夫，连带屋内所有的绘画，包括一些罗莎·博纳尔的作品。但是园地已经荒芜了，车道长满了草，院内的喷水池也不再喷水了。由扬医生和一些俄国人组成的先头部队已先去了，奥斯本斯基太太替他们做饭，开始清扫房屋。等大队人马来到时，他们已清理了道路上的野草，洗干净了无数块玻璃窗。后来的人中有奥列加，他同扬医生在仆人的住处合用一间房子。最好的房间留给客人和格吉夫自己，别墅的这一部分很快就被那些不住在此的人称为“里兹饭店”（罗瑟米尔夫人在“里兹”呆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排小房子里住着格吉夫的母亲和已婚的妹妹，弟弟德米特里和他的一家，斯杰恩维尔医生和太太，德·舒尔曼先生和太太。

凯瑟琳去时，那儿已有将近60人居住，但是还需花费很多精力修整装饰、饲养牛羊、家禽和猪，而且最主要的工作是建一所主人所熟悉的那种东方式聚会大厅。格吉夫自己双手极其能干，根据他的指点，人们将一个废弃的石头房子临时建成俄国式浴室，而格吉夫本人承担了大部分的砌砖工作。男人们劳动，女人则制作服装，以备锻炼和公开表演以及跳舞时穿着。格吉夫裁剪技术非常高明，女人们只需缝制，根据他的设计剪蜡纸，照他的示范印染花布。

德雷福斯（1859～1935），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1894年，被法国军事当局诬为叛国者，判为终身苦役，当时许多著名人物曾为其辩护，后以宣告无罪而释放。 译注

罗莎·博纳尔（1822～1899），法国女画家，雕塑家，《马集》一画是她的代表作。 译注
巴黎最豪华的饭店。 译注

他们弄到了一个战时飞机库的框架，将它奇迹般地竖立起来，内外都钉着粗木板条，板条中间塞满落叶，然后整个棚架都覆盖着希伯莱人制造砖头的材料，一种泥和稻草的混合物，四面墙壁至一定高度巧妙地装配着旧的黄瓜架，玻璃涂着高加索彩色花纹，坚硬的泥土地面先用炉火烘干，再铺上草席，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待着12月从布哈拉和巴鲁齐斯但运来63张地毯和仪式所需的一些皮挂毯。

房子建成后像一个伊斯兰帐篷，里面有东方乐器和鼓，在另一头的土台子前有一个灯光香水喷泉，墙四周无数的板条上用某种中东文字刻写着东方格言：“这儿工作是目的，不是手段”，等等。进口处微微高出地面的是一个装饰性的壁龛，四周挂着大红的帷幕——是格吉夫自己的座位，具有一种圣地的气氛。

凯瑟琳写信告诉默里，“新的生存方式并不容易……我还有很多事未做就将死去”，唯一能做的就是战胜死亡——几乎可以说是追求它——“然后全力以赴准备再生”。至于他，难道不能“离生长的大地更近一些吗？”他应该弄些园艺，养些动物。同沙利文下棋只会助长他“已经过分发达的智力中心”。是的，她的确关心劳伦斯，想在春天再见到他，但她现在不想写任何书了。

她后来告诉默里她已问过格吉夫是否能让她留下来，他已同意让她呆两个星期，“接受观察”。如果让她留下来，她就真的得救了。自从《苍蝇》以后，她只写过零星片断，“我因生活过于贫乏而要死了”。埃达目前暂时住在西莱特旅馆，她当然感到“非常悲惨”。

埃达在巴黎哀悼她的损失，守着“一个完全空虚的世界”，“的确，我已同凯瑟琳说过永别了”，她知道不能再见到凯瑟琳了，开始寻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后来打听到某个农庄上有工作可做。

凯瑟琳对她说：“那地方太偏僻了，你只会感到沮丧乏味……但是你现在的确认为我们的关系完全错了吗？……如果你真如你想象的那样爱过，现在怎么会因为我不再是孤立无援的而如此悲伤呢？试着装装样子吧。”

凯瑟琳把她的生活描绘给默里听：7点半起床，用冰冷的水洗脸，坐下吃一顿丰盛的早餐——“铺床，收拾房间”，白天在花园里，晚饭后有音乐，“长鼓，圆鼓和钢琴——跳舞或者表演各种古怪的舞蹈练习”。睡觉时，扬医生来替她封好炉火，她则替他缝补裤子。

他不能认为他俩已渐渐分离！她只是尝试把自己过去一直有的想法付诸实践，体验另一种“更为真实”的生存。

格吉夫先生希望我下午去厨房“观看”。我在角落里有一张椅子，厨房很大，有6个帮手，领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太太四处走动，俨然像个女皇。她极其美丽，穿一件旧雨衣。妮娜是位高个子姑娘，身穿黑色围裙——也很可爱——在研钵里捣碎东西。另一位厨师在桌上切东西，碰撞着碗碟，一边唱着歌，还有一个跑进跑出端碗碟。有人清洗锅子——狗躺在地上吠叫，害怕清扫壁炉……格吉夫先生大步走进来，抓起一把切碎的卷心菜吃下去……一切都是如此。“一张一弛”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形容词。

她告诉默里怎么在车间度过一个早上，打铁炉生着火，格吉夫先生在刨木头，舒尔曼先生在做车轮。牛买来了后，格吉夫先生就要为她在牛棚里做一张高躺椅，她可以坐在那儿吸入它们的气息，大家已经开始称它们为“默里太太的母牛”，所以它将留下来。

这一切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凯丝·比切姆无论有时似乎是别的什么，但永远是一个比切姆，一直渴望过一种群居的，不用思想的积极生活，像她自己那个大家庭一样；戴尔祖母在厨房为满架子的瓶装果酱忙碌，贝尔姨妈谈论着肩带，帕特·西安给马装上鞍子，或搬进牛奶或剥去鸭头。那种做一个“作家”同默里——他对此除了从她那了解的以外几乎一无所知——一起度过的乏味生活实在太过分，而死亡的迫近使她更急需重获一种记忆中卡罗里的生活。

40年前人们通常说格吉夫是“害死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人”，因为那时人们读到她在冬天将至时如何感到寒冷，在厨房里干活，削萝卜，剥葱头等，现在则很易明白这些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在修道院结识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奥尔佳·伊万诺夫娜（她后来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结婚）曾描绘过默里太太到达时的情景：“她站在我们大饭厅的门口，用锐利的黑眼睛看着大家，双眼燃烧着对新印象的渴望。她想同所有的学生一起坐下进餐，但别人把她喊到另一个饭厅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亲密的友谊。赖特太太在一篇充满对凯瑟琳亲密了解的文章中说道：“格吉夫所做的最为人道的事情之一就是吸收她进入学院。”

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默里太太没有多久好活了；那时学院还没正式开办，如果格吉夫只思考自己的利益，就不大可能冒险毁坏声誉——事实的确如此——在学院成立的第一年就让一位作家死在那儿；再说她也并不是像罗瑟米尔夫人（她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希望，离开了）那样是潜在的基金来源。

至于格吉夫的学说，则基本与此无关，它们或者过于幼稚，或者过于陈旧，只适合于没读过什么书的人，又没有什么道德内容，他的“了解你自己”几乎算不上现代希腊语；他的“平衡中心”的概念来自于那种只会制作坚实板凳，却不大可能推翻三位一体的人。但是在凯瑟琳最后竭尽全力去发现“自我”的时候，他一直是她亲切上直的朋友，他告诉她：“不要思想，不要写作，……再次用你的身体生活。”

他不是骗子，他能砌墙，刨木头，裁剪衣服，印制蜡纸花样，设计“圣地”所有的装饰，修补东方地毯，在厨房抓起一把卷心菜，这种人不是等闲之辈。

他靠自己的工作养活一大家人，但从未“发财”，作为一个父亲，他代表了凯丝·比切姆从不知道的一切。他在自己身上很少花钱，对金钱完全没有兴趣，除了把它视作进行工作的手段，钱倒进他的口袋，立刻又倒出来。他总是像土侯一样赠送礼物，有时还为那些想来看他，却没有钱的人支付旅途开销。

11月中旬，格吉夫让凯瑟琳搬进工人住宅的一个房间，“简单狭小”，她在里面感到很冷，写信给埃达说房间“地板光秃秃的，矮小的桌上放着水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美国建筑师，建筑学家，他主持设计的日本东京帝国饭店、美国匹兹堡“落泉”别墅、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等，皆颇获国际建筑界好评。 译注

基督教的主旨，意谓上帝本体为一，但又是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 译注

罐和脸盆等等”。然而除夕写的一封信则说她在那儿居住的整个期间白天从不需要呆在床上，这让人惊奇。她告诉默里：“只有在接到埃达来信时我才会想到她，可怜的埃达！我为她感到遗憾。”

她也为默里感到难过，注定永远要当“一位作家”，只是在书房内进进出出，“你难道没有厌倦关上那扇门，坐在那张书桌前吗？”她问他，不知道桌上是否连花也没有。

她确实知道有两个人会理解这个地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劳伦斯和E.M.福斯特，但是她说劳伦斯的“骄傲”会使他退缩不前。她自己不再是“喜欢东方地毯的小欧洲人”，西方现在如此贫困散乱。但是默里惧怕任何东方的事物，对吗？（回信中他告诉她自己目前正醉心于印度的瑜珈，因为他现在同一位名叫邓宁的英国神秘主义者来往密切。）

早在12月凯瑟琳就告诉默里她情愿到春天才同他相会，此时格吉夫已替她装修好了牛棚，她可以舒适地躺在那儿呼吸牛的气息，这对肺有好处，她常常登上几级台阶，那儿有她专用的铺着地毯的长躺椅，舒尔曼先生根据她的爱好用花朵、马、动物和蝴蝶等图案装饰四壁和天花板，这些图案有着大家熟悉的面孔（奥列加是一只大象）。她每天去那儿呆几个小时，到夜晚可以听见下面挤奶的叮咚声。根据主人的旨意，她每天甚至还喝下一些刚挤出的鲜牛奶。他又让她回到了自己舒适的房间里。

所有这些都是在对待一位濒临死亡的年轻女人的好意，凯瑟琳很感谢舒尔曼先生（他是契诃夫遗孀的一位朋友）用他精致的艺术给她带来了快乐。“他穿着像一个非常寒伧的看林人，我几乎像喜欢他的妻子那样喜欢他”。

圣诞节将临，凯瑟琳改变了她的外貌，“我不再留刘海——看上去很怪”，在节礼日她给默里写信说，“你看，亲爱的，问题总是：‘我是谁’，在这个问题未得到回答之前，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指导自己去做别的什么事情。‘是否有个我存在呢？’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问题可单单靠头脑来解决。的确，如果我只能对上帝有一个请求，那么这个请求应该是：我要求真实。”

在这些日子里，凯瑟琳和奥列加天天相见，两年后他发表的作品《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谈话》很令人失望，他不是好记者，人们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更别说什么新观念。他使用了柏拉图式的对话形式，假设是她的语言的话听上去却更像他自己的声产。凯瑟琳宣称最伟大的文学如果没有与其他艺术相对称的目的，也“不过是文学而已”，哪怕她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写作，也总还会有缺憾，因为“文学不够”——这是她几乎从未放弃过的说法。然后文章又讲述到有一天她请他去，因为有要事相告，他进她的房间，看见她“满脸放光，似乎刚朝圣回来”。她说已找到了自己的观念，她感到了过去从未感到的东西，明白了过去从未明白过的东西。

她说自己有了全新的对待生活和文学的态度，打算将来“把平常的美德描写得引人入胜，就如人们通常描写罪恶那样”，她将展示美好事物的机智、惊险和引人入胜，暴露罪恶的平庸、乏味、沉闷和枯燥。过去她一直像一架照相机——一架有选择性的照相机，但却没有创造原则，等等。奥列加说“她去世前的几小时我见到她，她仍然神采飞扬地谈到新的态度。”

另一女士的文章则回忆道：

我们两人看着人，心情轻松平静。

“你以什么为生？”

“我是个作家。”

“你写戏剧吗？”

“不。”听上去她很遗憾不写戏剧。

“你写悲剧，小说，传奇吗？”我追问道，因为看上去她应该写这些。

“不，”她说，神情更为不安；“只有短篇小说，全是短篇小说。”

后来她告诉我当时她感到非常伤心，情愿付出一切代价，如果对那些“大”事哪怕至少能有一个肯定回答。

还有一个立陶宛小姑娘照顾默里太太，名叫阿德拉，那时她还不会说英语，她俩只能用简单的法语交谈。后来阿德拉讲述了凯瑟琳怎么“带着笔记本”进牛棚，她还说，在12月25日为英国成员举行的圣诞晚会上，凯瑟琳用一种英语方言朗诵了几个人物速写。

圣诞前夕和除夕都是星期天 在伍德小姐公寓学会了好习惯的人总在这一天写信。前一个星期天凯瑟琳给埃达描述了为1月13日俄国新年所作的准备，她还附寄了100法郎，说自己已没有了“金钱情结”，信末签名“爱你的K.M.”。

大年夜，奥尔佳·伊万诺夫娜感到她的朋友“出了什么事”，凯瑟琳谈到要抛弃“旧的情感、习惯和愿望”非常困难，需要确知自己“仍然走在正路上”，她说要请默里先生来看她。

然后那天她写了最后的几封信，签上不同的名字，用铅笔匆匆写就的简短请默里8号或9号来，作为格吉夫的客人呆一星期，参加教学楼的启用仪式；然后是写给表姐伊莉莎白的信，附寄去一张还给她的100英镑的支票，凯瑟琳说自从10月以来她未写一个字，打算等到春天（“我像笼中生长的鸟儿一样，对我的小故事感到厌倦”），但是她又说道：“别了，我最亲爱的表姐，我不再会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将永远记住你的每一细微小事，爱你的凯瑟琳。”给彻迪和珍妮的信只开了个头，却没有写完。

然后她愉快地，充满深情地给回到新西兰的父亲写信，描述了自己高居于牛之上的画廊（“我觉得自己看上去一定像一个女父亲，高高在上”），说她至少要在那儿呆6个月，杰克似乎很快乐。她很遗憾自己没有希望在英格兰安居，“安居下来的想法在我就像对于祖父一样，只是我被迫去那儿，而他是自愿的”。这可能是她最后一封信，结尾说道：“新年已来了，我必须离开炉火上床睡觉，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父亲，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再见，永远是您忠心的孩子，凯丝。”

杰克将于1月9日午饭后到达，默里太太为了他的到来特地把头发刘海梳下来，事先还询问过奥尔佳这样做是否很傻。

默里见到她时也感到“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她房间里谈话，她似乎“像一个因爱情而改变的人，完全信赖爱情的人”。她没有试图为学院辩护，只是安静地谈到自己的感情，说也许她已得到了所有该得到的一切，可能很快就将死去。

奥尔佳在教学楼见到他俩，那儿还没有完全装修好，让人感到有些不自在。她同凯瑟琳坐在地毯上，妇女们在玻璃上绘画，使凯瑟琳感到高兴的是

杰克也拿起一支画笔，同大家一起工作，“她很高兴默里对大家都亲切友好。”

晚饭后大家照常集中在起居室练习，凯瑟琳在她最喜爱的炉旁的老地方，奥尔佳走过去，但她似乎冷漠不耐烦。“我想听音乐，”她说，“他们为什么还不开始？”她苍白，古怪，“对我非常疏远”。舞蹈完毕后，奥尔佳同她道别，回到教学楼，心中有些疑惑不解。

事情发生时阿德拉在近旁，凯瑟琳同默里一起回自己房间，忘了所有的告诫，像一个健康人一样跑在前面，不知怎么打开了闸口，在楼梯顶上时，她开始咳嗽，转身面对默里，鲜血从她嘴里涌出来，可怜的凯丝还从没见过这种事，她勉强对默里说“我想 我要死了”。他扶她上床，跑下楼去找斯杰思维尔医生，在楼下碰见阿德拉，用手指着他们的房门。

阿德拉跑上楼梯，默里苍白的脸色已使她预感到事情不妙，她发现凯瑟琳坐在床上，完全清楚自己的状况，鲜血从她嘴里喷涌出来，阿德拉抓起一块手巾，凯瑟琳痉挛地把它按在唇上，眼睛盯着门口等着默里。两个医生同他一起到来，他们当着凯瑟琳的面把默里推出房间，阿德拉回到自己的房里去哭泣。

等奥列加把奥尔佳·伊万诺夫娜从教学楼喊来时，医生们上“用热水袋作些无望的措施”，但凯瑟琳已死了。

埃达第二天来，住在凯瑟琳的房间里，开始清理她的东西，拿了金表和金项链，知道是留给自己的。第二天在一个小教堂里，她用那块本来准备给安妮·埃斯苔尔·赖斯的色彩鲜明的西班牙黑丝绸披巾盖在凯瑟琳白色的棺材上，遮掩了它的寒伧。

彻迪、珍妮和布雷特及时赶来参加了星期五的葬礼，一些姓名不明的“年轻文学家”也从伦敦来了，他们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儿谈论凯瑟琳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埃达起身叫他们走开。没有什么鲜花，但是布雷特在棺材前放了一些山谷的百合。

两匹黑马拉着灵柩从枫丹白露的新教教堂出发，后面跟着长长一列慢慢行进的车辆，上面坐着格吉夫和他的学生，前往艾汶公墓。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长而曲折的路途，埃达下车步行。凯瑟琳手上仍戴着弗丽达的戒指，被安放在弟弟躺卧的法国的泥土中。

默里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没有往凯瑟琳的棺材上洒些东西，埃达碰碰他的手臂，“但他猛地缩了回去”。有人建议用披巾，但那是给安妮的，因此埃达扔进了一些自己带来的金盏花。人们回到修道院，悲伤使第二天的新年庆祝也黯然失色。客人们也各自回家了。

“是的，我们生活中失去了重要的东西”，劳伦斯从新墨西哥给默里写信说道：“我们在惠灵顿时想到了她，奥特琳是否把我从那儿寄出的明信片转交给她了呢？我总是感到内心深处与她相联，现在这个联系断了，我感到害怕……回到英格兰后，我们将再次相聚，这4年在外的历程领略够了野蛮。”

E.M.福斯特写信给默里说：“你的话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从未想过她会想到我。死亡使我感兴趣，不止一个原因，我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回忆有关，我感到悲伤，间接而非直接的痛苦，这令人迷惘。”

坟墓上覆盖着一块大石板，用作墓志铭的是凯瑟琳喜欢的霍特斯巴的一

段话。字体是理查·默里设计的：“凯瑟琳·默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之妻，1888~1923。但是我告诉你，傻瓜大人，我们从危险这刺丛中，折下了安全这朵鲜花。”

后 事

忘了，忘了吧，抹去了一切，遮盖了一切——白雪说，那是很久以前，再也不能重现，再也不能折磨你，一切都杳无痕迹……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全了，隐藏起来了，得到安宁——自由了。

《日记》
1921 年

在 1923 年的新年庆典上，哈罗德·比切姆被封为爵士，以表彰他在新西兰自治领金融方面的贡献。接着传来他那有名的女儿去世的消息，几个星期以后，他公开承认商业对艺术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 月 7 日的《自治领》报说“昨天哈罗德·比切姆爵士捐赠一笔价值 5000 至 6000 英镑的地产，以赞助创建惠灵顿国家美术画廊。”那是位于市内费茨霍伯特区的房子，是凯瑟琳在新西兰最后一个家，也是她最后一个真正的家。在给内务部长的信中，哈罗德爵士说他原来打算把它留待自己死后遗赠，“但是，最近我决定活着时就这样做。”他做此决定时，心中似乎确实想到了凯瑟琳，信中还提到他希望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建立一种对“最好最真实形式”的艺术的热爱，几个月以后，他的合伙人沃特·纳森去世了，伯拉廷公司卖了 15 万英镑，他后来给了特恩比尔图书馆 200 英镑，让它能购买她著作的第一版本。他共给过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2600 英镑生活费，她自己的不动产，除了个人财产外，共计 232 英镑。

葬礼以后，默里和埃达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英格兰。默里不久就邀请埃达去苏塞克斯帮助他整理凯瑟琳的文件，给早期的手稿注明日期。他在给奥特琳的回信中写道：“现在我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她必须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让人们承认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具有最美好的灵魂。”因为布雷特对埃达参与这项工作非常不满，默里为埃达作了有力的辩护。实际上布雷特希望凯瑟琳去世后自己能嫁给默里，而早在 2 月 1 日，他就不得不告诉她必须立即打消这个念头。布雷特自己各方面都已感到非常沮丧，不能忍受看见这个“大海豚一样的女人”来处理凯瑟琳的东西，把她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她给默里寄去一封信，他的回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布雷特：

收到你的来信，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它，不喜欢你说的那些影射埃达的话。你不该这样，这不值得……你的信完全错了，有些含沙射影的话令人难忍，你没有权力说“埃达折磨凯瑟琳”，你以为自己就从来没有使凯瑟琳痛苦吗？或者我自己，因为同样的原因？“她那样不敏感”，真的吗？如果你没见到，就不能这样说，你还要等待很久……相信我，你对埃达的态度必须完全改变，真正改变，连根拔掉，再重新种植，然后才会怀有善意。这种简单地履行职责，纠正你与一位像你一样热爱忠于凯瑟琳的同胞的关系，维吉尼亚的同情或任何别的事情怎能与之相比呢？为什么要对她采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道地中学生的派头？真的，你想如果她真是那样，凯瑟琳会依赖她 20 年吗？

默里并不常常用这种激动的语气写信，实际上这种语气流露了他自己完

全失去平衡的心情。默里绝望情绪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他忘了支付凯瑟琳葬礼的费用，以至她死后仍不能停止流浪。1929年，一新西兰崇拜者发现她的墓并不在永久地带，而被移到了可以再次使用的贫民墓地，于是通知了哈罗德·比切姆，他责令英国女婿查理·伦肖去艾泣处理这件事，坟墓再次迁移。今天离此一两米之遥一个醒目的地方安息着格吉夫和他的家人，因此有朋友近在身旁。

1923年默里出版了《鸽巢和其他故事》，接着是《诗集》，然后是《幼稚的故事》，1927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日记》的初版，这本《日记》30年来一直使凯瑟琳保持完美的形象，1930年的《书信集》在编辑时也出于需要加以修饰，删去了许多对朋友和作家同行不客气的评论，因此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凯瑟琳的形象符合默里心中“十全十美”的凯瑟琳，而不符合比切姆的实质。在英国，对它的称赞渐渐变为尴尬，人们感到默里利用了亡妻的工作，而在法国引起的却是近似于狂热的崇拜。

同时，默里创办了《兄弟》杂志，拥有近15000名读者，但是因为在其中为凯瑟琳洒下了过多的眼泪，他耗费了自己的精力，而巨受到劳伦斯和赫胥黎在自己广为流传的小说中毫不留情的嘲讽。到了40年代，他在英格兰不得人心至深，掩盖了她和他自己作品的价值；“英国的契诃夫”这么一种概念渐渐地在人们心中扎了根，很长一段时间评论家和传记作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影响。

现在她已获得了自然的死亡——度过了那个通常伴随着位备受推崇的作家去世而至的冷淡阶段，如今可以从头开始，让她的作品的真实性受到重视。

克里斯托夫·马洛28岁时死于酒店殴斗，如果莎士比亚也是那个时候被人刺死，我们就只能发现他不过是伊丽莎白时代有点抒情才能的小剧作家；凯瑟琳死时34岁，如果维吉尼亚·吴尔夫在这个年龄投水自杀，我们就只知道她写过《远航》，别无其他；她不会读到《园会》，也写不出《戴洛威太太》，现代评论似乎也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料可供研究潜在能力和纵向模仿。

伊莉莎白·鲍恩1960年在一段引人注目的引言中称凯瑟琳为“我们早逝的同辈人”。她1911年与默里初次相遇时就已经患有肺病，在班达尔时写下的《芦荟》中可能就留有疾病的痕迹；而从1917年开始所有她的艺术都像济慈或斯梯芬·克莱恩的艺术一样受死亡将临的影响。我们没有理由询问如果她能活下来会怎样，问题本身从哲学上来看就是荒谬的，但人们能够探讨一下如果她能拖得更长一些的话会发生什么——例如长得足够写完那本已构思好了的书——只需安静地呆在小木屋里，有她自己清晰的语言，书目题纲和开头都已拟就，形成一个那本书将具有的概念并非不可能。

默里曾经说过新主观主义小说家，例如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人，似乎尝试“专门表现真实”，而契诃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这一类作家则追求“一种与真实一致的艺术”。到了1921年她确实不再有那个杂念，不再有任何跻

克里斯托夫·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剧作家，对莎士比亚等人的戏剧创作有一定影响。

译注

伊莉莎白·鲍恩（1899～1973），英国女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去年九月》《魔鬼情人》《图景和会话》等。

译注

斯梯芬·克莱恩（1871～1900），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海上扁舟》《梅季》等。

译注

身于当时那时尚知识界的愿望。她夭折的书本来也许会在现代作品中占一席之地，近似于莫里斯·拉威尔的音乐在现代音乐中的地位：无暇疵的听觉，使用现有音调的绝妙技巧，直党的古典风格及其结构、规模和清晰鲜明的轮廓，这一切都适于这种比较。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没有写《达菲尼与克罗埃》的拉威尔，并不因为她采用的形式似乎缺乏重量而被视为一个平庸的作曲家，再说她也并不是能够被忽视的平庸之辈。

与作品密切相关的生活的道德内涵较难评价，我们怎么能评价这么一个生活中常用欺骗手段的人对艺术真诚的追求呢？我们必须探寻生活中难以捉摸的讽刺性，最后，还是让这种讽刺选择凯瑟琳富有同情心的敌人弗丽达从康沃尔写的信——她仍然戴着弗丽达的戒指，“贴近骨头的灿烂黄金手饰”

来作结束语“她必须变得简单、就像我们大家都将学会的那样，但是我的确爱她，虽然她撒谎，但她同时也比别人更了解真实，竭力不让我们看见过多的丑恶事物。”

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他的代表作除本书提到的《达菲尼与克罗埃》之外，还有《水之游戏》《夜之幽灵》《波莱罗》等。 译注

